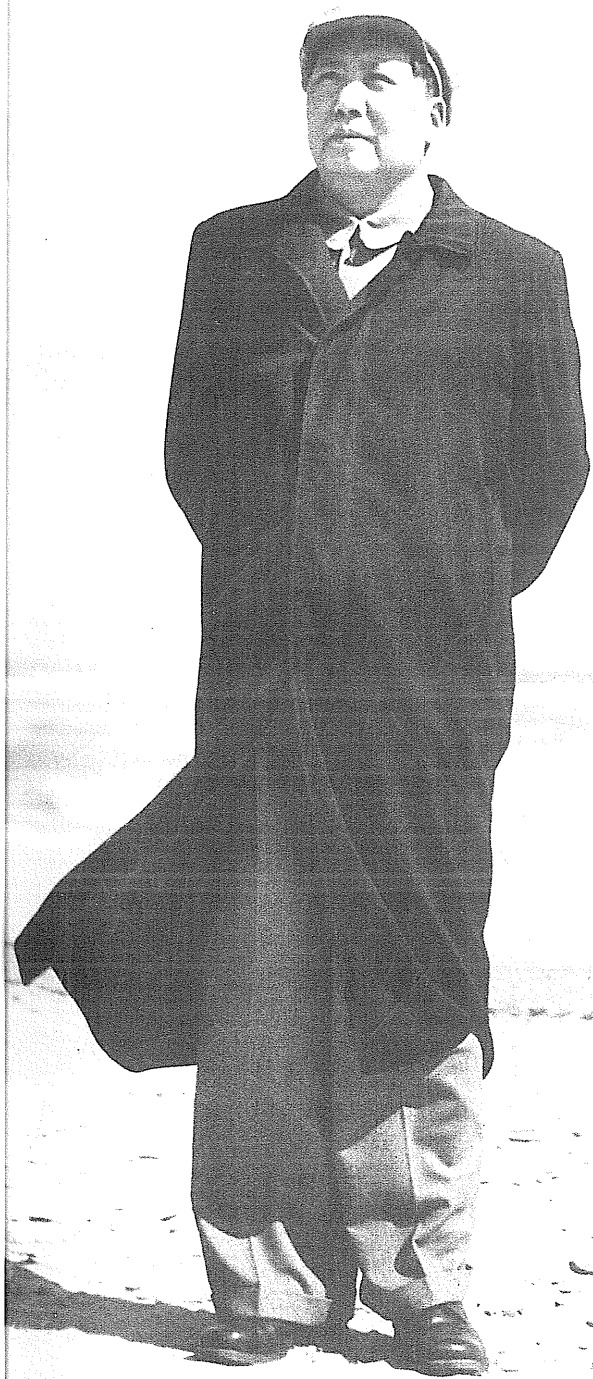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 ……1
（1927年6月22日）
中央农运讲习所给各省党部函*……12
（1927年6月）
考送学生章程*……13
（1927年6月）
中央农运讲习所招生计划 ……18
（1927年6月）
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 ……21
（1927年6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25
（1927年7月4日）
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27
（1927年7月20日）
中央委员宣言 ……33
（1927年8月1日）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40
（1927年8月7日）
湘南运动大纲 ……45
（1927年8月）

湖南民众组织更需要武装 ……47
（1927年8月9日）
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 ……48
（1927年8月18日）
湖南秋收暴动要有军队帮助 ……49
（1927年8月18日）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50
（1927年8月19日）
湖南致中央函*……51
（1927年8月20日）
湖南常委来信*……53
（1927年8月30日）
不打长沙转兵向南 ……54
（1927年9月20日）
给杨开慧的信 ……55
（1927年9月）
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 ……56
（1927年12月18日）
西江月·秋收起义……57
（1927年）
题军旗联 ……71
（1927年）
到安源时之报告*……73
（1927年）
题遂川公审土豪劣绅大会联 ……79
（1928年1月）

为井冈山群众题春联 ……83
（1928年）
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 ……84
（1928年5月2日）
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 ……94
（1928年6月16日）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99
（1928年7月4日）
湘赣边界特委致湖南省委信* ……102
（1928年8月）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04
（1928年10月5日）
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18
（1928年10月5日）
挽王尔琢联……128
（1928年10月）
西江月·井冈山 ……131
（1928年秋）
井冈山的斗争……133
（1928年11月25日）
（井冈山）土地法 ……172
（1928年12月）
红军第四军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76
（1928年12月16日）
和何长工应对联……184
（1928年）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87
（1929年1月）
共产党宣言* ……191
（1929年1月）
筹款公函……194
（1929年2月13日）
告商人及知识分子……196
（1929年3月16日）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9
（1929年3月20日）
敬告士兵群众书……204
（1929年3月27日）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205
（1929年4月5日）
四军军部命令……216
（1929年4月10日）
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218
（1929年4月13日）
〔兴国县〕土地法 ……219
（1929年4月）
农民协会章程* ……222
（1929年5月）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227
（1929年6月1日）
给林彪的信……234
（1929年6月14日）

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249
（1929年6月）
清平乐·蒋桂战争 ……252
（1929年秋）
采桑子·重阳 ……254
（1929年10月）
从蛟洋到达汀州后给中央的信……263
（1929年11月28日）
给李立三的信……266
（1929年11月28日）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269
（1929年12月）
告全国士兵弟兄书* ……314
（1929年）
告绿林弟兄书* ……319
（1929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25
（1930年1月5日）
中国红军第四军告国民党军队士兵书* ……344
（1930年1月）
如梦令·元旦 ……351
（1930年1月）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354
（1930年2月）
土地法* ……358
（1930年2月7日）

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364
（1930年2月14日）
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 ……370
（1930年2月16日）
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 ……373
（1930年3月18日）
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379
（1930年3月19日）
整顿军风纪的训令……381
（1930年3月21日）
关于官兵考绩的训令……382
（1930年3月29日）
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386
（1930年3月29日）
宣传员工作纲要* ……388
（1930年4月26日）
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390
（1930年4月）
反对本本主义……392
（1930年5月）
寻乌调查……403
（1930年5月）

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

（1927年6月22日）

（一）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甲）发展的情形：湖南农运为时不久，然据本年四月份报告全省有组织的有六十三县，会员达五百余万人，农民起来者近千万人。其分布区域，以湘江流域为中心，滨湖各县及资江流域次之，因此等地带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占重要〔地位〕，湖南农民运动为准备北伐工作计，也不能不首先着眼此处，至于湘西一带，因交通不便，又长时间在军阀——袁祖铭等统治之下，所以至今还在开始的时期。（乙）发展的原因：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完全是封建军阀统治的结果，军阀政治建筑在剥削农民上面，其赖以维持政权的最大饷项，即出于田赋、盐税、杂税、厘金，这四项完全直接或间接是农民负担的。湖南农民在张敬尧、傅良佐、赵恒惕、叶开鑫等军阀统治下之惨受提征田赋、加设厘金、增加杂税等，一切层出无穷的剥削，差不多八家九家弄到家空业尽。军阀为贯彻其剥削起见，复勾结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为爪牙。厘金局、榷运局为官吏竞取之美差，六个月知事可得数万元，如此等类的事实归结为加倍农民的痛苦。至于土豪劣绅，为军阀政治的下层基础，政治上垄断乡村政权，利用团防武装实行屠杀，经济上重租重批高利借贷，农民生活乃更堕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整个的封建势力——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层层剥削，

决定了农民只有两条出路：革命与死亡（饿死、冻死、为匪而死等）。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对于农民的利益——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重租重利等曾有广大的宣传，于是湖南农民在饥饿困顿中便蹶然兴起了。（丙）农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贫农是农民中最受痛苦、数量最大的群众，他们没有土地，生活毫无保障，简直早上不知道晚间。在封建政治下面，他们的地位又属于最卑贱，饿与死是他们不可逃的两个命运，因此他们天然富于革命性。富农中人对于革命起始是不生兴趣的，只有贫农才一开始便十分相信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对农民的宣传，毫不犹豫地赞成革命，毫不犹豫地加入农民协会。因此贫农实在是农民协会的发起人，是参加北伐的战士。换言之，贫农是湖南农民的领导者，这也就是湖南农运中的主要力量！

（二）湖南农民运动的功迹。（甲）参加北伐：湖南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第一个贡献，即是领导了农民北伐，湖南农民参加北伐与省港罢工有同样的意义。省港罢工封锁香港，革命政府才有“闭门捉贼”，将陈炯明、邓本殷、杨希闵、刘镇寰等根本肃清，进而举行北伐的机会。湖南农民参加北伐，即使北伐军在极短时间通过湖南，能养精蓄锐而克复武汉。要是说省港罢工创造了北伐，那末农民运动即促成了北伐，当北伐军从衡阳下来的时候，醴陵、浏阳、平江、临湘、华容等地的农民曾以锄头、梭镖实际参加战争。组织侦探队、慰劳队、冲锋队援助北伐，因之农民阵亡者极多，至于送茶、送粥慰劳兵士更普遍全省。（乙）反抗土豪劣绅：军阀政治的下层势力建筑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及团防武装以从事封建式剥削的上面。因此不求打倒封建军阀政治则已，否则除努力为打倒军阀本身外，必须进一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专就农

民解放而言，也必须先从其直接统治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下解放。

湖南农民对于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比任何口号都容易接受，因土豪劣绅为农民直接的统治者！湖南农民指土豪劣绅为“长牙齿”“坐长板凳的”，这都是形容土豪劣绅剥削农民血汗，垄断乡村政权的事实。尤其是农民对于此等“长牙齿”“坐长板凳的”所把持的乡村自治机关，比贪官污吏所盘踞的县政府及一切征收机关更属畏惧，更属痛恨，所以就有“打头张衙门”“铁门坎”的称呼。

湖南农民革命目前的对象仅有土豪劣绅，因主观的力量还不能与整个的封建势力作战，因此贪官污吏在湖南有些地方可以存在，他们队伍中间也没有打倒几个。至于土豪劣绅被农民打倒的，在数量上，可就比其他封建势力多了。但是实际说来，湖南农民打倒土豪劣绅也没有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闹得太凶”，统计全省为农民打倒的土豪劣绅也不过几十，倒是土豪劣绅两年未满的时间，惨杀农民实有可惊的数目矣。所以湖南农民目前只在反抗土豪劣绅，还不能算是打倒土豪劣绅。可是这种反土豪劣绅运动，也就已给湖南封建势力以不少的打击，如宁乡之刘昭、杨致泽，湘潭之晏容秋，华容之梅实，长沙之俞敕华等，均为土豪劣绅队伍中坐头一把交椅的。从这几个巨子明正典刑后，湖南的封建势力可算是挫折了锐气，这一点湖南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实在建了伟大的功迹。（丙）建设了太平盛世的乡村：任你把湖南农村的骚扰现象说得如何动人，但即算是一个土豪劣绅的巨魁，在心里头或者竟致于口头上，也不能不承认目前的湖南农村，比他们这些“老爷”（湖南农民对地主的称呼）当权的时候，倒有太平气象。

满清末年起，政府即三令五申地禁鸦片，但事实上，在军阀统

治之下，禁烟局本来即是卖烟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哪怕你拿着烟枪躺在十字街头，也没有人问，被查处罚的却尽是一些小烟鬼和没有势力的，请看武汉市上的特别雅室、广州的谈话处之多，便可想见禁烟的滑稽。然而禁之二十年不但不曾禁绝，反而有长足发展的鸦片，湖南农民已起来的地方，以最短的时间，却一点一滴都禁绝了。

土豪劣绅的烟枪给农民劈尽了，区乡农民协会议决，发现秘密吸食的罚款游乡，果然有许多颇有面子的绅士先生唱了几出戴高帽子的把戏，从此湖南农村谁也不敢在虎头上捉虱，再干那吞云吐雾的勾当了。

至于赌博，农村童子团挨家搜索麻雀牌及其他赌具，当场付之一炬。旧习新年，乡村照例大开赌局，喝雉呼卢闹个不休，可是现在的新年娱乐，旧有的却留下的龙灯狮子着换，新增的却有演讲会、提灯会、群众大巡行等类，著名赌痞们，也只好跟着大家丢手。

三寸金莲，在北方以至于九省通衢的武汉还不算稀奇的事，湖南的穷乡僻壤，过去本也不少，可是现在农民协会的女会员，已经穿起草鞋，跟着大众背起梭镖进城游街了。还不止此，湖南农村女子公然有些自办小工场，下田耕种的了。

乡间还有几件事，连最凶的土豪劣绅也背着在啧啧称赞的，即是修塘坝、筑道路、垦荒土，任何人（包括地主）的塘坝要是壅塞，农民协会即下令开挖，工程完后，即与地主交涉，照实数给工钱。乡村道路素来不注意的，可是现在差不多每一处都给修好了。羊肠小径已变成丈多宽的通衢，真算是行旅称便，地主们惯于把持荒山荒土任其荒芜，农民协会便出名租借交会员开垦。

从事这三件工程，修塘坝、筑道路、垦荒地的，尽属贫农，这

是区乡农民协会议决安插贫农的方法。乡间因没有过分失业的危险，偷盗案件也就绝迹了，人们所梦想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湖南农村是一步紧一步地向这个现象走的。

此外办教育（捐钱设夜学）、破除迷信（观音殿、财神庙变了会场，神像抬开换了孙先生遗像），已成为农村极踊跃的工作，高贵的士大夫，一味空提倡，却不如平凡的农民马上见诸实行。

总而言之，农民运动已给湖南农村一个新的气象，民主主义的新气象，振兴工业生产、改良风俗习惯、救济失业，这都是湖南农民已有成绩尚不曾稍懈的工作呵！

（三）湖南农民运动的趋势。土地问题的解决，一切农民们急迫的要求是四个大字："土地国有"，根本推翻封建势力的经济基础，完成国民革命中的经济革命。农民是竭诚参加革命的，可是他在革命中不会忘记他的目标，倒是因革命更使他对这个目标增加了渴望。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跨过了先进的广东，因此他比其他各省更早、更明地告诉我们，他前列的战旗，即是"土地国有"，根本铲除封建势力。过去几个月农村中即流行一种口号"平均佃权"，这纯粹是贫农阶级喊出来的，这个农民式的口号的意义，即是反对垄断土地。农民协会会员中占多数的贫农分子，多主张按当地农民人数平均佃种，这个办法当然是行不通的，于是发生了"禁佃"的纠纷，这个现象完全是贫农丧失土地所致。还有个流行更为普遍的口号，在一般知识分子看来，简直是笑话，即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平等"。农民口中所说的不平等条约，不是什么南京条约、辛亥条约，而是关于苛刻征取地租的"佃约"，如最流行所谓"东七佃三"及"无息押金""田鸭""田蛋""田草"，逢时逢节送"人情"（即礼物）给地主，遇地主婚丧，有做工不受工资的义务等苛例陋规。这

些在农民尤其是贫农，以为便是国民党、国民政府所宣传要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看来真是好笑！可是这其中却含有贫农要求土地的意义，因所谓不平等条约的“佃约”、苛例、陋规，贫农固受害不浅，尤其是使贫农永不能有佃田的机会，贫农丧失土地，生活陷于极困苦的地位，是其能踊跃参加革命，胜过其他农民的唯一原因。农民自定之“平均佃权”，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即万一能够见诸实行，也完全是治标的办法，而不能将土地问题根本解决，因土地仍归为大地主所垄断，农村经济仍停滞于封建状态中，因此农民乃进一步发出所谓“平等”的呼声，即孙总理所谓“耕者有其田”，孙总理可说是预先看到湖南农民运动的趋势了！

湖南农民对于土地已经有二十分的急迫，在“平粜”“阻禁”两件事上更表现得显明。西欧农民的希望是产物价格增高，然而在市场上时常是产物还不及工业品的高贵，而发生所谓“剪刀”问题。在湖南却是相反的现象，农民协会普遍地抑平谷价，阻止谷米出境，实在说来这不算稀奇，不过是一个土地关系。西欧之农民都是有土地之小农（在机械生产的农场耕种的，只能算是工人，自当别论），所以他总希望谷价增涨，湖南农民也可以说中国农民，可就不然了，农民中贫农占百分之九十，这种贫农都是丧失土地，或者有土地而不足的，他们的食谷是要从地主富农手里用重价购买的，因此对于农产物价格的态度恰与西欧农民取一种相反的形势，就是希望谷价更贱更好，根本原因是高租重利的关系。“平粜”“阻禁”的确能给其他有土地的农民以不利，对于农产流通、政府财政的妨碍也毋庸讳言。

然而这完全是一个土地问题，要解决也只有土地问题解决以后才有可能。只要每一个农民都能够有够耕种的土地，那时农民站在

小农的利益只会希望谷价增涨，决不会发生“平粜”“阻禁”，否则任你如何救济总是徒然。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对于“平粜”“阻禁”，曾有“按照当地所需食谷存仓外”“一概放行”的议决，省农民协会更三令五申实行禁止，但结果依然。因贫农嗷嗷待哺，饿肚皮使他在没有更好的方法而存仓又事实上做不通的时候，便以群众的力量，继续维持“平粜”“阻禁”的老法子，不能给与土地，要禁止这种农民式的方法，谁也不能够的呵！中国农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所以总理说“国民革命成功在农夫工人之参加”，但是怎样使农民参加革命？给农民以所需要。农民的向背，是国民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准，湖南农民运动已显示给我们，土地问题实在是国民革命议事日程中最先待解决的项目。

（四）湖南农民运动的障碍。土豪劣绅之进攻——我始终相信湖南农民目前还够不上说打倒土豪劣绅，而只能说是反抗土豪劣绅，许多人尤其是不明湖南真相的外省人，惯于一口咬定湖南农民闹得太凶，杀土豪劣绅太多了，事实告诉我们却是相反的。上面说过湖南被杀之土豪劣绅不过几十人，而农民被土豪劣绅残杀的却有可惊之数目，赵恒惕时代，以土匪为名，共杀了一万以上。除开我们有意抹杀事实，人人知道湖南农民的革命，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湖南土豪劣绅的残酷狡猾，比任何省区都厉害。湖南农民运动当前的最大障碍，即是整千整万的土豪劣绅，湖南农民与此等土豪劣绅的中间，只有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整个的土豪劣绅的阵线，是拼命地在向湖南农民进攻呵！

他们进攻的方法，最阴狠、最残酷的，分析起来一共有六个：

（1）利用团防实行屠杀：团防局、保卫团、民团、警察所，在湖南本来露骨的是地主的镇压农民武装，在赵恒惕时代更为军阀政

治的真实基础，如宁乡大地主童氏为赵氏岳家，童氏在宁乡可以任意调遣全县团防。这种地主的武装，在军阀时代是实际的乡村政府，是统治农民的直接机关，逮捕屠杀农民简直变成这些“局长老爷”的家常便饭。只要土豪劣绅鼻子里哼一声，农民便有“进局”的危险，宁乡杨致泽办团防时，并杀四百余人，并没有罪状。刘昭办团防的时候，有一次两个乡村竞玩龙灯，刘昭唆使所住乡村的乡人与其他乡人争斗，一铁匠骂刘昭的娘，过了许久，刘昭带团兵去外查案，路遇铁匠上山进香，刘昭即喝令团兵捆缚，挖眼截舌，又割断阳物插铁匠口中，大骂：“你还骂娘吗？”牵走五里，始行枪毙。各县团防私用非刑更属普遍，农民稍不如命，即以土匪之名，实行“挂半边猪”“踩杠子”“坐快活凳”“断脚筋”“鼻熏辣椒”“倒挂”等使人战栗的刑法，因此农民不“进局”则已，否则不死也成残废。

北伐军经过湖南时，而宁乡、湘乡、安化团防预备齐集雪峰山为赵氏作最后挣扎，湖南团防在土豪劣绅指挥之下，纯为反农民运动的工具。益阳泉交镇团防局不参加区党部成立典礼，大队巡行之农民，经过团防局时，质问局长不参加理由。团防局毫不答话，即开排枪，当地立毙农民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嘉禾团防局长王泽民在团局大开赌局，被农民禁止，即枪毙农民王老四，并抄掠农民财产多家。茶陵团防局秘密将假期回乡宣传农运学生一人，以洋油、柴薪活捉烧死，尸首粉碎，丢弃灭迹。此外团防局勾结土豪劣绅以武力企图消灭农协的事实，差不多月有数起。

（2）勾结土匪：农民运动兴起，土豪劣绅所把持之乡村政权已大半倾颓，因之其所有之武装——团防局渐次失其统治的效力。许多团防局已自行解散，存者又为正绅所管理，土豪劣绅为继续进攻

农协计，便不得不舍弃团防而寻找新的武器——土匪了。安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杀农民二百余，差不多在省农协的卷宗十件中有九件报告着，土豪劣绅聚合匪类，饮雄鸡血酒，指天发誓，打倒农协，杀尽特派员的举动，湖南农民在土豪劣绅勾结土匪这一个方法之下，的确牺牲了不少。

（3）组织反动团体：利用团防，勾结土匪，还是一时的行动，土豪劣绅进一步企图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便组织反动团体以团结势力，并以为指挥反革命的中枢。湘乡有镇乡维持会，衡阳有白化党，醴陵、浏阳有三爱党，醴陵有打狗会，所谓狗者即指农民。保产党更为湘中普遍组织，这些团体专在对付农民，凡各县惨杀农民、捣毁农协等举动，都是出自这些反革命、反农民运动的参谋部的计划。有些地方这种计划虽为民众破获，但其组织，并不曾解散，千方百计进攻农民正在一天天猛进呵！

（4）混入农协：这是一个更阴毒的进攻，在许多力量薄弱、指导者没有力量的地方，狡猾的土豪劣绅便戴着一副假面具混进了农协，从中捣乱，侦探虚实，尤其是故意提出过高的口号，做出越轨行动，以破坏省农协一贯的政策，或转害革命的农民。农民运动失却革命民众的同情，十分之九是出于这班土豪劣绅的奸细所赐。

（5）组织御用农民协会：土豪劣绅知道农民运动万难用武力阻止，继续以团防、土匪、反动团体明目张胆地进攻，只是以卵击石，惹火上身。聪明的土豪劣绅决不做这样“猪头式”的勾当，于是转而满口赞成农民运动。有一个时期，差不多每天都有几批肠肥脑满、尖口利嘴的人物到农民协会来索取简章，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他们是打着两树大旗——家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号召家族，农民协会在各县曾不断地发现，团结一姓、反抗外人是他们的口

号。此外土豪劣绅多声称入其所号召之农协，可吃便宜食谷，或可得金钱以号召同姓或佃户，并千方百计愚哄上级机关承认其为特别区乡农协，以遂其利用窃取的阴谋，而从容置农民运动于死地。

（6）造谣中伤：湖南土豪劣绅，第一等逃往上海，第二等逃往汉口，第三等逃往长沙，这是湖南土豪劣绅在农民反抗以后的普遍行迹。他们是犯了滔天大祸，幸逃法网的罪犯，可是在逃亡中，他们还是不曾放弃他们反农民运动、反革命的工作，最大的最厉害的方法即是到处拼命造谣。这个阴谋实在比上面这些方法更来得严重，什么农运是共产公妻，兵士六个月不回家，妻子便由农协公去，某军长、师长的家财被充公，父亲被杀等无稽之谈，以挑拨革命军人与农民的感情，并使农民在革命民众面前失却深厚的同情，而陷于孤立的地位。目前在汉口，这种反宣传即极其发达。

（五）湖南农民运动的缺点及今后的方针。革命者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他只有从不断的进行中，了解他的错误，以求补救。湖南农民运动决不会有像土豪劣绅在各地反宣传那些奇怪的事实，如公妻共产之类，错误就是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就是从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中间，稍忽略了小地主、小商人的利益。但是这个错误的原因，革命政党，尤不能辞其咎。几千年压迫下面的农民一旦起来，他的行动自不免带种种幼稚的行动，要是革命的政党能够取得农民的领导，农民在革命的政策之下作战，定不会有这样的错误的。可是现在农民运动如飞的发展，党在事实上落了后，以湖南言，几百个农民中不能找一个农民党员，所以革命的政策决不能深入农村而为农民作战的目标。今后的我们，唯一的方法只有在农村极力发展国民党的农民，努力地取得对农民的领导，继续实行下面的六个政策：

一、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的财产。

二、保护革命军人的土地及财产。

三、保护中小地主、小商人的利益。

四、从速实现中央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

五、建设革命民主的乡村政权。

六、武装农民。

中央农运讲习所给各省党部函*

（1927年6月）

迳启者案奉中央党部决定续招第二届学生，贵省党部□□□□生□名，兹将考送学生章程奉上，即希查照办理。惟须有特别声明□□□□一招生经验届各省考送，学生有未能按照考送学生章程办理，致□□□□窒碍，及不经□之事实：如学生身体之未详细检验，入所旧病即发□□□□能上课，这回则白费川赀；学生并无农运决心，不能接受严格军事□□□□途他去，服装被帐之不带整齐，入所即感缺乏。供给为难。此皆由□□□□慎，通知未周，致办理者与考送者，皆蒙不和。此届考送学生，务□□□□个，即能训练成材，有一个作用。特此函达，即希察照见复□荷。

考送学生章程*

（1927年6月）

一、名额　（各省名额见招生计划）不能超出规定数目，学生分配，以注重交通为要，政治中心，农运需要的地域，将该省总名额分配于各县。由县党部按照本章程，考送省党部。

二、资格　学生以由各县考送，来自乡间者为最好，其资格如与下列不合者，到所时绝不收录，并不负责遣回。

甲、思想　革命观点确定，无反动思想。

乙、学历　中等学校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小学教师。

丙、决心　向党部填具志愿书，决心入所后服从本所纪律，接受严格训练，毕业回到本省乡村做农民运动，无他臆想者。

丁、身体　强健耐劳，确无肺病、痔病、神经衰弱、花柳等病，及其他痼疾，在所能服严厉军操，到乡能走远路（省县党部须负责行个别严格检验）。

戊、年龄　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

己、性别　一概男生。核

三、考试　由县党部考送省党部，省党部加以复试，以定去取。考试分笔试、口试。笔试科目：国文、□□、历史常识测验（本所□□复核如认为不合格即行遣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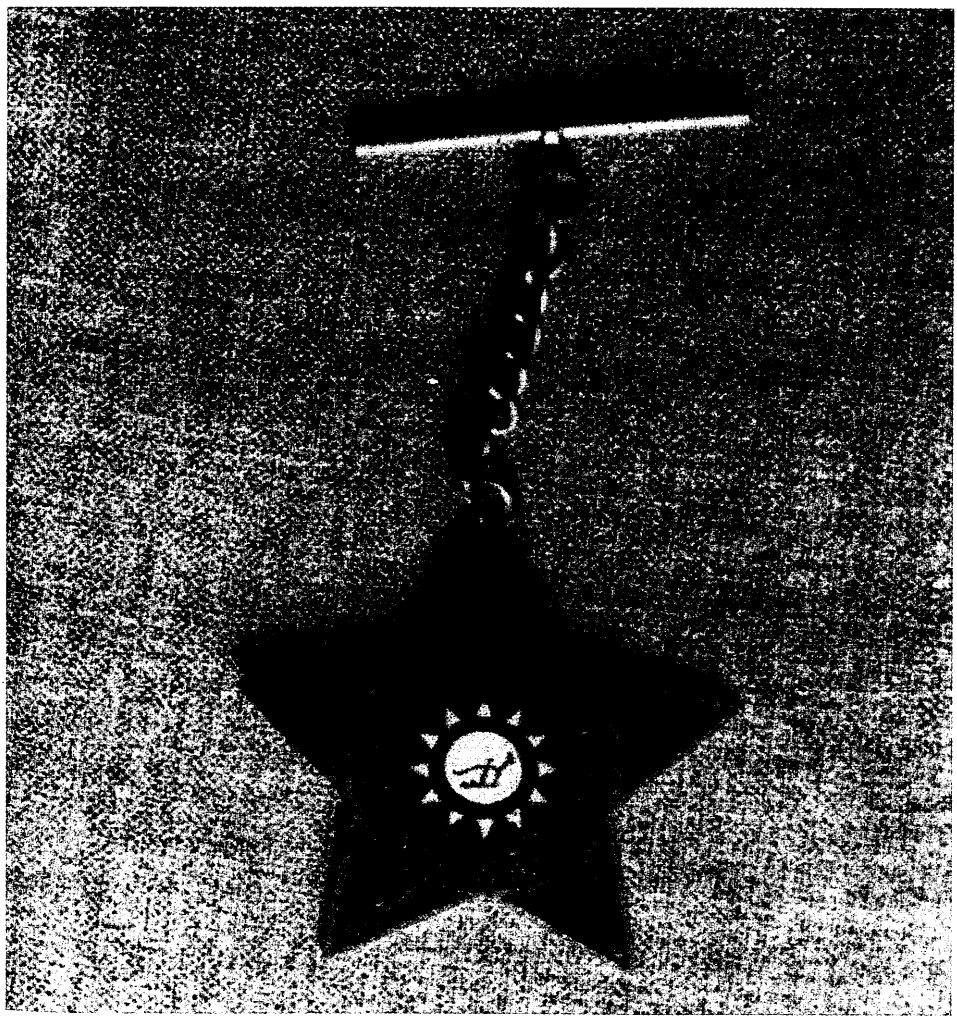
四、待遇　来往川资，由所供给，每人□□元，不收学费。制服由所供给，单制服两套。毕业后派赴乡村，担负农民运动工作。

五、学习期间　九月一日开学。

六、到所日期　限八月二十七日起到三十一日止，为到所时间，迟到早来，均不收纳。

附学生须自行携带之物件表：

一、面盆、手巾、漱口盂、牙刷。二、短夹裤、短棉衣、棉裤、换洗里衣。三、鞋袜、皮鞋。四、棉被褥全副。五、小箱□口。六、笔墨。七、洗衣剃头零用。上列各物必须自行携带齐全，如有缺乏本所概不供给。



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学员毕业，大部被委任为农民特派员，或回乡从事农民运动。图为农讲所发给学员的毕业证章。



《送学员》（油画）



《红日照征程》（中国画）

中央农运讲习所招生计划

（1927年6月）

一、学额　一共六百名，第二期学额分配，应注重北方各省尤应多招直鲁豫三省学生，湘鄂赣农运人员已有相当准备，暂不招生，其他各省，则酌量支配。

省　别	学　额
鲁	八十
直	八十
豫	八十
陕	五十
晋	五十
川	五十
皖	三十
苏	五十
奉	三十
热	十五
察	十
绥	十
闽	二十
浙	二十
其他	二十五

二、开学日期　定于九月一日。因第一届须六月底始能结束，结束后，须稍有休歇时间，整理一切，且北方各省招生，亦须相当时间，故须九月一日，始能开学。

三、招生办法　学生仍由各省党部依据第一期招生章程，负责考送。

四、课程训练　根据第一届所定办法办理。

五、学习期间　仍定为四月，即今年十二月底毕业。

六、班数　仍为四班，依第一届之经验，每班学生人数过多，管理训练，极形不便。故二届学生，应酌量减少，第一届每班二百人以上至二百五十人，第二届应减至一百五十人，故六百人仍为四班。

七、经费　第二届经费支出及收入，均与第一届有不相同处，即第一届经费有四万元，系湘鄂赣三省党部负担，第二届经费，须完全由中央负担，因北方各省，尚无能力分任也，又第一届学生来所，并无路费，支出回籍路费，□比较不多，第二届学生则来所回籍，均须发给路费，故路费支出，为数甚巨，来往路费共三万元，预算如下表：

省　别	每名数（元）	共计（元）
鲁	五十	四千
直	五十	四千
豫	三十	二千四百
陕	七十	三千五百
晋	六十	三千
川	八十	四千
皖	二十	六百

省　别	每名数（元）	共计（元）
苏	十四	一千二百
奉	八十	二千四百
热	七十	一千零五十
闽	四十	八百
浙	三十	六百
察	七十	七百
绥	七十	七百
其他		一百零五

经常费共六万六千元。

（说明）依第一届经验每学生一人四个月需用费一百一十元，六百人六万六千元。

以上两项，共需九万六千元，拟由七月份起，仍按第一届，向中央支领一万四千元之数，则中央每月支出之预算，仍然不变。

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

（1927年6月）

为令遵事：前此蒋、夏诸逆，相继叛变，均以反对农工运动为旗帜。此虽反革命派一贯之口号，而非农工运动本身真有所谓过失与否之问题。但一方因革命潮流飞涨，初期农民运动之原始现象，未能完全免除，他方面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中国农民运动，已进到一个新时期，必须采取新政策，更能顺利执行起见，再指出下列五事，务望各省农民协会，并转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照办理：

一　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

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因为发展甚速，难免有土豪劣绅等不良分子乘机混入，以遂其破坏农民运动之企图。他们每每假借农民协会名义，做出种种妨害大多数农民利益及农民协会名誉之事实。现欲改正此种不良事件，必须多数农民积极参加各级农民协会，各乡区农民协会更当尽可能地随时召集代表大会，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发现不良分子，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并为执行新政策起见，各级农民协会，应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增选新职员，增加新的指导工作人员。同时使耕田的贫农、佃农、

雇农及自耕农，成为农民协会之坚固的社会基础。

二　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

农村中的小商人为流通金融之主要分子，并与农民同立于被压迫的地位，农民协会应即领导农民，与之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煮酒熬糖，以及其他商品，虽为商会之利益，同时亦与农村经济有关，农民协会必须予以保护。农村谷米，在乡村自治机关未成立时，应由农协计算农村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而军米亦得充分的供给，农村中之其他重要出产品，未宜与城市商业发生良好的经济关系，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以前有些地方，因为抽捐派款及其他原因，遂使城市商业与农村之关系日益恶化。今后对于此种情形，亟宜纠正，并当有组织地扶助商业之发展，以防奸商过度之剥削。对于革命军人之家属及财产，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已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指导农民，予以切实保护，此项工作，目前尤须与慰劳救护革命军人之运动，一致加紧进行。

三　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

乡间禁酒席、禁斋果香烛，反对一切迷信及宗法社会之旧习，改良乡间妇女之地位等运动，因为打破封建社会恶习之必要的行为，但必经过长时间的宣传，使一般民众俱能了解，社会文化上已提高，方可行之而无碍。倘必操切从事，则不惟得不到良好效果，及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

以破坏乡村的革命联盟。

四　开始乡村建设事业

乡村自治机关之建立，为镇压反动封建势力，巩固农民已得胜利，消灭乡村无政府状态而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新环境之重要工作。已由本会呈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各级农民协会，应即联络乡村革命平民，努力进行，务于最短时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农民银行、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及其他建设事业，各级农民协会，亦应与其他革命平民，共事建设。

五　加紧宣传工作

农民运动一有相当发展，土豪劣绅等及封建势力，除一面集中力量，残杀农民外，一面复收买走狗，捏词诬陷，造谣煽惑，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对于组织协会，既无经验，幼稚行动，万难全免。土豪劣绅更复小题大做，以耸听闻，夏逆叛变以后，其行动尤为猖獗。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非常懈怠，土豪劣绅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之宣传，遂得以充满于乡村城市，甚至革命同志，亦受其影响而怀疑农民运动，以后各级农民协会，不但要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呈露于革命同志、革命民众之前，用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并真实地将农民运动详细情形，尽量发展出来，使上级农协得以随时指导其工作，纠正其错误。对于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更须作一度很普遍的宣传，使一般农民俱能彻底明了农民运动的新方向，而积极按照

本会所示径途，努力工作。

凡此五端，均为巩固革命联盟，促进国民革命之要务，各省农民协会必须领导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行，倘有奉行不力，或阳奉阴违者，本会必当伸以革命纪律，立予改组，其有反动派假借农协名义，滋生事端，或捏词诬陷者，各级农民协会，转请政府立予扑灭，毋使滋蔓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

谭延闿　谭平山　邓演达　毛泽东　陆沉



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一家在武汉的住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27年7月4日）

一

长沙事件为何键夺唐生智政权。唐生智本欲拉我们反何，但见我们没有力量，遂拉拢何键部下打何，故唐不能打许克祥。

二

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几个师和军反蒋，应促成唐生智和何键分化，拉唐反蒋。

三

有两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二）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讨论湖南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讨论联合唐生智反对蒋介石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关于省农协策略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此外尚有两条路：（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

（1927年7月20日）

（一）近年农民运动的进展，已表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这一革命在中国目前已经受了一个挫折，其原因：（1）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不强健，换言之，即无产阶级主观上的组织力尚不能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这一革命联盟；（2）工农武装没有建设；（3）我们党动摇不定政策的错误；（4）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所谓革命军的阶级性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不能担任新的历史使命——土地革命，他们由限制工农运动而进到反对、屠杀工农的整个的反革命，这种叛变是历史的必然，证明了革命的深入丝毫不足惊奇，我们党的责任只有坚决地与这种新的反革命奋斗，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这是目前革命的客观情势，要求我们一个新的策略上的答复。

（二）现在全国农民，整个的在新旧军阀之下喘嘘地活着，十几年新旧军阀战争的负担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最大部分架在穷苦农民身上，在北方，苛捐苛税的繁重已经迫使大多数的农民抛弃土地，得不着生活，南方各省，农民的痛苦与北方无异，屡经奋斗所得的些许自由，又重新完全被剥削。无论南北大多数遭受过度的压

迫的穷苦农民（佃农、半自耕农、雇农、失业农民以及大部分自耕农）他们已经觉悟起来，到处和他们的敌人奋斗，尤其在南方自李济琛、唐生智之屠杀以来，农民之反抗奋斗，更加英勇而坚决，同时新旧军阀因为他们彼此间的冲突和内部矛盾，不仅不能建设一个统一的反动政权，反而一个一个很迅速地正在继续崩溃下去。因此全国的革命潮流，表面上虽似一时的低落，实际却是继续往上涨。目前的反动局面只是革命转到解决土地问题这一阶段时阶级冲突的反应。我们的党只有坚决地站在这个土地革命的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怎样开发土地革命的潮流呢？只有敏捷地认清客观情势，抓住每一个机会，提出适当的口号，领导广大的群众继续不断地争斗才能达到此目的，此时，“不缴苛捐苛税”“不缴预征钱粮”“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取消高利贷”“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及一切公共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旧军阀”“实现革命民权”“实现乡村农会政权”“民选县政府”“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武装”“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抗租、抗税之自由”等口号，应当是开发土地革命的总的动力。

（三）在北方各省如直鲁晋豫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多数，他们苦于繁重的税捐日益破产，流为土匪或逃亡他省。在这里我们要以自耕农、贫农、佃农、雇农为中心联合一切农村穷苦民众及小地主结成斗争的联盟，反抗一切苛捐苛税及预征钱粮，反抗一切战时的征发，实行减租二五，同时从这种斗争的发展中夺取乡村政权、夺取武装以至于没取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等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及地户。

在南方湘鄂赣粤等省则佃农占多数，次之为自耕农半自耕农，

佃农受地主重租的剥削，同时自耕农、小地主则受军阀税捐的剥削极为繁重，我们应立即于实行二五减租，反抗苛捐苛税预征钱粮的口号之下实行罢租罢税，一面借以揭破武汉南京政府减租减税的伪善面具，一面以佃农自耕农贫农为中心团结一切农村穷苦民众以至于小地主，进行严重的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夺取农村政权武装于农民协会之下，以至于没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的土地以开展土地革命。这是我们现在应用全力宣传聚集农民群众力量而实现之的口号。

无论在什么地方，反对超过年利百分之二十的高利贷的争斗应彻底进行，因为这是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共同要求。

（四）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必有夺取政权的争斗，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在南方各省如广东湖南，虽则农民运动的主要特点已经进到没收大地主，其实农民如果没有取得政权，单纯地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依湘粤的经验，这个分析是丝毫没有错的。

所谓政权的争斗，就是要建设农民的革命政权，换言之即农会政权之建设。在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政治联盟，因为农民协会，事实上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耕地的或失业的），包括了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同情之小地主也经联合在农民协会之内。所以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穷苦农民联合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会政权。这是乡村政权的一个正确的形式，要开始在各地实现起来。

（五）根据两湖农民运动的经验，应当指出在农民协会组织上要

特别注意的几点：

（1）每一省农民运动要把我们的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占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宁可为求这些区域的深入而暂缓扩大，万不可只求扩大而忘记了中心基础工作。

（2）农民协会既团结了一般农民群众、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小商人，并且在一定条件之下，小地主也包括在内，则农协各级领导机关的成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大概小地主一般的不吸取在领导机关内，此外在区执委内，佃农、自耕农、贫农、失业农民至少各占五分之一，在区执委内小学教师的当选是有必要的。

（3）各级农协设立妇女部及青年部，乡村儿童运动及儿童团体完全受农协青年部之指挥，农妇概加入农协不另组织女界团体。

（六）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但是现在所谓革命军实际是在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军官领导之下，到处屠杀农民，武装冲突已成为农民运动中极普通的现象，因此在现时阶段中农民运动确是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每一个农民运动者如果没有十二分注意这个问题而谋给予正确的答复，便等于没有准备农民革命得到胜利。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今指出几项大要的办法如下：

（1）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

（2）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员有组织地投到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并用种种方法时时进行破坏其组织夺取其武装的工作。

（3）对团防局、保卫团等地主阶级的武装在不能即刻夺取其武装时亦采用上项的办法。

（4）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

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 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B. 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 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5）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万不可一开始便去攻击其反动领袖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破除迷信，这种机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众拥护的。同时如过去只知联络其领袖或借军事领袖的招牌去号召也是不能收效的。

在南方一般以“劫富济贫”为标语的会匪，在农民革命的高潮中又输入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同时他们的行动也能与农民协会接近甚至团结在农协之下。本来他们多半是失业农民或将近破产的农民，他们的经济口号如“劫富济贫”就和“没收大地主土地”接近，他们自然是地主阶级的仇人，是城市反动军队的敌对者（在没有被他们的反动领袖拍卖以前），假使能领导他们上正确的革命的轨道，一定可以成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帮助者，但是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是异常之恶劣的，他们的领袖多半是带有候补军阀的性质，因此他们得不到正确的政治的领导走上革命正轨为一定的目标而奋斗，而以“打家劫舍”为惯常生活，其行动与思想完全随其领袖为转移，因此我们要懂得会匪在农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一面又要明白他们走向反动的可能性，我们的目的便是要增进他们的革命性和革命训练，使之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而成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帮助者，其方法与上项大体相同。

（七）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过去是没有能够相当地尽其领导责任的，许多地方虽然能有十万几十万的农民群众的争斗，但每每只是

几个同志在那里活动，而党的组织在那里尽其领导责任，有些地方虽然有党的组织，但没有深入群众（都只在区协没有到了乡协）或者虽有组织而不起作用，或者便是农运负责同视党和集体的领导而习于个人的活动，因此，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感觉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概。党在平时既不能尽其组织上积极的责任，□时，自然更不能希望其成为唯一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如果本党的领导能正确地在农民中建立起来。那末，第一，要使党的支部能够深入到乡农协，并□□正成为群众争斗的核心。第二，党对农民的指导必须经过党团（改正过去□□领袖的错误），党团要绝对服从党的指导。第三，各省党部的农民都要□地建立起来，对一省的农民运动每次定出一月或两月的计划，督促并□各级党部切实执行。

中央委员宣言

（1927年8月1日）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急时期，幸能无大陨越。今者党国危机，更等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将最近事态之真相，与全国同志唯一之奋斗途径，掬诚敬告我全国同志。溯自去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来，具见革命进程中仍不免有少数拥有武力之野心家，企图勾结反革命势力，以逞其□党自重之私意。当其时也，同人等顾念革命全局之利益，冀能促成北伐发展广大民众势力，则必能裁制野心家之阴谋于一日，故一年之间不惜降志辱身以与蒋中正等相周旋，未敢稍自离弃全国同志，置革命前途于不顾，一走了事自命清高。迄至今年春间，蒋逆中正始则欲移党部政府于南昌以遂其反动独裁之私；继则公然叛变，割据东南，勾结军阀买办，残害同志，屠杀民众。如是全国同志为党国存亡计，始发动恢复党权之运动，而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亦于是举行，通过各项巩固革命势力之决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危而复安者，间不容发。唯此恢复党权运动，全赖全国同志之一致努力，始能与蒋逆中正以重大之打击，重振革命之前途。但唐生智等武人亦起而投机，借口拥护此种运动，以遂其倒蒋而自增势力之私，同人等明知此等武人对于

革命毫无诚意，将来难免危害党国。然亦只有根据总理遗训，使本党获得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始能巩固革命之基础。故对于两湖广大农民运动之发展，以及农民群众进入为解决土地问题及建立乡村自治之革命行动，认为不但不应加以压抑，而且认为系本党“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渐得广大农民之认识。广大农民有此认识与运动，方能摧毁封建之残余势力，以为本党革命势力及民治民有民享之新中国取得切实之保障。不图第二次北伐出师以后，唐生智部将何键即开始谋叛。嗾使夏斗寅等潜袭武昌，暗令许克祥等发难长沙。当此危急时机，武人之与勾结者拥兵坐视，不肯协力剿办。中央党部少数软弱领袖，震于反动之声势，不免动摇软化，对叛逆武人不敢毅然加以相当之惩治。同时，江西朱培德因谋于蒋氏妥协，有驱除革命分子停止工农运动之事。此少数领袖，亦曲予优容，视为当然。冯玉祥入豫以后，更公然赴徐州与蒋逆会议，致电威胁中央罢免军队中一切政治工作人员。此少数领袖亦无制裁能力，且不能不虚与委蛇决定，以自乱其步趋。中央党部在此少数软弱领袖指导之下，威信完全坠失，但知仰武人鼻息，以中央神圣之决议，徇其私利。于是武人之气焰大涨，党与政府完全成为武人之一种工具，唐生智回湘，更任意改组省政府、省党部，并将屠杀政策推行不已，全湘忠实能奋斗之党员与农民断腰折躯者数以万计，全鄂以五千计，而武汉中央对此数万同志之被害，一则曰此多共产分子，再则曰彼辈不服从中央命令，自由行动，三则曰“耕者有其田”“应以政治与法律来解决”。今则事实显然，无可掩饰。两湖之被害者，其一部分为加入本党忠实革命之共产党员外，未加入他党之本党党员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此万数党员，均系根据本党农工决议总理遗训，在农工群众中艰苦工作，今为反动武人如此残杀。武汉中央

则加以违背中央命令之罪，其卖党、卖同志，一致于此！总理遗训谓不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今武汉中央则以政治法律保障唐生智等屠杀党员及工农，亦即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屠杀农民问题。此是总理之本意?！唐生智、何键等复在武汉首都横行无忌，包围中央党部，占据民众团体，劫掠中央银行，逮捕中央委员，搜查总理夫人宋庆龄同志、外交部长陈友仁同志住宅。中央党部复在此种反动武人威胁之下提出分共之议，欲借此排斥一切忠实党员，以便于武人反革命之企图，卖党无耻，如斯其极！分共之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未能通过。彼等仍欲号召八月十五日之中央全体会议。同时在武汉及一切在彼等权力以下之各机关已开始捏造曲解种种事实，大为反共之宣传，企图强迫中央委员通过彼等所提出之议案，以掩饰其非法谋叛之逆迹。同人等目睹此等情形，知武汉少数领袖已甘心受武人挟持，卖党卖身。若犹隐忍不与奋斗，助成其叛逆之计划，将何以对全国同志托付之重，何以对总理与本党先烈？是以决意先后离汉，为革命与本党前途，将尽力所能及，以领导全国同志为保持本党革命的正统而奋斗。尤可痛者，汪精卫同志向居本党领袖地位，此次竟以模棱两可致受群小包围，终屈服于军阀武力之下；屈服以后，犹复巧鼓簧舌，淆乱听闻，言辞矛盾，举止反常。凡其所为，与其回国之初，迥若两人。总理临逝世时，虑党中领袖或不免受敌人软化。总理逝世不及三年，党中旧的领袖竟大半为敌人软化以去。言念及此，痛心何极！同人等顾念总理四十年造党之艰难，与全国百万革命同志期望之远大，不能坐视本党荣誉之历史为此等少数旧领袖所断送，兹特郑重申明，近日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名义所发布之一切训令决议，同人等概未同意，不能负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

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与陈炯明、杨希闵、冯自由、谢持、邹鲁之辈实殊途而同归。北伐之牺牲，必须能达本党总理之遗志，拯救民众疾苦，解放工农，以发展革命势力，倘如今日新旧军阀相缘为奸，以屠杀工农，压迫民众，则不仅北伐之牺牲为无代价，其结果必仍旧造成军阀割据之局，使中国战乱循环起伏，永无止境。同人等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决不敢有所瞻徇，以贻误革命大局。全国同志在此时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尤望在本党指导之下的忠实将士，能一本总理百折不回之勇气，使一兵一卒皆能不受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之所利用，为本党真正之革命主张奋斗到底。凡我同志，丁此时艰，务宜团结一致，以为下列之主张奋斗：

（一）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所发布之训令决议。

（二）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

（三）共同努力为革命获一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

（四）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

（五）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弱态度，须正确而勇猛地以此种革命主张口号天下，唤起民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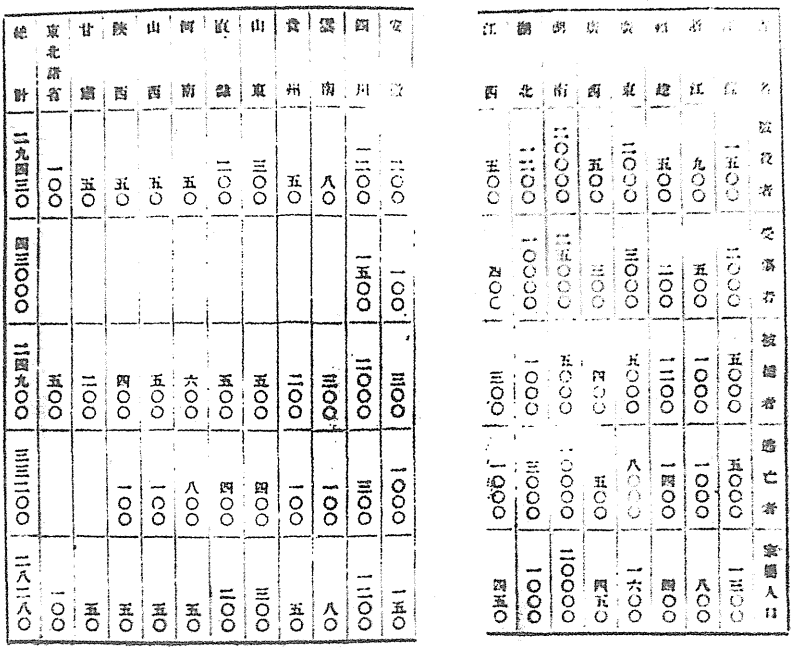
（六）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秕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

（七）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为国内一切帝国主

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

以上种种，同人等以为当前急务，唯有全党一致坚决为此等主张奋斗，然后中国革命运动才有成功之望，凡我同志，希鉴察之！

孙宋庆龄　邓演达　谭平山　彭泽民　林祖涵
恩克巴图　吴玉章　于树德　恽代英　柳亚子
杨匏安　高语罕　谢　晋　白云梯　毛泽东
董用威　江　浩　韩麟符　夏　曦　许苏魂
邓颖超　屈　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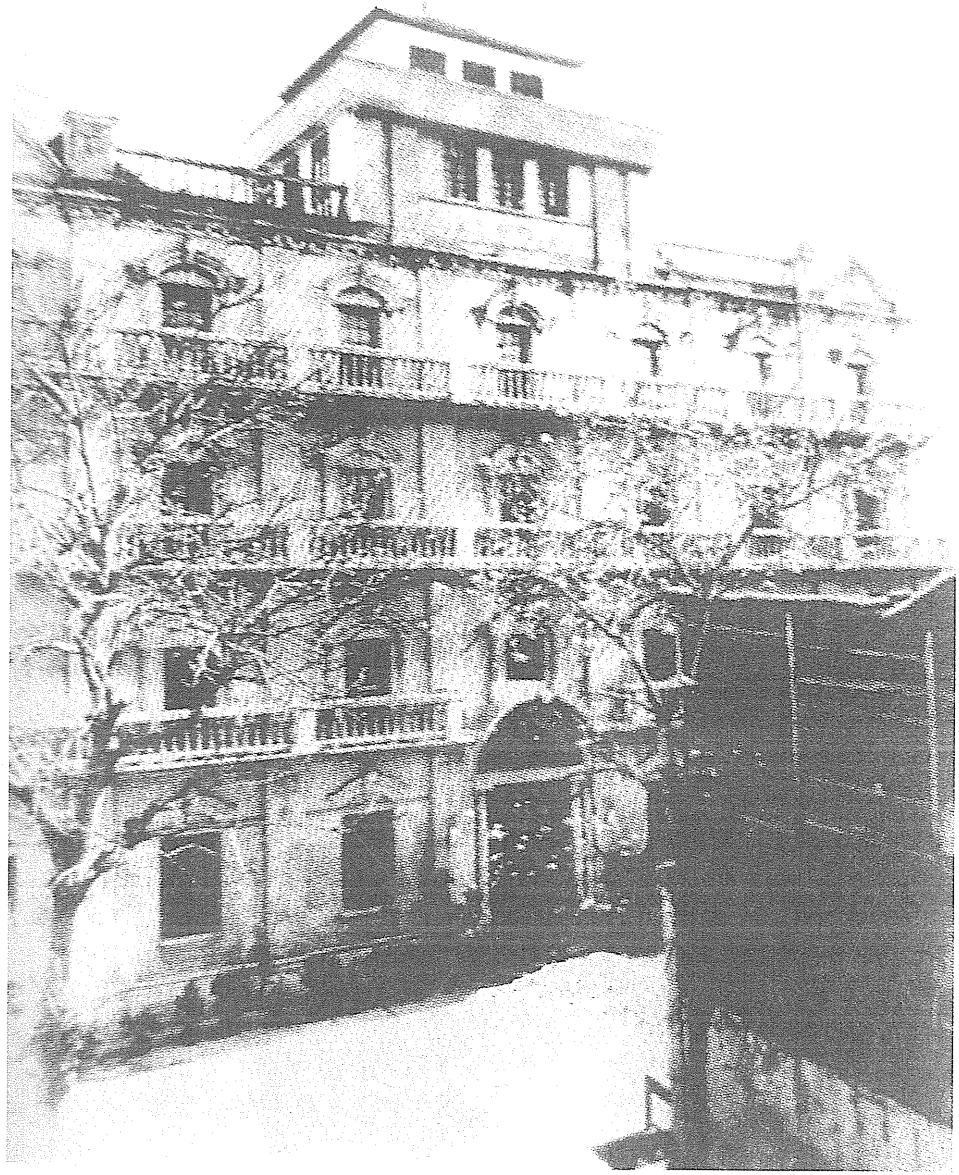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國各省因革命而犧牲者的數目之統計表（全國農運調查）

省名	被殺者	受傷者	被捕者	逃亡者	家屬人口
湖南	一五〇〇	二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二〇〇
湖北	九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八〇〇
廣東	五〇〇	二〇〇	一二〇〇	一四〇〇	四〇〇
廣西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八〇〇〇	一六〇〇
河南	五〇〇	三〇〇	四〇〇	五〇〇	四五〇
江西	二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安徽	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江蘇	三〇〇	四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〇	四五〇
浙江	五〇〇	四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〇	四五〇
福建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五〇
四川	一二〇〇	一五〇〇	一一〇〇	三〇〇	一二〇〇
雲南	八〇	一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	八〇
貴州	五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五〇
山東	三〇〇	四〇〇	五〇〇	四〇〇	三〇〇
直隸	二〇〇	四〇〇	五〇〇	四〇〇	二〇〇
河南	五〇	六〇〇	八〇〇	五〇
山西	五〇	五〇〇	一〇〇	五〇
陝西	五〇	四〇〇	一〇〇	五〇
甘肅	五〇	二〇〇	五〇
東北諸省	一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
總計	一九四三〇	四三〇〇	二四九〇〇	三三二〇〇	二八二八〇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國各省因革命而犧牲者的數目之統計表　七三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中国共产党成为非法党派，大革命失败。图为当时被杀的各省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统计表。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发起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图为江西大旅社，起义前周恩来等曾在这里开会讨论起义问题。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

（1927年8月7日）

国际代表[2]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

[1] 这是毛泽东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的一次发言。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这个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2] 国际代表，指罗米那兹（1898—1934），苏联人。1927年7月下旬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在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

当主人。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曾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1]走了。甚可怪的，唐[2]军还仅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3]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

---

[1] 许克祥（1891—1967），湖南湘乡人，1927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同年5月21日（马日），他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捣毁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及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史称马日事变。

[2] 唐，指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1927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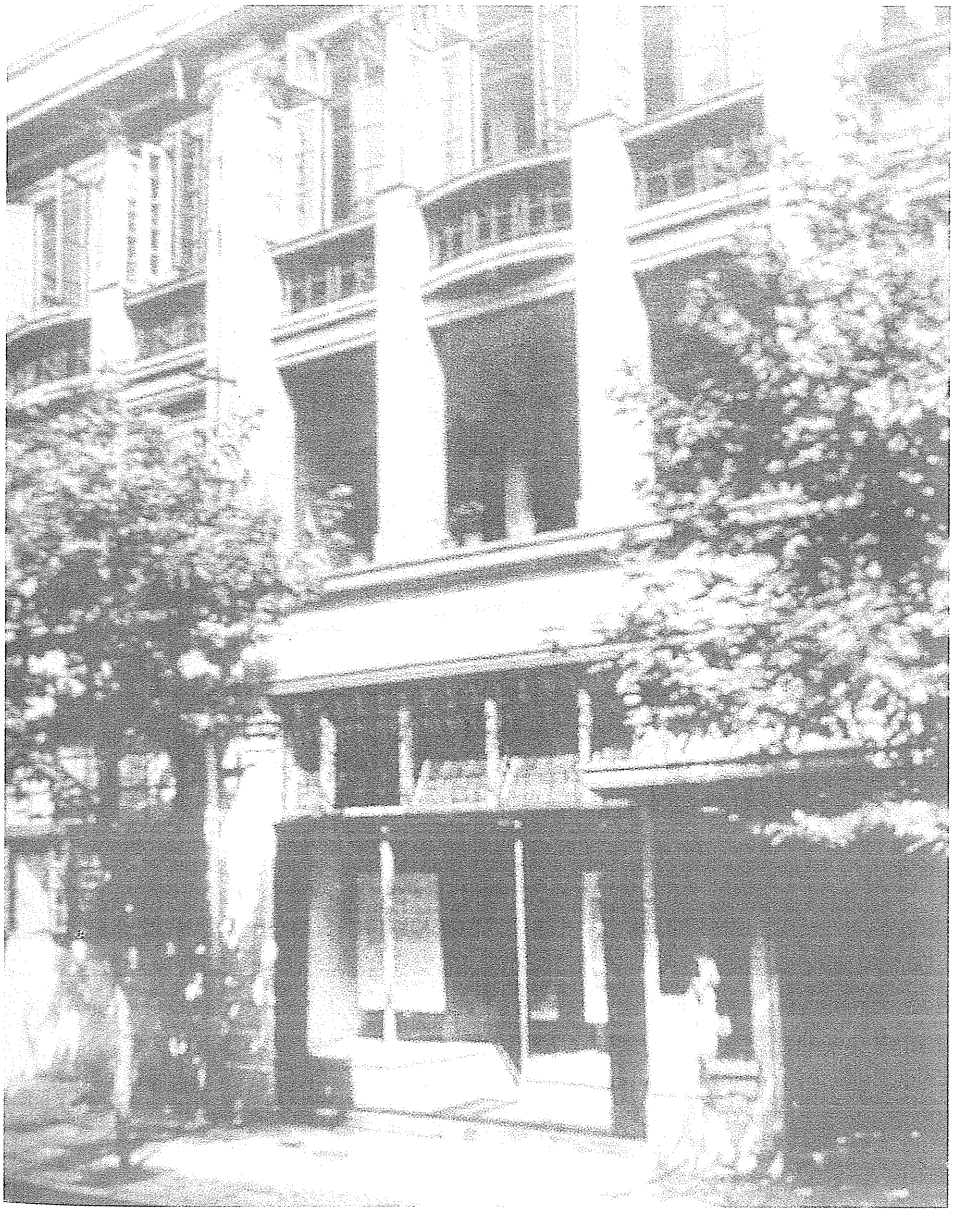
[3] 蒋，指蒋介石。唐，指唐生智。

中取得的。[1]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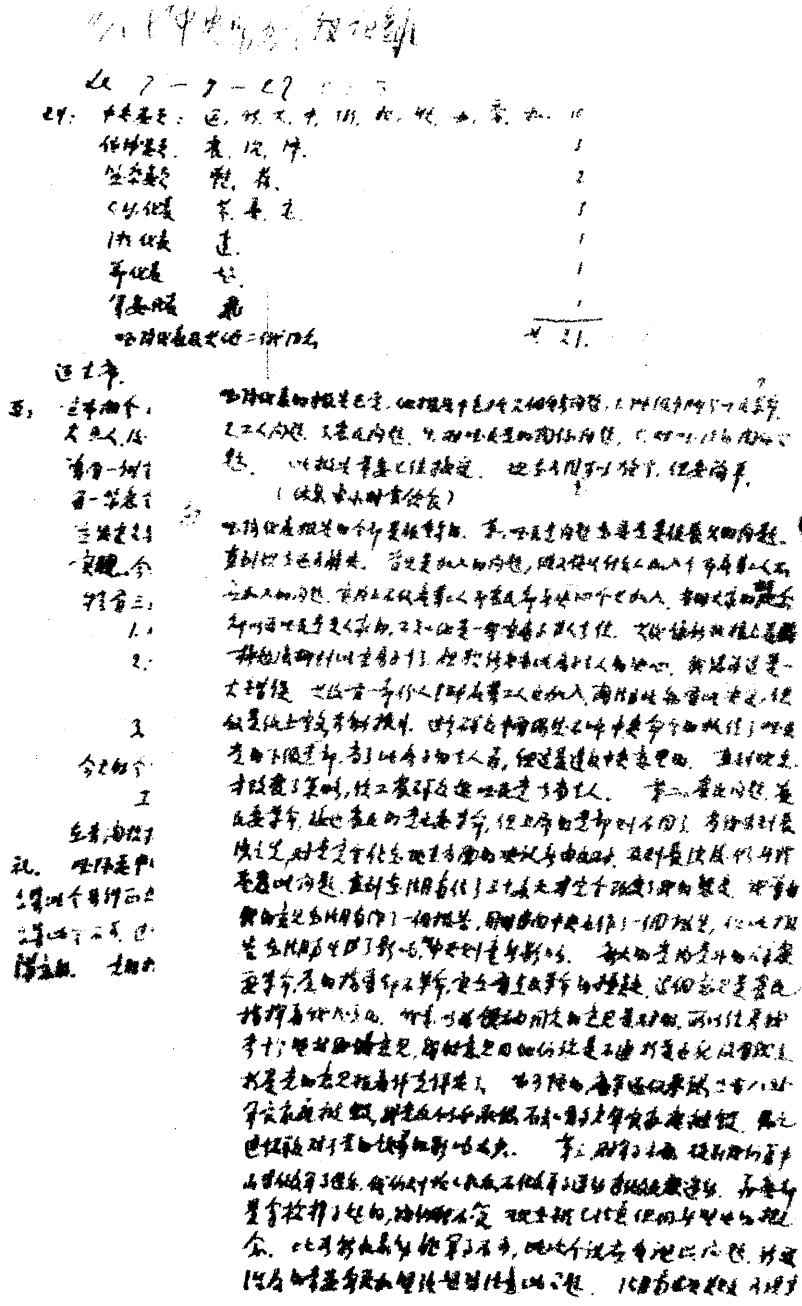


八七会议会址（内景）。

[1] 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对这个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图为八七会议旧址。



八七会议的会议记录。

湘南运动大纲[1]

（1927年8月）

一、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2]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

（一）使唐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

（二）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

（三）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

二、军力方面：

（一）请中央命令彭湃[3]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这之前，毛泽东在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这是使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应大力普及。7月4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民武装如何发展和保存的问题时，毛泽东又提出有两条路线：“(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2] 唐政府，指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省政府主席唐生智。

[3] 彭湃，中共中央委员，曾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当时是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

（二）浏平军[1]千人立即由郭亮[2]率领赴汝城。

（三）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

右三部分共兵力约一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

三、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革命的粤政府成立，则受粤政府指挥，并供给其需要。中央应命令江西方面执行此计划。

四、党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

[1] 指湖南浏阳和平江的农民武装。

[2] 郭亮，1927年马日事变后曾代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同柳直荀等部署发动长沙附近各县农军进攻长沙。

湖南民众组织更需要武装[1]

（1927年8月9日）

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2]，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现在的省委是在事变[3]后收拾残局的，成立不到两月，他在恢复湖南组织上是建了一点功劳的。以后省委应增加工农同志的指导是很对的，以前党内群众对党的负责人是不满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问题时的发言。

[2] 即《湘南运动大纲》。

[3] 指马日事变。

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1]

（1927年8月18日）

一、没收土地必有没收的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即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二、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我们的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将全部办法要农协或革命委员会执行。三、这个没收土地的政纲，如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方法安插。因此主张在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主，应由农协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四、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征收农业税。

[1] 这是毛泽东在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时发表意见的一部分。

湖南秋收暴动要有军队帮助[1]

（1927年8月18日）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1] 这是毛泽东和易礼容在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暴动问题时发表意见的一部分。易礼容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27年8月19日）

世荣兄：

湖南的秋收暴动在现在客观环境上看，确是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现在此间决定办法于下：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

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的政府的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

三、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

四、湖南现在因许克祥对唐生智的叛变，唐的军队均开往前线抵许，现在湘南与长沙事实已经隔绝，因此，另组织了一个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目的在夺取湘南，至万不可能时，决夺取桂东、汝城、资兴三县，建立工农兵的政权，湘南等革命委员会坚决实行土地革命政策。

以上是此□，对湖南暴动的原则，具体详细情形由资深同学面告，接到此信后请即批准赐复，并帮助一切为盼。

湖南致中央函*

（1927年8月20日）

（上略）……（三）某同志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跳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立，必须迅速地取得全国之胜利。望中央无疑地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实行。

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们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农工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地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四）土地问题

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

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的几位农民同志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大要是：

（一）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

（二）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

（三）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必如此而后分配略得其平，至于甲区移住乙区暂不可能。

（四）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办法分为……（中略）四等：一等收百分之四，二等收百分之三，三等收百分之二，四等收百分之一。

此草案昨日虽在省委会讨论一次，尚待多征询农民同志意见然后再请兄处作最后之决定，兹先将草案录上借供讨论资料……（下略）

八月二十日

湖南常委来信*

（1927年8月30日）

某某兄：

湘字五号信收到，关于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兄所说，兹将答复于下：

（一）夺取长沙与秋收暴动在革命的整个意义上说，是发展土地革命，长沙暴动与秋收暴动是一回事。长沙暴动是秋收暴动的起点，秋收暴动的发展是土地革命夺取政权，我们计划夺取长沙的主要战斗者是工农，要调某某两团进攻长沙意义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不是主力，是掩护暴动的发展，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暴动成分。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

（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此间没有将各地已有相当准备之事实，向兄陈述这是一个错误。（请看湘中暴动计划）关于湘南工作问题，也该说明一句，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决定不以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但是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长沙暴动开始，各县随之同时发动。

八月三十日

不打长沙转兵向南[1]

（1927年9月20日）

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

[1] 1927年9月20日早晨，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这是讲话的一部分。

给杨开慧的信

（1927年9月）

我亲爱的霞[1]：

我去了，不管去的有多远，有多久，我总是要回来的，我们不久就会团聚的。要坚信两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大家团结努力，革命一定会成功！

润之留笔

[1] 霞，即杨开慧。

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1]

（1927年12月18日）

部队行动，由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毛泽东七人组成前委，请批准。如系驻军，则应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人员除上述七人外加江西的刘真，请呈报中央批准。又朱云卿应加入前委和特委。

[1] 1927年12月18日，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提议改组前敌委员会，表示朱、毛两部建立联合领导的意向。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西江月·秋收起义[1]

（1927年）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2]。
匡庐[3]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4]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

[1] 秋收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决定发动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武装起义。毛泽东在湖南省东北部和江西省西北部领导农民、工人和一部分北伐军，成立一支工农革命军，9月9日起在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武装起义，遭到敌人围击。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成功地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2] 斧头，中国共产党党旗上的锤子当时常被误认为斧头。

[3] 匡庐，首次发表时原作“修铜”，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根据作者修改的抄件改为“匡庐”。传说商、周间有匡俗（一作匡续）在今江西庐山结庐，因称匡庐或庐山。参见东晋慧远《庐山记》（一作《庐山记略》）。

[4] 潇湘，首次发表时原作“平浏”，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根据作者修改的抄件改为“潇湘”，借潇水和湘江指湖南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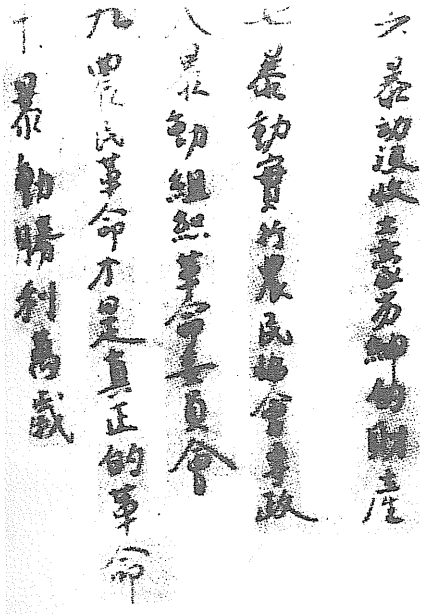
农民个个同仇[1]。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2]。



《秋收起义》（中国画）

[1] 同仇，同心合力打击敌人。《诗·秦风·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2] 进、动，按《西江月》词律，上下阕末句末字当与二、三句末字同韵异调，即第二、第三句押平声韵，第四句押原韵的仄声韵。这里没有按律押韵，而依湖南方音用进、动两字隔阕押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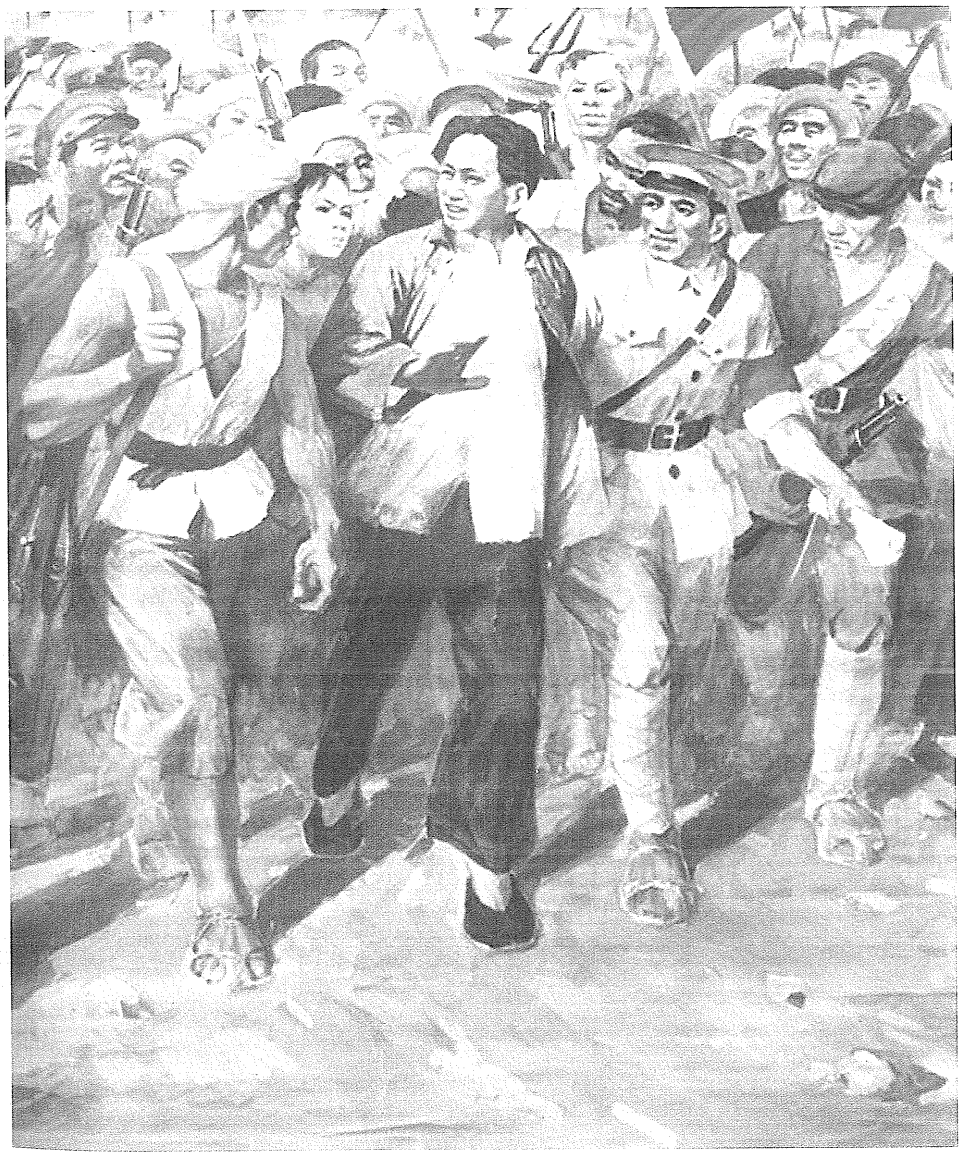
秋收起义口号。



《秋收暴动》（中国画）



《秋收起义》（中国画）



《秋收起义》（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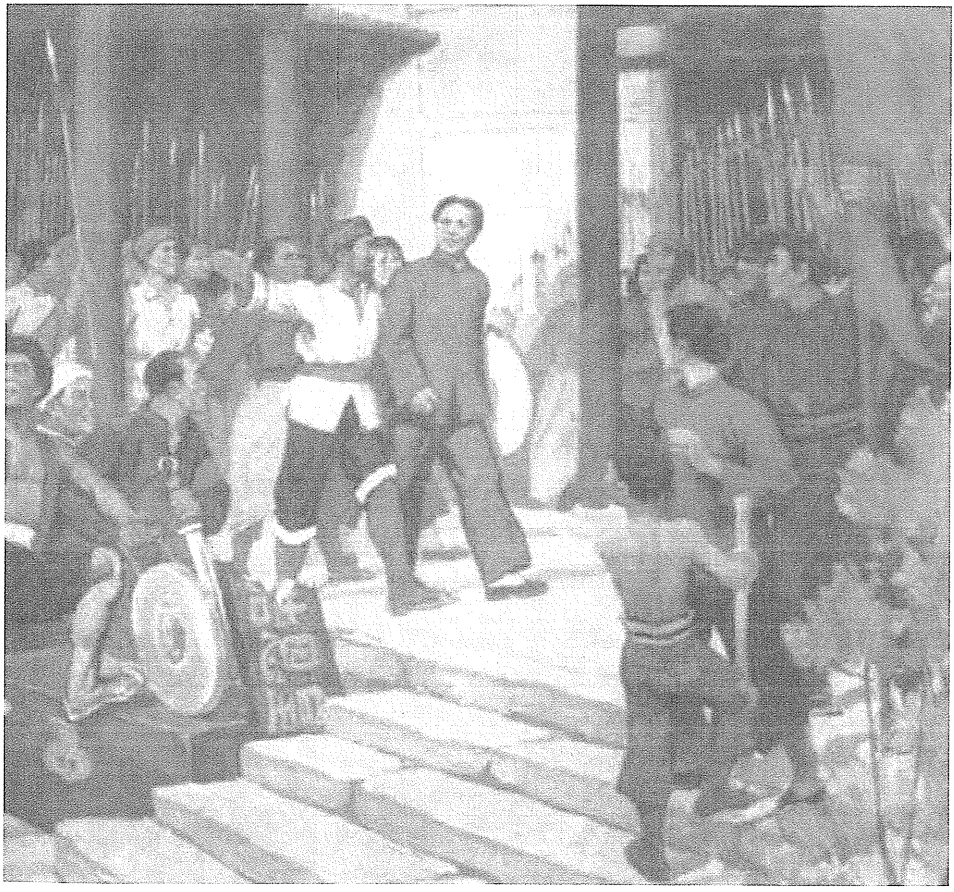
《秋收起义》（油画）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誓师大会上》（油画）



《秋收暴动》（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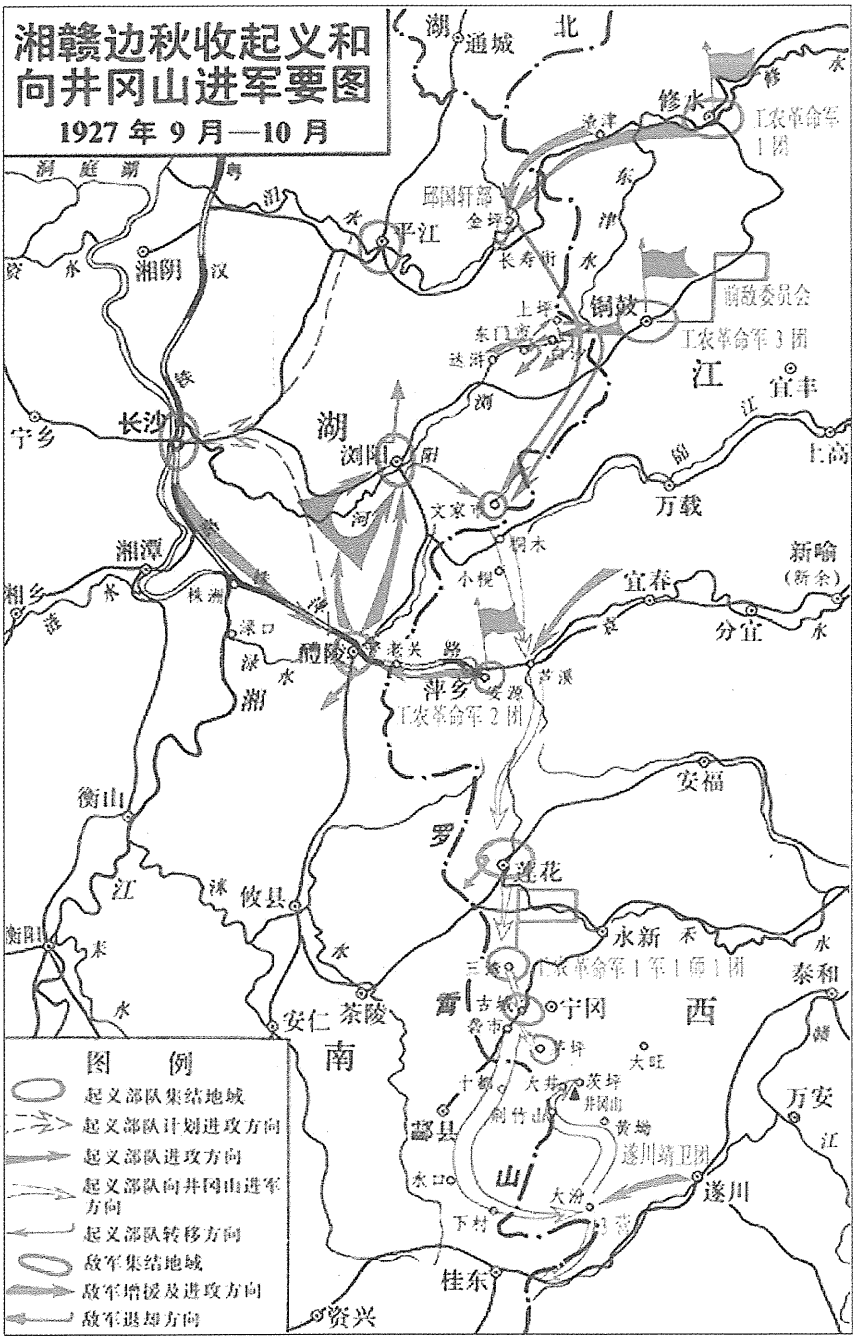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油画）



《秋收起义》（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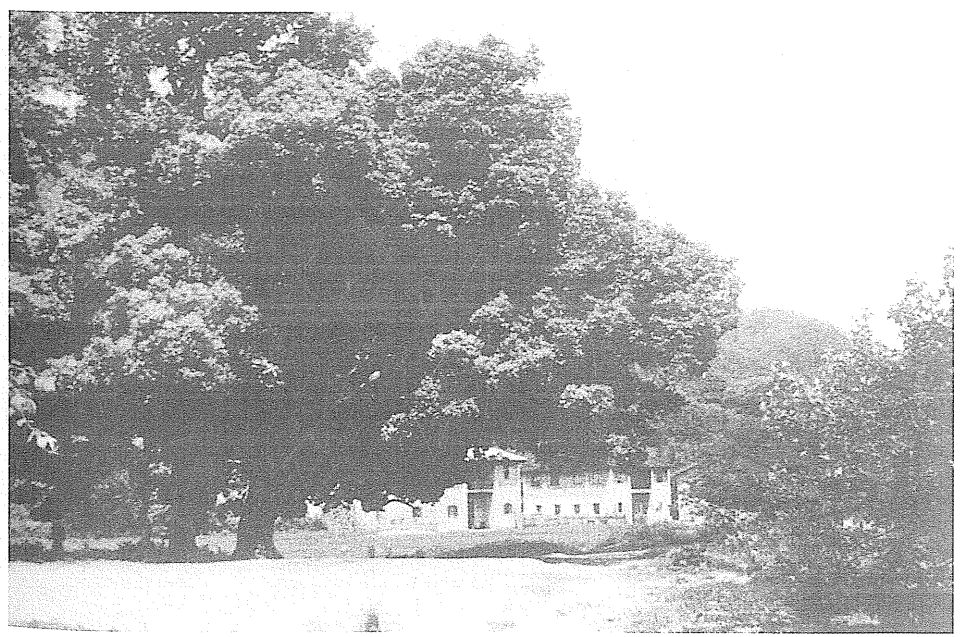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宣传画）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图为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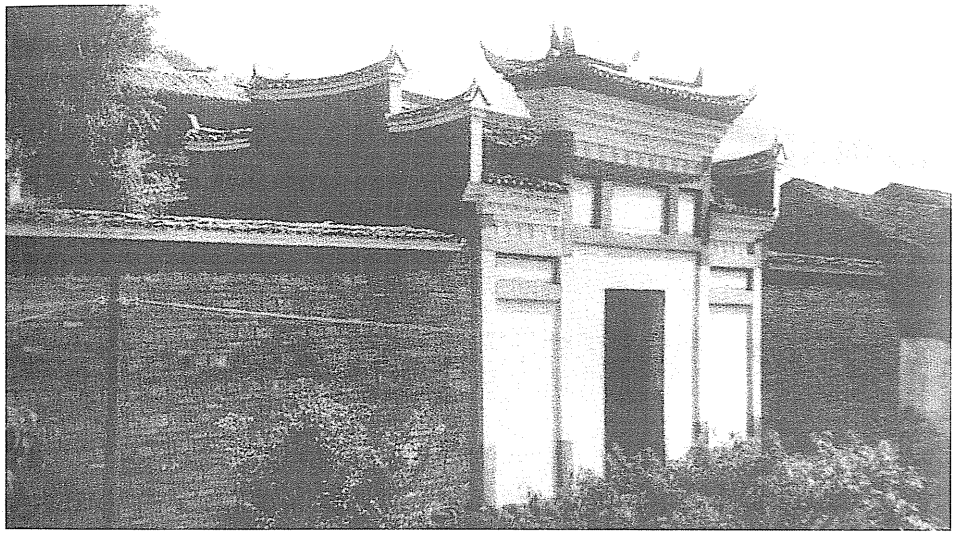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向井冈山进军。图为文家市里仁学校旧址。



1927年9月底，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图为三湾枫树坪。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中共各级党组织和民主制度，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图为三湾士兵委员会的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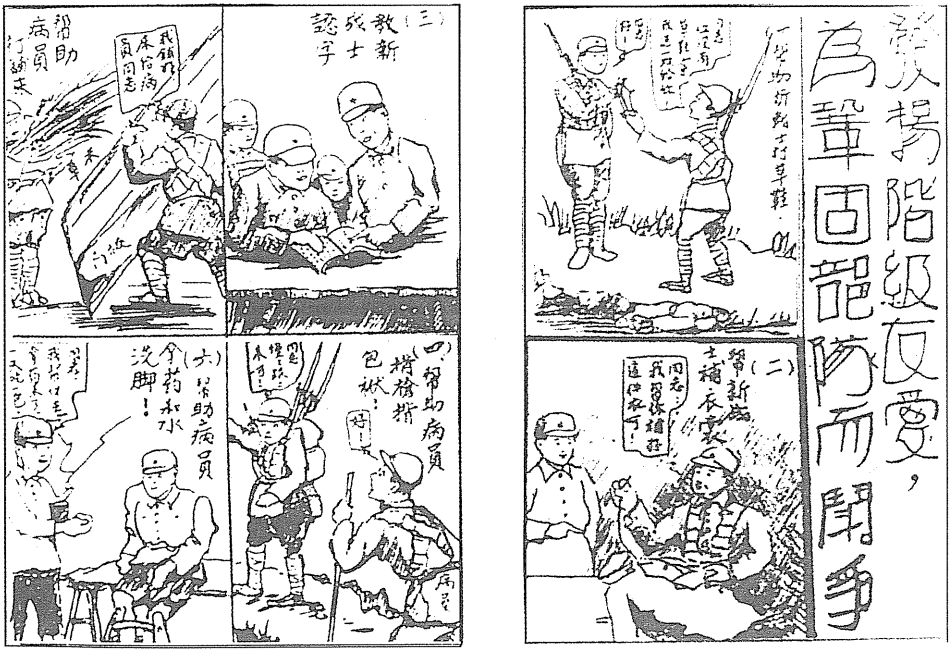
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图为会议旧址——联奎书院。



《三湾改编》（油画）



《毛主席在文家市》（油画）



三湾改编提出了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改变军官欺压士兵的旧风气，为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图为红军当年的宣传画。

题军旗联[1]

（1927年）

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

[1] 1927年9月9日，在湘赣边界的浏阳起义。为了加强对起义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毛泽东独出心裁，亲自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旗上书写了这副对联。



1927年9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奔赴安源，部署秋收起义，并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图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由何长工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到安源时之报告*

（1927年）

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五百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既绕道闽边，他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源同志将军队的情形作一详细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



《伟大的进军》（油画）



《向井冈山进军》（油画）



《向井冈山进军》（油画）



《向井冈山进军》（油画）



荆竹山雷打石。1927年10月毛泽东在这里宣布了“三大纪律”。

1928



《井冈山会师》（油画）

题遂川公审土豪劣绅大会联[1]

（1928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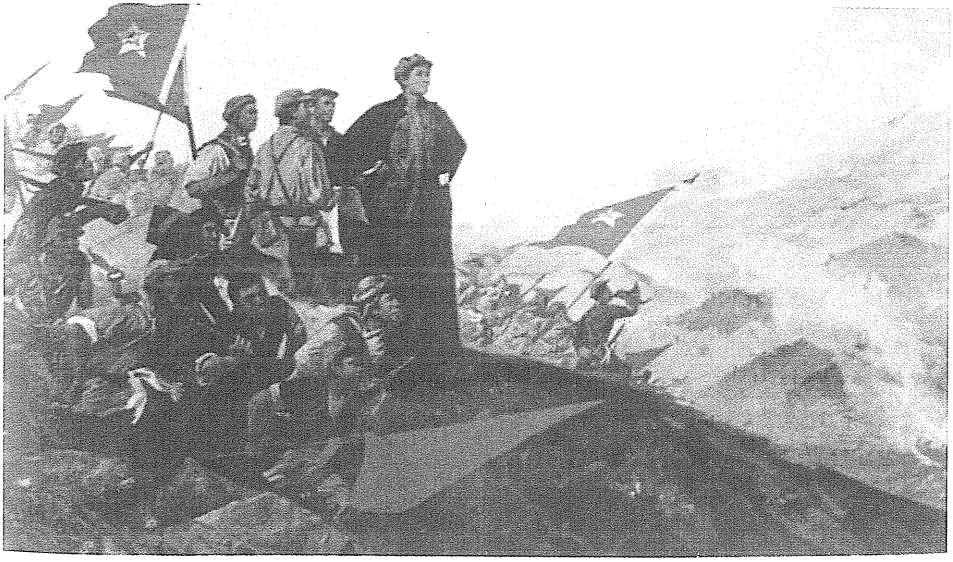
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
我今日宰杀土劣[2]，怕不怕，刀上加刀。

[1] 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队攻克江西遂川县城，1月24日召开成立县工农兵政府的群众大会，公审土豪劣绅郭渭坚，并处以极刑。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并为大会亲笔书写了这副对联。遂川，县名，在江西省西南部，赣江支流遂川江上游，邻接湖南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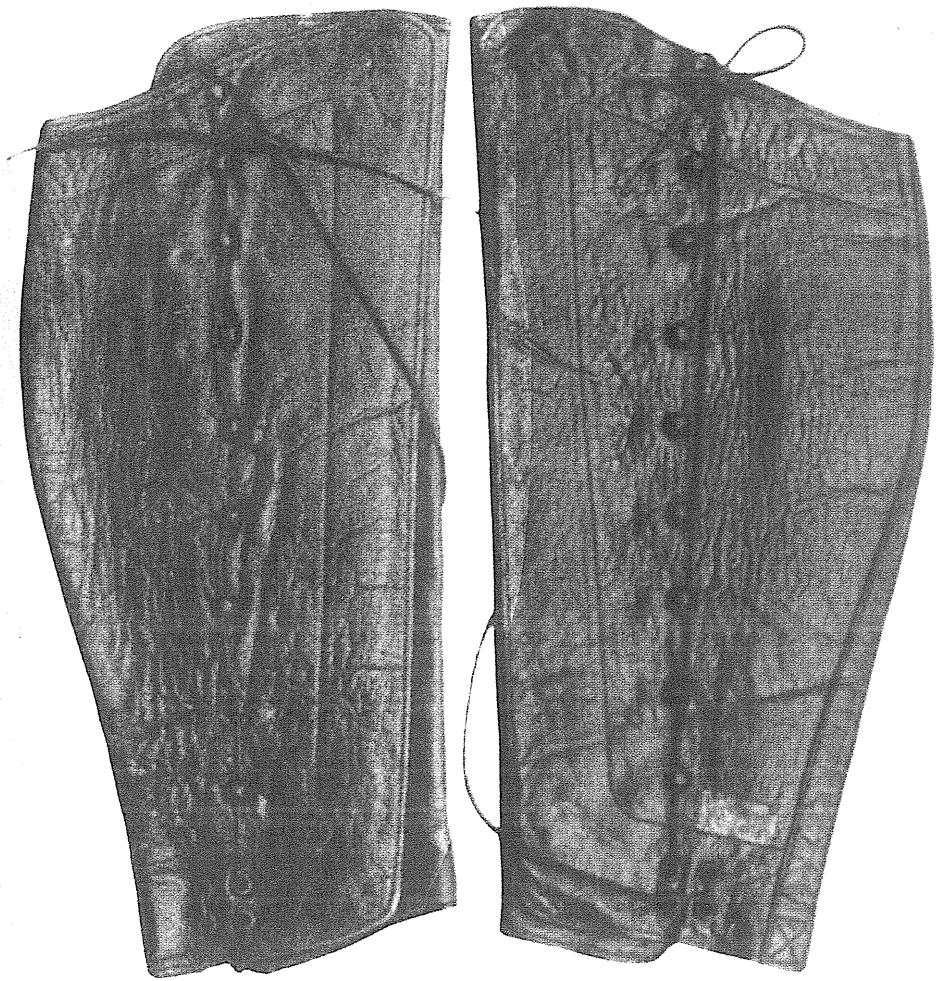
[2] 土劣，土豪劣绅的缩称。




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极力争取、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图为袁文才（左）、王佐。



1928年2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取得井冈山斗争的第一个胜仗，攻克宁冈县城新城，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图为油画《新城大捷》。



毛泽东送给袁文才骑马用的裹腿。



《王佐迎接工农革命军》（中国画）

为井冈山群众题春联[1]

（1928年）

大刀梭镖铲除旧世道；

斧头镰刀开创新乾坤。

[1] 这是1928年春节，毛泽东在井冈山茅坪给井冈山群众题写的春联。

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

（1928年5月2日）

中央：

（一）我们失败后——由湘南（军队无甚损失，不过是湘南政权和茶陵政权被破坏了）退至赣边。岂有此理的湖南各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现在有一万八在这里。

（二）占领的地方是永新、宁冈、遂川三县，不久将会扩充地盘。

（三）追击毛部之杨如轩师，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被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部缴械之营，现在也被朱部击溃于永新。现在毛部之三十一团亦由宁冈开来了，永新敌兵已溃退吉安，此次缴械三百支。

（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与分配土地。因此决定把打吉安的功夫来做这些事，比较有意义的多。

（五）前湘南特委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德为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十师师长，宛希先党代表；毛兼十一师师长（本任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党代表。另一教导大

队，陈毅任大队长。机关炮略备。以朱部二十八团，毛部三十一团为较有战斗力，马马虎虎的军队来很可一打。

（六）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一部分除外），刻正大加整顿，日益良好。

（七）军委、师委、团党、各支部开了党的训练班，日益良好。

（八）吃饭大难。一个月来大多数每天除米三分洋外，别的不消说。不过现在永新这几天筹了些款子。

（九）两省边界距离仅十余县，两省省委历次管不到手。因同志们努力，党的组织活动都在天天发展中。但从三月间周鲁同志（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了不良之现象。去年十二月前委会即有建议组织边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请另派得力同志来此做书记，毛同志任军中工作很难兼职。

（十）我们的永久通信处：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金竹山王佐。

（十一）政治分析、党的重要文件，请时时寄来。

（十二）请将别区不能立足的暴动分子大批送来，不论军事、政治、技术的，愈多愈好。前委之搅事做无骂词又骂受不办呢？睡不觉，现未免是罪恶，现于吉安来信之后，大略意思即把特委组织起来。你以为如何？听兄处明示，组织一是，组织，这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央多次，未见奉准驳明文，间以安源市委来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话，并非省委明示，前两日接吉安县委的信，又有江西省委亦核定的话，并毛同志任书记的话，仍非省委明示，这怎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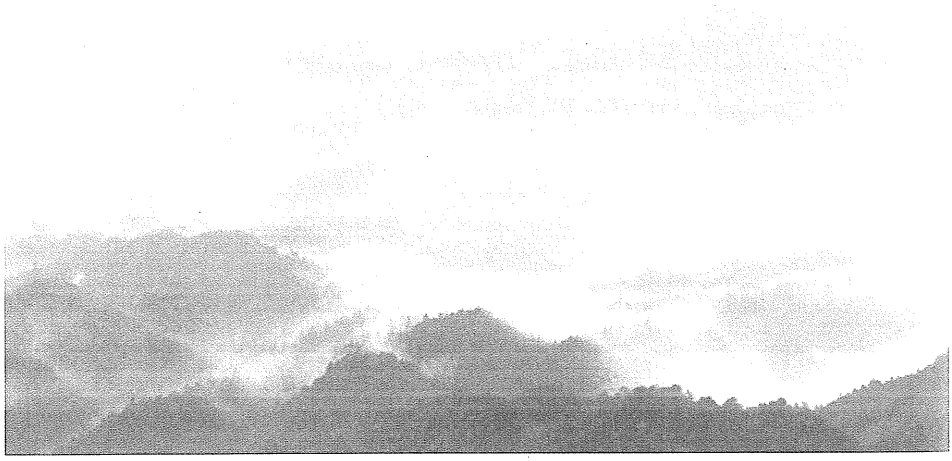
来呢？又怕挨无味的骂。完了。

此致

敬礼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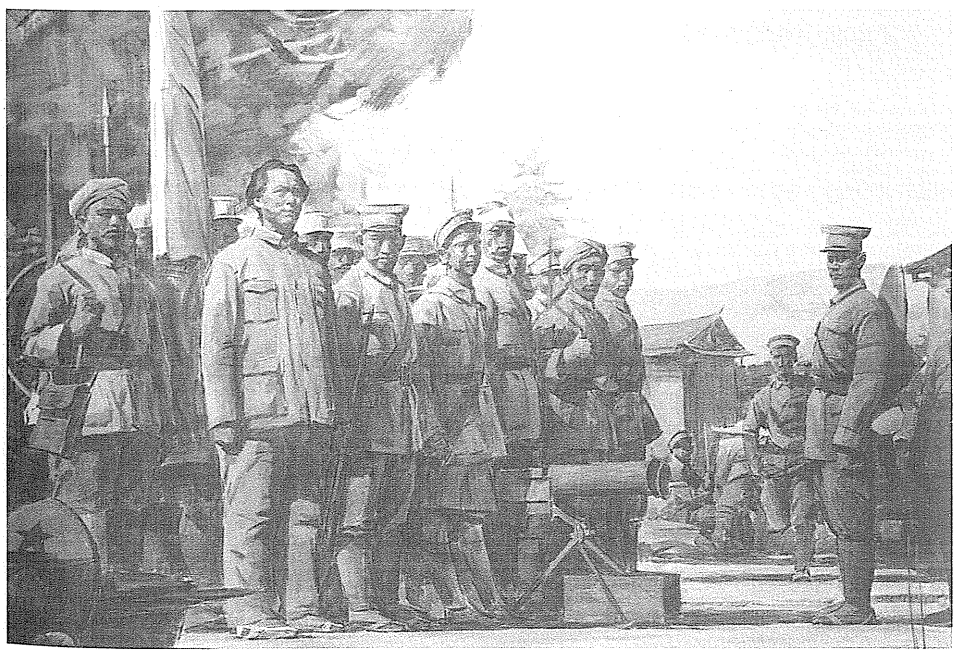
五月二日于永新城内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图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1928年，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和毛泽东部在宁冈砻市会师。图为砻市龙江书院，毛泽东、朱德曾在这里长谈。



《排头兵的故事》（油画）



《井冈山会师》（油画）



《井冈山会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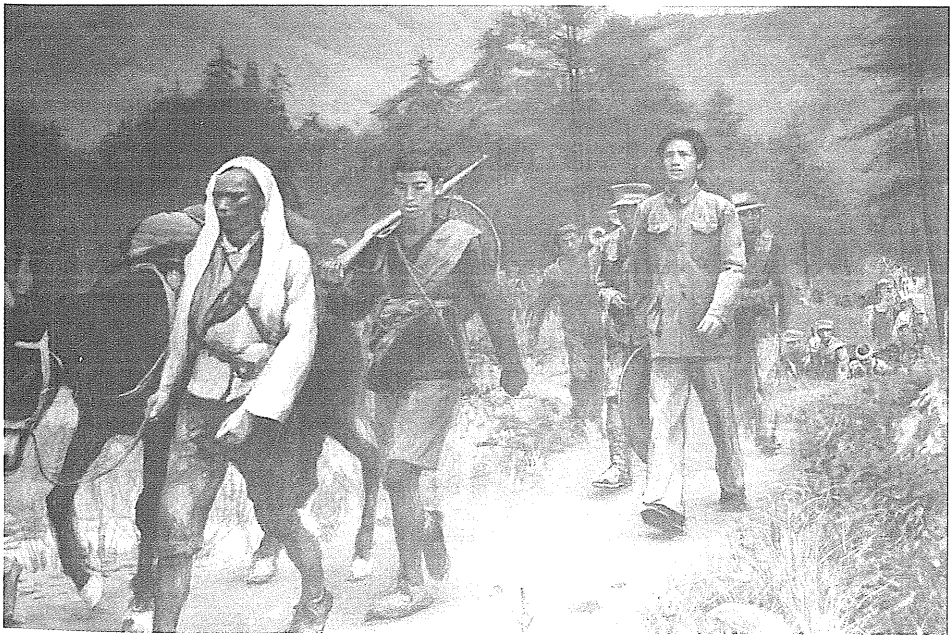
《井冈山会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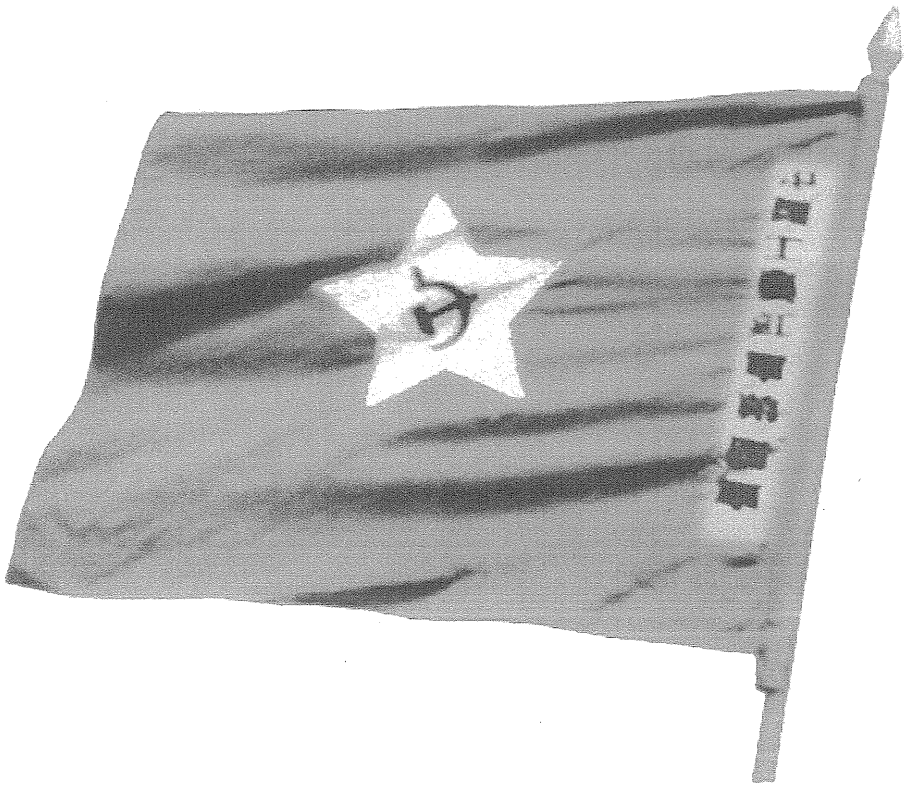
《井冈山会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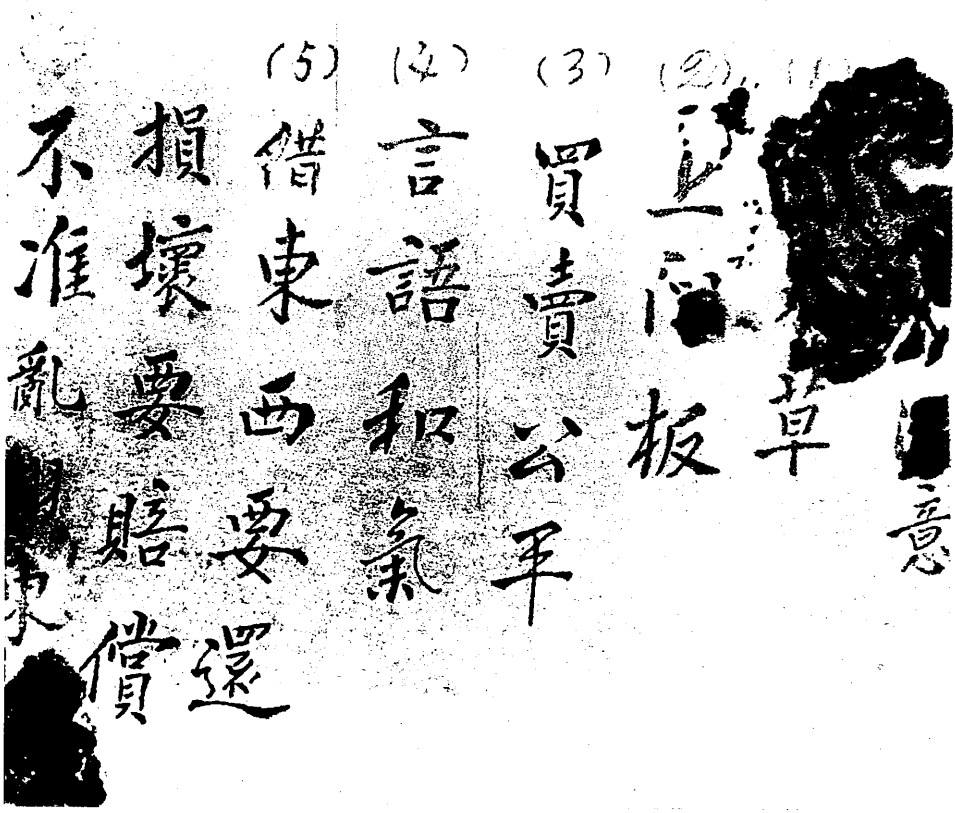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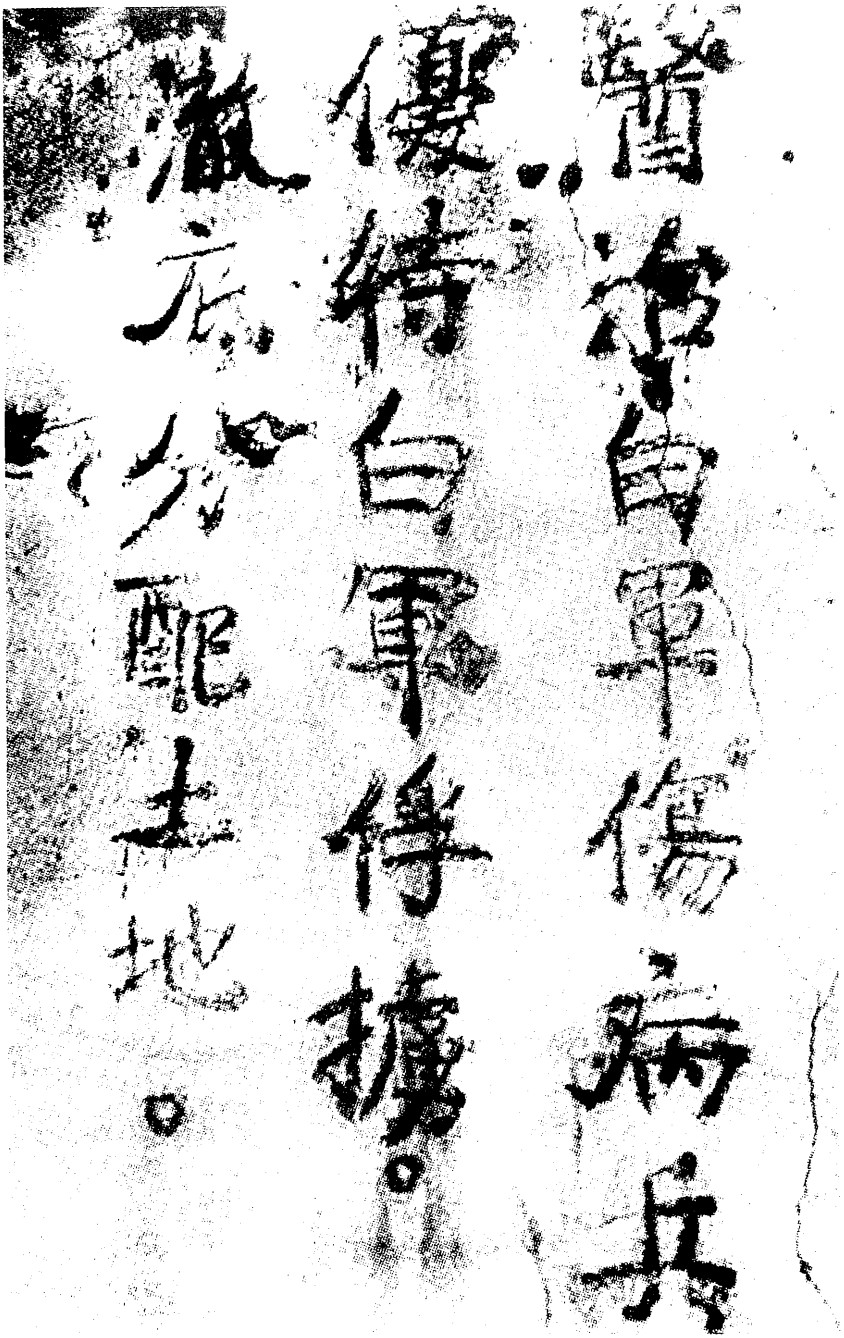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油画）



1928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旗。



1928年，毛泽东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图为红军战士写在包袱皮上的“六项注意”。



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为部队制定了正确对待俘虏的政策。图为红军战士写的优待俘虏的标语。

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1]

（1928年6月16日）

一、此间争斗已到很剧烈很阔大的时候了。敌人以十团之众（杨如轩[2]四团、吴尚[3]六团）向我们进攻，地主的挨户团[4]当然在外。茶酃两县的广大的农民群众业已被压下。白色清乡把我们党的组织压得粉碎，茶陵的好些勇敢做事的同志被杀，酃县县委负责人被害。第八军最近与我作战四次，一败三胜，但敌人顽强抵抗，已占领之茶、攸只得完全退出，湘南已无寸土。最近有一次军事胜利[5]，五月杨如轩七十九团及二十七团一营，工兵，大炮队，机关枪连，师部，卫生队，输送队，被打得落花流水，虏获颇多，杨已逃吉安（一说负伤），刘团长（二十七团）死，夺获迫击炮七尊，山炮二尊，光洋二十余担，但敌精锐两团仍是在附近永新县城一带，不

---

[1] 这是红军第四军反对国民党军连续“进剿”期间，毛泽东在江西宁冈茅坪写给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的一部分。

[2] 杨如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

[3] 吴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军长。

[4] 挨户团，是当时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5] 指1928年5月中旬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反对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次“进剿”期间的草市坳战斗和重新攻占永新县城的战斗。

敢穷追。此间军事布置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但目前数日按兵未动，俟查明敌情再行决定。军队中一部分下级军官军事投机的心理尚未除去，常想逃避斗争，跑到赣南去，这已成为党内的一种奋斗，及特委成立，用特委命令才把他们勉强的制止。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A. 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 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 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正随时解此难关。

二、吉安来信，始知江西省委已批准湘赣特委之组织（茶陵、攸县、酃县、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批准于五月二十一二两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1]，议决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选举负责人（工农分子占多数）。宛希先、毛泽东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霄为候补常委，暂推毛为书记。泽东此刻在学习时期，实在不能担任。以后两省委及中央之派人即可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1. 普遍发展六县之党。2. 发动当地农民的暴动。3. 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4. 在军队中建立健强的党。5. 办军校及党校。盼望政治消息，请湘东特委担任政治消息传达，三日一次。取报纸在高陇牺牲营长一、连长二、兵士五十人以上，最后因朱德会攻才获着胜利。6. 四军军委书记今日开始负担。

---

[1] 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中是1928年5月20日。



1928年4月至6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打破了国民党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二、三、四次“围剿”。图为红四军第四次反“围剿”龙源口大捷旧址。



1928年5月，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图为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会址——茅坪谢氏慎公祠。



1928年5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政权机关——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宁冈茅坪成立。图为苏维埃政府旧址。



《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油画）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1928年7月4日）

湖南省委：

袁、杜二位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收到，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此间，六月二十三日击溃杨池生后，四军已大部来永新向莲花、安福及吉安之西南端游击，筹款并发动暴动，即于六月三十日晚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在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愿住定一处艰苦地做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行走徒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

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钧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后且补可用适当战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分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斗，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所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尚成杰一军（三千枪），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乃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以胜尚、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尚、许的包围中，有立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三）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月工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

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可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困难，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至五百，若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之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做到，以期彼此呼应，互相为之犄角。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关于军队与地方详细报告容后奉呈。

特委　军委

七月四日于永新城

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钧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后且补可用适当战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分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斗，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所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尚成杰一军（三千枪），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乃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以胜尚、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尚、许的包围中，有立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三）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月工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

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可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困难，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至五百，若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之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做到，以期彼此呼应，互相为之犄角。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关于军队与地方详细报告容后奉呈。

特委　军委

七月四日于永新城

湘赣边界特委致湖南省委信*

（1928年8月）

湖南省委：

（1）杜同志来及来信均悉。五月卅日此间军委召集扩大会，由杜同志报告政治情形，并宣读省委来信，扩大会完全接受，对杜同志综合各地实际斗争的教训之报告，亦极重视。关于省委信中应解释者有下列几点：A. 实力……但以游击战争汇合湘南湘东赣西赤色努力，唯力是视，不过行动应侦察敌情，才能决定。B. 以少数武装编成独立团营的错误，亦极接受，不过此间并未曾做过。C. 此间系朱毛部及湘南农军而成，现在湘南农军已回去活动，原系□师编制，后改为□团，取消师部，组织军部，直接指挥。

（2）省委指出焚烧城市的错误，此间决不再犯。

（3）军中的党在形式上已普遍组织，组织形式上照国民党革命军的党之组织。

（4）军中CY组织，在过去湘南特委指示要成立，数月的经验，在工作方面感觉许多不便，在四军CY第二次大会决定合并。此次扩大会亦认为有合并的必要，不过非局部所能解决，须有省委作最后之决定，但此主张与取消派不同，CY有干事会，可以尽量参加工作。

（5）改造军队，洗刷流氓无产阶级当尽力去做。

（6）废除饷银制度，此间早有计划，但事实上兵士生活困难，兵士之耐劳艰苦，颇属难得。

（7）请派大批安源矿工来此当兵。

（8）军委成立，省委指定泽东为主席，此节似无必要，因此间地方工作，需人尤其迫切，军委组织亦无完善，书记为陈毅同志，此节未执行。

（9）湘南特委随军到资兴，取道安仁回衡阳，宜郴负责人已回去。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

（1928年10月5日）

一　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2]，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3]，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2] 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1935年12月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1939年12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曾作了详细的说明。

[3] 蒋派指蒋介石派。桂派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冯派指冯玉祥派。阎派指山西军阀阎锡山派。他们曾经联合对张作霖作战，于1928年6月占领了北京和天津。

一个对张作霖[1]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2]。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

[1] 张作霖（1875—1928），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1924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打败后，张作霖成为北方最有势力的一个军阀。1926年他联合吴佩孚入据北京。1928年6月，他从北京退回东北，在路上被向来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死。

[2]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及蒋介石公开对日妥协之后，曾经追随蒋介石参加1927年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他们既不满意蒋介石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他们发动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幻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之外，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当时，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政客，曾在这个运动中进行投机活动，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所谓“改组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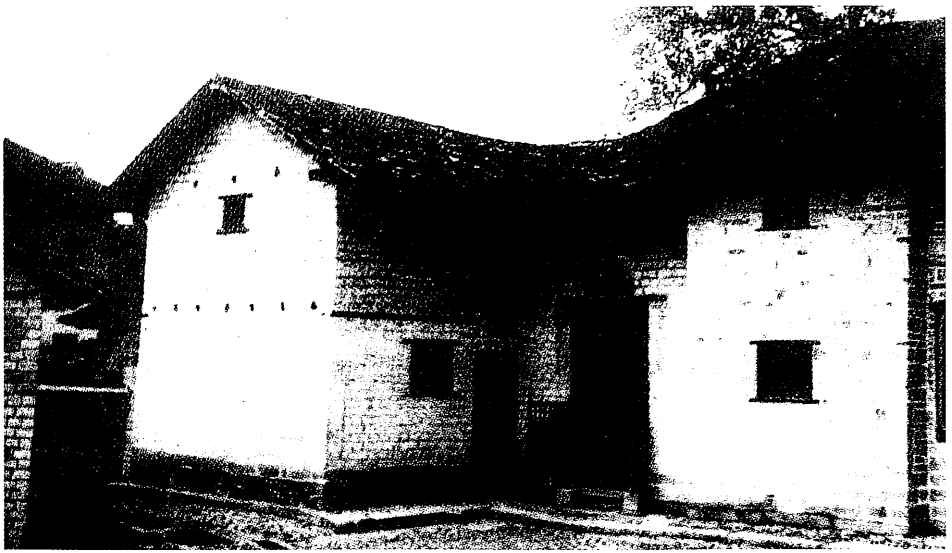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二　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1]，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

---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属于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方许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组织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广泛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开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原来的殖民地统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种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他们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阵线在中国被突破，因而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上发生很大的动摇。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于1928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部著作。图为毛泽东撰写这两部名著的地方——茅坪八角楼。

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

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1]。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

[1] 这是指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各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最初爆发起来的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行动。在广州，1927年12月11日，工人和革命士兵在一部分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联合起义，建立过为时3天的人民政权。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在1927年5月和9月举行起义，都曾经建立过革命政权；在这年10月举行的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1928年3月。在湖南省东部，1927年9月，起义的农民曾经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并于1928年2、3月间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的起义农民，曾经在1927年11月占领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20多天。在湖南省南部，1928年1月，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起义农民，建立过革命政权达3月之久。

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1]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

[1]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1]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

[1] 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

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四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五　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1]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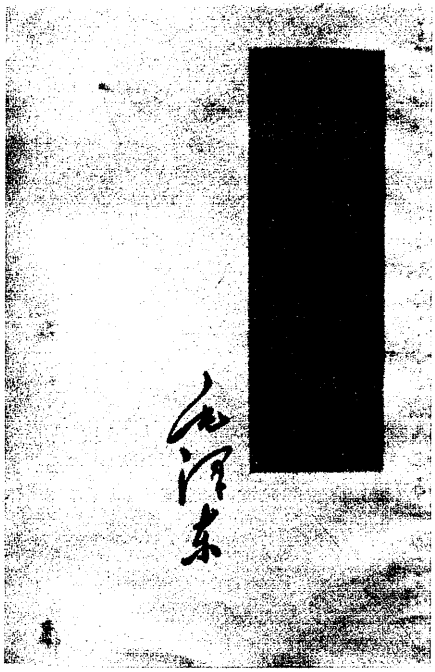
[1]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是指农民以外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自由职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这类社会成分主要在城镇，但在乡村中也占有相当数量。

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六　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1]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1]　大小五井山区，指介于江西西部的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东部的酃县4县之间的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



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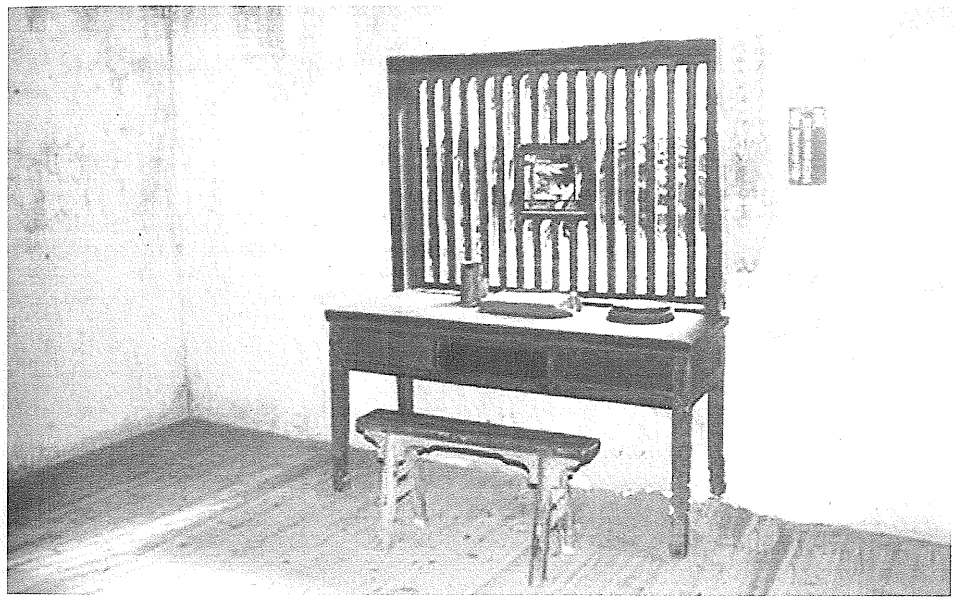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中，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中，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

*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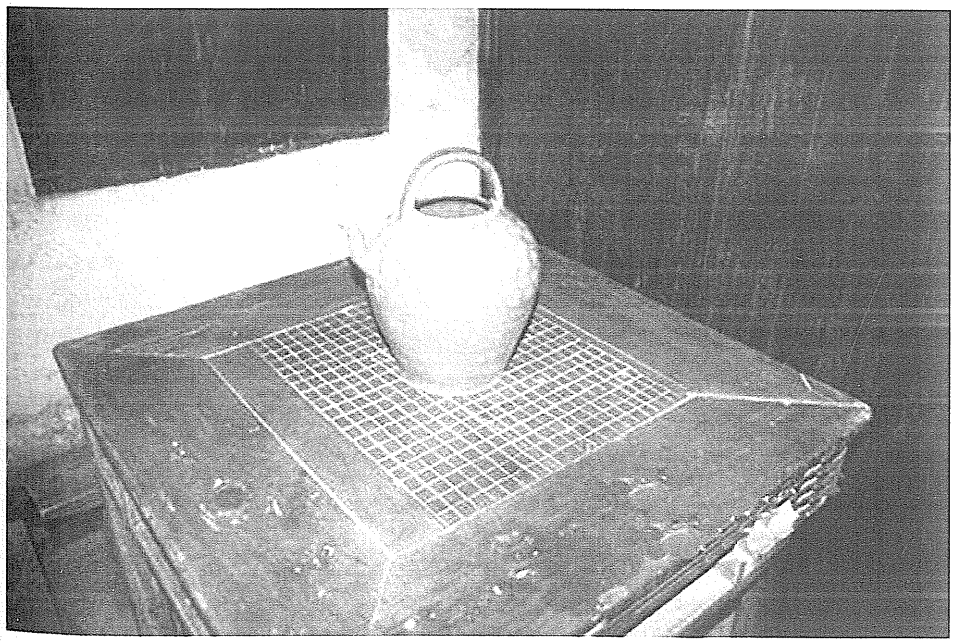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部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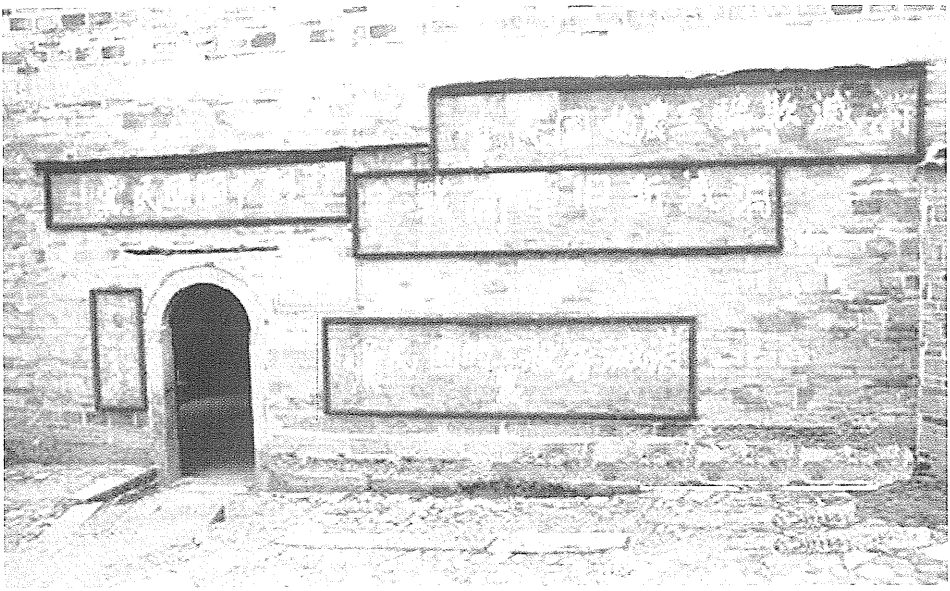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八角楼》（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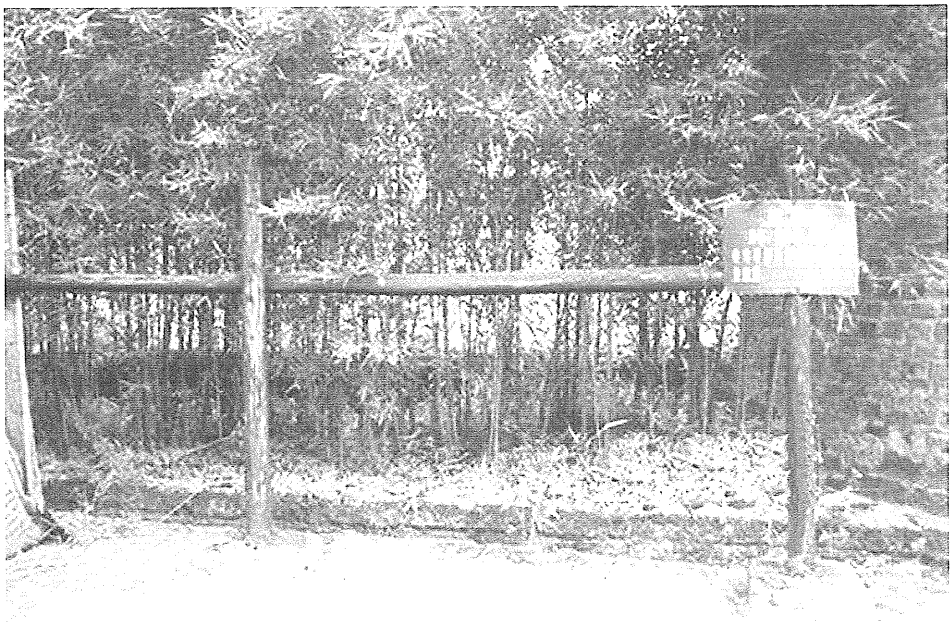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八角楼办公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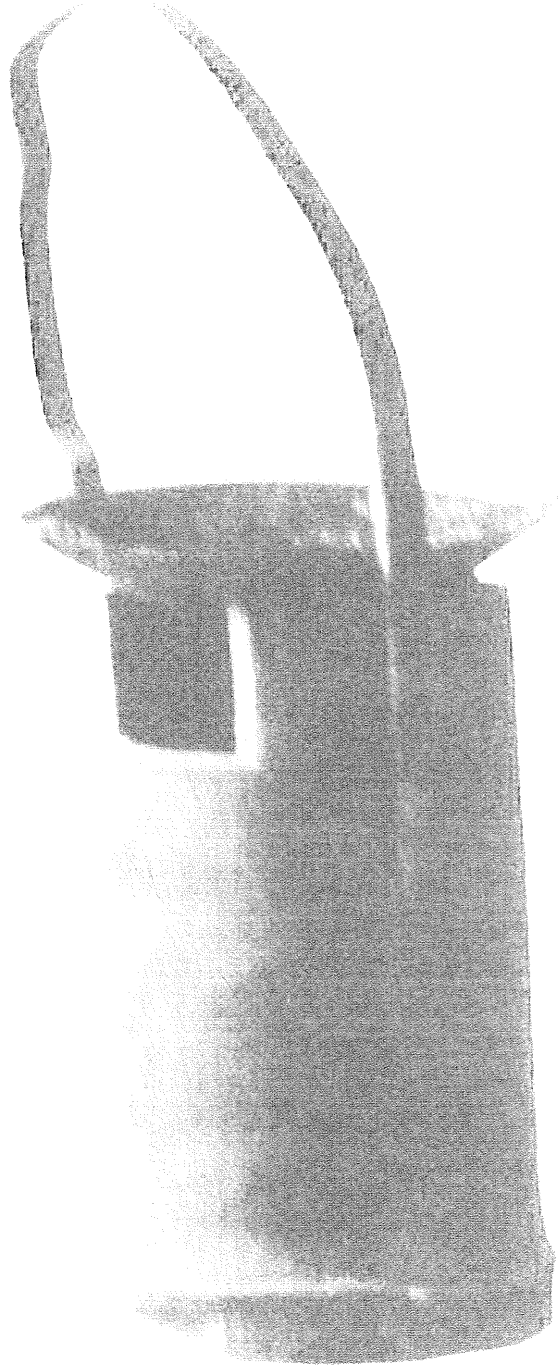
毛泽东和朱德在八角楼空闲时下棋用的四方桌。



八角楼的墙上还有当年红军战士写的几条标语。据老同志回忆，这些标语是当年贺子珍带着红军宣传队书写的。



八角楼内的大院里，至今仍保留着毛泽东、朱德当年使用过的拴马桩。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使用过的油灯。

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8年10月5日）

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

（内容参见《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

边界各县党的改选与建议

边界特委是最近四个月才产生的，在此短短的期间内，虽然曾领导工农红军做过了“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及给旧社会以伟大的破坏等工作，但因为边界是个农村经济的环境，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争很少（因为有红军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指出过去一切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

攸县的党到现在还未建立。其他各县党的影响亦只及各该县之大部或一部，并未建立坚实的中心区域及普遍发展到四处的广大群众中去。故建立攸县的党和各县的坚实中心区域及普遍建立各县党

的基础，同样是边界党部今后的重要责任。

一　过去党的错误

1. 过去各县党中机会主义遗毒太深，依靠军队而不领导群众作独立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2. 过去各县的党，很有农民党的色彩，有走上非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永新的党要公开脱离特委，成立“独立国”。其他各县，如宁、酃、莲等县亦不注意向特委作报告，以与特委发生关系。这都是组织上很严重的错误。

3. 过去党的机关，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完全没有集体领导及民主的精神。如特委只有毛泽东一人，永新县委只有刘珍一人，以致客观上群众发生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的误解。这完全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党。紧急会议中虽然很严重地指出了这种错误，特委经常有三个常委驻会指示工作，但各科及秘书等机关，因人才缺乏之故，仍然无法建立，加之特委工作人员病者极多，政治时生变化，各县委与特委的关系不能密切，故特委本身反对各级总部的指示，仍然没有尽量执行紧急会议之决定。

4. 指导机关，多数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对于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缺乏注意。

5. 过去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

6. 过去党没有注意基本组织——支部。

7. 过去党的工作方式不对。党的一切问题应该集权于常委会，

组织科、宣传科等不过是常委会的技术机关。但是边界的党，不但没有集权到常委会，甚至连组织科都没有，而仅是书记一人的独裁，紧急会议后，特委本身及永新县委比较好点（由常委会决定各项工作），但特委以下之各级党部，仍然犯同样的毛病，一点都没有改正。

8. 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秘密工作，以致养成极大部分党员不懂秘密工作，在夺取政权时，就全部公开出来；在失掉政权时，就去“打埋伏”。

9. 过去工作，上级与下级隔开，下级对上级也没有很好地巡视和指导。党只偏重机关工作，犯了与群众隔离的错误。

10. 过去党太少注意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

11. 过去特委只注意军事范围的布置，如宁岗、永新两县工作，没有顾及全部，以致成为军队附属品。如军队打到某县，就注意某县的工作，军队没有到某县，某县的工作就不注意了。

12. 过去党太不注意团的工作，甚至有取消团的倾向。

二　今后党的改造与建设

1. 党必须彻底改造，从支部改造起，肃清组织上和政策上机会主义的领导。

2. 特委县委都须有四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

3. 尽量提拔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各级执委会、常委会都须有过半数的工农同志参加，提拔工农分子，特别要注意教育的意义。

4. 各级党的机关，必须组织健全，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常委会，各科都是技术机关。

5. 在党的改造当中，应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极力注意讨论和执行党的新政策，坚决与过去党的小资产阶级、自由独立、浪漫的分子[1]，严密防止“独立国’的倾向。

6. 党应该扩大民主化到最高限度，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使党员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计划。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应尽量用选举办法产生。

7. 党员成分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须严格限制。

8. 党的发展，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当中，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和考查工作。凡介绍一个新同志应在一个支部会议上通过，经过区委批准，反对拉夫式的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党的组织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基础。

9. 党要注意党的基本组织——支部，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同时要特别注意城市支部工作，并提拔很好的工人同志尽量当农村支部书记及委员，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在乡村中的党员，须选出先进分子，加以特别训练，以培养成党的中坚。

10. 党的组织应绝对秘密，各级党部每个党员，应当极力注意秘密工作，反对依靠军事政治势力去组织党，应在敌人范围内秘密组织党，反对逃跑和“打埋伏”。

11. 特委应极力注意使本身和各县委健全，攸县县委应马上建设，对于边界各县党的工作应有整个的布置。

---

[1] 原文如此，疑缺内容。

12. “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仰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垒森严、步伐整齐地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纪律为改造与建设党中央的重要工作。

三　各县工作问题

各县工作详细计划由特委负责讨论。

四　农村斗争问题

1. 过去农村斗争，并没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所谓分田，完全不是适应贫苦雇农的彻底要求，而只是站在富农、中农、贫农的调和观点上去平均分配的，这是过去一种重大的错误。

2. 过去我们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并没有施行严厉的赤色恐怖，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上花茶陵比较好点）。

3. 过去在乡村赤色政权之下，太忽略农村中富农、中农、贫农之间的阶级斗争，以致在白色恐怖之下，贫农无团结无力量，富农反水，中农动摇。

4. 我们今后农村斗争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地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5. 根据这个策略，我们应即组织：（1）雇农工会（贫苦的佃农

加入此组织），以此团结雇农，加强雇农的力量，以为乡村中的主干。（2）赤杀队或暴动队，在白色恐怖之下，以最勇敢的工农分子组织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时，赤杀队可改变为赤卫队。（3）在工农群众中选举勇敢分子组织暴动队，发展农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五　工人运动问题

1. 工人是各种劳动群众之先锋，是各种劳动群众的领导者，过去没有注意工人运动，工人领导更是说不上，以致造成农民党的倾向，这是党的一种重大危机。

2. 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城市工人，我们党须用大的力量去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由零碎经济斗争进而武装暴动，纠正过去忽视工人运动的错误。

3. 各级党部各级苏维埃，应极力提拔工人，使之能站在领导地位，领导斗争。

六　兵士运动问题

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在执行中必须将工农兵三种力量很好配合起来，然后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因为中国的“民权革命”尚未实现，故军阀豪绅买办阶级得以运用封建关系愚弄工农而雇用之，以为保护他们的工具，故现在的士兵有大多数尚安心在敌对阶级指挥之下过饥寒交迫（敌军有几年未发过饷的）的生活。但在国民党未叛变之前，国民革命军相当地

都受了一点“阶级斗争”的宣传。至于事变以后，投入军营的（农灾协或工会的办事人）当然更有觉悟。这些觉悟分子在反动军官高压严密的防范下，而又苦于找不着领导者，故不敢轻易在反动军营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实则他们的革命情绪，反水志愿是很丰富的，这可以证明在客观上的士兵运动的可能性，实在已经具备了。而且此运动的成功，在湖南、广东等省，已有事实可据。现在反动统治的屏障，完全是靠几百万尚未觉悟的国民革命军，我们士兵运动做得好，则反动统治很迅速地便要倒台，反之，我们不注意士兵运动而只专门做农民工作，则中国的革命，永久也不会成功的。

边界各级党部向来少注意士兵工作而只顾工农运动（有些党部还仅只有农民工作）。须知我们过去许多失败的经验，主要原因是没有士兵运动参加暴动（如去年广东的年关暴动、湖南屡次的暴动失败……），现在如再不注意，则将来的失败便可预言。很明显的，现在单靠边界主观的方量，妄想打出一个天下，或造成更大的割据是不可能的，所以各级党部必须努力进行士兵运动。莫忘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是要将工农兵三种势力配合起来才有可能的。

1. 士兵运动此时与工农运动同样重要，各县应有计划有组织地选派大批工农同志去反动军队内当兵、当夫、当伙头……在敌兵内部起作用。尤其是永新、茶陵、辽川等大部敌兵汇集的县分，要特别注意此项工作。

2. 加紧对敌兵的宣传工作。

3. 派人到敌人内部去组织党，不要组织士兵委员会，以免组织复杂而易于惹起敌军军官之发觉。

4. 利用灰色同志及农村妇女，向敌兵做口头宣传和煽动工作。

5. 造谣、恐怖煽动，以动摇敌军人心，由动摇而瓦解。

七　宣传问题

1. 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同时在各项工作中（如组织苏维埃、暴动队，分田，组织党等工作），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只是利用军事政治势力去逼着做，“不做就杀”。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

2. 特委县委宣传科，应设法使之健全，每周标语宣传大纲，都须按期发出，每日壁报亦应发给各级党部缮写张贴。各游击队出发游击，都须有很好的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宣传队、个别宣传）。

3. 以后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工作报告，须有宣传工作的报告。上级巡视和检查下级工作时，亦须注意宣传工作的检阅。特委县委每周应有宣传大纲发给各下级党部。

4. 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应极力分析军阀内部的冲突，注意反对军阀混战的宣传工作。同时，应极力宣传工农及共产党的力量之伟大，说明军阀混战其结果必被工农暴动所消灭。

5. 我们目前对一般工农群众的宣传，须极力揭破军阀及豪绅欺骗工农政策，多发表本党的主张。

6. 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脑海中。

7. 此时我们应对同志和群众，详细分析统治阶级与政治上经济上之矛盾与冲突，极力宣传工人农民本身力量及各地暴动的势力，

打破灰心没有希望的失败观念，同时要打破同志及群众专门依靠军队的等待观点（自然我们不否认军队发动暴动与帮助工农暴动的力量）。

八　训练问题

1. 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2. 特委组织教宣委员会，制定训练材料，计划每周训练工作。

3. 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成干部人才。

4. 各级党部的会议及实际工作当中，应极力提拔工农分子，训练工农分子及干部人材。

5. 目前基本训练工作，应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

6. 增高同志的文化程度政治教育，同时要作识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的“写”“看”能力。

九　苏维埃问题

1. 过去苏维埃政府差不多完全是农民协会的变形，所以它的工作，是秘书长和主席包办，甚至有些政府还是富农当权，或为知事衙门。这些所谓苏维埃政府，应一律改组。

2. 由特委制定苏维埃组织法，各县各区各乡苏维埃，应一律照组织法组织之。

3. 苏维埃必须以工人贫农革命兵士为主要力量。反对富农秘书

长把持，实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4. 湘赣边界政府重新彻底改造。

5. 各级党部与各级苏维埃的关系要弄清楚，免除党即政府的弊病。关于党与政府不同，特委须发一通告，各级党部要作普遍宣传。

十　土地问题

接受中央对土地问题的通告，交特委讨论，作最后决定。

十一　CY问题

1. 青年团是党在工农群众中的政治组织，过去边界各级团部多不明了青年团的政治任务，团在边界各县仅只作了些扩大影响的文化运动，事实上成了党的附属机关，因此造成边界各级党更严重的错误——主张取消团。

2. 目前边界各县应当是建设团的工作，但是团的本身力量薄弱，很难单独担负起这个责任，各级党部必须划出一部分力量，经常注意团的工作，帮助团在边界各县普遍地建设团的支部，扩大团的组织，健全团的指导机关。

3. 团的经费应该独立，以便团在工作上能够措置如意，避免团在经费上依赖党的观念。

4. 注意团的工作，是各级党部应有的责任。今后各级党部向上级报告中，必须有“团工作”的一项。上级巡视员在检查各级工作中，亦须留心团的工作。

5. 各级党部、团部多不明了党与团的关系，以致发生各干各的倾向。

挽王尔琢联[1]

（1928年10月）

一哭尔琢，再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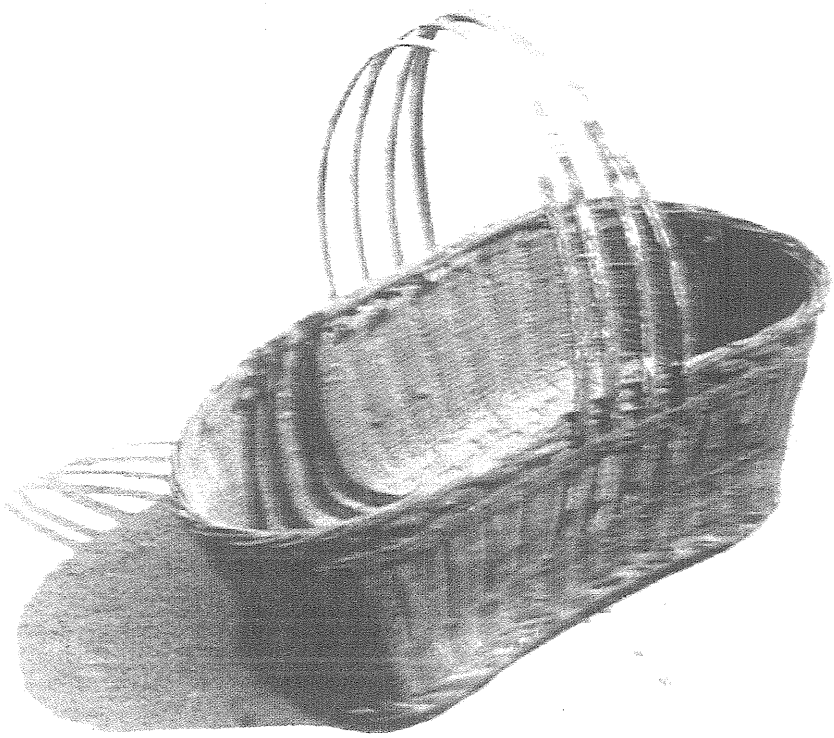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

[1] 王尔琢（1901—1928），字蕴琰，湖南省石门县商溪乡王官桥村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又参加湘南暴动。1928年4月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兼红军第二十八团团长。1928年8月25日，追赶叛徒时，在江西省崇义县思顺墟被叛徒袁崇全枪杀。王尔琢牺牲后，朱德赶到思顺墟现场，痛哭和悼念战友。10月上旬，在宁冈砻市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前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村八角楼起草，由陈毅书写了这副挽联，挂在会场两边。



为了改善根据地医疗条件，根据湘赣边特委决定于1928年10月，在井冈山西北的小井兴建一座红军医院。图为小井红军医院旧址。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给伤员送饭用过的篮子。

西江月·井冈山[1]

（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2]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3]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4]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

[1] 井冈山，在江西西部及湖南东部，方圆500里。

[2] 鼓角，本指古代军中所用的战鼓和号角，此处借指军号。

[3] 岿然，高峻独立。

[4] 黄洋界，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另4个是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



《革命圣地井冈山》（诗意画）

井冈山的斗争[1]

（1928年11月25日）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2]，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3]，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

[1]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2] 这个战争发生于1927年10月，到第二年3月结束。

[3] 这个战争发生于1927年11月，到第二年2月结束。

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如果遇到什么人在军事方面主张采取逐步推广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张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则谥之曰“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坏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枝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

士兵委员会[1]。部队分开行动时，则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之。这时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

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

[1] 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1947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中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原来七月中旬，湖南敌人第八军吴尚侵入宁冈，再进永新，求战不得（我军从间道出击不值），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红军大队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并在酃县变计折赴湘南，而江西敌人第三军王均、金汉鼎部五个团，第六军胡文斗部六个团，又协力进攻永新。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永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敌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这时江西敌人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去，随即和王均的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军五个团，亦仓皇退至永新城内。设我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队已不在，我一团兵复疲惫不堪，乃决留一部分会同袁、王两部守井冈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

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敌范石生战于郴州，先胜后败，撤出战斗。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王尔琢。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此次失败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割据地区的现势

今年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

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1]。八月三十日井冈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乡村。然而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有西北两区，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在莲花有上西区，在遂川有井冈山区，在酃县有青石冈和大院区。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仅失枪三十枝，最后退入山区。

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冈山。十月一日，与敌熊式辉部周浑元旅战于宁冈获胜，收复宁冈全县。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十一月九日，我军又击破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口。翌日进占永新，随即退回宁冈。目前我区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莲花的上西区，永新的天龙区、万年山区，则和整块不甚连属。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消灭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正在准备打破敌人的进攻。

军事问题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

[1] “反水”，意为叛变。

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1]；（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2]；（三）平浏的农民[3]；（四）湘南的农民[4]和水口山的工

---

[1] 即1927年8月1日在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的旧部。这些部队在潮州、汕头一带失败后，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在广东坚持斗争，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等率领退出广东，经福建、江西，转入湖南南部，会合当地农军举行湘南起义，开展苏维埃运动。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2] 指1927年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它的干部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这个警卫团在8月初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就转到修水，同平江、浏阳的农军会合。

[3] 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在1927年春已经形成相当有力的农民武装。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即“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为了向反革命还击，浏阳的农军，同长沙附近其他各县的工农武装一起，曾经向长沙前进。在进军途中，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撤退农军的命令，其他各县工农武装都向后撤退，只有浏阳农军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长沙城下，遭到失败后撤退。7月中旬，这支农军同平江的农民武装会合。9月又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等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领导下，于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秋收起义。10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4]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原来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5县，这时都组织了农军。后来这部分农军由朱德、陈毅率领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

人[1]；（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虽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2]来此，亟盼实行。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

---

[1] 湖南省常宁县水口山是重要的铅锌矿产地。1922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历年与反革命斗争。1927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为主，组成了湘南游击总队，进行游击战争。1928年初，湘南游击总队编入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参加了湘南起义，后随起义军一起，到达井冈山。

[2] 指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1921年秋，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当时，安源一带有1.2万多名工人参加了工会。1927年9月，安源工人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党代表制度[1]，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

---

[1] 红军中的党代表1929年起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1930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

上，全靠打土豪供给[1]。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2]。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

[1] 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分的。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收税等方法筹措军费。

[2] 此种办法在红军中施行了一个很长时期，在当时曾是必要的，后来改变为按等级略有一些区别。

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2]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3]。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湘南来的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可是八月间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现在不能调出人去。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

---

[1] 在军队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这里毛泽东特别着重地指出革命军队内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初建，非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农民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的革命积极性，不足以肃清干部中由反动军队传来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当然，部队中的民主生活必须是在军事纪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着加强纪律而不是为着减弱纪律，所以在部队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要求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初期的红军中，曾经一度严重地存在过。关于毛泽东反对军队中极端民主化的斗争，参见《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2] 1926年北伐时，叶挺领导的部队为一个独立团。这个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伐中有名的战斗部队。革命军占领武昌以后，独立团本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同时，抽调该团部分骨干组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抽调该团的大批骨干组建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等部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兼任军长。

[3] 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1/3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

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马日事变[1]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业经规定红军每营用四连制，每连步枪七十五枝，加上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团部和三个营部，每团有步枪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

---

[1]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5月21日（马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聪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时，我们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

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土地问题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间阶级问题：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1]，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但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

[1] 1928年湘赣边界土地法中曾经有这样的规定。毛泽东后来指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验而来的。1929年4月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国亦差不多。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但是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

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1]。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2]。

---

[1] 鉴于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毛泽东随即纠正了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政策。毛泽东对中间阶级的政策主张，除见于本文外，又见于1928年11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内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布告（内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等语）和1929年4月兴国县土地法等。

[2] 此种情况，依靠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革命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后来也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关键是坚决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过左的政策。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1]。

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

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政权问题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

[1] 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长时期都是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

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

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党的组织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拼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拼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

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

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

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

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1]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

[1] 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基础。(3)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4) 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 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酃县、茶陵、攸县尚有大敌，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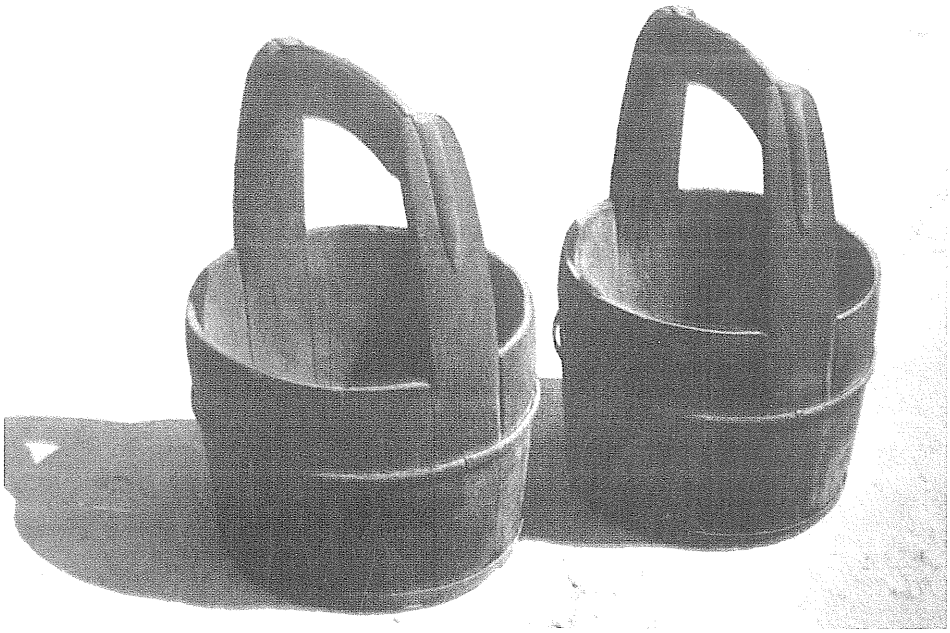
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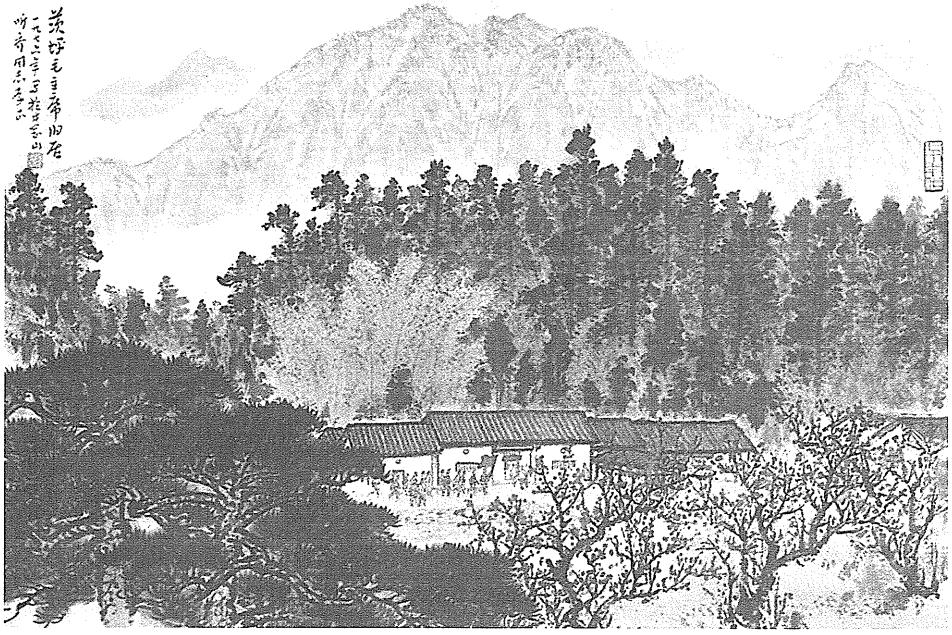
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中国画）



毛泽东在永新调查时为乡亲们挑水用过的水桶。



《茨坪毛主席旧居》（中国画）



《毛泽东在井冈山》（油画）



《毛主席在井冈山》（油画）



《毛主席在井冈山》（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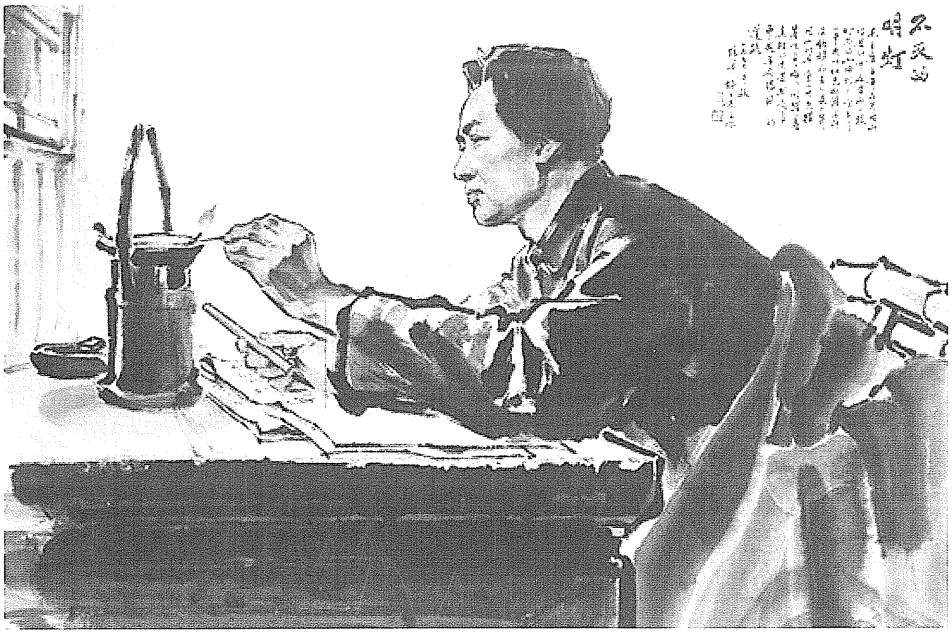
《艰苦岁月》（油画）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挑粮路上》（油画）



《光辉的榜样》（中国画）



《不灭的明灯》（中国画）



《井冈山之晨》（版画）



《井冈山岁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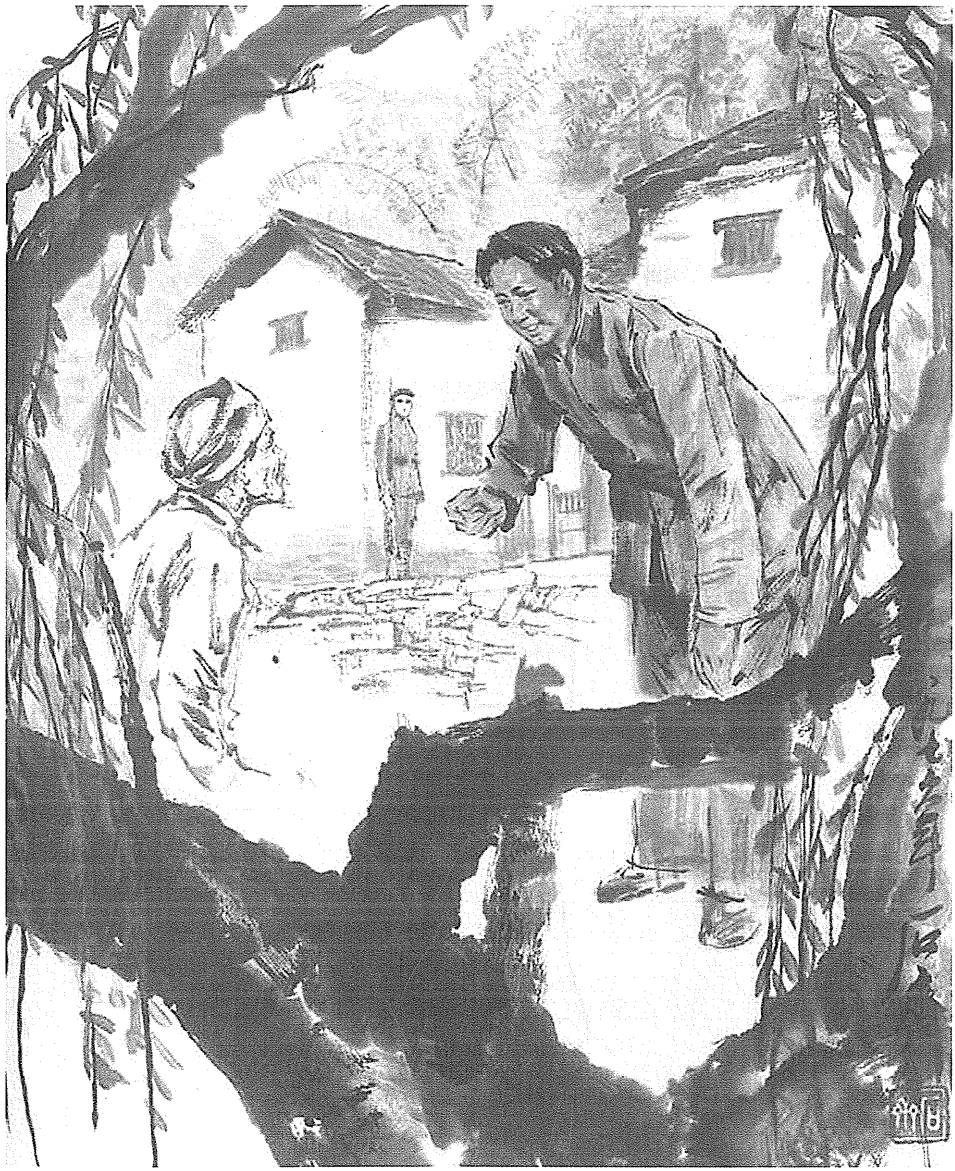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井冈山》（油画）



《毛主席在井冈山》（油画）



《峥嵘岁月》（中国画）



《毛主席到我家》（中国画）



《井冈晨雾》（中国画）



《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版画）

（井冈山）土地法

（1928年12月）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一）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一）以乡为单位分配。（二）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三）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坳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

（一）茶山[1]、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二）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三）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

（一）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1. 百分之十五；2. 百分之十；3. 百分之五。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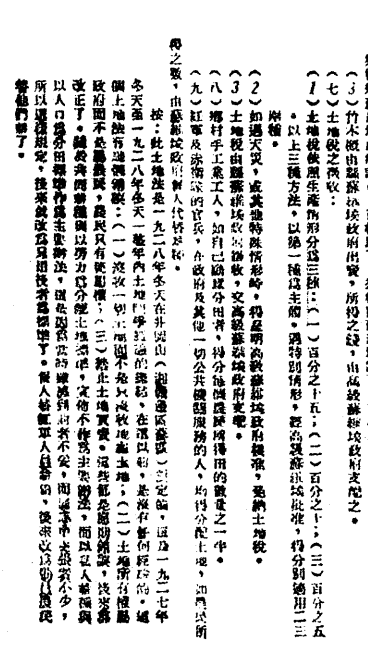
（二）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三）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

[1] 茶山，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田的数量之一半。



土地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製，在井岡山）

（一）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種方法分配之：

1、分配農民個別耕種；2、分配農民共同耕種；3、由蘇維埃政府耕種（現暫取第一種）。

以上三種方法，以第一種爲主體。遇特別情形，或蘇維埃政府有力時，實施第二第三兩種。

（二）一切土地，經蘇維埃政府沒收並分配後，禁止買賣。

（三）分配土地之後，除老幼殘廢沒有耕種能力及服公務勤務者以外，其餘的人均須參加耕種。

（四）分配土地的數量標準：

1、以人口爲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勞動力爲標準，服勞動者比不勞動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兩種標準，以第一種爲主體。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採用第二種標準。採取第一種標準的理由：

（甲）革命後老百姓的政權未完固以前，老幼如分用過少，要至不能維持生活。

（乙）以人口爲標準計算分配，比較簡單方便。

（丙）沒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時亦無妨礙其耕種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後政府不分配以和當之公家勤務，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區域標準：

1、以鄉爲單位分配。2、以縣爲單位分配（如水數之小江區）。3、以區爲單位分配（如遂川之黃坳區）。

以上三種標準，以第一種爲主體。遇特別情形時，得採用第二第三兩種標準。

（六）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應分用的辦法，以鄉爲單位，平均分配耕種使用。

2、竹木山，除現有的竹木，仍歸農民經營耕種外，得將荒山栽植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須得鄉蘇維埃政府許可。百根以上，須得縣蘇維埃政府許可。

3、竹木歸由縣蘇維埃政府出賣，所得之錢，由高級蘇維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稅使用生產物分爲三種：（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種方法，以第一種爲主體。遇特別情形，經過縣蘇維埃政府批准，得分別適用二三兩種。

（八）鄉村手工業工人，如有已組織分用者，得分地與農民所得用的數量之一半。

（九）紅軍及赤衛隊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機關服務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農民所得之數，由蘇維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種。

按：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岡山（湘贛邊區）制定的。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內土地鬥爭經驗的總結。在這以前，是沒有任何經驗的。這個土地法有幾個錯誤：（一）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權屬政府而不是屬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三）禁止土地買賣。這些都是原則錯誤，後來都改正了。關於共同耕種與以勞動力爲分配土地標準，後來改爲以人口爲分配土地標準，因爲那時農民還不甚覺悟，雖有少數勞動力強的人不滿意，但大多數農民贊成，所以這種規定，後來就改爲照顧多數人利益的原則了。

1928年冬，毛泽东总结一年来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图为《土地法》的部分内容。

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1]：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界）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力为分配土地标

[1] 这个“按”是毛泽东在延安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加写的。

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张者不少，所以这样规定，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雇人替红军人员耕田，后来改为动员农民替他们耕了。

红军第四军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8年12月16日）

一　大会纪事

四军五次大会是本年五月在宁冈新城开的，到现在经过了六个月的艰苦斗争。六次大会于十一月十三日开预备会，十四日开正式会，十五日闭会。到会代表七十九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卅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所有支部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三十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十七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各种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期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各种提案因各代表身负重责，急须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后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四十九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二十三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大会于十五日闭幕。这次大会一切决定关系红军前途及边界发展至巨，复志其概略于此。

二　政治问题决议案

（1）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根据国际二月间对中国革命问题决

议，认定中国革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阶段。这个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其内容对外推翻军阀完成土地革命，将封建剥削关系消灭，使中国被压迫群众得到民权自由。要这样才能培养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若果否认这个民权的革命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误解于中国革命极有害。我们从过去的斗争中，证明国际意见的真实。从广州暴动以来，各地烧杀主义便是根本误解了中国革命性质，红军四军于……苦的经验，我们今后的行动是领导工农兵群众及小资产阶级，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土地革命，推翻目前最反动的局面，红军必须宣布具体城市政纲，力改前次无限制没收军需品的政策。

（2）国际形势：从德奥资本主义复兴，英法海军协定，美国战争条约，意大利争地中海的权，日本对华出兵，美国对华单独条约，诸事件证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日趋激烈，这是国际革命涌进的时机！

（3）国内情势：近来国民党各派军阀成立了一个联合政府，表面上鼓吹永庆升平，实际上蒋介石派专政拉拢勉图一时的相安，从军政、财政、党务三方面国民党内包含了极繁复的裂痕，尤其是北方匪祸方面与南方工农兵暴动证明这个“统一政府”的力量薄弱。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统治中国的主人是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帝国主义既是不一致，则其卵翼下的军阀政府更是分崩离析的了。所以中国现时政局的暂时相安，只是在酝酿着军阀们的大混战。

（4）苏维埃政府的产生与存在问题：在白色势力统治下的中国能生长出苏维埃政权而有继续存在的情势，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征。因为中国革命是一个半殖民地，在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根本是割据不能统一的，苏维埃政权即从其分裂中成长，如果统治阶级的

分裂是继续不断的，则苏维埃政权也同样的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从一年来各地苏维埃之发生证明，上面理之真实，又从边界一年来的割据证明，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需要下列四个条件：（甲）能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乙）广大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丙）有相当力量的武装红军和赤卫队；（丁）有利于斗争以少胜多的地势。

（5）目前政治任务：湘赣二省在中国地域上过去经过极汹涌的革命潮流，群众有较深入的基础，边界各割据便负有影响二省革命运动的使命，这样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领导群众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红军所到区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发展以促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这是党在红四军中的任务。

三　党务决议案

（1）红军中各级党部，不宜公开处置各种事务，竭力恢复秘密状态，党的机关可设置在各级士兵委员会内，党的负责同志须兼为士委职员，对外须提高士委权力，成立党团指挥之，军事机关也需健全，使具有执行党的革命指挥军事的权力。纠正党部过去直接处理日常事务，视军事机关及士委为虚设的毛病。

（2）五届军委决定健全各团委，军委只负责政治指导责任，因此对于下级情况毫不明了，各团委也独自为政，逐有不能集中之弊，今后应建全军委，军委须经常明了各支部的工作。

（3）红军迭经巨战，党委干部人才已伤亡殆尽，此后军委须经常成立政治训练班，陶铸党务工作人才。

（4）须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其比例至少须二分之一。

（5）连上支部干事会应改变称连支部委员会，扩大委员数量，

使多数同志参加干部指导工作。切实做到连支委为红军核心，支委人数定五至七人。

（6）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并同时负有计划督促政治工作之公开任务，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

四　军事问题决议案

（1）建立军事根据地：（甲）在大小五井建筑巩固的工事；（乙）在根据地尽量屯积粮食；（丙）在根据地建筑医院、营舍及红军纪念堂。

（2）部队编制：每连长枪定七十五支，每营四连，每团一个特务连，其枪数与步兵连等，每团可有机关枪连、追击炮连，每连长枪四十支，团部传令排八支，营部四支，军部可设立特务营，其组织与兵营等。

（3）一切枪弹归军部，各团、营、连不得自由分配。

（4）短枪每连至多不过六支，营部至多不得过三支，团部至多不得过五支，军部至多不得过六支。

（5）红军战术遇小敌则以主力迅速消灭之，大敌则用群众力量四面包抄，使其疲于奔命，然后用主力消灭之，红军竭力避免硬战。

（6）军事技术得加强训练，对于下级干部的军事指挥更应注意方法，健壮红军战斗力。

（7）在军队组织中要特别健全侦探队、卫生队、担架队，在每营可设担架排，关于经济经理及报告应采用新式簿记。

（8）编纂红军战史及死难同志传略，并收集其遗嘱、遗物作纪

念品。

（9）红军政治训练要注意下列诸种：（甲）健全士委会，使其权能代表士兵利益，参加军队管理，维护军队纪律，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对外作群众运动；（乙）分期举行士兵识字运动；（丙）启发士兵阶级觉悟，使士兵了解革命中各种主要问题，并具备政治常识；（丁）筹备各种娱乐，影响士兵自动参加，使其得到艺术的享乐；（戊）连上须组织三人以上宣传队，战时平常不断地做宣传工作；（己）标语口号须由军委规定发出，以求统一，免致杂乱。

（10）各级党部须随时计划做破坏敌人工作。

（11）为使红军扩大须应募工农及革命分子来红军入伍。

（12）军委须着手健全三十二团第一营。

五　经济问题决议案

军部军需处及各团辎重队，每月需要作一详尽经济报告，交由士兵代表会审定后向群众公布，务使红军经济问题彻底公开。

六　纪律问题决议案

十一月十日红军新城、永新之役，宁冈四区赤卫队及一部农友不来前线作战、夺取敌人枪支及担任运输、救护、搜山等工作，仍在新城附近收搜耕牛及其他杂物。此种行动实属违反革命纪律，侵犯农民利益，本代表大会应向宁冈县委及县政府提出质问，希望以后不宜再有此项行动，关于索去耕牛须尽数发还，并公开发表宣言，解释此项错误，使群众明了。

七　大会代表提案

（1）健全担架队；

（2）健全侦察队；

（3）健全军事政治学校；

（4）优待敌军；

（5）招新兵；

（6）收买枪弹西药；

（7）派员联络五军；

（8）整饬军纪党纪；

（9）囤积粮食于后方；

（10）颁布民权革命政纲；

（11）禁止盲目的焚杀；

（12）保护中小商人利益；

（13）恢复罗霄山脉政权向北发展；

（14）红军需依照太平天国军队的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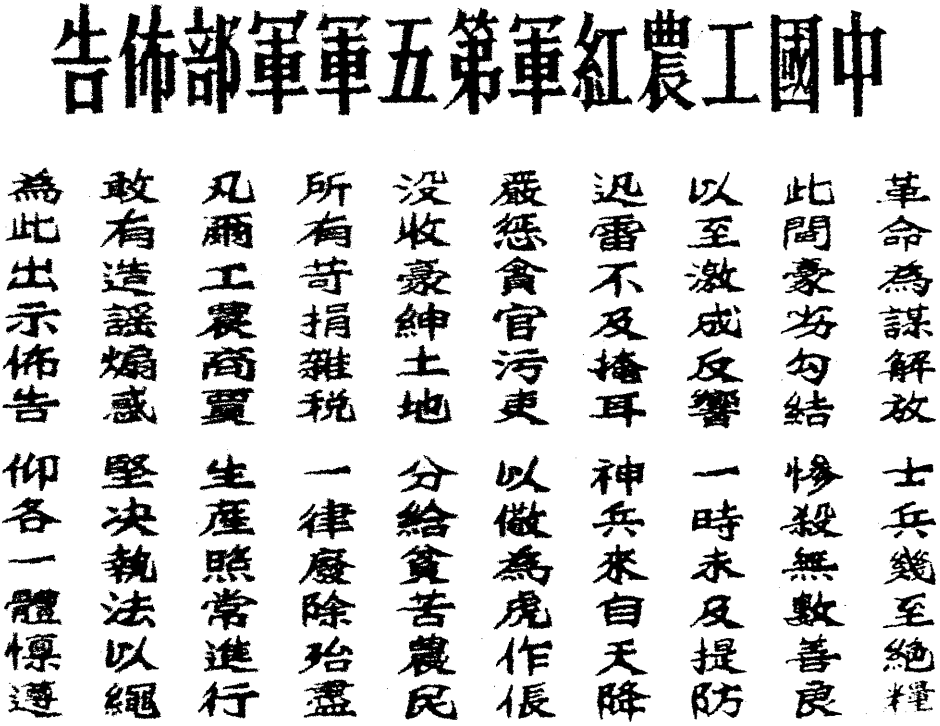
（15）速定红军人员武器的编制表；

（16）军队中不准私自买卖；

（17）健全士委会；

以上十七种提案，大会因提前闭幕，未及详细讨论，均交新军委讨论执行。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发行


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軍部佈告

革命爲謀解放　士兵幾至絶糧
此間豪劣勾結　慘殺無數善良
以至激成反響　一時未及提防
迅雷不及掩耳　神兵來自天降
嚴懲貪官污吏　以儆爲虎作倀
没收豪紳土地　分給貧苦農民
所有苛捐雜稅　一律廢除殆盡
凡爾工農商賈　生産照常進行
敢有造謠煽惑　堅決執法以繩
爲此出示佈告　仰各一體懍遵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和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会师。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部布告。



伪装题名《新出绘图国色天香》的《中共六大决议案》。

和何长工应对联[1]

（1928年）

谷磨磨谷，谷随磨转，磨转谷裂出白米；（何长工）

门锁锁门，门由锁开，锁开门敞迎故人。（毛泽东）

[1]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将王佐的武装力量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并将何长工派去任党代表。一天，毛泽东外出散步，见一位老农正在磨房磨谷，便进房帮助。何长工有事来找，见磨谷的磨盘，略加思索出了上联。毛泽东听后，说：“妙对！妙对！下联可难配啊！待我仔细想想。”回到驻地后，毛泽东见警卫员用锁开门，当即触景生情，对何长工说：“我看刚才的上联可以这样对。”接着说出了下联。何长工（1900—1987），湖南华容人，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4年参加长征。建国后任重工业部代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29



1944年3月，胶东联合社以《古田会议决议》为书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

（1929年1月）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2]，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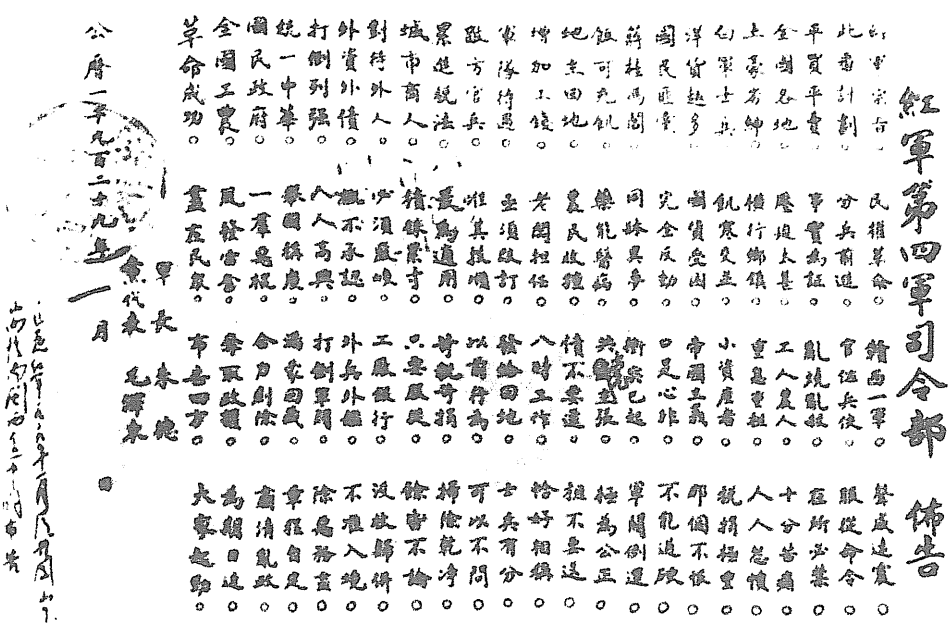
---

[1] 这是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布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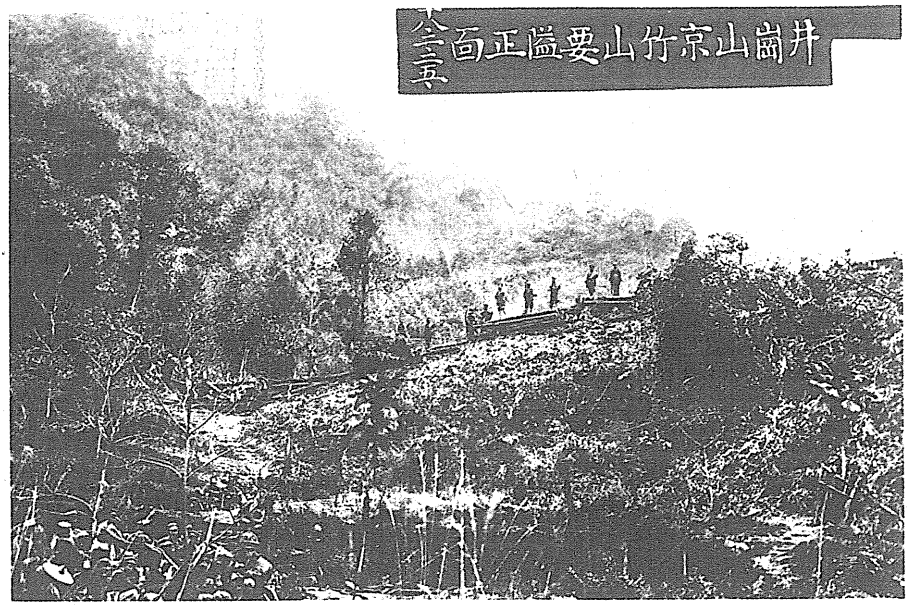
[2] 蒋桂冯阎，指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四派。

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军　长　朱　德
党代表　毛泽东
公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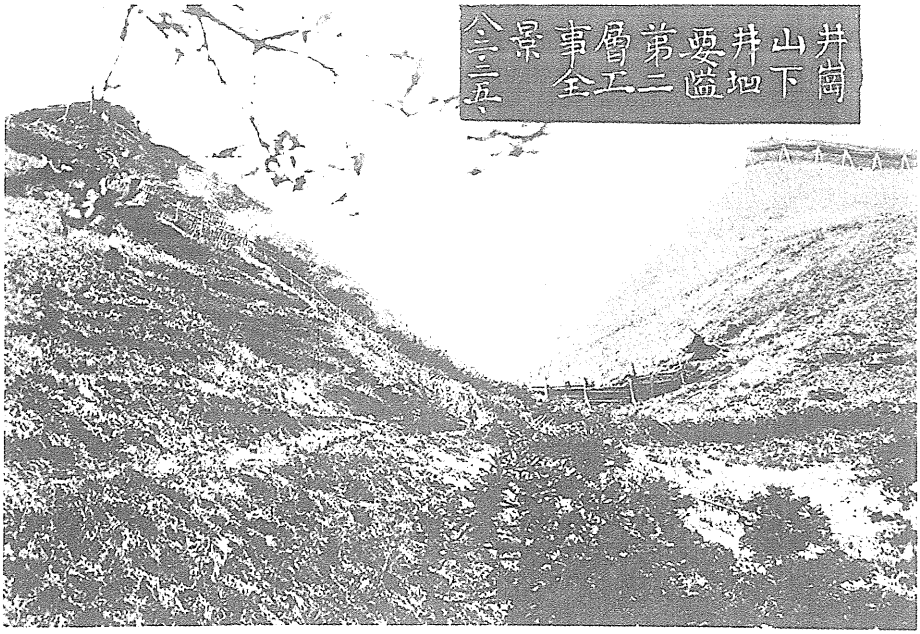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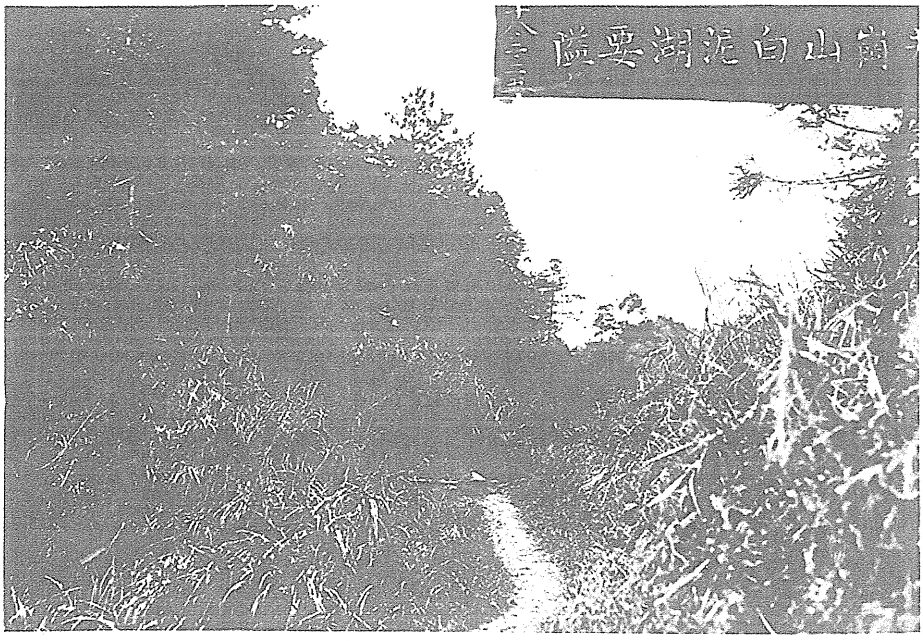
红四军司令部在进军途中发布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





1929年1月，国民党军队进攻井冈山。图为国民党军队拍摄的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的军事设施图。





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的军事设施图。

共产党宣言*

（1929年1月）

中国的革命现在还是民权革命的阶段。民权革命是要推倒两个最大的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阶级。中国受英、美、法、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有几十年了，他们把洋货运进中国来，把中国的农产品运到外国去，使中国的农民吃亏很大；又开工厂剥削中国的工人，开银行吸收中国的资本，管理海关扼制中国的命脉，设立教堂养成他们的走狗，把租界做根据，兵船开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各沿海沿江重要口岸，陆军亦驻在北京、天津、上海各处，简直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帝国主义这样压迫中国，中国数万万工人、农民、兵士及小资产阶级便不得不起而反抗，共产党更不得不站在民众的前头勇敢奋斗。乃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半路反叛，不但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且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卖国媚外，和吴佩孚、孙传芳一个样子，资产阶级国民党既已反革命了，工人、农民、兵士和小资产阶级，乃不得不担负打倒帝国主义的责任。帝国主义打倒之后，全国才可以统一，工业才可以发展，中国整个的民族才可以得到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责任。中国现在的土地制度，是一种半封建制度，农民受重租、重息、重税的剥削，田地集中在地主手里。中国境内，差不多不论哪一县，田地十分之七在地主手里，农民只有很少的田地。

乡村里一百户人家之中，少穿少吃的贫农要占七十家，够穿够吃的中农不过二十家，余钱剩米的富农不过十家，乡村中大多数人受苦受难，只有少数收租谷收利息的土豪享福。城里的官僚军阀乃是土豪的代表。一面重捐重税剥削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一面勾结帝国主义帮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削。土地革命是中国民权革命主要的内容，地主官僚军阀不除，中国农民得不到土地，民权革命就不算成功。所以推翻封建剥削，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责任。如上所述，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剥削，是民权革命的两大目标，但国民党已经背叛民权革命，蒋、桂、冯、阎、奉各派新军阀都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的走狗。故要达到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剥削的目的就非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不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个责任。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今来至此地，所执行的任务，就是上面所说的三件。同时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所执行的任务，也就是上边所说的三件。要执行上述三大任务，特依照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的指示，发布下列十大政纲：

（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二）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船只、矿山和银行；

（三）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民族的自决权；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六）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

（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田地和工作；

（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十）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

以上十条政纲是达到三大任务的具体方案。工人们、农民们、兵士们、一切贫苦群众、一切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快快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新军阀奋斗啊！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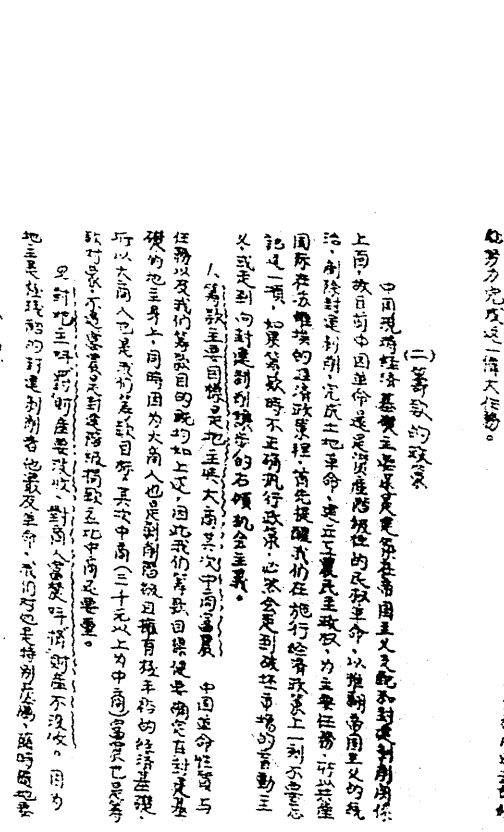
《向赣南闽西进军》（油画）

筹款公函

（1929年2月13日）

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现因军粮拮据，特函前来，请代筹军饷大洋五千元，草鞋、袜子各七千双，白布三百匹，夫子二百名。务于本日下午八时以前送来本部。即希查照办理，切勿玩延。如坐视不理，即证明宁都商人显系与宁都反动派勾结一气，故意与红军为难，本军唯有将宁都反动商店进行焚毁，以警奸顽，勿谓言之不早也。

晚上八时前，招待处执事们按时将所筹款和雇用的民工带到红四军军部军需处。此次筹款任务顺利完成。



图为湘赣军区政治部翻印的《筹款须知》，对筹款的政策作了具体规定。

告商人及知识分子

（1929年3月16日）

做生意的同胞们，读书的同胞们：

（一）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到你们这里来了，共产党会怎样对待你们呢？你们要怎样对待共产党呢？

（二）共产党在现时领导的革命，叫作民权革命，是要打倒三个反动的东西。第一个，打倒帝国主义，不许洋人在中国逞凶，中国归中国人管，不许洋人支配中国；第二个，打倒地主阶级，废止收租制度，田地平分给农民；第三个，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这就是共产党现时领导奋斗的三个大任务。

（三）提出这三种任务，你们不要吓倒了，岂但不要吓倒，应该十分欢迎。做到这三件事，是工农阶级的盼望，也是于你们大有益的。你们明白你们的地位吗？你们是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洋货不断地进口，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你们想，打倒了帝国主义于你们的益处有多大？半封建的地主阶级集中了多数田地在他们手里，重租重息，农民贫困到十分，乡下无钱到城市买货，城市工商业因此凋敝不能发展。打倒了地主阶级，取消了收租制度，农民得到了完全的收获，向城市的买货的力量大大增加。你们想，城市的生意不会大大发达吗？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及其政府打倒了，帝国主义失去

了走狗，地主阶级失去了代表，工农兵政府掌握了政权，民权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就算有成功的希望了，你们不觉得于你们是有益处的吗？

（四）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大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三大任务上努力，不要三心二意，表示服从，心怀敌意。须知共产党领导的民权革命一定要成功的，而且很快要成功的，此时一不服从，就走入反革命一路，将来决无立足之地。

（五）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配他们相当的工作。红军政治部正须招收大批政治工作人员，那些能够刻苦耐劳勇敢奋斗的革命学生们、教职员们，均可加入红军来做政治工作。

（六）蒋桂战争已在两湖爆发，全国新军阀大战业已发动了。欺骗民众的国民党已完全解体，三民主义完全是狗屁，全国统一完全是臭话。美国走狗的蒋派冯派、英国走狗的桂派、日本走狗的奉派阎派，只是为着私利就混战起来。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各派新军阀之倒台溃败就在眼前，工农阶级的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现于全国。商人们、学生们、一切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速

起来帮助工农阶级参加此历史的革命斗争啊！

商人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学生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赞助土地革命增加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断绝洋货的来源！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推翻国民党政府拥护工农兵政府！

商人要赞助革命，共产党就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保护他们的商业自由！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工农革命的队伍里来！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红军政治部！

民权革命万岁！

全国被压迫阶级解放万岁！

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

（1929年3月20日）

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

1. 我们（红军第四军）三月十四日攻克汀州[2]城。郭凤鸣（福建第二旅旅长）打死，陈尸汀市三日。缴获步枪约五百支（单响、九响多，红军用不着），马枪七、八支，迫击炮三尊，炮弹一百余发。郭旅残部向上杭溃退。

2. 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近城农民大大起来，连日建立农会、工会的基本组织（分秘密公开两种），日内即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目下是政治部代替政权机关。

3. 时局开展（我们看到三月三日的上海报，三月十三日的……及漳潮两报），闽西及赣南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动，尤盼飞速指示！

4. 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了。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名义给中共中央的信。

[2] 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重心，我们的意见：宜在江苏、直隶[1]，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5. 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6. 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部）约四百枪，战斗力颇好，现在兴国、泰和、赣州之交。独立第四团（段月泉部）约三百余枪，战斗力尚弱，现在兴国、于都之交。红军彭德怀[2]部约三百枪（井冈山逃出来沿途失散后存余者），在于都、信丰之间。三月七日彭部袭击刘士毅[3]残部，缴步枪百余，水旱机关枪各一，子弹七担。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尚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惟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7. 福建省委须立即派遣一闽西特委来汀州指导汀属八邑[4]工

---

[1] 直隶，旧省名，辖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两省的小部地区，1928年改为河北省。

[2] 彭德怀，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3] 刘士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五旅旅长。

[4] 汀属八邑，指旧汀州府下辖的归化、长汀、上杭、永定、宁化、清流、连城和武平8个县。

作，汀属党部太弱，担负不起建设政权的责任。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扩大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建设政权机关及闽西红军（现在枪无人抬），望省委以大力注意此间。

8. 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

9. 我们自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二十日在大余与李文彬[1]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远、寻乌，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二月一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嶂[2]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宁都、兴国、吉安之交，地属吉安）。二月十一日到宁都之大柏地，与追兵之先头部队刘士毅第十五旅两团战，大败之。我军士气大振，缴得步枪二百余，水旱机关枪六架，俘敌甚众。敌之残部，溃退赣州。追兵后续队伍李文彬部（三团）到来，我们则已往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军二、四两团会合，并与江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在于都），安置了伤兵。及李文彬（赣军最精锐部）追至东固，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3]），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复入宁

[1] 李文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

[2] 罗福嶂，村名，位于江西寻乌东部。

[3] 打圈子政策，是毛泽东对井冈山初期红军游击战术的一种形象说法。

都、瑞金之壬田市，后卫距敌才一里，乃我们离开壬田市向汀州之原因。张旅[1]忽然折回，盖湖南战事爆发，蒋系须集中部队，故将张旅调回，因此我们得安心对付郭凤鸣旅。十三、四日两次击溃郭部二、四团，而红军亦在兴国、于都一带发展。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以来，总计损失约二百余枪，六百人，最大的就是干部损失多员最为可惜。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难关，而得现时之胜利。内部团结坚固（最困难时兵士开小差的极少，干部袁文才[2]等数人脱离队伍），党的指导不错，亦为战胜困难的原因。

10. 军中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敌委员会（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人）。第四军除留在湘赣边界的一部分外，出来的部队现编为三个纵队，共三千人，枪一千五百，子弹极少。因战事太多，老的干部损失太大，战斗力不及从前。但井冈山出发以来的疲败精神，业已恢复，士气亦已振奋起来。因两次损伤的结果，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之缺乏，达于极点，亟盼中央派人来补充，至少须派军事的政治的教官各数人，来此开办训练学校。

11. 两年以来因交通隔绝，仅得中央来件二次。一是去年六月四日的长信，十一月间在井冈山接到的；一是六次大会[3]决议案

---

[1] 张旅，指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旅长张与仁。

[2] 袁文才，1929年随红军第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途中，脱离队伍回井冈山，仍坚持革命，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委。

[3] 六次大会，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

（政治，军事，土地，政权，农民，大会……结[1]六件），今年一月在永新接到的。我们寄给中央的信：去年八月毛泽东之一长信，由湖南省委转；去年十一月前委之详细报告[2]，由湖南江西两省委转，此报告历述两年来湘赣边界斗争之经过，红军之现在计划等，不知均曾收到否？

12. 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地接受。前已油印五百余本散发井冈山以来沿途的党部，现又石印一千本，为闽西赣南扩大组织之用。惟少组织、宣传、职工三决议案，乞即补寄！

13. 闽西特委须速建立。赣南特委与江西省委非常隔绝，但与前委已发生密切关系。湘赣边界特委自去年五月成立以后，与湖南省委关系较密，与江西省委关系较少。赣南党部，于都及东固最好，兴国、信丰、宁都、安远、寻乌次之，瑞金、会昌、石城尚无组织。长汀在开始发展中，最好之永定，离我们三百余里。为应付江西事变，红军此刻不能去永定。阮山[3]同志的红军有开来汀州之必要，必须如此，我们去江西后，汀州的政权才可以继续，才可以与我们取得密切的联络。郭凤鸣死，汀州再无人管，八邑中心工作应在长汀，望省委熟计。

14. 中央在估计力量时，不可把我们估量得太大。

前委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

---

[1] 原文如此。

[2] 即《井冈山的斗争》。

[3] 阮山，当时是闽西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

敬告士兵群众书[1]

（1929年3月27日）

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誓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到彻底的解放！

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们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打张贞[2]！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向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发布的《敬告士兵群众书》的主要内容。

[2]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

（1929年4月5日）

中央：

二月七日的信[2]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3]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地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4]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

[2] 指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

[3] 指1929年初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4] 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分是老的国

民革命军、浏平[1]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2]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汉，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

---

[1] 浏平，指湖南浏阳和平江。

[2] 指大柏地战斗和长汀战斗。1929年2月10日至11日，红军第四军在江西宁都大柏地（后改属瑞金），伏击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刘士毅部，歼灭该旅大部，俘虏敌团长以下800多人，缴枪800余支。1929年3月13日至14日，红军第四军与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激战于福建长汀的渔溪、长岭寨一带，全歼敌军2000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并乘胜占领长汀城。

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概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1]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2]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3]同

---

[1] 叶，指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昌卫戍司令，1927年8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贺，指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8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

[2] 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当时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3] 恽代英（1895—1931），江苏武进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1]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会到来。在这种时局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二省中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湘省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2]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然郭旅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3]二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亦未打过仗，战力谅不大，只有张贞[4]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二团好的，且五部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5]二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则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6]一旅之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

---

[1] 贺昌（1906—1935），山西柳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2] 蒋伯诚（1889—1952），浙江诸暨人，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3] 陈国辉（1898—1932），福建南安人，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兴邦（1880—1945），福建尤溪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4] 张贞（1884—1963），福建诏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5] 朱培德（1889—1937），云南盐兴（今属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集团军第五师师长。

[6] 李文彬，云南盐兴（今属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二十一旅旅长。

二，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1]的红军独立第三团[2]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我们三月十四日到汀州，战败郭旅，打死郭凤鸣，始知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因此，我们不下杭、永[3]，也不去龙岩，在汀工作十七日，于四月一日开到瑞金，定四月八日进占于都，到于都当召集一扩大会，与赣南特委与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同志等讨论行动计划。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

---

[1]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

[2] 独立第三团，似应为独立第一团。

[3] 杭、永，指福建上杭和永定。

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现随军来到瑞金。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临时与正式的革委都发布政纲。到瑞金规定四天工作计划，把部队分散到县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挥机关在县城。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无组织，一个同志都没有，无本地领导，组织工作仓卒，难做得好，特别是县城。到于都后大约有一星期在县城及四郊工作，以后或向宁都、广昌，或向万安、泰和，看情形决定。赣南游击一个时期，再赴闽西，那时须与郭凤鸣残部及卢兴邦、陈国辉战，福建省委须努力准备。

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分留边界外，大部分出来的计三千六百人，一千一百枪，在大余、信丰、寻乌损失约二百支枪，六百个人（多数是作战时失联络，真正被敌人拿去的不过几十枪，一百多人）。报纸所载那些骇人的消息，都是敌人欺骗的话。宁都汀州二战之后，不但恢复原状，而且增长了些。全军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每纵队辖二支队（等于营），每支队辖三大队（等于连），每纵队约枪五百余支，千二百余人。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冈山者八百人、枪五百支，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政治部已设立，军设军政治部，每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政治部内设

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分职工、农民、特务三股）、政治保卫科。支队大队两级设党代表。纵队以上废除党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赣东黎川方面（与广昌接近）有两个部队想来接头，一是金汉鼎[1]部下反叛出来的五百多人，三百多枪，现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田桂清；一是土匪军三百多人，二百多枪，到处被打无出路，现编为独立营，胡竹笙为营长。此两部约定四月十四日后开到宁都编就训练。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湘赣边界遭一度破败之后，现必到了恢复的机会，那边除王佐[2]部二百支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酃茶[3]六县赤卫队共八百枪，在军阀混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同志率部回去，当更有办法。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邓乾元同志。湘南自去年三月暴动失败之后，党的基础在盲动主义之下完全毁灭，农军武装也被豪绅缴去，群众都被镇压下去了。去年八月红军攻郴，在资兴、汝城、桂东组织三个县委，三个农民武装的赤卫队，另组织一特委统辖之，杜修经为书记。近接报告，他们又在盲动主义之下牺牲了。醴陵去春暴动后，党的组织打破，武装消灭之后，夏季又向四军领去七十支枪，秋季全部覆灭于攸、醴[4]交界之皇图岭，此足见少数武装单独存在之不易。

---

[1] 金汉鼎（1891—1967），云南黎县（今华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十二师师长。

[2] 王佐（1898—1930），江西遂川人，当时任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

[3] 宁永莲遂酃茶，指江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酃县、茶陵。

[4] 攸、醴，指湖南攸县和醴陵。

红军党的指导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来信云：关于前敌指导机关，中央视为有组织委员会之必要，委员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委员会，前委之工人同志为书记，一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军委及工委名单由前委决定。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为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受湖南省委指导。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的报告须立即回答，并将前委的报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我们对中央这种组织的指示，视为十分适当，合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地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

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转中央，原稿已失。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1]，历史地叙述湘赣边界斗争的经过及割据问题政策计划等，由湘赣二省委付上，此信原稿尚存，特重写付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一个是三月二十日前委在长汀发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未知能达到否？今亦重新寄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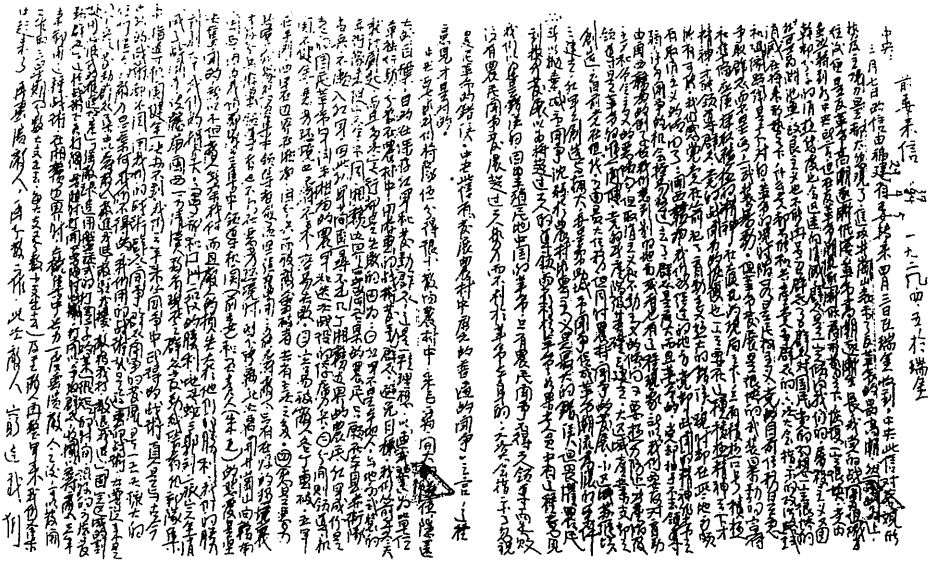
[1] 即《井冈山的斗争》。

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1]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前委

一九二九、四、五、于瑞金

[1] 何键（1887—1956），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其中最早以文字记载了毛泽东、朱德在1928年5月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图为该信的部分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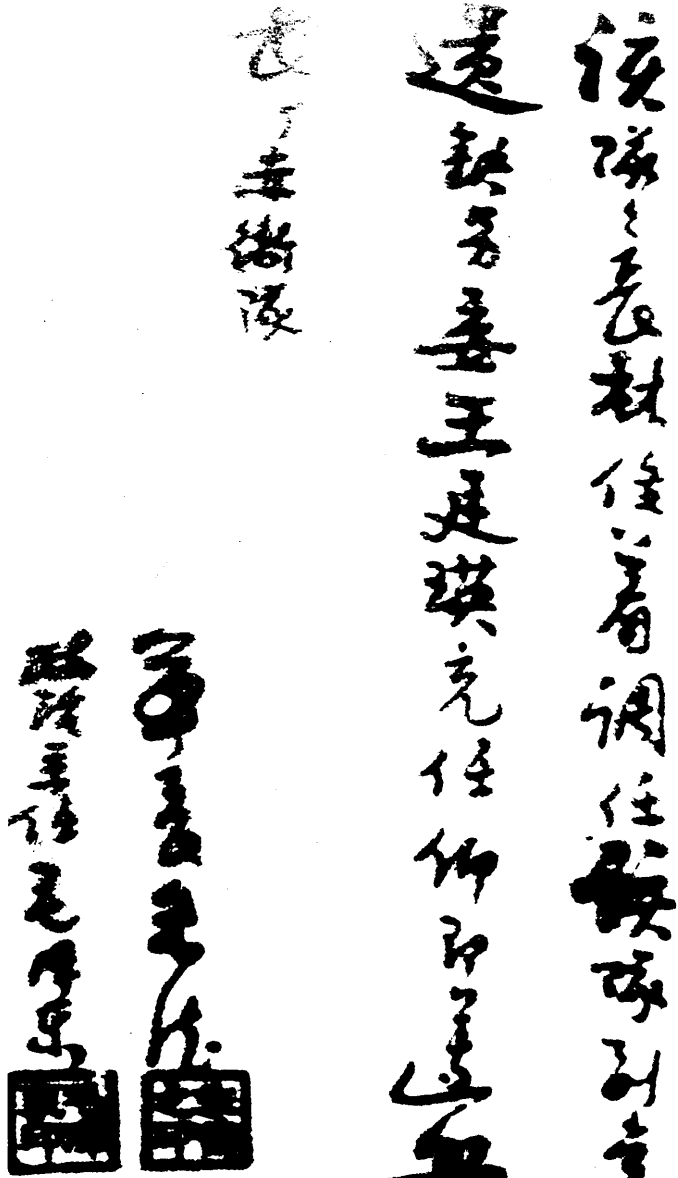
四军军部命令

（1929年4月10日）

该队队长林俊着任该队副党代表遗缺另委王廷瑛充任，仰即遵照。此令长汀赤卫队

军　　长　朱　德

政治主任　毛泽东



毛泽东、朱德给长汀赤卫队的命令。

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

（1929年4月13日）

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1] 这是毛泽东在于都以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名义，致湘赣边界特委信的部分内容。

（兴国县）土地法

（1929年4月）

（一）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二）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经工农兵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别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毕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致不能维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四）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

第三两种标准。

（五）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所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六）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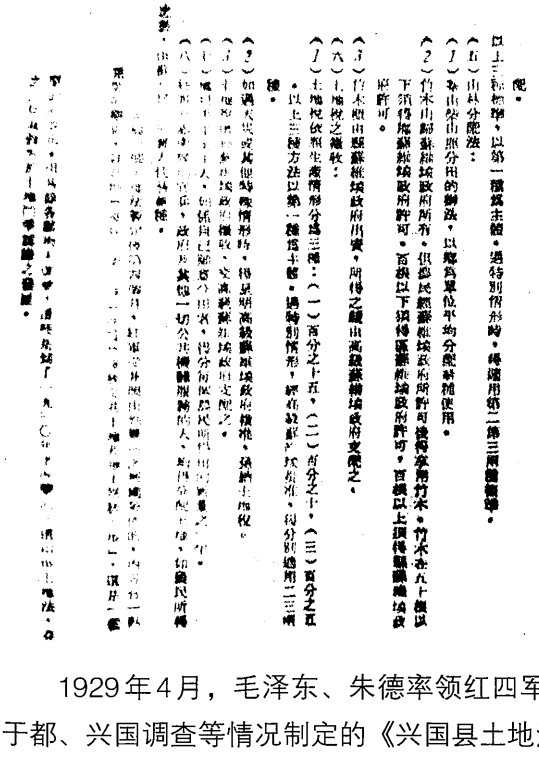
（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乡村手工业工人，如系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八）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岗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改变的。这两个土地法，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



土地法

（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调查土地法）

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于都。图为毛泽东根据于都、兴国调查等情况制定的《兴国县土地法》。

农民协会章程*

（1929年5月）

第一条　目的

农民协会之作用，在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领导农民，对地主阶级斗争以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田地分与农民，扫除农村中一切封建势力为目的。

第二条　会员

（1）农民协会之会员，为雇农、佃农及其他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

（2）农村手工人，尚无工会组织之时，亦得加入农民协会。

（3）革命的农村妇女，必须引导加入农民协会。

（4）会员年龄规定十四岁以上。

（5）一切收租的人、放重利的人及反动分子，不准入会。

（6）非农民之革命分子（赞成土地革命主张不还租、不还债的人）经全乡会员大会五分之三通过亦可入会。

（7）会员入会手续。

（甲）有会员二人介绍。

（乙）执行委员会通过。

（丙）填写入会表。

第三条　乡农民协会

（1）三人至十人成一小组，选举组长一人。每七天开会一次。

（2）三个以上小组，成一乡农民协会。

（3）全乡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每小组派代表一人至三人）选举委员五人至七人，组织执行委员会。

（4）执行委员会，互选委员长一人、组织科长一人（内设雇农、青年、妇女三股）、宣传科长一人、土地科长一人、财务科长一人、粮食科长一人、军事科长一人，聘秘书一人。

（5）执行委员三分之二，及委员长、粮食科长、土地科长、军事科长必须雇农或佃农方能充当。

（6）执行委员任期三月。

（7）乡代表大会每十五天开会一次。执行委员会每三天开会一次。临时会随时召集。

（8）地方过大、人口很多、不便指挥之乡得设立村农民协会，受乡农民协会之指挥。委员会人数及分科，得比照乡农民协会酌量减少，会期与同。

（9）执行委员任期三个月。

第四条　区农民协会

（1）三个以上乡农民协会成一区农民协会。

（2）全区代表会，每乡三人至九人须全部或至少三分之二是雇农、佃农议决。

（3）在有工会的区域内，须组织区革命委员会，不要区农民协会，区内各事，选举委员七人至十三人组织执行委员会。

（4）执行委员会，互选委员长一人、宣传科长一人、组织科长一人（内设雇农、青年、妇女三股）、土地科长一人、财务科长一人、粮食科长一人、军事科长一人、秘书一人。以委员长、组织科

长、土地科长、财务科长、军事科长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

（5）执行委员任期三个月。

（6）执行委员会三分之二及委员长、土地科长、粮食科长、军事科长，均须雇农或佃农方能充当。

（7）区代表大会，每月开会一次。委员会，每七天开会一次。常委会三天开会一次。临时会随时召集。

（8）区农民协会，受县革命委员会管辖（县不设农民协会）。

第五条　农民协会的工作

（1）把革命农民组织于各乡农民协会之内。

（2）对一般农民作普遍的宣传（特别是肃清反动势力、解决土地问题二项）。

（3）对组织了的农民，加以政治斗争的训练。

（4）打击地主阶级。

（甲）对于平素欺压工农、阻碍工农革命运动或经手公款账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和他们的走狗，一概捉拿起来，依其情节轻重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赔偿、游行示众、写悔过字等刑罚。

（乙）没收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的谷子、衣服、器具、房屋，以大部分分与贫农，小部分归农民协会应用。勒令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减轻谷价。

（丙）废除农民对地主的一切债务（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

（丁）举行群众大会焚毁田契借约（关于地主的）。

（5）组织赤卫队举行游击。

（6）发动没收一切收租田地（大、小地主的，祠堂的，公会的）的斗争，到群众革命情绪高涨时实行没收，分配贫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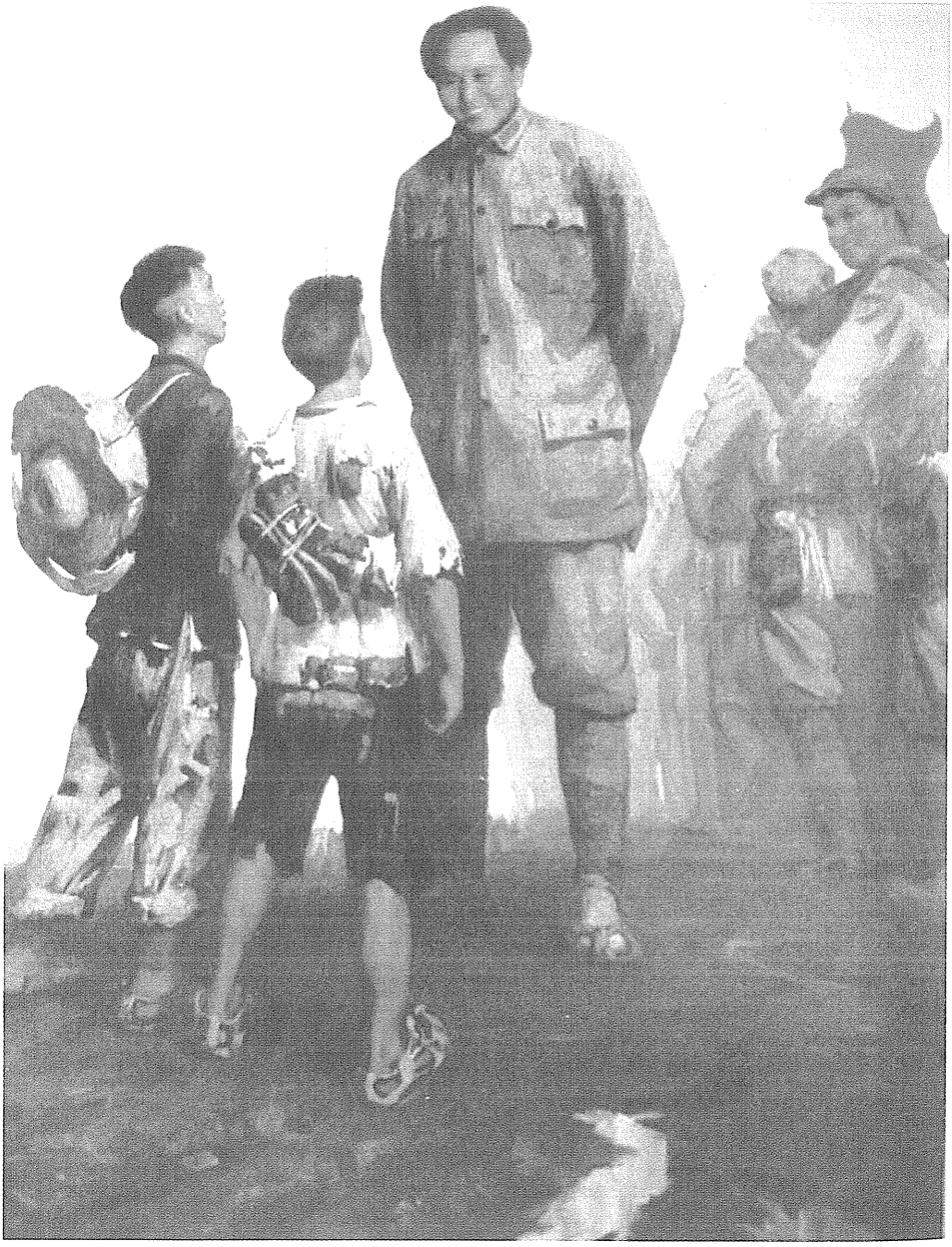
（7）筹备建立区乡两级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第六条　农民协会与工农兵政府

农民协会是组织群众发动斗争的机关，到了群众的斗争大大发动了，群众大多数有了组织了，此时就要组织区乡两级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以代替农民协会，而于工农兵政府下，设立贫农委员会，为代表贫农利益的机关。

第七条　经费

农民协会经费以会费（会员每人每月出铜元五枚）及打土豪充当。



《贫农的儿子》（油画）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

（1929年6月1日）

中央：

1. 我军（第四军一、二纵队）由瑞金不攻汀州取道直趋龙岩，五月二十四日到达龙岩城及其附近，坎市之陈国辉部两营，一特务连，一机关枪连，骤不及备，大部缴械，得机关枪两挺，步枪二百余支，子弹三万发，俘营长一，士兵二百余。

2. 因永定有郭凤鸣部黄月波团，有迅速击破之必要，五月二十六日进攻永定，黄团不战而退上杭。

3. 我军现在永定分兵各县城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帮助革命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并去发动群众斗争的新区域，消灭民团势力，刻在工作中。

五日后即移往他县（龙岩、上杭等），闽西党有相当基础，群众也好，各县斗争日益发展，前途希望很大，张贞、陈国辉、卢新铭大部入粤，闽西、闽南空虚，张贞、陈国辉、卢新铭（代郭旅长）三个残部合计五千人，故此时在闽西一带游击，是最好的机会，望省委对这方面工作多加指导。

---

[1] 本文序号不连贯，编者未加改动，均按原文刊印。

4. 我们四月一日退出汀州到瑞金，在瑞金、于都、赣州东乡、宁都、兴国五县做消灭反动武装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共为四十五天，路线是从瑞金到于都到赣州东乡到兴国到宁都，五月十五日再到瑞金，每到一县，每到一地，把队伍分散往各乡，往一乡的队伍再分小支，这样集中分散容易于争取群众、对付敌人，发展亦不至偏于一隅，与中央指示的“分开游击，统一指挥”相合，现在闽西是这样的。

5. 在赣南游击四十五天内朱培德又闹剿匪，一旅由赣州进于都，一旅由泰和进兴国。一路由抚州进宁都，瑞金由抚州来的是王均师李文彬部，我们在瑞金但未游击，我们向龙岩来，他亦进汀州。在此刻军阀发动全国大混战的时候，此一部敌军或无再追我之可能，唯尚不能完全断定刻在探查中。我们对于这等战争强的军队，决采打圈子政策，不到条件具备（如地势与群众）有胜算可操时，决不和他碰头，所以敌也终无奈何我们。

6. 赣南党与群众的基础，以背都兴国及赣州东乡比较好，安远……宁都次之，瑞金刚在开始，石城、广昌、南丰等县无组织，新改组的赣南特委在赣南于都工作人员很缺乏，一部分地方有盲动主义，多部分还有机会主义（不动主义），省委对他们的指挥很稀少，于都、兴国、宁都三县都有了政权机关（工农兵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之下是农会工会。赣南各县地主势力很弱，前有刘士毅、赖世琮（赖世璜弟）两部土著军队，十分为害，刘旅被红军之二次击溃，残部调往沪浙，赖部于四月三十日红军攻克宁都时，又完全消灭（俘赖世琮，缴好坏枪一百余）。此两部既不存在，朱培德军队又决不敢长驶偏僻之赣南，故赣南的前途，亦是很有希望的，因赣南的发展又可与赣西之井冈山（宁冈等六县）、赣东之方志敏部取得联

络，请中央通告江西省委注意这二处工作。

7. 一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井冈山彭德怀同志两连兵抵抗很大的会剿军至四日四夜，终于被敌军攻破之。各县赤卫队及王佐营仍在边界，未受大的损失。彭同志即退来赣南缴得刘士毅部枪百余，四月一日与四军在瑞金会合。前委决定彭同志部及王部改编为第四军第五纵队（第四纵队缺），王佐同志为纵队长，湘赣边界赤卫队为四军第六纵队，贺国中同志为纵队长，共有枪一千四百支，此两纵队战斗力颇强。此两纵队属于彭同志以四军副军长名义（对内彭为书记）指挥，湘赣边界军委隶属于前委，前委不能直接指挥时则受湘赣边特委指挥，游击的区域是以宁冈为中心，边界各县有势力广大的提为斗争区域，注意与赣闽路联系。四月十四日彭同志部从于都出发，往信丰、南康……遂川四边界以后从……抵……积他们的活动……江西省委指挥之下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共有枪约一千支（四军补充五百支，好坏各半），两面战斗力颇好，四团成立不久较差，内部组织也颇健全，党在军事上很能发生作用，他们游击的区域是吉安……泰和、万安、兴国……各县他们工作的方法比前较差，四军的影响须有进步。四军在赣南游击时他们受前委的指挥（与前委的关系不变），与四军一同做发展组织、发动群众斗争的工作，担任的区域是兴国及宁都之一部。四军来闽西后他们仍在那里以兴国为中心向四周各县游击。

9. 我们在宁都时东江特委曾到一信给我们，说东江准备暴动要红军分兵去彼帮助。前委复了他们一信，说不赞成此时举行总暴动，此时只能发动游击战争，红军实不能分兵去助，因彼反动势力很大，且不能很远路线发兵。来到闽西时又去了一信，要他们做群众工作，红军在闽西工作一时期后有向东江游击一时期的可能。东

江特委与闽西特委有联络，与赣南特委尚没有联络，依工作的进展，各特委有密切联系的必要，且有在省交界一带设指导机关之必要，或以前委固定设置于此，望中央讨论指示。

10. 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由大余失败退到赣南时人数由三千六百减至三千，计损失六百（内有百余名受伤与病，现在东固疗养，实际损失二百）。六日大柏地对刘旅一战幸已补充（但因没有兵提，将所有之枪给江西红军第二团去）。三个月来，人数增加一千六百，枪数增加五百（汀州、宁都、龙岩、坎市四役共得枪八百支，三百多等坏些的发给地方赤卫队去了），连原有共计二千。子弹三个月前，平均每枪不到四十发，现亦增加一倍，这是我军的实力。外间所宣传均超过此数甚多，如各地党部甚至有朱、毛，有人两万，有枪一万，这样实情不明，势必在估量上发生错误。现在计在前委管辖下与前委有发生关系的共有三个部队，一是四军一、二、三纵队，枪二千，这是主力，二是湘赣边界部队有枪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二、四团枪一千，共计四千四百枪。这三部分大体都可说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正式军队，都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高潮下创造出来的。

11. 红军党的详细概况，已详四月一日在瑞金补抄去年十一月的报告，由福建省委转上谅已达览。去年十月以前全军有军党部，十一月的中央指示后，组织比前妥。前委设军委管辖前委的各级党部兼及地方赤卫队，前委于指导红军之外还有对地方党部指导。今年一月四军从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境，每日行程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迭，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之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

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

兹将五月份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及军部直属部队党的各项重要统计于下：

（1）党员数量：1329。

（2）职务总计：长官330，战斗力兵734，非战斗力兵188，夫子68。

（3）发展同志统计：官长9，战斗力兵99，非战斗力兵9，夫子10。

（4）年龄统计：十八岁以下95，十九岁至二十三岁644，三十一岁至四十岁179，四十八岁以[1]

（5）成分统计：工人311，农民626，小商人106，学生192，其他95。

（6）处罚同志统计：劝告29，警告96，留察10，开除31，共计166。

（7）活动分子统计：支委委员65，组长123，组员200，共计500余。

（8）伤亡同志统计：官长伤6亡3，战斗兵伤9亡5，

再附上一信后，四月一日在瑞金寄上一信并付上彭同志一信补抄去年十一月份的详细报告，不知均收到中央否？到于都探闻中央告全体同志书、中央通告十五号二十号，当在兴国石印数千份，散发红军及各地党部。刘安恭同志还未办公，听到详细的口头报告。五月二十日在瑞金收到中央军委致前委一信，到龙岩又接到中央通告三十四

[1] 原文如此，疑缺内容。

号，国际职工运动小册子、中央为蒋桂战争告民众书等均收到。

此外尚接到福建省委闽西政治经济状况与党今后方针小册子《烈火》等刊物，我们久处深山穷谷之中，与外界隔绝，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种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唯江西省委三年来不曾有一个字给我们。最近二次到赣南，罗受男同志从中央来带往我们的文件，又只见罗空手来，文件被江西省委留住了，这种情形太不好了，请中央通知江西省委千万改正这种状态。

（13）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符，如前在汀州十七天，仅向大商人筹款二万，豪绅地主筹款三万，彼就宣传几十万；仅杀五人，都是最反动的（郭凤鸣营的）；长汀革命委员会烧四个，红军烧一个，彼则宣传为五百多间房子；仅杀郭凤鸣死党三四人，彼则宣称为杀千多人，总之全是胡说，不足为信。杀人烧屋，要有群众的基础，已经成了信条之一，军队单纯的烧杀，现在可以说没有了。

（14）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现请中央在最近期内派遣中、下级军官，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各一百人，医生及造炸弹师各数名，高级军官、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各五人，在□个月内赶来。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来人从福建省委转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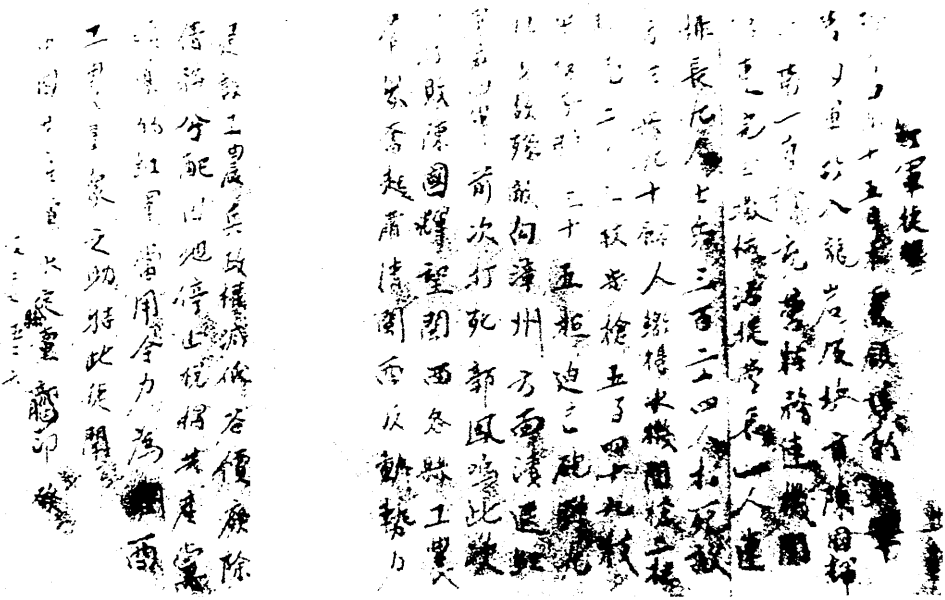
（15）请福建省委负责在厦门设交通机关，专任前委与中央的传达。设立机关经费付上价值一万元的烟土，托龙岩县委转交，如何运送，祈指示龙委。

（16）红军因长期斗争，现有军官及政治工作人不唯知识感特异的饥荒，精神亦表现疲倦，为救济红军的疲计，为造就将来工作人

计，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到时即动身。二十二人业经前委选定，另用专函连同履历付上盼速复！

宣传情况容后报告！

前委书记　毛泽东



1929年5月至6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攻占永安、龙岩县城，建立了县级革命政权。图为龙岩战斗胜利的捷报。

给林彪[1]的信

（1929年6月14日）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2]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3]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

---

[1] 林彪（1907—1971），当时任第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

[2] 指林彪1929年6月8日给毛泽东的信。

[3] 白砂会议，指1929年6月8日在福建上杭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疑的。

二、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让我在下面预说出来。

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的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1]，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

[1] 原件在“抗分”后脱漏八九个字。

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1]之机。自四军成立以后，党从连上建设了普遍的基础，现在上级指导机关对于斗争策略的正确（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前委），边界各县地方党部之建立，群众斗争之发展，使得个人作用渐渐减少，党的领导渐渐加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四军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包括边界迭次战争的胜利和湘南的失败[2]。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

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3]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枝长枪一连的制度[4]，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5]，拨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一时期那样困难了。这时期内

---

[1] 原件如此。

[2] 1928年7月上旬，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不顾湘赣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红四军继续在湘赣边界巩固根据地的决定，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的指示，附和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欲回家乡（湘南）的思想，于是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结果造成红四军在湘南和湘赣边界同受严重损失，称八月失败。

[3] “建设”二字，从上下文分析，疑为“批评”二字之误。

[4] 原件在“制度”后脱漏七八个字。

[5] 原件在“短枪”后脱漏约30个字。

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在这时期内有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是在湘南失败及大余一路逃难形势之下，个人没有显出什么大领导，同时非依赖党的领导就会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时期有迭次的军事胜利，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一原因。第二，这时期内党的组织与同志们的政治程度和斗争经验比起第一时期来确实进步些，少数同志不正确的言论行动比较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拥护，因此自己要收敛一些，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1]与二、四团[2]。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特别是柏路会议[3]讨论四、五军合编问题时，彭德怀[4]同志的愤激的表示，给了少数同志以颇大的打击。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5]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

---

[1] 指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军第五军，该军1928年12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红四军会合。

[2] 指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1929年2月，红军第四军与第二、第四团在吉安东固会合。

[3] 柏路会议，指1929年1月4日在江西宁冈柏路村召开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军第四军军委、第五军军委等的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了如何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决定彭德怀率红军第五军和第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实施外线机动作战。

[4] 彭德怀（1898—1974），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5] 原件如此，可能是就花名册说的。

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

从汀州到现在是第三时期。这一时期内党及红军的各方面实在都比以前进步了。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1]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这都是关于组织方面的。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六次大会[2]指示的政治任务能在工作上去求实现了，城市政策的执行更好了些，宣传进步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术学会了，因时局的开展红军的组织也扩大了。但因为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这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枝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以上是他

[1] 原件在“纵队委员会”前，有3个字不清。

[2] 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们在湖雷前委会议[1]时发表的意见，议论问题虽则分成了三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自近日争论问题发生之后，有的同志觉得四军的党到来了一个危机，如果少数同志作的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那末必至如你的来信所说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为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各纵队的基础已是不能动摇，个人自私的欲望决定会被群众所拒绝，我们只要看四十一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下面各项大体说来（均其分支）没有一项不是有正相反对的两种意见，我们试简单举出。

四、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因长期斗争经验和工农群众的影响，这种单纯观点的头脑，渐渐洗刷了一些，单纯的“打大仗”和“拿几十个州县”的观念比较地减少了，但没有完全消灭，遇有机缘就会发作，特别是在军事失败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这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

[1] 湖雷前委会议，指1929年5月底或6月初在福建永定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

主义，反而有助长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从前代表这种思想的人，至今还不能说是已抛弃这种思想。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湘赣边界割据问题在四军党内的一致仅仅是表面的罢了，骨子里面是有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一到危急时候，这些同志马上[1]，参加过湘赣边界斗争的人大家明了的。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在群众的心理上，因为多数人做了、少数人做好，结果便发生不良的影响。

对时局的估量亦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对于红军行动的意见也就不同了，特别在边界时是很显著的。去年七月四军大部往湘南

[1] 原件在“马上”后脱漏三四个字。

的一致处，同志们大多数都承认是错了的，沙田的代表会议亦是这样承认，不料近日少数同志之中的奇异见解，却说往湘南是对的，留在边界的倒反是错了。这也是见解上极端相反的证例之一。

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说话完全不顾及这话将要发生的影响，不管对不对，乱说一顿便了，“你乱说就是，横直他们只晓得那多”，这是何种非科学的态度！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的”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然而同志中显然有一部分人是有意无意中在拥护这种现象，至少对此现象没有和它奋斗的决心，遂使红军至今不能建设一规模，比起资产阶级军队还相差得很远，这实是一种可叹的现象。

“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这是朱云卿[1]同志形容四军军事技术太差的愤激话。凡在四军生活过的人，大概没有不承认四军军事技术到了很差的程度了，但是偏有一些同志对于训练军官的本职不愿去管，却天天作些政治上的鼓动，发生什么“土豪不能打还有什么事做”的怪话。这种现象不改变，四军的军事技术问题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五、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

[1] 朱云卿（1903—1931），当时任红军第四军参谋长。

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他们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不是完全形式主义的说法吗？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找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我们只要查明了四军的历史，就容易明白这回争论的实际意义了。

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他们提出攻击的理由最具体的是：（一）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二）四军党内有家长制。他们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但是少数同志的形式主义又要在这里发挥了，他们说党部机关虽没代替群众机关及政权机关，但实际上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部淡了。少数同志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纵委或前委的领导加强，一切问题（凡是他们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够提出在会议席上讨论决定，然

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否则谓之自由行动（如自由支配财政、自由支配枪弹等）。这种表现是党部领导力量加强的证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每次会议，政权机关的负责同志都是到会的，而意见也参加了，而且许多问题是要这些负责同志提议才能讨论的（如作战计划、官兵训练计划等），大家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了，会后拿去执行起来，因而觉得行政机关简单了一些，自由了一些，于实际上究竟有些什么要不得呢？军长闲起了，但是党代表（与党部书记是两个东西）的闲起更甚，因为没有下级党代表向他打报告。纵队司令部少有报告打到军司令部了，但是纵队政治部打到军政治部的报告更少。不问后来的状态比从前行政自由支配、比从前报告打得多的热闹的时代——湘赣边界的初期，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至于指责到湘赣边界的行委[1]，不问行委制度在边界斗争中收了多少效果，只是形式上以为是党的机关代替了行政机关而认为要不得，这又是同样犯了形式论的错误。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边界的行委制度在边界的斗争上有过很大的效果，这是有眼睛的人都明白的，而且行委一面是在内的党部，一面又是公开的行政机关，有什么妨碍行政机关的系统的呢?

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于此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四军内是否

[1] 行委，全称为行动委员会。

有家长制，不然随口乱说必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末，我们看一看，四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一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说到各指导机关的产生，从支委[1]到纵委、前委是中央委派的，但这不能作为四军党内家长制的证明，四军党内事实上寻不出家长制。为什么少数同志有这种借口呢？这种话有什么客观的来源呢？是的，就是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红军党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党代表与书记在职务上是两样东西，因为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由是引起了头脑不清楚的人把党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党的书记在那里工作了。三纵队几个连上的同志叫那个连的支书做“老板”，就是这样牵挂来的。要除去此弊，只有使党代表与书记分开，这是应该一面从内部找人，一面从外面多找人来才可以解决的（从前的兼任是因人材太少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

[1] 支委，指红军中的中共支队委员会。支队，当时相当于营。

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

六、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1]，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

[1] 原件在“奋斗”后脱漏七八个字。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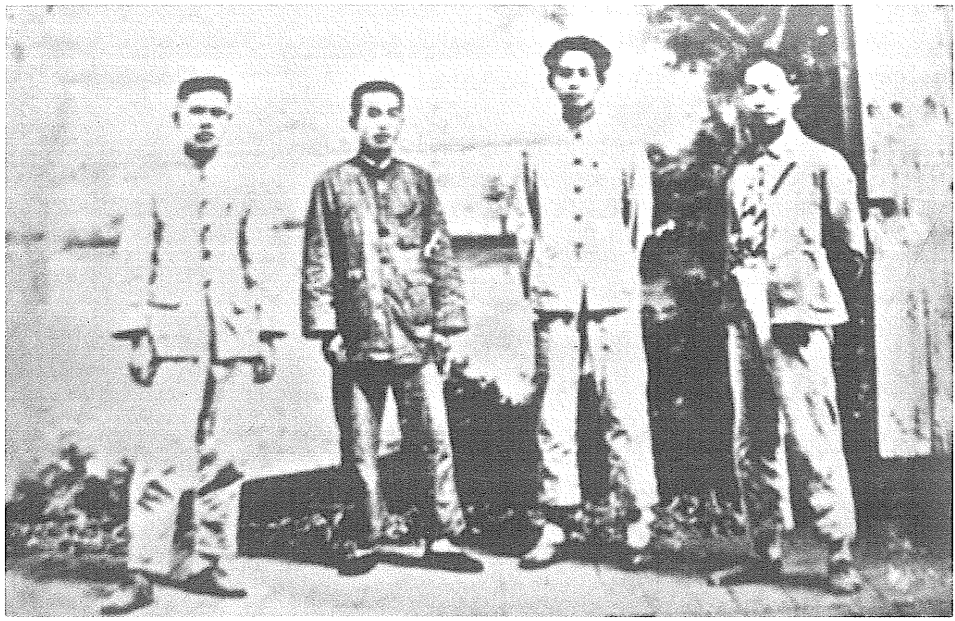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C的敬礼！[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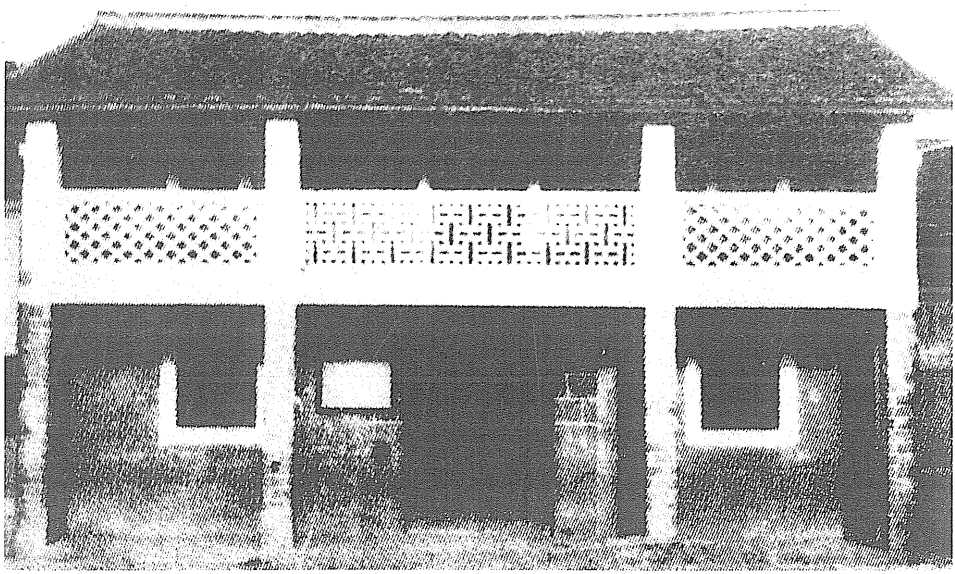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于新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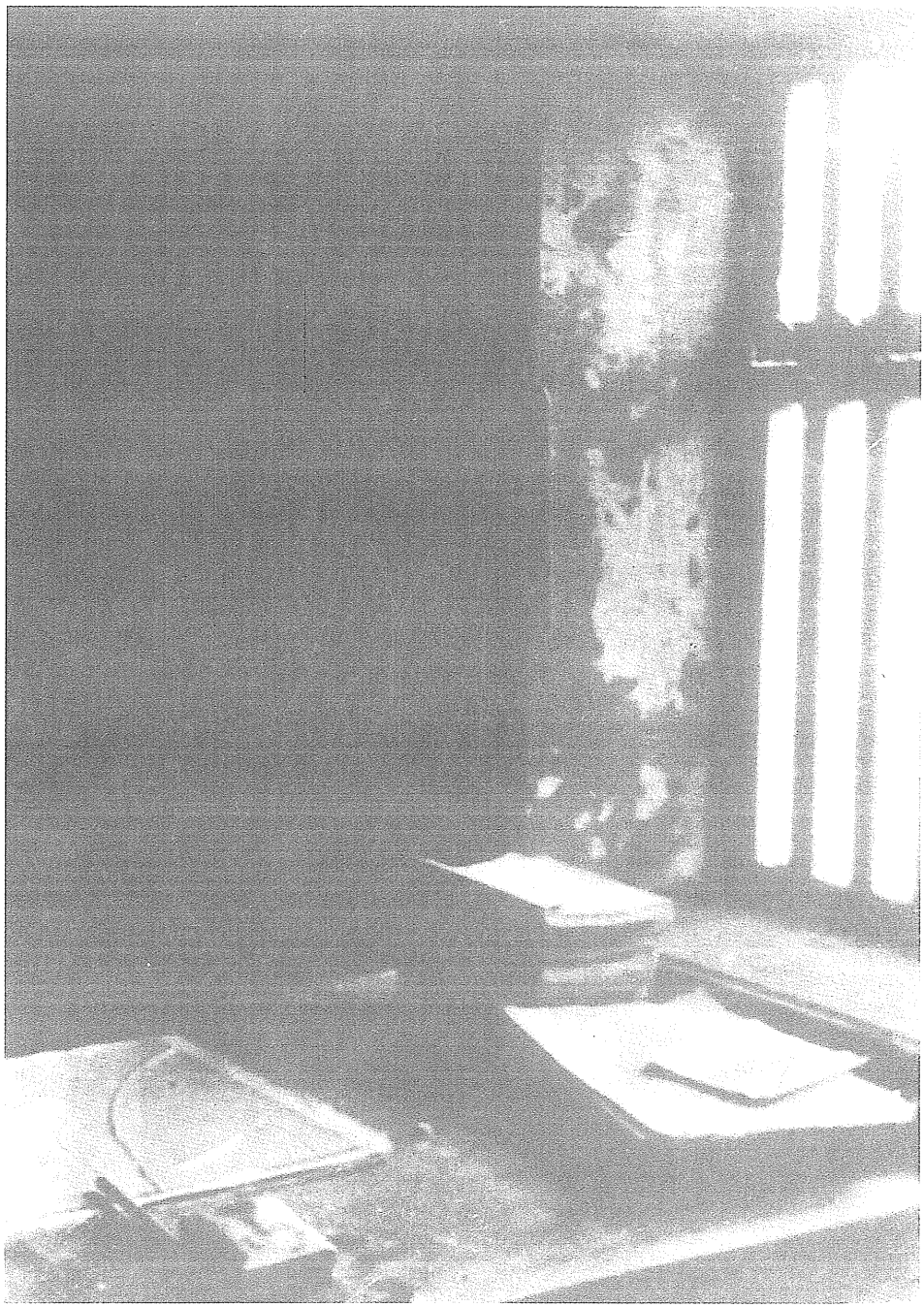
[1] 即共产主义的敬礼。C为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1929年6月19日，毛泽东等在福建龙岩。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大会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在会后到上杭地区指导地方工作。图为毛泽东在上杭的住地——上杭古田协成店。



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蛟洋举行。图为毛泽东在蛟洋文昌阁的旧居内景。

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

（1929年6月）

为布告事。我们红军受共产党的指导，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现在国民党四分五裂，蒋桂冯阎全国混战。反动政府根本动摇。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人数越多，势力越大。兵士组织红军，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各省各县各乡各镇都大大地干起来了。本军来到此地，知道民众痛苦甚深，谷价很贵，利息很高，租谷很重，苛捐很多。土豪劣绅操纵一切，借了祠堂公会，欺压各姓贫民。这种土豪劣绅，百人之中，不过几人。大多数人，应该联合起来，打倒这少数的豪绅，求得多数人的利益。现将急于要做的事开列于下：

（一）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

（二）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

（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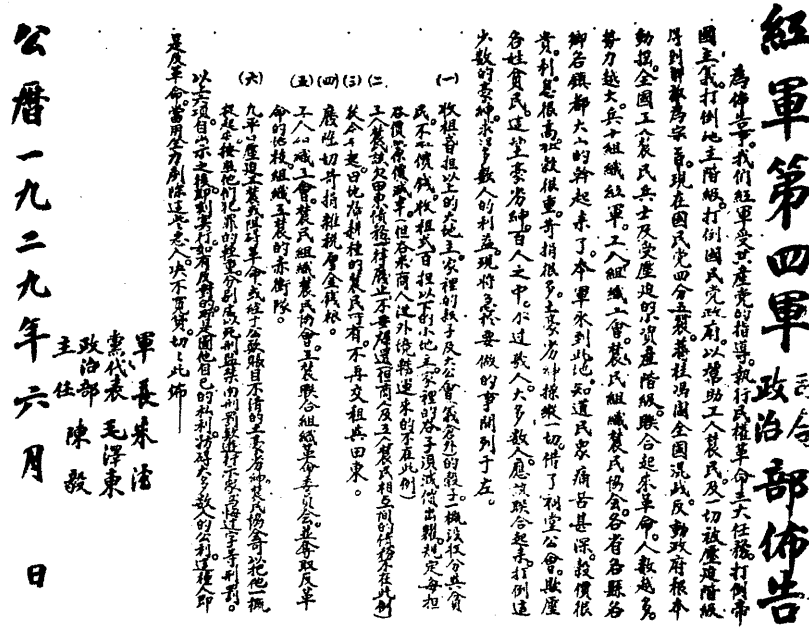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

（五）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农联合组织革命委员会，并夺取反革命的枪支，组织工农的赤卫队。

（六）凡平日压迫工农或阻碍革命或经手公款账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可以把他一概捉起来，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游行示众、写悔过字等刑罚。

以上六项，自出示之后，即刻实行。如果反对的，即是图他自己的私利，妨碍大多数人的公利，这种人即是反革命，当用全力铲除这些恶人，决不宽贷。切切此布。

军　　长　朱　德
党　代　表　毛泽东
政治部主任　陈　毅
公历一九二九年六月　日



紅軍第四軍司令政治部佈告

為佈告事。我們紅軍受共產黨的指導。執行民權革命三大任務。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國民党政府。以幫助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階級得到解放為宗旨。現在國民党四分五裂。蕃桂馮閻全國混戰。反動政府根本動搖。全國工人農民兵士及受壓迫的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革命。人數越多。勢力越大。兵士組織紅軍。工人組織工會。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各省各縣各鄉各鎮都大小的幹起來了。本軍來到此地。知道民衆痛苦甚深。穀價很貴。利息很高。社穀很重。奇捐很多。土豪劣紳操縱一切。借了祠堂公會。欺壓各姓貧民。這些土豪劣紳。百人之中。不過數人。大多數人。應該聯合起來。打倒這少數的豪紳。求這多數人的利益。現將急於要做的事開列于左。

(一) 收租昏担以上的大地主。家裡的叛子及大公會。義倉外的穀子。一概沒收分與貧民。不收價錢。收租或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裡的谷子須減價出糶。規定每担谷價。常價減半。但谷米商人。從外境轉運來的。不在此例。

(二) 工人農民欠田東債務。一律廢止。不要歸還。但商人及工人農民相互間的債務。不在此例。

(三) 從今年起。田地除耕種的農民可有。不再交租與田東。

(四) 廢除切斗捐。耕稅。厚金。錢粮。

(五) 工人組織工會。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工農聯合組織革命委員會。並奪取反革命的佔領。組織工農的赤衛隊。

(六) 九平以上壓迫工農或阻礙革命。或經十分敬服目不清的土豪劣紳。農民協會可以把他一概捉起來。按照他們犯罪的輕重。分別處以死刑監禁。由刑罰獄進行示衆。為遵守等刑罰。

以上六項。自出示之後即刻實行。如有反對的。那是圖他自己的私利。妨礙大多數人的公利。這種人即是反革命。當用全力剷除這些惡人。決不寬貸。切切此佈——

軍長 朱德
黨代表 毛澤東
政治部主任 陳毅

公曆一九二九年六月 日

毛泽东、朱德、陈毅署名的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清平乐·蒋桂战争[1]

（1929年秋）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2]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3]，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4]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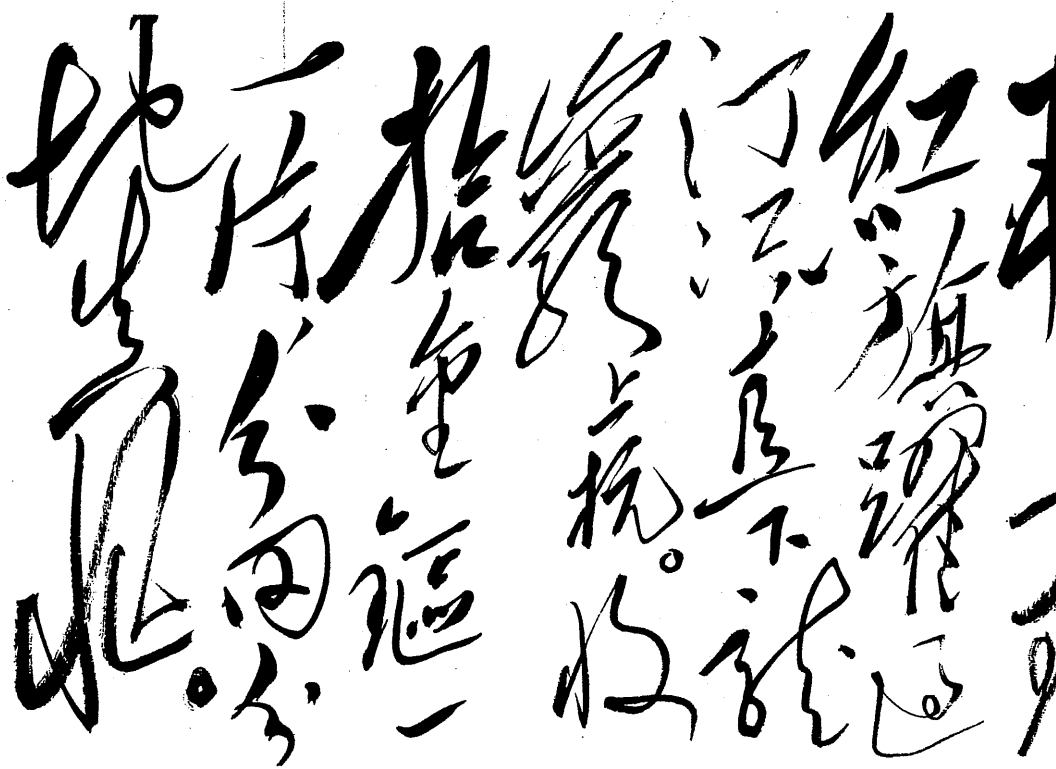
---

[1] 蒋桂战争，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1929年春为控制两湖而进行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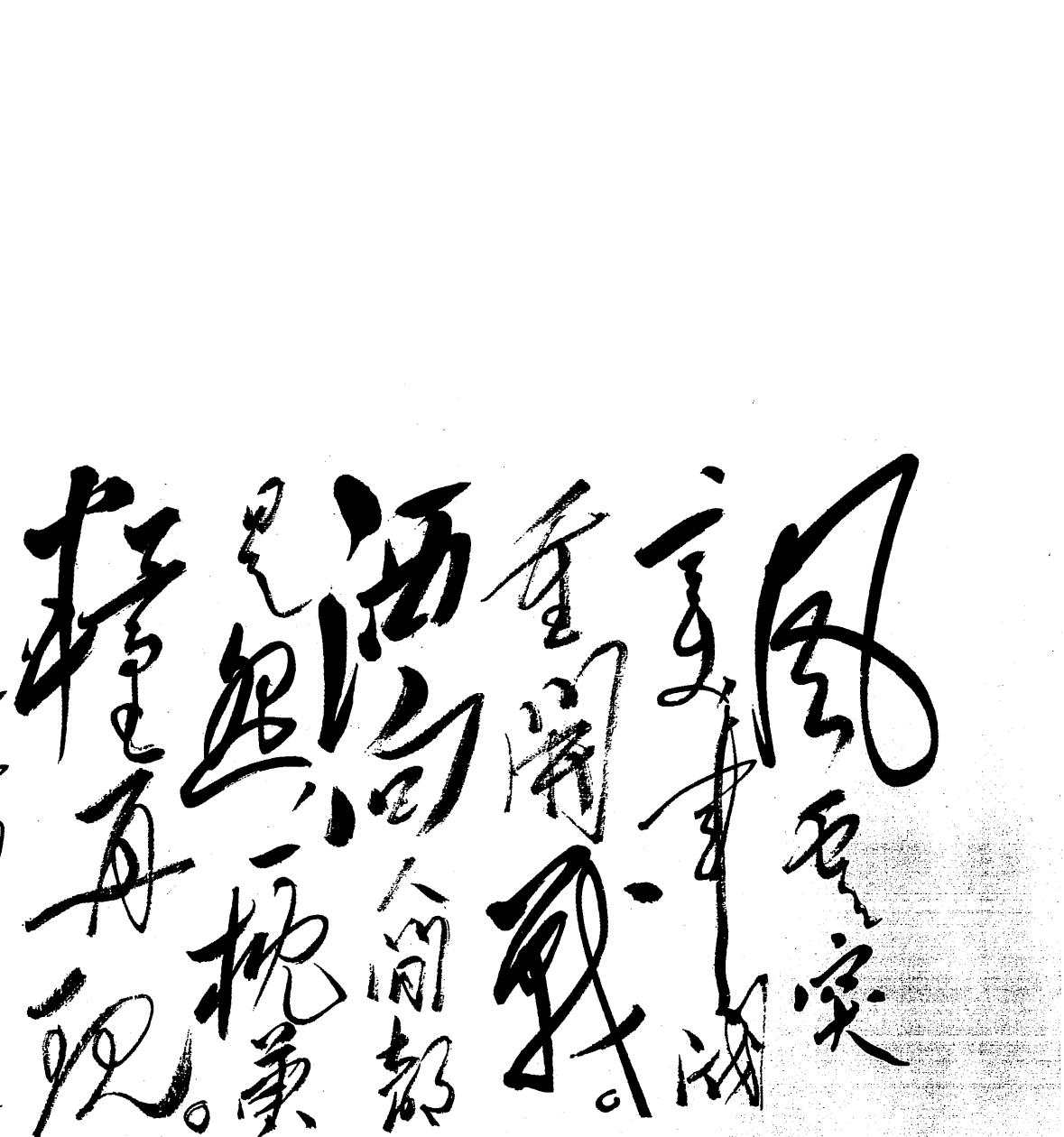
[2] 一枕黄粱，典出唐沈既济的《枕中记》，讲一个叫卢生的，在旅店向一个道士叹述穷困不得志。道士就拿出一个枕头，说枕在上面就能使他“荣适如志”。卢生在梦中从婚到死，享尽荣华富贵，转了一圈人生，醒来一看，困顿依旧，旅店主人也仍然在蒸黄粱（小米饭）。

[3] 汀江，韩江上游，源出福建省西部长汀，向南流入广东省。

[4] 金瓯，指国土。语出《南史·朱异传》，梁武帝曰：“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



毛泽东手书《清平乐·蒋桂战争》。





《红旗跃过汀江》（诗意画）

采桑子[1]·重阳[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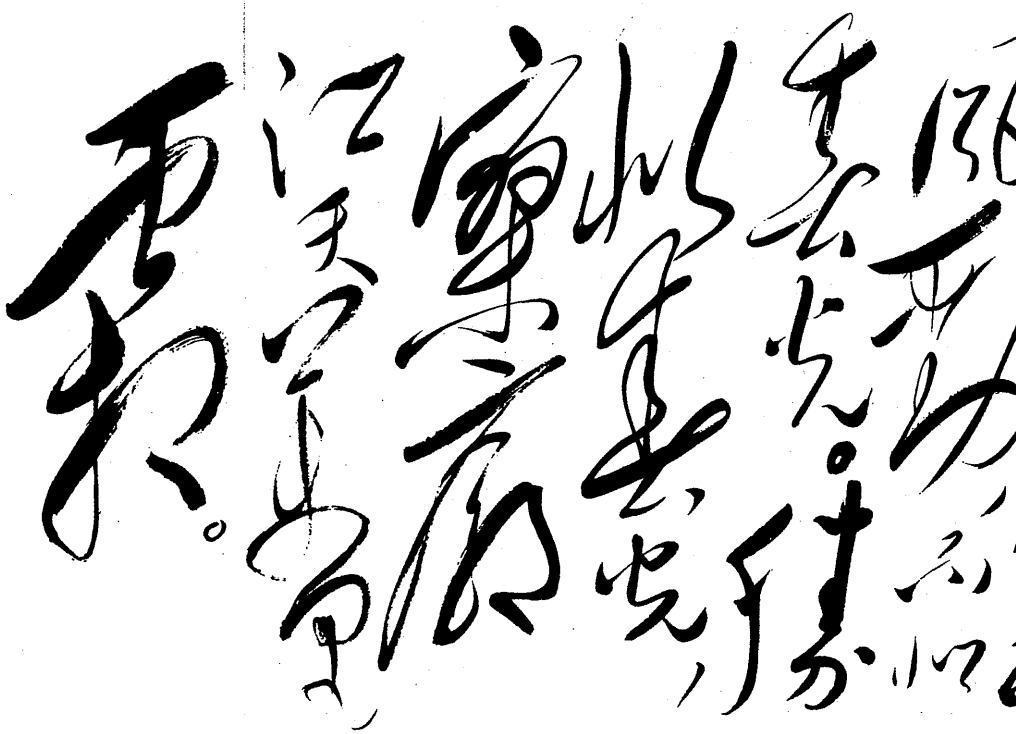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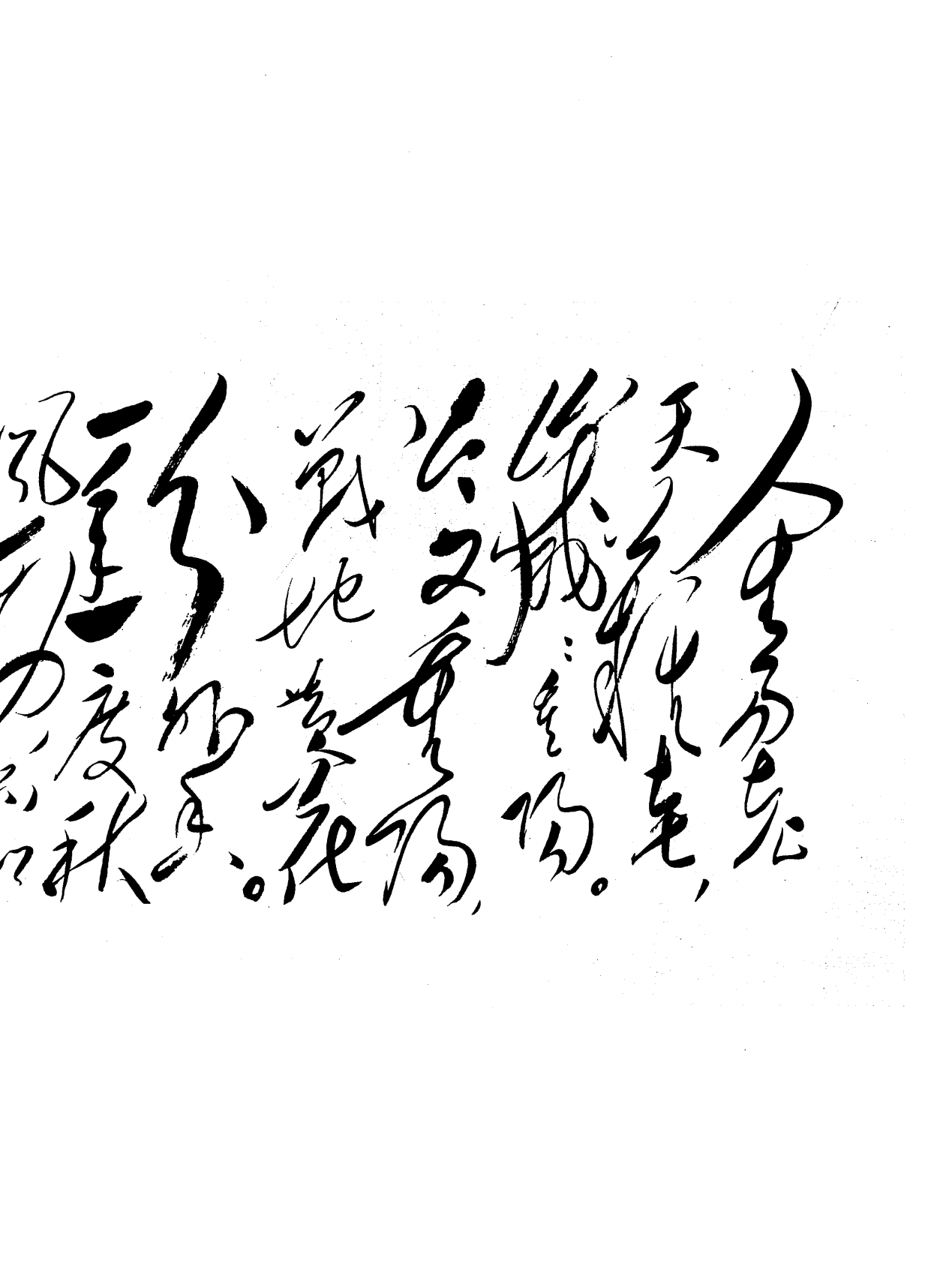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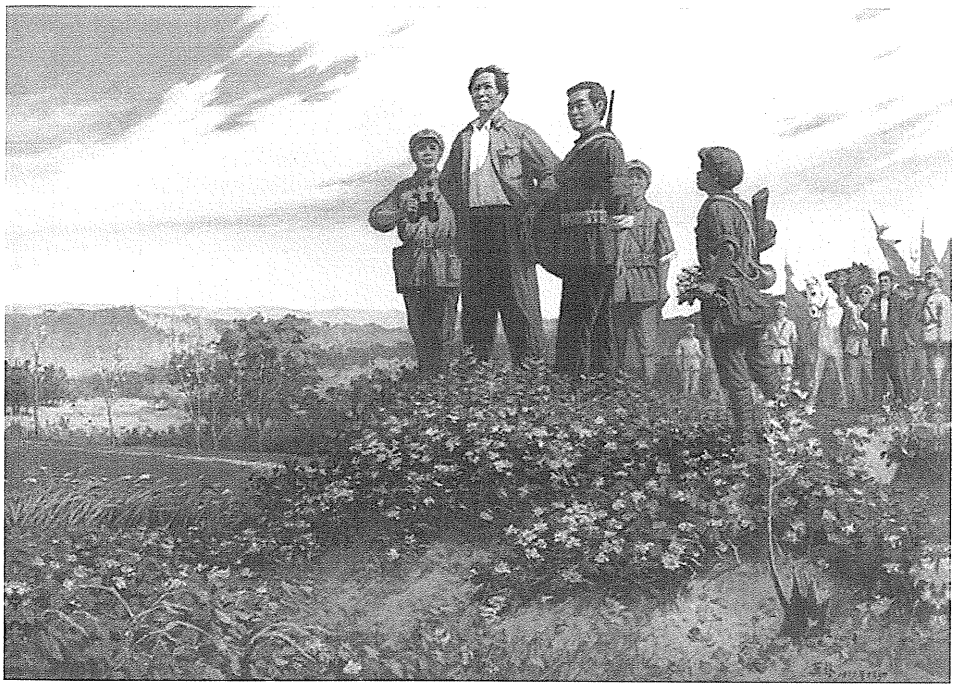
[1] 采桑子，词牌名，本为古乐采桑曲。

[2] 重阳，农历九月初九，传统上文人登高赋诗之日。



毛泽东手书《采桑子·重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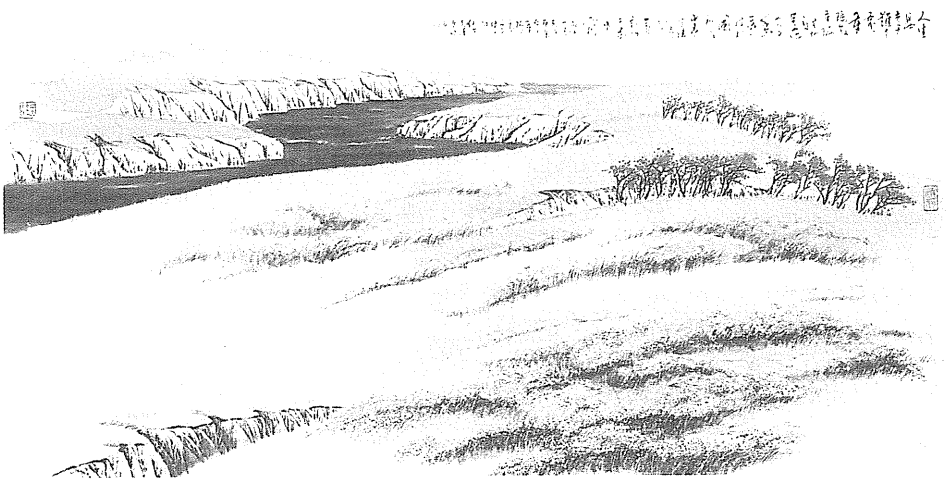
《战地黄花》（油画）



《战地黄花》（油画）



《历尽艰辛为人民》（中国画）



《重阳》（诗意画）



《战地黄花》（诗意画）



《战地黄花》（诗意画）



《战地黄花分外香》（诗意画）



《战地黄花分外香》（诗意画）



《战地黄花分外香》（诗意画）



《寥廓江天万里霜》（诗意画）

从蛟洋到达汀州后给中央的信[1]

（1929年11月28日）

中央：

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2]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3]，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4]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5]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

---

[1] 192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福建省上杭县蛟洋等处指导闽西工作并养病。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这是毛泽东回前委工作后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2] 谢，指谢汉秋，1929年10月他被中共福建省委派往闽西巡视工作。

[3] 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4] 刘和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师长。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5] 陈毅，当时任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9年8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会后，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带回部队。

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1]，《红旗》[2]，《列宁主义概论》[3]，《俄国革命运动史》[4]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　　”[5]。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余详前委报告。

毛泽东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汀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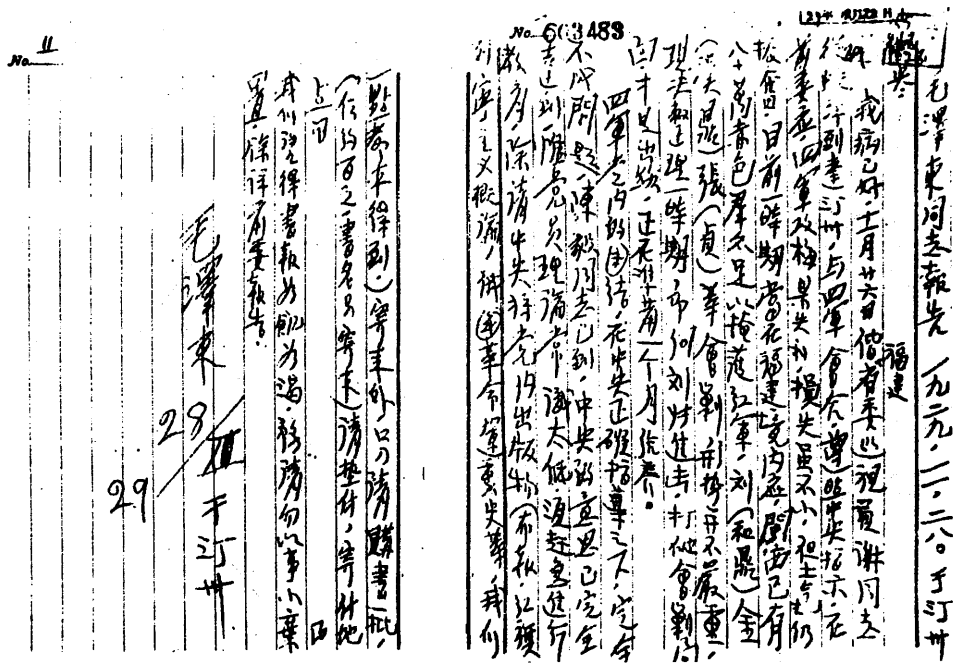
[1] 布报，即中共中央当时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1927年10月24日创刊。

[2] 《红旗》，是中共中央当时的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创刊。

[3] 《列宁主义概论》，是斯大林所著《论列宁主义基础》最早汉译本的书名。

[4] 《俄国革命运动史》，瞿秋白著，1927年7月由新青年社出版。

[5] 现在保存的此信的抄件中，引号内空缺。



1929年9月，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红军行动的策略与建设的正确主张。图为1929年11月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复信。

给李立三[1]的信

（1929年11月28日）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2]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3]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4]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邮政通信处“　　”[5]。

---

[1]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

[2] 开慧，即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夫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岸英，即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

[3] 泽民，即毛泽民（1896—1943），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弟，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4] 指陈独秀当时在党内散布托派观点，成立小组织等反党活动。

[5] 现在保存的此信的抄件中，引号内空缺。



古田会议前夕，毛泽东亲自领导红军在福建连城县新泉村进行整顿。毛泽东亲自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为召开古田会议作好准备。



毛泽东在新泉村的住地“望云草室”。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

（1929年12月）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2]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是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的，所以这个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8个部分，第一部分经毛泽东校阅，编入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2] 九月来信，指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为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

閩西古田會議決議案

——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九年十月）——

摘錄

乙、極端民主化。

（1）四軍竟接受中央指示之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雖然減少了許多，如党的決議及比較的能夠執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光交下級討論，至由上級決議」等口号之沒有人說了，都是事實。但在實際上這種減少的現象，只是表面的減少罷了，決不是在一般党員的觀念裡頭很全肅清了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這就是說極端民主化的毒根还深种在許多同志的心中，如決議案之執行，种种表示免强的态度，就是証据之一。

（2）糾正的方法：

（1）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古田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作报告。会上，毛泽东被选为新的红四军前委书记。图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一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1]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

[1] 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

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1]。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

---

[1] 1927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1927年年底流行过，到了1928年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下来。但有些党员也还存在着这种情绪。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二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

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三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　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

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　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四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

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五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

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六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七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1]、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2]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

[1]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2] 李闯，即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1628年，即明思宗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形成农民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曾经由陕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陕西。1636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李自成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同时他不准部下扰害群众，曾经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来约束自己的部队。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之一。但他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他在被推为闯王后，率部入川，折回陕南，经湖北又入川，又经湖北入河南，旋占湖北襄阳、安陆等地，再经河南攻陕占西安，于1644年经山西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结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八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作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地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党的组织问题

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于这个问题特作详细的分析与决定。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

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一　党的组织路线

（一）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

（二）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地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的方法。

（三）红军原有的小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地将各种出身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地混合编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

二　党的组织松懈问题

（一）四军党的组织现状：

1. 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

2. 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委、组联席会，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队[1]党员大会等，开得非

[1] 纵队，当时相当于团；支队，当时相当于营。

常少。

3. 一般的纪律松懈。特别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他的情况下，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对一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纪律一般地放松了。

4. 所有官长既都成了党员，结果所有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便很少注意他的社会职业的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如各级军事工作会议、各级政治工作会议几乎完全没有，一切都以为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简直不谈起了。

5. 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级会议上级少有派人出席。这固然是因为上级机关组织不健全，但上级机关工作态度不积极，也是对下级机关指导缺乏或指导不详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如一个部队出发游击的工作指导等，一般地缺乏详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

6. 支部大会及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

（二）纠正的路线：

1. 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2. 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

（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

（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不吃鸦片、不赌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介绍人首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需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

（三）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地举行起来。

（四）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五）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质。每个党员（除开党内负了重要或专门任务的人是为革命职业家外）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他的工作。

（六）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七）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

三　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

（一）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

1. 不明白会议的意义。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

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凡是对斗争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察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因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红军党员因为不明白这些意义，所以成为不爱到会或到会少兴趣的第一个原因。

2. 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到答复，因此减少讨论的兴趣。

3. 负责人事前没有很好地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样解决也没有准备一点意见。

4. 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发言偶出题外，便马上禁止他，他便挫兴不做声了。如发言有错处，除停止外还讥笑他。

5. 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

（二）纠正的方法：

第一，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

第二，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们提醒，尤其是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

第三，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

第四，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

第五，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

第六，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

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煞风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生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

第七，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要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四　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

（一）军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团没有特殊的工作对象。又党的小组以班为单位建设方才有利斗争。因此党的支部里头无设立团的小组的必要。

（二）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绪，除一般地接受党的训练外，还有特别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须有专门组织去担任这种工作。因此，应在支部中划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有特别情形如担任党的重要工作的除外），成立青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除以大队[1]为单位经常有计划地召集开会外，支队及纵队亦各应酌定时间，召集开会。

（三）为计划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计划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青年工作会议，前委及纵委[2]里头各设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员会，支队委及支委则各设一个青年委员，在各级党部的指导

[1] 大队，当时相当于连。

[2] 即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和各纵队委员会。

之下从事工作。

五　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

大队支队两级党部的书记，以不兼政治委员为原则，但在工作人缺乏的部队，仍可暂时兼充，没有担任党的书记责任的政治委员，上级党部应察看情形，在条件适合的环境之下得委为党的特派员，有指导该级党部的工作的任务。

六　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

军及各纵队的直属队，均组织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委员人数五人至七人。

七　士兵会党团[1]问题

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2]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委指导。

---

[1] 党团，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规定："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其任务在于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将"党团"改称"党组"。

[2] 支委，指红军中的中共支队委员会。

党内教育问题

一　意义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大会规定用下列的材料和方法去教育党员，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更详细的讨论，去执行这一任务。

二　材料

（一）政治分析；
（二）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
（三）组织常识；
（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1]的纠正；
（五）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
（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
（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

[1] 指本篇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的关于单纯军事观点等8种错误思想。

（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

（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

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于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

三　方法

（一）党报；

（二）政治简报；

（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

（四）训练班；

（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

（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

（七）个别谈话；

（八）批评；

（九）小组会；

（十）支部大会；

（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

（十二）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

（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

（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七）政治讨论会；

（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一　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二　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

（一）宣传内容的缺点：

1. 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从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均不具体）；

2. 忽略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与鼓动；

3. 忽略城市贫民之取得；

4. 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

5. 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

6. 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

7. 极少破坏地主阶级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1]等）的宣传；

[1] 民团、靖卫团，都是反动的地方武装。

8. 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

（二）宣传技术的缺点：

1. 宣传队不健全。

（1）宣传员由每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部队连一个都没有了。

（2）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火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1]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

（3）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同时也是因为宣传员成分太差，工作成绩少，引起一般的人对它的不满），“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们的称号。

（4）宣传队没有够用的宣传费。

（5）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同时对他们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没有人理它。

2. 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

3. 壁报出得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

4. 革命歌谣简直没有。

5. 画报只出了几张。

---

[1] 司书，即连队中担任文字书写的人员。

6. 化装宣传完全没有。

7. 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

8. 口头宣传又少又糟。

9. 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以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10. 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11. 群众大会很少开，又开得不好。

12. 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方法不好。

三　纠正的路线

（一）宣传的内容方面：

1. 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

2. 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

3. 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给豪绅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

4. 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

5. 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6. 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之不同，分别地对他们宣传。

7. 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之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

8. 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1]时期与汪蒋战争[2]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二）宣传的技术方面：

1. 宣传队问题

（1）意义

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的”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

---

[1] 蒋桂战争，指1929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2] 指1927年10月宁（南京）汉（武汉）对立期间，国民党新军阀何应钦、李宗仁同唐生智之间的战争。

（2）组织

甲、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

乙、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各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

丙、宣传队的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

丁、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的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调班长）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地做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

2. 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宣传品分布的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问题的重要一项。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该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

3. 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作《时事简报》。内容是：（1）国际、国内政治消息；（2）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3）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应注意下列各项：（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点，要清楚点。

4. 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

5. 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6. 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

7. 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

8. 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

9. 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1]。

10. 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

11. 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

12. 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1）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

（2）除有计划地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

（3）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

---

[1] 当时红军三大纪律的内容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

（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5）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一　材料问题

下列各项应很艺术地编制课本，做对士兵的训练材料：

（一）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

（二）土地革命各方面；

（三）武装组织及其战术；

（四）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

（五）早晚点名口号；

（六）识字运动；

（七）怎样做群众工作；

（八）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

（九）各种偏向之纠正；

（十）苏俄红军；

（十一）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

（十二）红军白军比较；

（十三）共产党国民党比较；

（十四）革命故事；

（十五）社会进化故事；

（十六）卫生；

（十七）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

（十八）革命歌；

（十九）图报。

二　方法

（一）上政治课：

1. 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分两种形式，一个支队在一起时，以支队为单位上课，教授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除战斗兵须到课外，传令兵、勤务兵、长夫、马夫、火夫须均到课。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兵士得到初步政治常识。

2. 特别班以支队为单位，从各大队士兵中考选稍识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识者五十名编成，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教授，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特别班之目的在造成较普通班高一级的政治常识人才，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

3. 干部班以纵队为单位，军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

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级军佐[1]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预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由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

4. 以支队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队各政治委员并军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其任务为讨论在一个支队内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训练的种种问题。

5. 军及各纵队直属部队的政治训练，由军及各纵队政治部宣传科负责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执行之。

6. 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二）早晚点名说话：

1. 说话时间每次最多不得过半小时。

2. 材料：

---

[1] 军佐，是旧军队中对辅助指挥员管理行政事务的人员的统称，如军需、军医等。这里毛泽东是沿用旧军队中的这种称呼。

（1）报告政治消息；

（2）批评日常生活；

（3）解释每周政治口号。

（三）集合讲话：

1. 支队每星期一次，纵队每半月一次，全军不定期。

2. 每次讲话须要有计划地由政治工作机关（支队由政治委员）商同军事工作机关规定讲话内容，指定讲话人，并分配讲话时间。

3. 每次讲话除任勤务的以外不准不到。

4. 每次讲话内容及对于群众的影响，下级政治机关须报告上级政治机关。

（四）个别谈话：

1. 对下列各种人须和他作个别谈话：

（1）有偏向的；

（2）受了处罚的；

（3）伤兵；

（4）病兵；

（5）新兵；

（6）俘虏兵；

（7）对工作不安的；

（8）思想动摇的。

2. 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

3. 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

4. 谈话后须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

（五）游艺：

1. 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艺：

（1）捉迷藏等；

（2）踢足球；

（3）音乐；

（4）武术；

（5）花鼓调；

（6）旧剧。

2. 于每个宣传队下设化装宣传团。

3. 游艺设备费由公家支给（大队由纵队政治部批准）。

（六）改良待遇：

1. 坚决废止肉刑；

2. 废止辱骂；

3. 优待伤病兵；

4. 恢复每月发草鞋钱大洋四角的制度。

（七）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1. 把红军的生活习惯，如（1）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2）三大纪律及其理由，（3）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4）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5）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6）废止肉刑辱骂，（7）优待俘虏事项，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

2. 讲述红军斗争略史。

3. 红军的宗旨：

（1）红军与白军所以不同，此点对俘虏兵要详细讲；

（2）红军与土匪所以不同；

（3）红军三大任务。

4. 讲述红军组织系统。

5. 普通政治常识，如：（1）国民党与共产党；（2）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4）分田；（5）苏维埃；（6）赤卫队等。

（八）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

1. 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教本等作参考）。

2. 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

3. 由公家出钱置备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

废止肉刑问题

一　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火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作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火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

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

二　肉刑的来源和废止它的理由

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群众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地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至于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诞生，阶级斗争的激进，工农阶级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和依于这个权力的剥削，便要发动自己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阶级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因此苏联不但红军中老早就没有肉刑，在一般法律上亦通通严禁肉刑的使用。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

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现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三　纠正的方法

（一）坚决地废止肉刑。

（二）举行废止肉刑运动。这个运动，要从官兵两方面工作，使“废止肉刑，方才利于斗争”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之中。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了，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与训练；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地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

（三）肉刑废止之后，因为历史的习惯的原因，发生一些临时不良现象是会有的，这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决不能借口有些不良现象，便掩护了他的封建制度打人习惯。凡那些借口临时不良现象，反对废止肉刑或对废止肉刑怠工的，客观上便是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

（四）四军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

1. 修改红军惩罚条例；

2. 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

惩罚条例；

3. 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一方面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觉地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的收获。

优待伤病兵问题

一　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及影响

（一）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药少，担架设备不充分，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许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疗，即大概的初步治疗有时都得不到。

（二）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的注意不充分，如：

1. 对于卫生机关的健全，不但没有尽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简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议对卫生问题讨论很少。

2. 官长对于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

3. 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

（三）重伤重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

（四）蛟洋医院的缺点：

1. 无组织状态；

2. 医官和药太少；

3. 医官卖私药；

4. 不清洁；

5. 御寒衣服、被窝不够；

6. 看护兵太少；

7. 饮食恶劣；

8. 房子窄；

9. 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

上列各种对伤病兵待遇不良，便发生下列的影响：

1. 使士兵不满意红军，“红军好是好，就只不要带花，不要病”，这种舆论简直普遍全体士兵以至下级官长之中；

2. 士兵对官长不满意，越发增加官兵间悬隔；

3. 士兵及下级官长都怕带花，因此，减少红军战斗力；

4. 逃兵多；

5. 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

二　解决的办法

（一）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二）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

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

（三）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

（四）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

1. 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

2. 要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

3. 无论哪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

4. 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

（五）发给伤病兵零用钱，要酌量伤病的轻重，重伤重病的要比轻伤轻病的多给一点。调养费一项，对于特别重伤重病的，应该不分官兵夫酌量发给。

（六）伤病兵衣服、被窝问题，除公家尽力置备外，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捐，此外还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款，这不仅为了增加伤病兵的零用钱，而且是唤起全军互助济难精神的好方法。

（七）蛟洋后方医院许多缺点，应该有计划去纠正。此外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现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

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一、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二、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一）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

（二）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

（三）凡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和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

（四）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须尽可能地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

三、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等，则用公函平行通报。

四、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应用阶级[1]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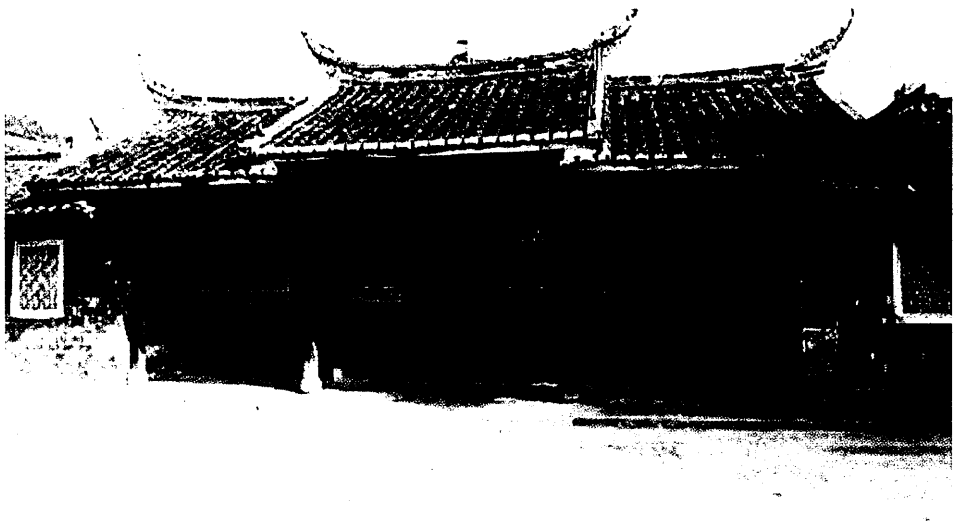
五、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

[1] 这里的“阶级”，指军队中官阶的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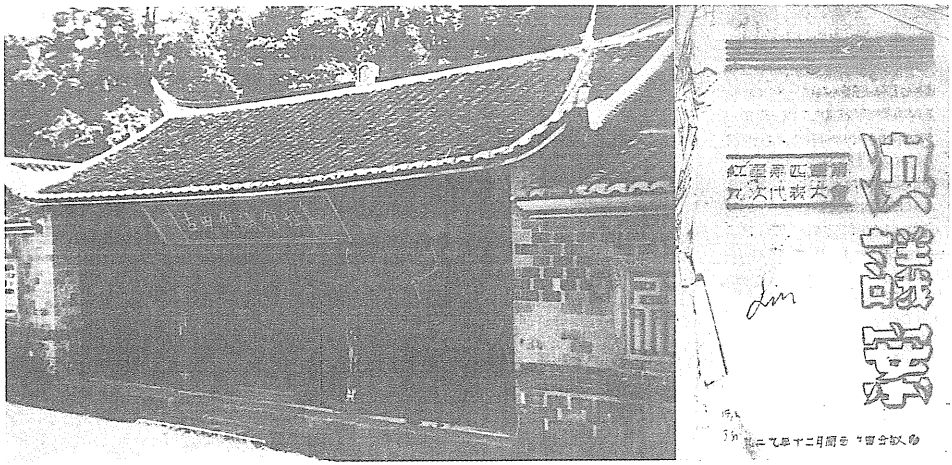
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

六、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之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的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由政治部支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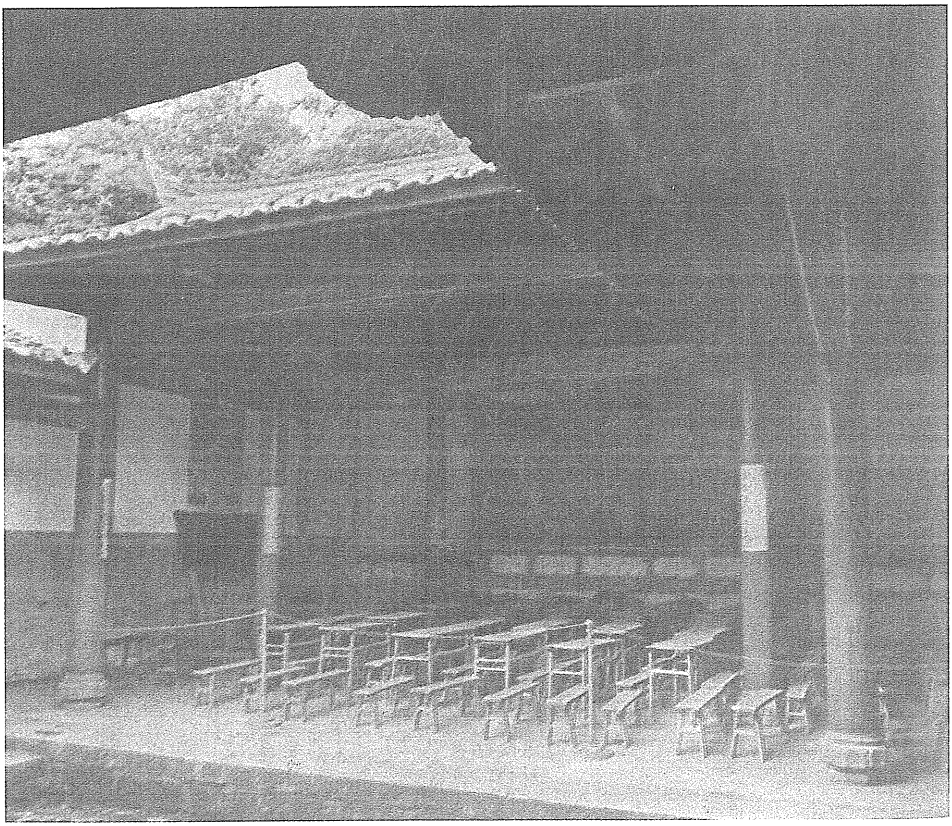
七、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部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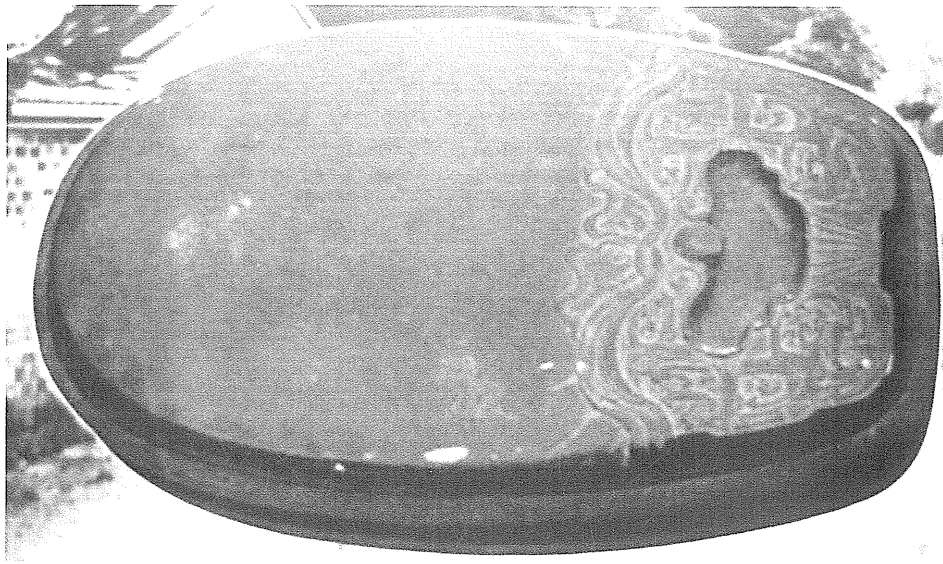
红四军前委、政治部旧址——松荫堂，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此起草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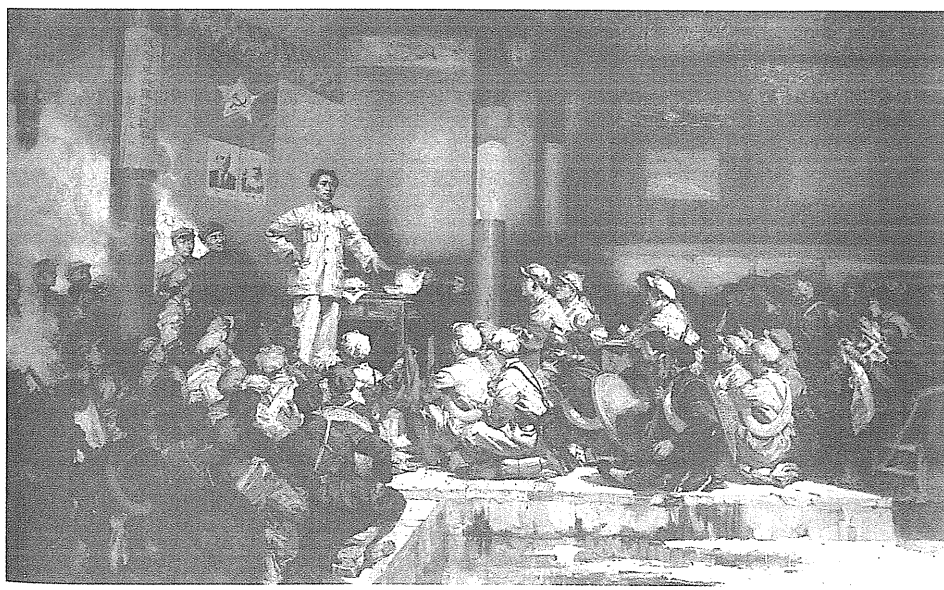
古田会议旧址和红军时期印行的古田会议决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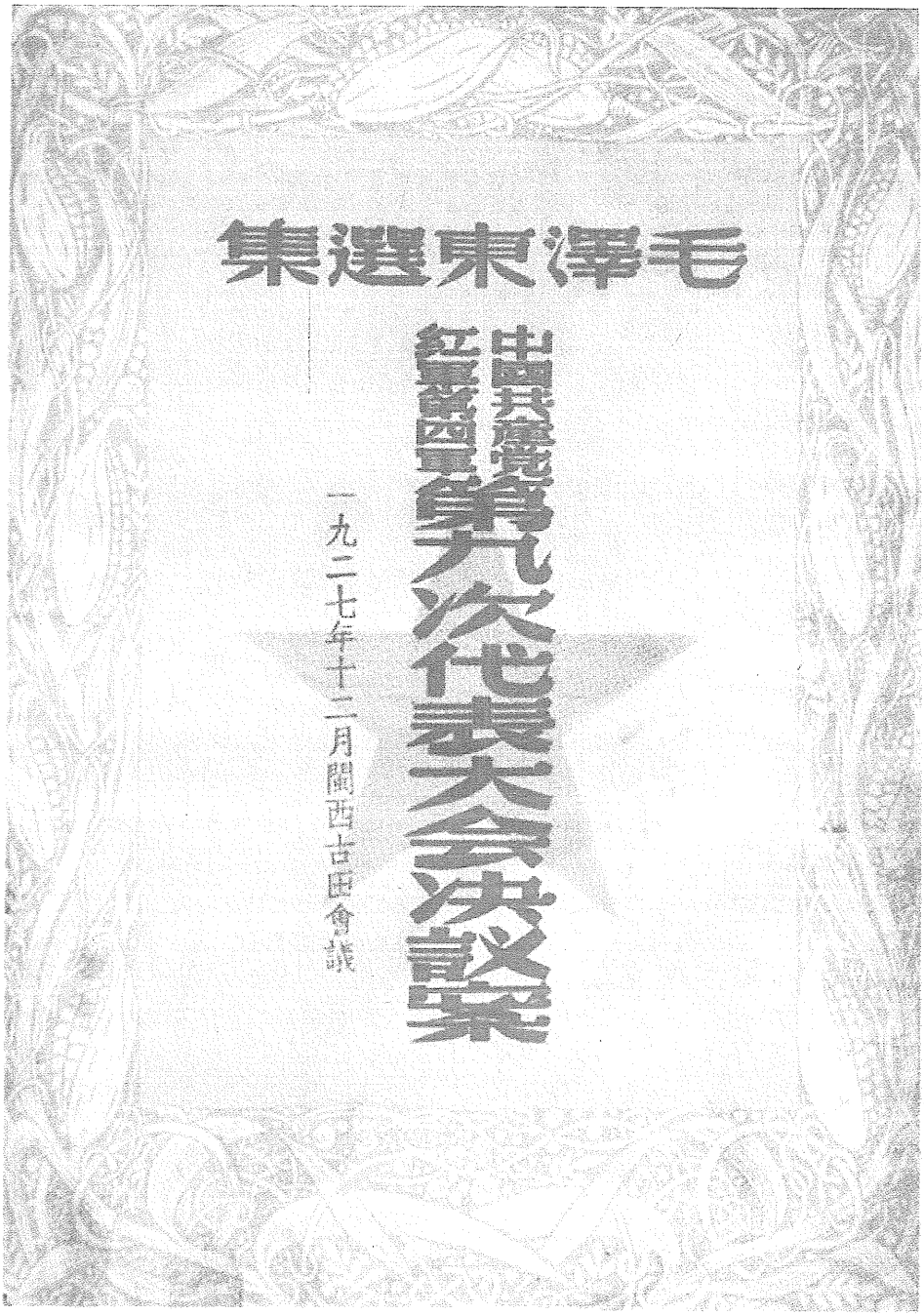
古田会议会场内景。



毛泽东在古田时使用的砚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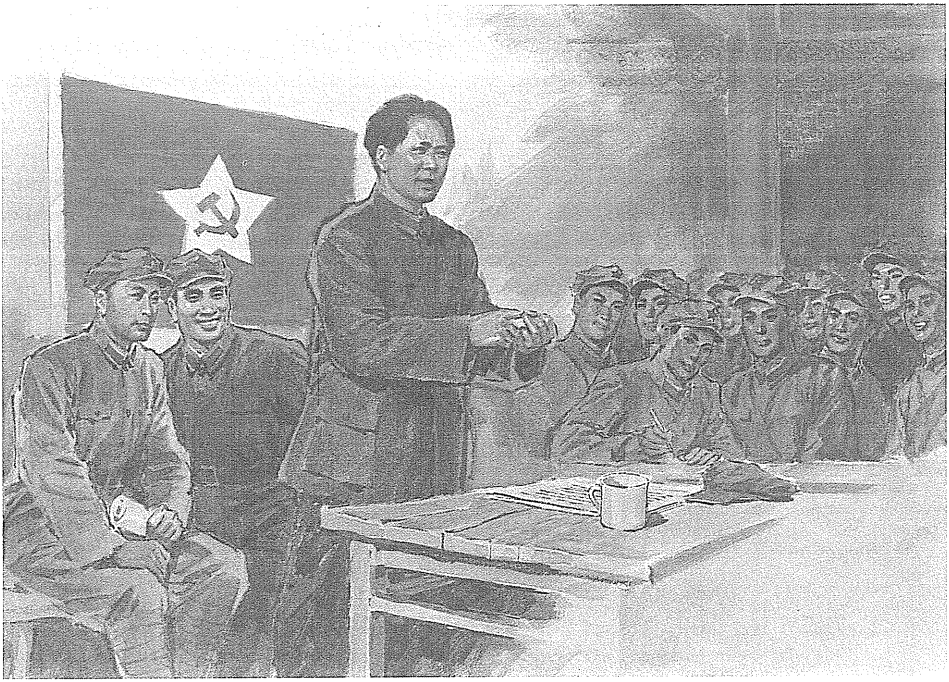
《古田会议》（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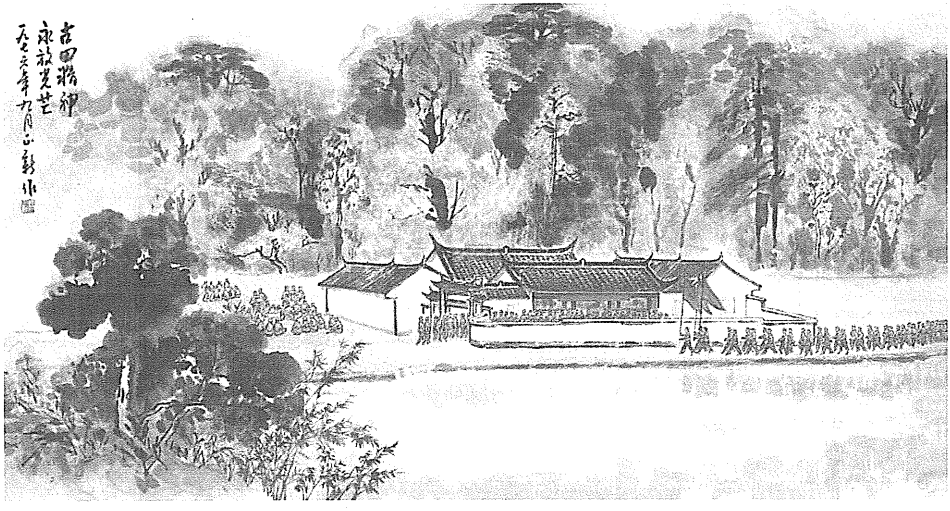
1948年1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毛泽东在连队中建党》（油画）



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油画）



《古田精神》（中国画）



《人民军队党指挥》（油画）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油画）

告全国士兵弟兄书*

（1929年）

全中国的士兵弟兄们：

我们有七件事情，要告诉你们，你们看了，请细细地想一想。

第一，士兵是穷苦工农出身。我们士兵谁个不是由工人、农民出身的？哪里找得出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子弟来当士兵呢？我们家中，因为耕田没有田可耕，做工没有工可做，或者耕出的田，还不够还地主的租和官厅的捐税，借了些债，又是利上加利，迫得无力偿还，家里住不下去，只得出来当兵。有些做工的，被厂主、店东开除失业了，再无法度日，无路可走，只得把性命出卖，每月换得几块钱。

第二，替白军当士兵，是非常受痛苦、受压迫的。初时我们不知道军队里的生活是怎样，我们只是跟着有钱有势的人，只想到军队去当兵，拿起枪来可以杀个痛快，报仇雪恨，哪知道我们走错了路，走在什么号称国民革命军的营盘里。他们首先就是革我们士兵的命，他们对我们施行苛待、恶骂、毒打，甚至于枪毙，不是吗？我们稍为不检点，就要得到军棍、藤条的“恩赐”，或两个耳光、一脚皮鞋，这是见惯的。至于军饷，他们只说没有钱，一欠就七八个月，有时开恩发一点，还要搭些公债券。而他们那些团长、师长们呢？你们试查查看，起码总有几千几万十几万洋钱，放在银行里。

至于新军阀蒋介石呢？那就多了，只是汇到美国去的，就有几千万元，他的洋房子建在租界上，他的老婆宋美龄做一件外衣，在上海大公司定的，报载用了三万元。然而我们住的、穿的怎样呢？就是那些师长、军长们，他们哪个没有洋房子住？你们不是住草棚就是住破屋。官长们穿的衣服，又比你们的烂军衣如何？他们吃西餐、大餐，吃馆子，你们的伙食呢？不是只有六块钱一月吗？不是只有一盘菜吗？打了好几年仗，他们做官的，个个升了官，个个发了财。你们呢？许多士兵弟兄，都打死在离家几千里的异乡，可怜有的老母、妻子还不知道，有的连老婆还没有讨呢！

第三，我们士兵要明白，谁是朋友、兄弟，谁是仇人、敌人？不要帮助仇人、敌人来杀自己的朋友、兄弟。让我们大家看看，到底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呢？绝对不是的，他们是我们的死仇大敌。替我们做器具、盖房子的工人和供给我们吃的、穿的农民呢？他们是我们的仇敌吗？绝对不是的。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兄弟，工农里面还有许多就是我们士兵的父亲叔伯兄弟亲戚呢。我们可以替我们的仇敌去杀自己的亲人、朋友吗？不可以的，不应该的。可是许多士兵兄弟，还没有觉悟，受了新军阀国民党的欺骗，到处去替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来杀自己的朋友、兄弟，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呀！你们不信吗？蒋介石自称顶“革命”的，第一次北伐时，他到了江西，就杀死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到了上海，他又把替他打开上海、杀退孙传芳的工人纠察队缴了枪，还枪杀了许多工人；许克祥在湖南，何健在湖北，李济深在广东都杀了工农，计算起来，总有几十万人。他们不是都说“革命”吗？他们革谁的命呢？是革工农的命，但是受他们欺骗利用去杀工人农民的，不都是我们士兵自己吗？两次东征，两次北伐，蒋

桂战争死了好多士兵！结果换得蒋介石做新皇帝，我们士兵的血，不知流了多少，只养肥了这些吃人的野兽；我们士兵的尸骨不知抛弃了多少，只垒成新军阀的宝座！够了啊！我们已受他们骗够了！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弟兄们！快觉悟过来吧！要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不要再受他们欺骗了。他们骗你们“不怕死，不要钱”，他们可是躲在后方，大扒特扒地扒钱，死的都是你们。他们就“爱国家，爱人民”，却把济南惨案出卖给日本，航空权出卖给美国；几十万被杀死的工农，已经这样蒙他们的“爱”了；国家一切权利，已经蒙他们的爱出卖完了，谁说不是呢？士兵弟兄们，快醒来啊！

第四，我们试问一问自己，打了几年仗，得了些什么？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都是军阀争地盘、争权利，互相打起来的，他们无论谁胜谁败，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们只有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送到战场上去死；一些些的抚恤费也都进了官长的腰包；没有死的也成了残废，不能为军阀跑腿了，就一批一批地裁掉去修马路，修不了马路的就只好讨米，千山万水，没有盘缠，哪有一个回得到家中！另一方面，又因为军阀战争不息、加捐加税，更有土豪加紧加租加息，家中的父母、妻子、兄弟都快要饿死冻死哩。总之，士兵们替军阀打仗，军阀升官发财，士兵们不被打死的也只落得个被裁！

第五，红军士兵打仗，是替自己谋解放。士兵弟兄们，你们大家要找出路，要谋生活，要不受痛苦，要不做奴隶，要家中得着利益，只有觉悟起来，联合起来，杀死反革命的军阀长官，自己举出士兵弟兄当官长，成立士兵委员会，来参加管理军队，与工农联合起来，打倒压迫我们的土豪劣绅，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来分给农民，我们才有好日子过。要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我们自己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然后才能得着真正永久的幸福。我们的红军，才

是我们士兵自己的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受官长压迫与剥削，官兵薪饷一律平等，穿吃一样，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队管理，可以枪毙反革命的官长，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消灭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

第六，红军第四军与反革命奋斗了几年，消灭了许多豪绅军阀。我们红军第四军在两年前的八月一号，因蒋介石反水投降了帝国主义，保护土豪劣绅、资本家，屠杀工农的时候，要我们来保护仇人，来杀我们自己的弟兄工人农民，那时我们还没有忘记革命，不愿意受他的欺骗杀自己的兄弟、朋友，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南昌暴动起来，与反革命军阀作战。两年来，我们转战湘赣闽粤各省，打倒许多土豪劣绅，消灭了许多新军阀，建立许多工农兵政府。

第七，红军士兵欢迎白军士兵到红军里来参加革命，士兵弟兄们，让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向我们的阶级敌人进攻吧！你们觉悟起来吧！我们欢迎你们。弟兄们！起来吧，让我们共同高举起鲜红的旗帜，高唱："同志们，快来努力建设我们的劳动共和国，劳动阶级要做世界主人翁，人类才能进入大同，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先锋队。"最后我们高呼：

1. 全国士兵弟兄们，倒过枪来，杀死压迫你们的反革命官长！
2. 全国士兵暴动起来，消灭新老军阀！
3. 全国士兵起来，组织自己的红军！
4. 工农兵联合起来！
5. 打土豪分田地！
6. 推翻国民党政府！
7. 打倒帝国主义！

8. 建立工农兵政府！

9.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10.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红军第四军士兵委员会

告绿林弟兄书*

（1929年）

绿林弟兄们！山上的弟兄们！土豪劣绅为你们取一个名字叫土匪，土匪成了极恶劣最下贱而凶恶的东西，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们可以每年抢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当土匪的少许弄一点东西来饱肚子就犯了大罪，见着就抓，抓着就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何等不平，何等可恶！真是岂有此理！

共产党与红军并不以为你们可恶，土匪这个名字不过是土豪劣绅给你们起的罪名，但这有什么要紧，因为你们与我们都是无田耕、无工做、无衣穿、无饭吃、无屋住的穷朋友，我们痛苦的来源就是受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的压迫，我们打土豪劣绅、反抗军阀实在是名正言顺，用不着客气，不要管什么土匪不土匪！大家务要硬干下去！不过你们的生活不是怎样快乐，我们深知你们的痛苦。

第一是你们的力量太小了，枪少又不好，人少又不懂得军事随时受军阀民团的压迫，使你们白日不敢露面，躲在深山中，夜晚要忙着打土豪不得片刻休息，风吹雨打，吸霜吹露，是你们日常的生活，虽说吃喝要比在家好一点，但是走路就不敢随便了，说话也不敢随便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呀！

第二是你们不敢回家，因为你们上了山，得了土匪的大名，家

里面不敢住，你们打土豪分的东西没有法送回家，送回家土豪知道就要祸事临头，因此你们上山，除你受苦而外你家里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也得不着幸福。

第三你们在山上因为力量小受军阀的压迫、受民团联合的压迫，以前土豪没有枪，军阀住在城里不下乡，你们还可以随意活动，可以多打土豪多分东西。现在可不同了，民团有枪，修起了巩固高大的围子，军阀随时下去向你们进攻，使你们三天四天要搬一次，恐慌不了，土豪渐渐打完东西分不着，你们力量小又不敢到远处去打，一旦不幸被土豪军阀捉着，他们毫不讲理，不给你家送一封信就把你一命呜呼！呀！这又是何等悲痛而令人愤恨的事呀！

第四纵令你们力量大一点，使你们在山上多快活几日，但是你们的将来，这一生一世的出路结果，实在渺渺茫茫，一个人做一件做得久了会要厌，所谓（糖吃多了都不甜）何况弟兄们在山上受苦呢！

绿林弟兄们！在你们这个痛苦环境中你们的出路是什么呢？我们替你们想，不外以下几种：

第一是你们打土豪得了钱就跑到远方去。这个办法不对，你们跑到远方去，沿途有民团军警巡查，你们插翅也难过，何况你带的有金银，这一条路是条死路。

第二是你们打土豪得了金银，积财回家。你们以为在远方当土匪没有得罪本地人可以回家，其实你依靠枪杆子回得家来，土豪劣绅为敲诈你的钱，哪里容得下，假口你的案发了就把你送去县里坐牢杀头。

第三是你们力量大一点弄得土豪们没办法，他硬打你不过，想一个软法，就是编你们为民团欢迎你们下山，这个方法非常巧妙，

真所谓软索能够套猛虎！土豪不欢迎你们下山，你们就会把他们消灭，所以想一条妙计来欢迎你们当民团，外表说得好听免你们的罪，实际上每月用几块钱买你们为看家狗！你们是一个活活泼泼的草泽英雄，千万不要上当，受他们狗套的拘束。

第四你们力量大了被军队改编。国民党政府和军阀可以用一个官来软化你们，这个当你们千万不要上，因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他们与我们工农贫苦人们是不两立的，他们改编你们不是为你们好，实在是一个软办法，先笼络你们，使你们入了他们的圈套，然后才来解决你们，试看有几个绿林出身的人被改编得到发达？还有一层，你们今日被改编，明日土豪就要你们去打土匪唉！土豪改编你们就是用的以土匪打土匪（就是弟兄打弟兄）的毒计呀，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弟兄们！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与红军齐心合作受共产党指挥。第一红军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但是为一国的穷人努力谋幸福，有力量为全世界人谋幸福。共产党与红军每到一处要想尽方法来与你们见面，你们与红军联合接成一气又能长进学得政治、军事的本领，又能够有帮助不致单独孤立受压迫，又能与全国的革命势力工友与农友们团结一致不会永远都躲藏山上，共产党与红军既是穷人的好朋友，有钱的死对头，是绝对不害你们的！

第二共产党与红军是为工农及贫苦人努力奋斗的，现在农友没有田耕，因为田地被土豪霸占了，工友没有饭吃，因为工钱太少或被老板赚去了，士兵没有饷，因为被军阀克扣去了，我们中国人受苦受寒，是因为受了国民党与外国洋人（帝国主义）的压迫。共产党红军就是要把土豪的田地夺来交给农民，使得田地公有，要工人的工资增加，不准老板一个独赚，要帮助士兵发军饷，要把克扣军

饷的军官打倒，要联合全国人民起来打倒国民党，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实现全世界的自由平等，弟兄们！你们是有力量的，是极勇敢的，不要老占在山上辜负你们的勇敢善战的本领，应与红军联合一致，参加当前的大革命，弟兄们！你们能这样做，不但你们本身的痛苦样样的可以解决，你们家里也可以分得田地，所有的穷人都会得到幸福，这样的为穷人做事，立下了革命功业就是死也值得啊！弟兄们快来啊，我们红军欢迎你。

（一）欢迎绿林弟兄加入红军

（二）欢迎绿林弟兄加入土地革命

（三）绿林弟兄不要扰害工农及贫苦人民

（四）绿林弟兄不帮助土豪，红军不打绿林弟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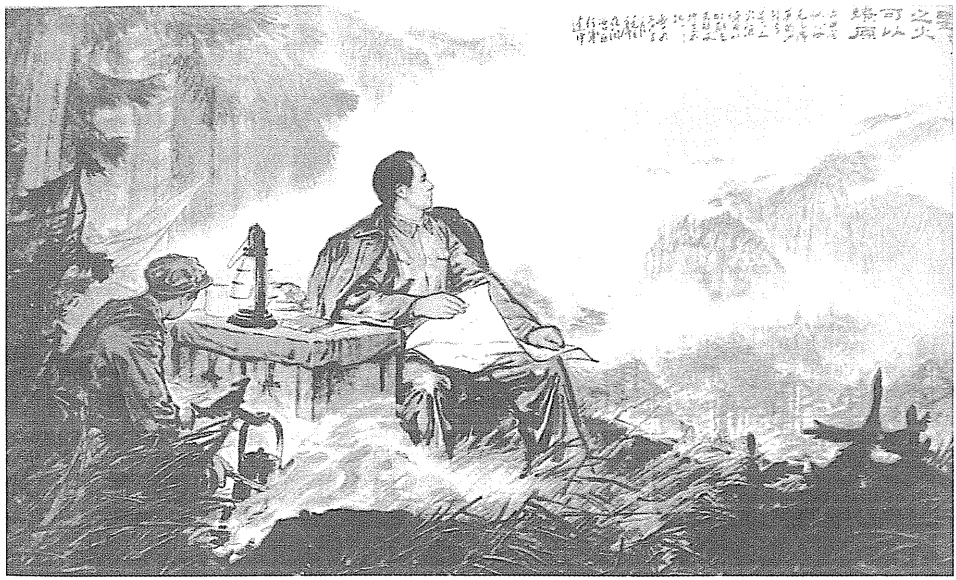
（五）绿林弟兄不帮助军阀，红军不打绿林弟兄

（六）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

（七）绿林弟兄加入土地革命万岁

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

1930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国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

（1930年1月5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

[1]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1]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

---

[1]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1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1928年至1933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1934年11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1935年1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8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1]，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

[1] 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1]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2]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3]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

---

[1] 鲁涤平（1887—1935），湖南宁乡人。1928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2] 指1929年3、4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3] 1928年7月至11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1929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6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1]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

---

[1] 指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1929年4月5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1]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2]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

[1] 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2]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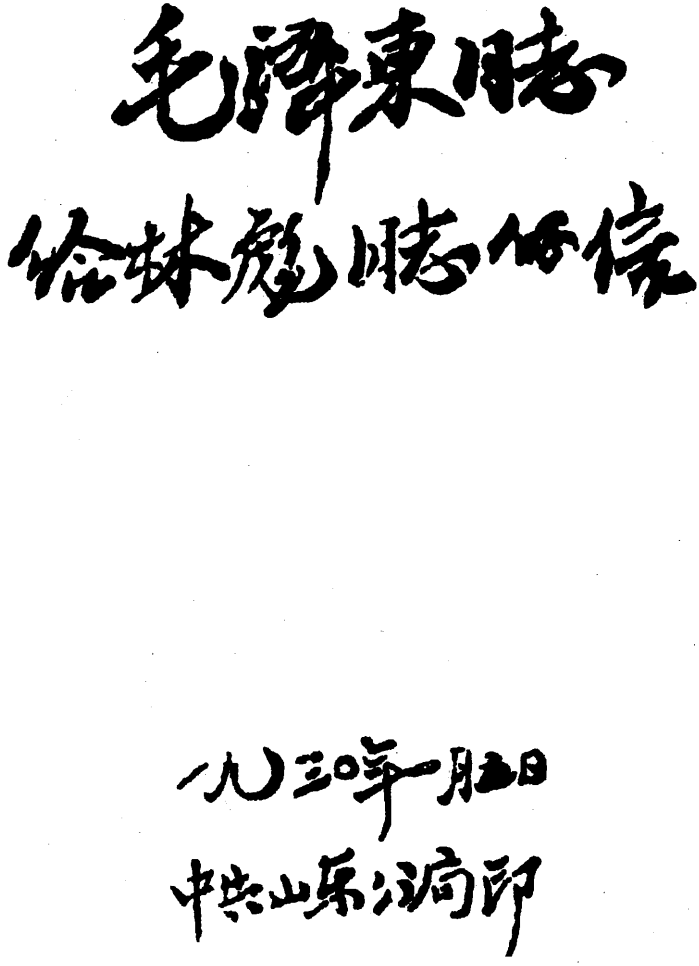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1]，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

[1] 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1929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提出了中国革命和武装道路的基本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1]，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

[1] “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1]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2]旅已被击破；陈卢[3]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4]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5]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

[1] 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2] 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3] 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1926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4]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5] 朱培德（1889—1937），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

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油印件）。

1·

毛澤東仝志給林彪的信（1930·1·5·）

林彪仝志：已經

新年到來幾天了，你的信我還沒有回答一原因[illegible]事情忙着，二則也因為我到底得点什么給你呢？有点什麼好点的事而可以貢獻給你呢？搜索我的枯腸，沒有一點適當的東西來，因此也就拖延着，現在我想得一點東西，雖然不知道到底於你的情況切合不切合，但我這点材料是現在鬥爭中一個重要問題，而是再你的個別情況不切合，仍是一般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就把他提出來。

我要提出的是什麼問題呢？就是[illegible]局的估量，[illegible]即來的行動的問題，我從前所感覺到今仍相[illegible]于時局的估量比較悲觀的，去年五月十八晚上[illegible]上，你這个觀点最明顯，[illegible]你相信革命高潮[illegible]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illegible]，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illegible]三區域的[illegible]，[illegible]三區域[illegible]因此也沒有由這[illegible]的深刻觀念，由你相信XXX式的流動游擊[illegible]一点看來，似乎你[illegible]在該革命高潮[illegible]的時期，做[illegible]的艰苦「工作」為徒勞；而有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

毛泽东致林彪信的油印件（部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写作地旧址——协成店。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油画）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油画）



《燎原之火》（中国画）

中国红军第四军告国民党军队士兵书*

（1930年1月）

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弟兄们!

一、现在军阀又在开火了!

现在军阀又在打仗了，一面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俄国），中国军阀蒋介石便为其忠实走狗；一面是蒋介石独霸中央政权，引起了全国大小军阀的反抗。前一种进攻苏联的战争是全世界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后一种是中国军阀代表帝国主义利益抢夺中央政府平分地盘的互斗。两种战争的开火都是加重工农兵的痛苦，尤其是当兵的弟兄们更要直接为军阀帝国主义受惨痛的牺牲。局势有这样的严重，弟兄们千万想一想什么是我们当兵的出路!

二、你们听一听红军的意见：

我们是中国的红军。我们中一部分同志在两年前曾为国民革命打过死仗，卖过苦力，眼见老弟兄们新弟兄们一批一批为国民党的总司令军长师长们当了炮灰。国民党对于工农兵提出的口号一点也不实行，而且保护土豪劣绅加重对人民的压迫，尤其可恨的是惨杀工农会的领袖及共产党员。等到假革命的黑幕揭穿，我们才根本明白国民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东西，我们才联合同志带枪投到农村中与工人农民联合一起实行干起土地革命来。反革命的国民政府两年来以三省的兵力几次进攻我们，终不能损伤红军的丝毫，倒多谢他们

的输送补充，红军转而强大起来。如今全国各地都有红军出现，完全证明工农群众的力量一天一天在发展。我们是受国民党欺骗的人，当此战争来到的时候，念及弟兄们的痛苦，特别很诚恳地为弟兄们贡献一个意见！

三、我们为什么要拥护苏联？

弟兄们！第一，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对于我们当兵的危险。现在全世界分成两个战线，一面是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战线，如英美日法等国，他们是专门压迫无产阶级弱小民族的。蒋介石坐了南京，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因为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兼军阀，所以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一面是无产阶级的战线，如苏联及各国工人农民兵士等穷苦的人。苏联在十余年前打倒了俄皇，成立了工农兵政府，把资本家地主等扫除干净。工农兵自己管理自己国家，求得了真正的自由平等。全世界无产阶级看见苏联为此办得好，都起来革命，联合苏联。比如中国从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曾有一次大革命，就是得了苏联的帮助。如果国民党不反叛革命，如果革命不失败，工农兵早得了政权，早成立了苏联第二。国民党反叛以后到现在两年光景，革命并未消灭，而且又渐渐抬头起来，中国是如此，其他各国也是如此。苏联成了我们工农兵的大哥，领导千百万穷苦人民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这样引起了帝国主义的绝大恐慌，不得不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以压迫一切革命势力。蒋介石便是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忠实奋勇去进攻苏联，造成几个月以来的中东路风潮，这明明白白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开始。战争如一旦开火，眼看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要运几万几十万兵士去打仗，就是要用我们工农劳苦群众去打工农劳苦群众，这是何等狠毒！弟兄们！千万不要上当，要拥护苏联，拥护无产阶级的国家，掉转枪头对着中国军

阀打去！

四、我们要起来打倒军阀

弟兄们！第二，你们要知道中国军阀混战是加重我们当兵的及工农的痛苦。中国军阀蒋介石、朱培德、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张学良等这般东西，时而和气，时而反面，打起仗来，今天南京打武汉，明天又武汉打南京；时而广东打广西，时而广西打广东，一年要干几次，弄得我们当兵的打得莫明其妙。每一次打仗，我们当兵的要死几十万，军阀们无论胜败都要刮地皮，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至于人民老百姓呢，起码几省或者全国遭殃！唉！这样打仗究竟为什么呢？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不同是国民党吗？不同是三民主义的忠实同志吗？不同是口头在讲革命吗？原来完全是假的。国民党是军阀的刮民党，民族主义投降英法美日，民权主义不准人民开会，民生主义加租加捐加税。国民党军阀只知道争地盘、刮地皮、发洋财，投降帝国主义以他为靠山而保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接济军阀的金钱和枪弹，所以军阀们打仗是永远不能停止的，也永远不会打倒帝国主义的。弟兄们！现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张发奎等为了打倒桂系以后地盘分配不均，又在打仗了！这个战争必然加重当兵的痛苦，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士兵同志应该起来反对，大家不要替军阀打仗。两方面的兵士一齐反转来打倒军阀，谋自己的出路！

五、什么是我们士兵的痛苦？

弟兄们！第三，要知道自己的痛苦来源以及自己的出路。弟兄们！我们不是生来当兵的，也不是命苦应该来当兵的，我们只是在家里没衣穿、没饭吃不得已才跑来当兵的。为什么我们会没衣穿、没饭吃呢？第一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用洋货赚了中国的钱。洋货销

场宽广，土货逼得不能出卖，只有停止不造。因此几千万几百万的工人农民便不得不失业了。加以军阀连年打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苛捐杂税的剥削，弄得我们老百姓求生无路、入地无门，大家没法不当土匪只有当兵。在我们当兵以后，初步进军营，每日三操两讲，七打八骂，从打手心、打屁股、关禁闭、开除以至于打靶，这些就是军阀们对我们的家常便饭！主要的意思就是养成我们的奴隶性格不敢反抗。至于士兵的衣服呢？每年顶多只有两套，穿来长长短短毫不合身，出外就惹人家发笑。被服呢？只有一两床坏毯子，夏天太厚了，冬天太薄了，破几个大洞简直是臭蚤的大本营。住房呢？军官们要揩油，不肯花钱修补，风吹日晒，把士兵当着牢狱囚犯还不如。军饷几月几年不发，上了他们的腰包。伙食尾钱照例不分，军阀们为了揩油，把伙食弄得非常坏，每日糙米青菜，无油无盐，这就是士兵的衣食住。一旦在战场带花，送入伤兵医院，那更是千百怪状，眼瞎的、足跛的、断背的，睡在床上不能动弹，那一面在哭，这一面在嚎，没有零用钱，没有医药，伤口流黄水臭得难闻，当兵带了花只有痛死。所以大家都希望痛快补一枪，不愿活受罪。唉！这些景况比比军阀们住洋房、摸麻牌、吃西餐、睡几房姨太太、存几百千万在银行里，究竟谁值得呢？还有军阀故意克扣军饷，使当兵的受尽穷苦，他们还向弟兄们说：大家不要愁，快打仗了。打仗到了大地方，弟兄们多少可得东西。唉！这就是军阀的毒计！他们克扣了军饷，指使我们到战场去抢劫，实在是要我们为他们拼命。许多弟兄听说打仗，就很高兴，以为发洋财机会到了，每次都拼命上前乱抢一阵，这正中了军阀们的毒计。大家想想，每次打仗到一个城市，大的商店、银行早有军阀们告示保护，谁敢去动一动？发洋财只有光顾小商人及痛苦的老百姓，他们

与我们是一样的苦人！大家再想一想，当兵的为军阀打了几百仗了，从广东打到北京，结果得了一个裁兵，强壮的留下，残废的滚蛋，请问哪个当兵的曾带了钱回家？军阀说打仗发财，完全是利用我们为他们拼命的一条毒计！弟兄们千万不要上当！唉！弟兄们！我们在家里受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压迫，不得已跑出来当兵。当兵以后，又仍然受帝国主义压迫，并且成了保护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压迫人民的器具。帝国主义军阀豪绅没有我们当兵的，他们不会那样凶恶；工人农民穷苦老百姓没有我们当兵的，他们不会那样受痛苦、受压迫。我们当兵的自己受压迫，又替别人做走狗去压迫自己的穷苦同胞，而自己一点好处没有，只有帮助军阀享福，唉！这是怎么样的蠢笨！这是怎么样的不值得啊！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吗？

六、什么是我们的出路？

弟兄们！我们红军弟兄中有一部分以前也与你们一样是很服从军阀长官的，不懂得军阀的可恶，后来从事实上看穿军阀压迫兵士的黑幕，才彻底懂得工农兵是亲骨肉，应该联合起来，所以才坚决脱离军阀到红军里面来。弟兄们！要知道红军的好处是什么？

七、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军队

第一，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军队。红军弟兄与工农是不能分开的，工农同志背着枪编成队伍就是红军，红军同志放下枪到田里工厂里就是工人农民。因此我们红军到一处，工农群众起来欢迎，煮饭烧茶、杀猪宰羊来欢迎我们。土豪劣绅跑的跑了，捉着的就罚款或者由工农兵开会来审判他，一切田地财物由工农兵大会决定处罚。因此红军与工农团结一气，分了田地，自己管自己政府，造成了真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如今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各地都有红军。就是由工人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呀！

八、红军是士兵自己的军队

第二，红军是士兵自己的军队。国民党挂着国民革命军的名称，骨子里是军阀的军队。军官有权，兵士无权。红军官兵好像师生的关系，弟兄般的亲爱。衣食住都由士兵选举代表共同管理，由工农兵政府供给。所以红军中官兵佚穿吃薪饷都是一样，红军中只有做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打士兵，士兵敬爱官长，财政公开，兵士代表有权过问，全军有多少用多少，明明白白，绝没有扣军饷吃伙食尾子上腰包的怪事，一有不平等即可开会提出来问，马上就有公平的处置。所以红军才是真正的军队，是以士兵的利益为主，完全没有压迫。

九、红军是拥护共产党联合世界革命势力的

第三，红军是拥护共产党联合世界革命势力的。帝国主义军阀的势力非常之大，而且他们是有全世界的联合，我们工农兵的革命也一定要有全世界的联合才能打倒他。共产党是全世界革命的指导机关，各国都有很好的组织。红军必然要拥护共产党才能与世界革命取得联络。共产党的政治意见与军事计划都非常正确高明，红军及工农群众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一定能步步成功。同时共产党并不是一个特别的组织，他只是在工农兵中一部分最勇敢明白的同志所组织成功，纪律特别严，工作特别苦。凡是工农兵，只要努力革命，有工作表现，都有入共产党的资格。所以共产党是工农兵自己的党，绝不像国民党只是几个军阀资本家豪绅的机关，把工农兵压在脚底。

弟兄们！朱毛红军就是因为有了上面三个原因，所以能转战四省，反革命派把他奈何不得。这可以证明，我们当兵的要到红军去才能得着工农的拥护欢迎，要接受共产党的指导才不会走错路，才

不会为军阀做牛马。弟兄们！现在战争已经爆发了，一面是我们工农兵又更加受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一面当着帝国主义军阀打架的时候，确是我们工农兵团结的好机会。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都在最近有到来的希望，只看我们工农兵的团结和努力。

十、你们到红军方面来吧！弟兄们！起来吧！不再替军阀做牛马奴隶，快带枪投到红军去。广大的工农群众及全国红军正热烈地欢迎你们。认清你们的出身是工农无产阶级。认清压迫你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军阀。认清工人农民是你们的好朋友。认清红军是你们解放自己的一条生路。离地狱，登天堂。快来呀！

十一、我们大家革命的口号！

（一）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二）反对中国军阀战争！

（三）全国兵士群众联合起来！

（四）不上前线去，不替军阀打仗！不替军阀当炮灰！

（五）向军阀算欠饷，要二十元一月兵饷！

（六）工农弟兄不打工农弟兄，士兵不打士兵！

（七）拥护红军，带枪到红军中去！

（八）实行土地革命，分配士兵土地工作！

（九）工农兵联合起来！

（十）拥护工农兵政府，打倒国民党政府！

（十一）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

（十二）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十三）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如梦令·元旦[1]

（1930年1月）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1] 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在福建省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以后，12月底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对红军发展史有重大意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同时，蒋介石组织了江西、福建、广东的反动武装实行“三省会剿”，向闽西革命根据地逐步进逼。当福建敌军先头部队进抵离古田村仅30里的小池时，红四军在1930年1月上旬向敌后转移。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先出发，挺进江西。毛泽东率领第二纵队掩护主力转移后，向北经福建连城、清流、归化（今明溪）、宁化等县，西越武夷山，去江西和红四军主力会合，使敌人的“三省会剿”宣告破产。元旦，这里指农历正月初一（1930年1月30日）。



《直指武夷山下》（诗意画）



《风展红旗如画》（中国画）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

（1930年2月）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2]。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3]。

此行何去？
赣江[4]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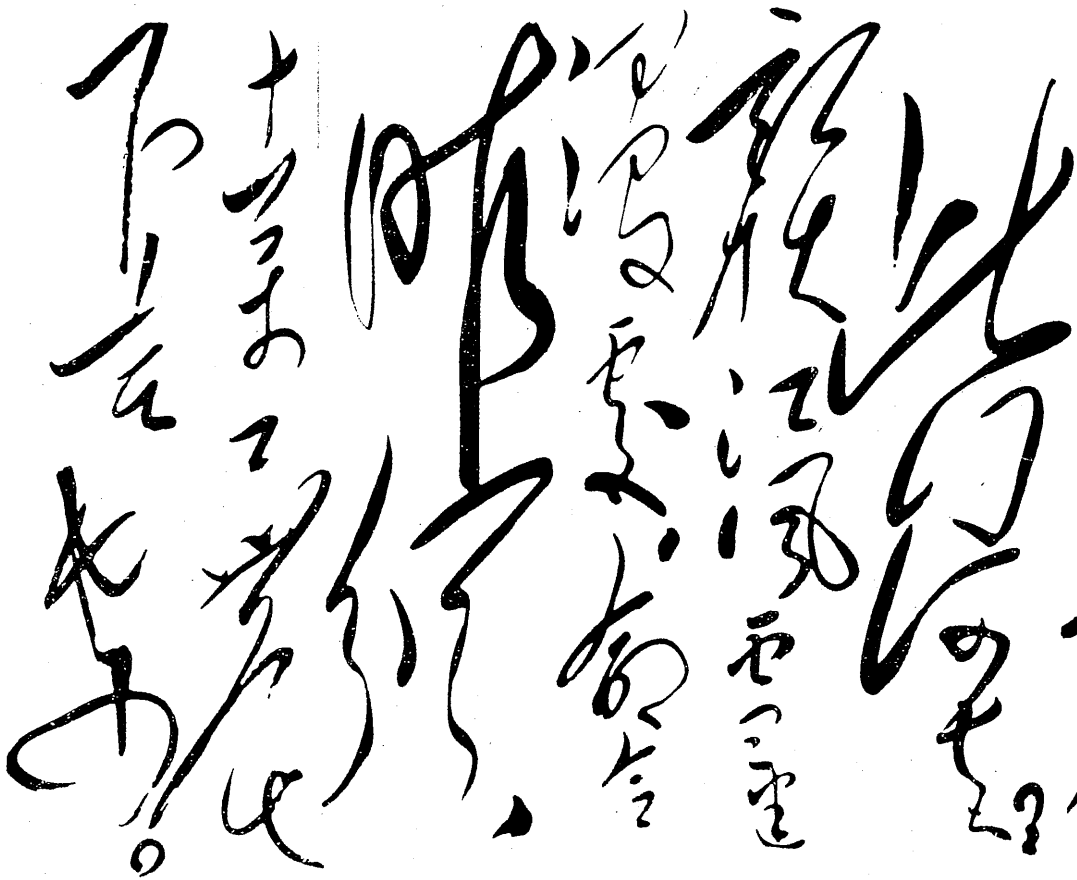
[1] 广昌路上，广昌，县名，在江西省东部。1930年2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军准备攻打赣江西岸江西省中部重镇吉安时经过这里。因当时国民党军调集7个旅12个团，开始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会剿”，毛泽东、朱德等遂决定不攻吉安，改在吉水县水南、吉安县值夏一带，打孤军进犯的国民党军唐云山旅。

[2] 情更迫，首次发表时原作“无翠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改为“情更迫”。

[3] 大关，指险要关隘。

[4] 赣江，江西省主要河流，由章水、贡水流到赣州市汇合而成，北流经吉安、南昌注入鄱阳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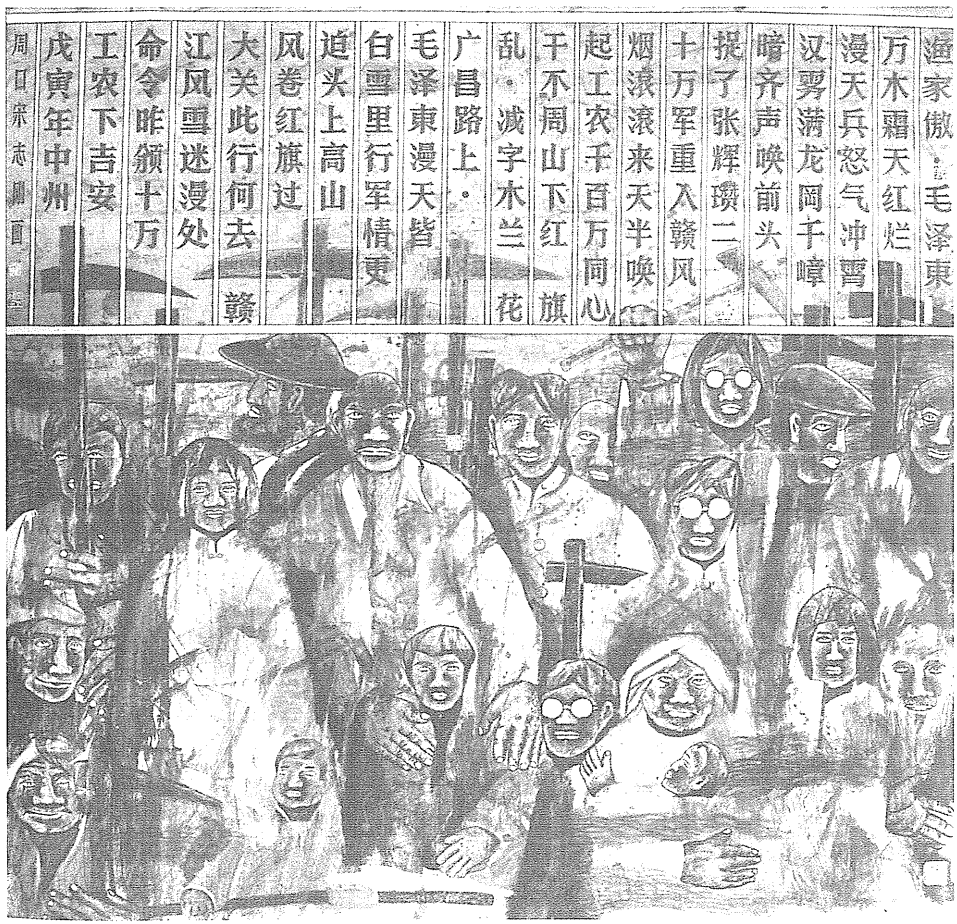
[5] 吉安，现为市，在江西中部，赣江西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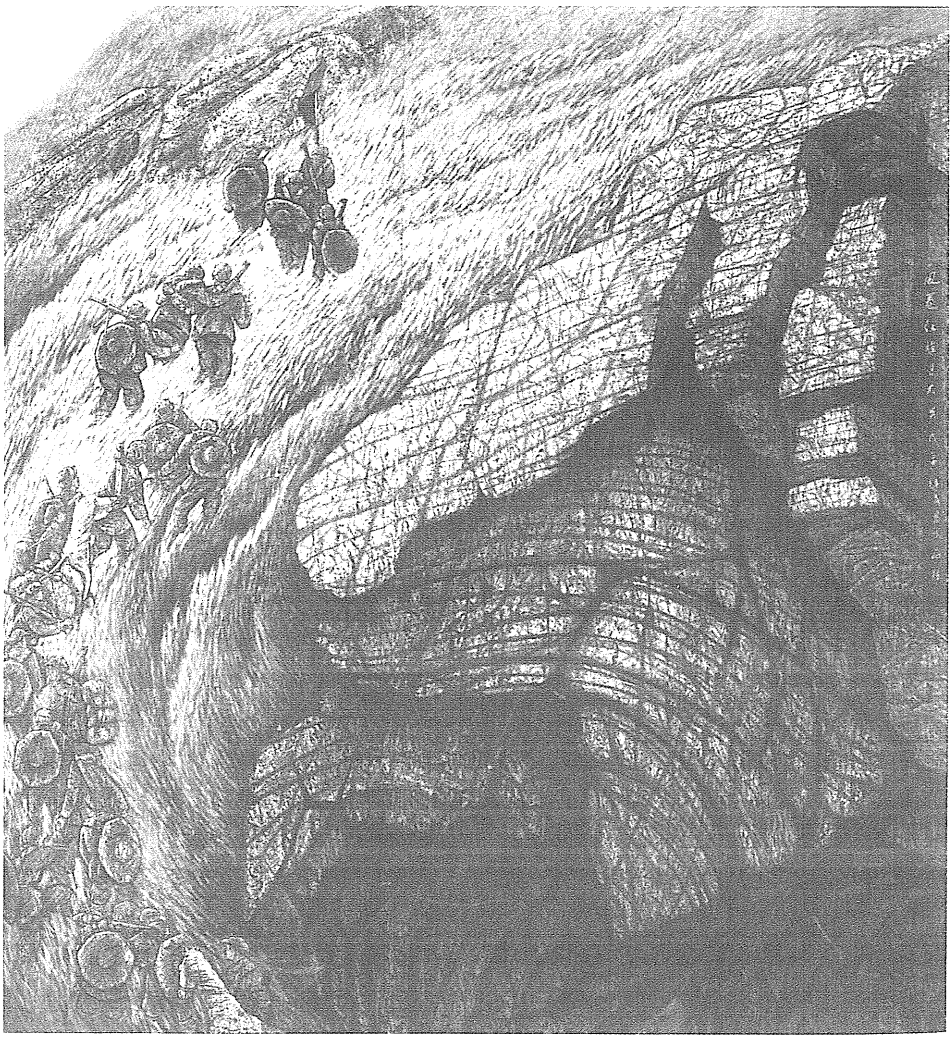
毛泽东手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雪里行军》（诗意画）



《岁月》（诗意画）



《风卷红旗过大关》（诗意画）


遠征圖
漫天皆白雪里行軍情更迫
頭上高山風卷紅旗過大関
此行何去贛江風雪迷漫處
帝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
毛澤東詞藏字木芝花（广昌路上）
戊寅年十二月周剑涛画

《远征图》（诗意画）

土地法*

（1930年2月7日）

第一章　土地之没收及分配

第一条　暴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刻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及祠堂庙宇社会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所有，由苏维埃分配与贫苦农民及其他需要土地等项的人民。只有农民协会，尚未成立苏维埃时，农民协会亦得执行没收及分配。

第二条　自耕农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除自食自用外，尚有多余，经当地多数农民要求没收的，苏维埃应批准农民的要求，没收其多余的部分并分配之。

第三条　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准其在乡居住，又无他种方法维持生活的，得酌量分与田地。

第四条　现役红军官兵夫及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照例分田，并由苏维埃派人帮助其家属耕种。

第五条　乡村中工商学各业能够生活的不分田。生活不够的，得酌量分与田地，以补足其生活为限。

第六条　雇农及无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

第七条　旅外不在家乡的，不分田。

第八条　分田的区域标准有二：

（1）以乡为单位，由某乡农民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所耕田地总合起来，共同分配。

（2）以数乡为单位，如有三四乡互相毗连的，内中几乡田多几乡田少，若以一乡为单位分配，那田少之乡不能维持生活，又无他种生产可以维持生活的，则以三四乡合为一个单位去分配。以上两种办法，第一种是普遍适用的，如有特别情形经乡苏维埃要求，得区苏维埃批准的，可用第二种办法。

第九条　分田的数量标准：

（1）为满足多数人的要求，并使农人迅速得到田地起见，应依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2）有特别情形的地方，经乡苏维埃请求得区苏维埃批准的，得以劳动的标准分配。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十四岁以上至六十岁能耕种的为一劳动单位）。

第十条　为求迅速破坏封建势力起见，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得采取绝对平均主义，重新瓜分。分田后，由苏维埃制定木牌插于田中，载明此田生产数量，现归某人耕种。

第十一条　所有豪绅地主及祠庙公田的契据，限期缴交乡苏维埃，或乡区农民协会，当众焚毁。自耕的田契，如有多数农民要求焚毁的，亦得焚毁。

第十二条　田地分配后，由县苏维埃或区苏维埃发给耕种证。

第十三条　凡乡中死亡、改业和外出的，将他所分得的田地收归苏维埃再行分配。或来或新生的，苏维埃应设法分与田地，但须在收获之后。

第十四条　暴动分田时，如农民已下种，则本季生产归原耕种

农民收获，他人不得刈取。

第十五条　河坝及大规模池塘，不便分配的归苏维埃管理，供给人民公共使用并督促人民修浚整理。

第十六条　大规模山林不便分配的，归苏维埃管理。人民需要采用竹木时，按照下列数目，得苏维埃批准，二十根以下的由乡苏维埃批准。二十根以上五十根以下的，由区苏维埃批准。五十根以上的由县苏维埃批准。

第十七条　大规模山林的出产，除供给人民需要外，其余归苏维埃出卖，所得之价，作苏维埃用费。各级苏维埃应得之成数，由高级苏维埃规定。

第十八条　木樟山杉山竹之不便个别分配的，得由人民数家合为一组，向苏维埃领取栽耕，以其生产分配组员使用。

第十九条　为满足贫苦农民要求起见，应将所有没收田地，尽数分与他们，苏维埃不必保留。但得保留没收房屋之一部分为公共事业之用。

第二章　废除债券

第二十条　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之债，一律不还，债券借约限期缴交苏维埃或农会焚毁。

第二十一条　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农贫民或小资产阶级之债，不论新旧，都要清还。

第二十二条　工农贫民欠商家交易之账，而非商业高利贷的，仍旧要还。但非本身之账不还，年限太久之账也不还。

第二十三条　工农穷人自己来往之账，革命以前借的，应全

还、减还或免还，由乡区苏维埃按照情形，适当规定。革命以后借的，全然要还。

第二十四条　工农穷人典当物件及房屋与豪绅地主及典业奸商的，无条件收回抵押品。

第二十五条　工农穷人典当物件及房屋与小资产阶级的，其抵押品，应收回若干或不收回，由乡区苏维埃照双方经济情形决定之。

第二十六条　钱会、谷会、豪绅地主奸商接取工农穷人在先的，接会人应将钱谷交还于纳会人，会取消。工农穷人接取豪绅地主奸商在先的，接会人无须交还钱谷于纳会人，会也取消。

第二十七条　苏维埃政权之下，禁止高利借贷。由县苏维埃按照当地金融情形规定适当利率。但不得超过普通资本在当地一般经济情况中所得利率之数。

第三章　土地税

第二十八条　为打倒反革命的需要（如维持并扩大红军及赤卫队，维持政权机关等）及增加群众利益的需要（如设立学校、看病所，救济残废老幼，修理道路河坝等），苏维埃得向农民征收土地税。

第二十九条　土地税须在苏维埃建立之后，而且群众已经得到实际利益，并经高级苏维埃批准时亦可征收。

第三十条　土地税按照农民分田数量分等征收：

1. 每人分田收谷五担以下的，免收土地税。
2. 每人分田收谷六担的，收税百分之一。
3. 每人分田收谷七担的，收税百分之一点五。

4. 每人分田收谷八担的，收税百分之二点五。

5. 每人分田收谷九担的，收税百分之四。

6. 每人分田收谷十担的，收税百分之五点五。

7. 每人分田收谷十一担的，收税百分之七。

8. 每人分田收谷十二担的，收税百分之八点五。

以后每加收谷一担，加收土地税百分之一点五。

第三十一条　土地税按照以下比例分配于各级苏维埃：

百分之五十归乡苏维埃，百分之二十归区苏维埃，百分之二十归县苏维埃，百分之十归省苏维埃。

第三十二条　山林出产，只供人民自己食用，没有多余的，不收税。自己食用之外尚有多余的，其多余部分，由苏维埃按照出卖价值，用适当比例收税。

第四章　工资

第三十三条　农村手工业工人及雇农，以前工资过低的要适当提高。以后工资数目，由苏维埃依照生活物价涨跌及农民收入丰歉两个标准决定之。乡区苏维埃规定工资，须得县或省苏维埃批准。



1930年2月，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图为“二七”会议旧址。



“二七”会议期间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1]

（1930年2月14日）

江西斗争第一步行动计划联席会议决议：

（一）根据联席会议对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作根本计划。

（二）目前行动的总目标及中心口号，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下列六个口号则是目前的中心口号。

1. 打到吉安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2. 打到吉安去建立赣西苏维埃政府；

3. 打到吉安去彻底分配土地；

4. 打到吉安去扩大工农武装；

5. 打到吉安消灭军阀混战；

6. 打到吉安武装拥护苏联。

以上六个口号各部队各政权机关各群众组织都要立即对工农士兵及其他被压迫群众（中小商人及学生）公开提出做广大宣传（对工农及城市贫民要在一切墙壁上写满，对士兵要作为早晚点名呼唤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广大群众达到政治任务，反对隐蔽政治目标及对宣传怠工。

（三）敌方形势估量及攻取吉安的意义：

---

[1] 这是“二七”会议主席团毛泽东、曾山、刘士奇署名发布的通告。

1. 敌方形势：两广战争相持未决，福建政变爆发，湖南有对周烂吴尚的军事行动，湖北有鄂系（夏斗寅徐源泉）与蒋系的斗争，老桂系（李石樵李宜煊）与蒋系的相持，蒋阎正积极酝酿南北大战，工农士兵贫民游民的斗争普遍发展。在上述形势之下，蒋系在短期内无增兵江西的可能，在江西赣东赣北至少可牵制张辉瓒部三团（赣东二团赣北一团），张部只能用三团兵力对付赣西，谭道源一师不能回来，金汉鼎受闽西工农牵制，同时又有参加争福建地盘的必要一时不容易到赣西。

赣西成旅两团朱旅一团及靖卫队的部署如下：吉安二营靖卫队枪一百五十支守城，分宜、袁州、新余三县共有一营另一连流动游击，加以分宜有靖卫队枪三十支，袁州有商团及靖卫队枪三百支，新余有靖卫队六十支，峡江有易团团部及兵七连又靖卫队八十五支有工事，三曲滩有一营人游击于吉安三曲滩间，吉水有二连（新开去）及靖卫队六十八支，新淦只靖卫队三十五支，兴国万安均靖卫队守城，在以上各县敌军及统治阶级都非常恐慌。

2. 我方形势：赣西及兴国、于都、宁都、南丰各县共有赤色群众百十五万，宁冈、水新、莲花、永丰、乐安、宁都六县县城都是我们的，泰和、吉安、吉水只有县城在敌人手，四乡都在我们手，安福、新余、分宜、峡江，南丰、于都都各有一部分在我们手，兴国有大部分是赤色区域，加以红军四、五、六军都到赣西各地，尚有许多地方武装，斗争情绪很高。

3. 在上述敌我两方形势之下，“打吉安”确是执行广大群众的要求。过去业已发动了广大群众动摇了敌基础，故这一行动口号是十分对的。但我们第一步不是打吉安城，而是实行围吉安城，目的在使吉安城内生活更加困难，人心更加恐慌，白色统治更形孤立，

然后进行第二步计划（后附）。

（四）部队的调动及布置：

1. 赣河以东：A. 四军三纵队及军直属队全部于二月十三号集中乌江市，十四号进攻吉水城，要有决心地打下来（四军三纵队在十二日以前要把永丰城拆完）；B. 六军第二纵队部第四支队二月十三号开往中鹄，十四号配合中鹄群众及武装消灭水东之敌，（二连）监视吉安城，响应四军进攻吉水；C. 中鹄苏维埃除分一部分群众与四支队配合进攻水东外，另要分配一部分群众于十四号清早开往吉水城，与四军配合进攻吉水城内之敌，消灭敌人，担任拆城及搭浮桥；D. 六军第二纵队第五支队于九日到达荇田东固，赤卫队由袁振亚率领于十日到达荇田与五支队取齐，组织一行委指挥荇田一带工作，袁振亚为书记（行委名单及任务另附）；E. 四军第四纵队及二十五纵队宁南游击队的任务仍如前委布置在宁都、广昌、南丰三县扩大红色区域牵制金汉鼎及筹款；F. 四军全部放弃永丰攻取吉水的意义是：揭出四军的目标，于吉安对面威胁吉安城，影响赣河下游群众起来，并使南昌反动政府的目标集中赣西；G. 吉水攻下后前委及吉水县委的工作①迅速拆城，②建立县政府，③建立县城工人组织，④发展城内党与团的工作建立区委。

2. 赣河以西：A. 五军及边界赤卫团的行动和任务：五军及边界赤卫团（至少要四百枪）限二月十三日集中永阳，以永阳为指挥中心，配合西区群众武装，向吉安城附近威迫，同时注意泰和之敌向吉安退却时相机截击之，所有西区一带群众武装都归五军指挥。B. 六军第一纵队（原二、三团）限二月十三日到达阜田集中（三团如赶不及可迟一天到达，二团必须同时到达），以阜田为指挥中心，配合相水金滩群众武装及吉水游击队向三曲滩吉安峡江三方面

威迫。甲、从第一纵队派出小部队配合群众武装向三曲滩扰敌，与吉水四军取得联络；乙、峡江边游击队向峡江城扰敌；丙、内外延赤卫队及儒行游击队集中桐树坪向吉安城扰敌（扰敌即每天拂晓及深夜向敌打枪），断绝吉安三曲滩敌人与下游的交通亦是六军一纵队的任务，所有北路的群众武装都归一纵队指挥。

（五）行动纪律及财政政策：

1. 各部队及工农群众到达的地方尤其是城市未得命令不得自由到民间及商店去搜索。

2. 各部队到达地方特别是城市应有计划地分配部队及负责人员去搜索应该搜索的处所，捕捉应该捕捉的人犯。

3. 关于没收反动财产及捉拿人犯均归政治部指挥并处理关于搜索残余敌人及没收反动派军用品均归司令部指挥并处理。

4. 凡罚款筹款没收及处理人犯均须由政治部或群众政权机关明白布告或宣布罪状。

5. 不得破坏学校及邮政。

6. 没有政治的必须时不得破坏公共机关及民众一切器物用具。

7. 禁止没有政治意义及群众基础的烧杀。

8. 财政政策：A. 红军军饷及政权机关的用费主要应向豪绅地主取得，而不应加增中小商人的负担。B. 商店资本在二千元以下的不筹款，两千元以上的按照下列比例要求他们捐助军饷：比例资本有两千五百元捐款三十元，三千元者捐款四十元。此外，资本增加一千元加捐于全部资本数百分之一。如资本四千元，除捐四十元外则加捐四千元之百分之一，共捐八十元；资本五千元者，除捐八十元外则加捐五十元，共捐一百三十元；资本六千元者，除捐一百三十元之外则加捐六千元百分之一即捐六十元，共一百九十元；资

本增加者以此类推。C. 向豪绅地主筹款用罚款名义，向商人筹款用捐款名义。D. 对于豪绅地主所开的商店于其商店资本部分仍按照比例向其捐款，于其豪绅地主部分则加以罚款。E. 反动分子所开的商店经过宣传取得中小商人的同情之后，可以没收，否则仍不要没收。对于反动店主在群众意义的必要时应该捉拿并罚款。F. 河流交通在军事的必要上得施以检查，或有时期有范围地断绝船只来往，或扣留船只，不得没收船只上货物及其他财产。

（六）党内外群众的动员：

1. 伟大的政治任务：只有动员党内外一切群众才能达到，过去许多地方对于行动目标只有少数负责人知道不让群众知道的错误应该坚决的废除。

2. 此通告到达各地方后要迅速召集党及群众的各种会议或大会，详细报告政治形势国际国内江西赣西反革命势力崩溃及革命势力高潮的形势斗争前途（工农夺取江西爆发革命）和目前行动的目标（六个中心口号），并宣布纪律（行动纪律各条），红军及政权机关并要发传单出布告，使群众完全明了我们要做什么。

3. 党内动员：A. 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开会讨论这一通告及续发的各通告。B. 开活动分子大会，由党的指导机关派人作报告，军队以军或纵队或支队为单位开，地方以区为单位开。C. 开支部大会报告通告内容发动党员全部。

4. 军队动员：A. 召集军政工作人员会议报告政治形势斗争前途行动目标及纪律各项，讨论执行方法，领导士兵积极行动。B. 举行士兵集合讲话亦是报告政治形势等各项，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

5. 工农群众动员：A. 召集各级群众机关及工农干部会议（即开各级委员会，以区为单位召集群众大会。B. 群众大会名为某区

攻取吉安示威大会，此通告到后三日内必须举行，事先要有好的准备，事后要将结果报告上级机关。C. 群众大会的中心口号除开前述六个中心口号外再加以下列六个口号（共十二个口号）。

①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消灭反动势力；

②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分配土地；

③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建立苏维埃；

④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扩大工农武装；

⑤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消灭军阀混战；

⑥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武装拥护苏联。

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

（1930年2月16日）

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两军军委联席会议在吉安之陂头举行，二月六日至九日开会四天，联席会议开会时节的政治形势是帝国主义积极布置反苏联战争，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群众共起反抗帝国主义，中国军阀混战日益扩大，财政经济危机遍布全国，工农兵士城市贫民的反抗运动到处发展，特别是以江西为中心的南方各省红色武装斗争有大规模的开展，打红旗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在三百万以上。联席会议明确认识世界革命高潮要随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运动中爆发，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地要到来，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成为世界苏维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比别省要成熟。联席会议明确认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形势，也是扩大土地革命影响于全国各地的鲜明旗帜。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有力分子，而且是世界意义上实行着武装拥护苏维埃促进世界革命的有力分子。

联席会议在上述政治估量之下规定着党的主要任务是：1. 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 深入土地革命；3. 扩大工农武装。由于这三个任务之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动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成为推动全国

革命的一大动力。联席会议又告诉同志及一切正在斗争的群众，实现这三个任务不是完全不费气力的，它是要从激烈的艰苦的斗争中方能取得，从前所没有的大的艰苦斗争将随革命势力的前进而到来，因为和我们作对的不但是中国的统治者——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而且是世界的统治者——帝国主义，但艰苦斗争的前途则必然是全国革命高潮援助南方革命势力，南方革命势力则要汇合全国的革命势力把统治阶级完全埋葬。

联席会议指出，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

联席会议决定革命的土地法，反对迟迟分配土地，指出不论何地，凡暴动驱逐了豪绅之后，须立即没收土地分配与农民。没收标准不限于豪绅地主，只要真实的群众要求，自耕农的土地亦得没收。对于分配土地，指出土地革命的当前目的，是动摇封建基础和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应把所有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尽量分与一切需要这些东西人，只有不便分配的（高山大塘），才由苏维埃管理，仍归人民公共使用。联席会议指出，表面上站在左边在现时阶段主张所谓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理论，实际是帮助豪绅保持封建势力，违反彻底破坏封建基础的任务。同时，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与男女老幼平分，应该采取后者，这是为了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所不可忽略的紧要策略。“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联席会议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

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指导机关的迫切需要，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应该扩大其任务，变更其组织，担负这一伟大的使命，四军则组织军委指导之。前委名单如下：毛泽东、郭贞、曾珊、王怀、方志敏、朱德、潘星元、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指定毛、曾、刘、朱、潘五人为常委，黄、彭为候补常委，毛为书记。联席会议为了赣西南的统一指导，决定将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合并，指定新的名单，成立赣西南特委，同时指定四军军委名单。又决定召集赣西南党的代表大会及江西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

前委在联席会议指出的任务之下，业已开展工作。特为通告红军及地方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

前委

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

（1930年3月18日）

一　环境分析和行动计划

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成光耀、朱耀华、邓英三旅及唐云山残部，蒋系因对阎作战虽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军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

金汉鼎师向福建开，目的在与刘和鼎夹击卢部进占福州。赣南、闽西空虚，给我们以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的好机会。闽西只张贞部队，稍远的将来我们可取得漳州，使红色区域直通海口。同时两广战争益趋激烈，东江驻军只有一旅内外，东江西北七县的红色区域有扩大之可能。赣州虽未攻下，然给赣州群众的影响仍然是不小的，对全国也有相当的影响。新的军队到赣州接防短时期没有可能。新的军队未到赣州以前，金部七十团是无法离赣州的。

在上述环境之下，红军第四军的行动应该以三个月为期分路游击，其游击区域是：赣南之赣县、于都、瑞金、会昌、南康、信丰、安远、寻乌各县；东江之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蕉岭、大埔各县；闽西之上杭、武平、长汀、宁化、连城各县。六军二纵队的游击区域三个月内应该是万安、赣县东乡、于都北乡、兴国东乡、宁都南乡和广昌石城各县。六军一纵队的游击区域是吉

安、安福、分宜、宜春、新余、峡江、吉水、永丰、乐安、新干各县。六军三纵队则是泰和西乡、遂川、万安各县。赤卫队的二十二纵队应与六军二纵队的行动配合，担任兴国全县、于都北乡、宁都全县的红色区域的完成，宁南游击队则担任广昌、南丰、宜黄的红色区域完成。红军第五军，第一步应与六军二、三纵队的行动配合，完成赣河上游的工作（泰和、遂川、上犹、万安等县），第二步应开返五军的根据地湘鄂赣边一带，推广湘东、鄂南、赣北的红色区域，并使赣北与赣西的道路打通起来。

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在现时这种环境之下，若仍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反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分兵游击一时期后，因为别一种环境的需要和夺取闽南、发展赣东等地，便应该集中行动。所以我们要反对绝对集中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

二　同时扩大同时深入

只求扩大不求深入是严重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赣西南与东江等处，很久不分配土地，不建设苏维埃和忽视赤卫队组织是十分错误的。红军游击时亦易犯这种只求扩大不求深入的错误。每处住不到三五天又开起来走，做了些宣传，也组织了几个小小的农工会，几个嫩芽般的支部，但红军一走动，马上就塌了台，这样的组织算不得组织。这种只做宣传不做组织的地方不是没有的，如南康、大余、会昌、瑞金、石城等县，有些原来没有一点组织的，有些原来有点组织的但只是很小的一点，我们要在这样的地方做深入的组织

工作是白费力的，在这样的地方自然只能做些宣传及分配豪绅谷物的工作，给群众以相当的影响，就可以开起来走。但在别的地方，如宁都、于都、安远、寻乌、长汀、武平等县就完全不同，不但原有党和群众的组织，而且有小块甚至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有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红军到了这些县内，要有计划地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体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将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推广到邻县。比如在赣南就应该扩大宁都、于都、安远、寻乌四县整个的赤化，在闽西要往武平县、长汀各县整个赤化。这样就把瑞金、会昌、石城包在中间，再图发展闽赣的联系，就成功了。寻乌的红色区域与东江的红色区域原来是通的，这样三省的接连都成功了。若不使这五六县工作深入，单是走马观花地游击一番，如去年赣南四十五天工作，则闽粤赣接连的任务，就不知何日才得实现。在一定时间，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一地区，同时即深入这一地区，是很有效力的工作方法。红军各部队分开工作时，应该指定时间，支配于指定区域。应该做深入工作的地区，工作时间要支配多，不做深入工作的地区，工作时间要支配少。在一定地区内（如四军三纵队之于于都）哪块是要支配时间多的，哪块支配时间少的，又要有计划，才能工作更有效。

三　伴着发展

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从我们的经验中是显示工作的效力的。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它去发展，这个观念要深刻地建设起来，因为从前没有过。过去的经

验，非如此则工作白费力，湘赣边界大块红色区域的创造，是因为大革命时，茶陵、酃县、莲花、永新、宁冈各县的群众斗争有一些党的组织的残渣，伴着这些固有的基础，才发展起来的。遂川原来没有基础，勉强制造的结果，仍然弄不出一个局面。四军闽西七月的分兵游击，一纵队在坎市兰家渡沿汀河而上，复折返上杭、永定交界一带，都是伴着原有的一些基础发展的，是“打通”“连贯”的工作，所以一纵队那次的工作效力特别大。三纵队在龙岩龙门一带是伴着原来斗争的区域，帮助农民去工作，所以也收了效力，可惜工作时间不久，仓卒开入闽中，所以效力不及一纵队远甚。二纵队去的雁石、姑田一带，原来一点基础没有，所以是完全白跑一趟，简直无效力可言。这回四军到江西来宁都、乐安、永丰、藤田四地的分兵，只有宁都四纵队一路收了大的效果（四纵队在宁都二十天不但推广了红色区域，主要还要在它纠正了宁都党的机会主义，执行了分配田地、组织苏维埃、建设赤卫队的重要任务）以外，其余三路都没有达到推广赤色区域的效果，因为三地都不是原来有组织的，只有三纵队曾派了一个小部队到吉水，可惜三纵队的党发展这个区域太迟，未能派很多的工作人员下大力去工作。虽然我们并不放过它，上面这些例子很够我们认识：“伴着发展”的口号是无疑的正确。虽然我们并不限制红军的脚板，不准跑入纯全白色区域去一步，有时为了全国的意义或其他不可避免的原因，如“影响时局，解决经济问题”和“退却”等等，是要跑入原无基础的区域去的，但这不是工作路线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无疑是“伴着发展”，也即是历来所说的“波浪式的向前扩大”。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应付地方党部及群众“请兵”的问题，有些同志对于地方党及群众向红军请兵去打土豪、打民团一件事，随

便的看过了，不知地方群众请兵是好工作机会，因为群众做了主体，一切布置设计都是群众自己的，红军趁此机会帮他一手，斗争之发展是异常迅速的，不顾群众的请求只是主观地布置工作，失掉极好的发展机会，这是个人主义的工作路线，也是错误的。

四　武装农民

扩大红色区域主要条件就是农民武装，若不能创造农民武装，则所谓深入工作只是一句空话，游击队所到之处，凡属做有深入工作希望的地区，不但不能把原群众武装收缴了去扩大红军（要在广大赤色区域的腹地部分土地斗争业已深入，武装作用减少了的时候，才能有计划地集中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红军）。在红军斗争力不大，感觉损失的条件下，还一定要由红军拨枪支去武装群众，不但要出枪，有时还出子弹，不但拨出子弹，有时还要拨出军事工作人。在红军力量不强，事实上无法拨出枪弹及人员的时候，就要尽可能地努力去收缴豪绅及小部队敌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总之，游击部队对于地方武装是与他的工作同始终的，谁不把武装地方看作十分迫切的工作，谁不看重地方武装，如同看重他们自己的部队一样，谁就是抛弃群众的机会主义者。

五　训练地方干部

红军党的斗争经验，是比许多农业区域的地方党部要丰富些、进步些的。同时地方斗争的发展，工作人员缺乏，工作路线不正确，也就越发表露。因此红军党的指挥机关，无疑的要负担新发展

区域地方干部人材训练的责任，短时期党内训练班和群众领袖训练班之说，依然要按照从前的经验去进行。

六　地方党的行动要与红军的行动合拍

去年四军在赣南东河一带游击时候，赣南特委却去注意西河的日常斗争，把东河方面红军发动起来了的热烘的群众，一点不去指挥，让他冷下去，机械地执行赣粤大道为中心区域的口号，忽视红军在东河一带的政治作用，忽视赣南、东江、闽西三区域联系的伟大意义，表现了十足的机会主义，赣南等处如有过许多许多乌龟干部，红军到了许久不出来接头，要他发动武装斗争就吓得魂飞魄散，有的比较积极一点，也不能利用红军游击的时机，加紧发展斗争的工作，这些地方党的行动与红军的动作不合拍的现象，是使工作失去效力的最大原因，此现象赣南最利害，赣西南特委要努力地纠正。

七　红军党部地方党部的关系

红军的军委与地方的特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军委可以直接地指导工作。红军的纵队委与县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区委以下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支队委和地方的区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地方的支部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大队委与地方的支部，开联席会解决问题。特委对于纵队委可以指导它的工作，但在超地方性的红军各纵队，不能完全束缚它的行动。前委以纵队为单位，派遣的巡视团与特委开联席会议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行使指导的职权。

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1]

（1930年3月19日）

为令知事。照得攻城之法，不外奇袭强袭两种，本军此次攻打赣城，即以强攻之决心，施行奇袭之手段，乃以下述缺点之影响，致未克奏效，殊为憾事。兹将是役之缺点及战后之教训，大略列下，以资他山之鉴。

一、敌情之判断不确

屡据各方来报，有谓城中无敌，仅靖卫团[2]百人，有谓城中敌人仅一营者，致使指挥官之判断敌方兵力误为一营，实则城内之敌为七十团全部（三营，每营步三连、机枪一连）。因此攻城之配备及计划多轻忽不周。

二、地形未预先观察

先日一、二纵队既抵城门附近，敌即闭城顽抗。当时我方尚未决心攻城，故高级指挥官未经率领各部指挥官观察城郊一带地形，致翌日四纵队到达南门附近时，未能即时占领有利阵地，以为尔后扒城之预备。对于炮兵、机枪之阵地，亦未预先选定射击区域，射击距离等更无测定。

三、事先无充分准备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二号训令。

[2] 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当我军到达茅店、冬田一带时，尚未准备扒城器具（如竹梯等），以致临时匆促。

四、上下决心不一致

在战斗间，各部官长以至士兵偶见城中之敌实有一团兵力，遂有一部动摇其攻城之决心，未照攻击命令实施。

五、战场报告不确实

战场之报告实为上级指挥官判断敌情相机处置之资，不宜轻敌妄大，亦不应[1]此次战役，有一时报告欲即再举攻击，而旋又报告不能攻击，反复无常，毫无正确[2]指挥官处置不易。

六、不按时施行总攻

攻城命令原定十六日晨三时三十分施行总攻击，乃第四纵队于四时三十分尚未到达原定之东南两门间之预备阵地，以至施行总攻击时间错过，及南门外发火时瞬已天亮，遂使扒城不能奏效。

七、指挥不适当

一部指挥官陷于急进务胜之感情，而地形之顾虑不周，攻击点之选择不适宜，当不应攻击之地区（如正对城楼之大路）及时间（如不在夜间而在日间）而施行攻击，而应施行攻击之地区及时间反而错过。

以上诸项系略举其大者，至各部在战场上部分之缺点，应由各部自行召集军官会议讨论批评之，并具报本部为要。此令。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九日

---

[1] 原件在“不应”之后空缺六七个字。

[2] 原件在“正确”之后空缺四五个字。

整顿军风纪的训令[1]

（1930年3月21日）

为令遵事。照得本军在此工作，原为争取群众，训练本身，故于军纪风纪一层，自应严为遵守，岂容稍有松懈，致生不良影响于群众中，是以不嫌三令五申，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2]，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乐为。故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至于花街柳巷，尤禁荡检闲游，以免一染恶疾，则百般困难，既自戕其身体，复贻误于要公。况值此春初，百病丛发，各官兵人等，正宜多加谨慎调摄，以冀健康，方克肩兹革命之重任，安可自寻疾病，以误工作。为此，除另行令饬特务支队派出巡查外，特此恺切训诫，勿得故违，致于拿办。切切此令。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

[1] 这是1930年3月21日17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省南康县唐江镇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三号训令。

[2] 三条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大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是红军在1928年提出的。

关于官兵考绩的训令[1]

（1930年3月29日）

为令遵事。照得军官、军佐之任免升调的适当与否，直接影响于战事的胜败和工作的利钝，所以要有考绩调查，使上级指挥机关明了各级官佐工作状况，而施以指导、纠正和教育。况且红军在游击时期，其重要任务在打倒阶级敌人，武装工农，帮助地方建立政权，扩大赤色区域。为达到此种任务，所以在战时，要能使官兵一致，奋勇猛进，歼灭敌人，解除其武装而武装工农。在平时，则一面官兵须一致做宣传、发动和组织的工作，一面各级主管官须负责训练本部士兵。因此，在这种重大责任之下，红军官长的本身训练和训练士兵是很重要的工作。查现在我们军中官佐提升调动都只在经过战争牺牲之后，迫不及待地将将就就把一个人补上一个缺，或者在下层去提升，这样都是无计划的用人行政。至于教育方面，我们的红军不是行军作战，就是分兵工作——这自然是我们环境和任务所必需的。但因此却使军部没有方法去有系统地计划各纵队的士兵教育，这样士兵教育只有归各级（纵队、支队）主管官负责计划，而军部仅能给以方针的指示。所以官佐任用得适当不适当，就是说他们在战时指挥能力、平时管理方法、教育训练等等，尤其是游击时的群众工作，是不是适宜的，这都关系于红色战事和群众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五号训令。

作。至于士兵中，自然不少勇敢老成、素有作战经验的工农的革命分子，其能力可以充当官佐的，然而我们从没有考绩调查。对于官佐则无从有计划而适宜地调用，对于士兵也无从提升。教育计划，更付诸阙如。现在为了（1）使官佐之调用适宜，（2）能将士兵中勇敢进步比较有能力的提升任用，（3）使全军官兵的教育训练都能够在比较有计划的推动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决定如下的办法：

一、规定教育系统。以后士兵教育归纵队，军部只能给以教育方针的指示（但各纵队之教育计划及实施状况仍须随时报部核查），军官教育则归军部。

二、实行测验制。以后教育经常采用道尔顿测验制[1]，以促其进度之迅速。测验之办法如下：

测验之机关

（一）兵卒之测验归大队（由支队派员参加）。

（二）军士（班长、副班长）归支队（由纵队派员参加）。

（三）下级干部（中队副以上，大队长以下）归纵队（由军部酌派人员参加）。

（四）中级官佐（支队长、支队副、直属队队长、股长）归军部。

三、调制官兵考绩表（表式另列）。

（一）考绩表分三项

1. 调查。

2. 测验。

---

[1] 道尔顿测验制，是美国人帕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这种制度废除课堂讲授，强调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

3. 考绩。

（二）兵卒之考绩

1. 调查：姓名，年龄，入伍时间，战役及负伤次数（政治方面政治部规定）。

2. 测验：（1）学科——典、范、令、游击战术。（2）术科——操场、野外动作。

3. 考绩：个性，嗜好，能力（由各排长考查填报）。

（三）军士之考绩

1. 调查（同上）。

2. 测验（同上）。

3. 考绩：个性，嗜好，班之管理方法及战时统率平时助教之能力（由各大队长、大队副、政治委员考绩详定之）。

（四）干部之考绩

1. 调查：姓名，年龄，籍贯，奉任现职日期，未入红军前之经历，入红军后之经历，参加战役及负伤次数，曾受赏罚及有何特长。

2. 测验（政治另由政治部定之）：战术原则，射击学理，阵中要务。

3. 考绩：主张（是否合乎红军政策及遇临时事变有无主张），管理法，训练法，游击工作，指挥能力及果断，个性（对同事之关系情感），命令之执行，在士兵中之信仰。

（五）中级官佐之考绩

1. 调查：同干部。

2. 测验（政治由政治部另定之）：战术学，射击学，地形学，阵中要务。

3. 考绩：同干部。

四、各部处之教育。

（一）军需处：军需处对于各纵队经理人才，应每月出试题，举行道尔顿式之测验，并尽可能地与以工作之指示，并用开会方式教育他们。

（二）军医处：军医处则对于医官、看护士、看护兵、担架兵等，亦须有计划地施以普通医学、药物学与救护教育，并行测验。

（三）副官处：副官处对于各级副官之管理（对于马夫、火夫、公差等），须时常予以指示并开会讨论心得，纵队或支队副官应时常召集马夫、火夫、挑夫、公差等训话。

以上关于教育之方法，各部队务须切实执行，并且用军官会议或部务会议的形式去讨论执行的方法，把这种方法及意旨转达到下级去，这样才能使红军中军事技术进步。军事技术进步自然也更容易达到我们的政治任务。为了革命的工作，希望各部一律执行为要。此令。

附表如下[1]。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公历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1] 本文收入本书时，将表略去。

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1]

（1930年3月29日）

为令遵事。照得红军为工农革命之斗争工具，在此反动政局日益崩溃，革命潮流日形高涨之际，自应多征忠实勇敢之工农分子扩大红军，以资扑灭反动势力，获取最后胜利。惟近查各部队对征募新兵一项，只图征募小公差兵及任意增添挑夫，极少注意战斗兵之补充。更有收募五官不全、驼背、跛足及患肺痨、花柳病、盲肠炎、痔疮等症者，此殊不知五官不全、驼背、跛足者不特有关红军观瞻，实亦不合军人之资格。原因患目疾者不能瞄准射击，耳聋者不能分辨号令，鼻塌者多为梅毒遗传且易受传染病，口吃者不能担负军人之传达任务，至于身患肺痨、花柳病、盲肠炎、痔疮诸症，不但身体孱弱不能随军斗争，抑且有传染他人之危险。本长鉴于上述各项之非是用，特规定征募新兵及新兵入伍时应注意之事项如下：（一）征募新兵之资格：年龄须在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身长四尺二寸（裁尺）以上，体格强健，无恶疾及非五官不全者。（二）征募职权及检查手续：各大队皆可随时征募新兵，但必须经军医处或卫生队检查合格后始得补名。如分兵（指一支队分出）游击时，得由支队长、政治委员或支队副亲自检验，确与第一项资格相符合者始行补名。（三）新兵教育：教育以集中为原则，新兵多则在纵队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六号训令。

设新兵大队，少则在支队设新兵排。教育训练至相当时期及有相当程度时，始行补充入连。自训令后务仰转知所属，一体遵行。倘再玩忽乱收不符上述规定者，除否准其补名之伙食外，并处罚其主管长官，决不宽贷。切切此令。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公历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宣传员工作纲要*

（1930年4月26日）

第一条　每一宣传员须备一副写标语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颜料，根据本部规定各种标语，随时随地写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的墙壁上。

第二条　根据本部规定的标语本子，除每个都要在墙壁上书写外，字数较多的标语得用有色纸写好，张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

第三条　每到一城市，要用红布写上本部规定之主要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

第四条　在宣传队中，要经常指定专人背带所有宣传品及浆糊筒，将宣传品张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

第五条　每一宣传员无论在行军、驻军，均须携带宣传品，碰见群众即行有计划的散发。

第六条　在白色区域，群众受反动宣传恐慌逃避时，各宣传员要注意将宣传品适当地配置，让群众回来可以看见。例如将各种宣传品贴于通衢大道之中及学校、工厂、商店、兵房之内。

第七条　在宣传队中，择定善于词令的宣传员若干人，担任口头宣传，随时随地打着宣传旗及引动群众之工具，召集群众对之宣传，并在群众中找出比较接受宣传的分子，作个别谈话。如群众很

少时，即和他们作个别谈话。

第八条　在宣传队中，择定性近艺术、善于词令的宣传员，担任化装宣传，在有一天以上休息、群众较多的地方去工作，并设法召集群众大会。

第九条　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将每天调查所得的结果，报告调查统计股，做成总的统计。

第十条　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

第十一条　在打土豪时，须分派宣传员随保卫科出发作宣传，并帮助保卫科工作（如没收谷物分给贫农等）。

第十二条　在开群众大会时，须负责布置会场，召集群众维持会场秩序。在开会前后，深入群众中去宣传。

第十三条　在作战失利时，或敌军向我进攻因战略关系退却时，各宣传员须多写对敌方士兵宣传的口号及多散发对敌方士兵的宣传品。

第十四条　在作战时，每一宣传员须帮助抬扶负伤官兵，并雇请战地附近群众扛抬负伤官兵，引送至卫生队上药。

第十五条　在每一战斗结束时，每一宣传员须注意招待敌方官兵与之谈话，作个别的宣传。

第十六条　战事结束以后，应帮助雇请战地附近群众收埋死亡官兵。

第十七条　每个宣传员，于随时随地须注意维持军风纪。

第十八条　每个宣传员，每日工作结束后，须将本日工作情形报告队长，由队长汇报成书面报告交科长察阅。

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

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1]

（1930年4月）

为令遵事。我们红军作战既没有强盛的火力压倒敌人，又没有军用化学可以制胜，全凭着已腾沸的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用血去染成赤色区域。所以每次胜利全靠官兵奋勇猛进，以我们的勇敢骇倒敌人。然而，这样就要靠有强健的体力才能一天奔跑百多里路，抢十多个山头，作几场恶战。这样还是不够，我们还没有制弹厂，还没有固定的后方。子弹无多，就应该特别爱惜，射击精确才能杀伤更多的敌人。如果跑步前进而落伍了一大半，就失了团结而强固的冲力；快放齐放，打不到一个敌人，就不能摧毁敌人的战斗力而动摇他们的阵地，对于掩护冲锋更不发生威力。所以没有健强的体力，就有万分的革命精神和志愿也无从施用；没有良好的射击技术，就不能在战场上杀伤得多数敌人，而自己也就多受损失。因此，锻炼身体增进体力，熟习瞄准增进射击效能，是现在红军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现在规定各部早操时间废除跑步，或多操持枪体操，或徒手体操。在每星期的操课表中须另有体操时间。晚上游戏多做各种运动，如竞走、踢球、演习、叠罗汉……在休息时间比较长久的时候，可酌量设置简单器械——单杠架、吊绳、吊棍、秋千、吊环、爬城索……（此等器械都可以带走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八号训令。

的）施行器械体操和设备些障碍物，施行应用体操——就是做超越竞走。这些事情只要有一个星期以上休息的地方，有相当的地点时就可以举行，派兵士去做并没有困难，而且他们必定也很欢喜来干。另一方面，在学术科施行中都要特别注意射击教育，加多射击教育的时间，举行射击比赛。以后军部拟在每一个月至两个月之间，召集一次各纵队及军直属队的体力比赛和射击比赛，由各部挑选选手参加，分别给奖，以资鼓励（比赛办法临时再行拟定颁布）。现在各纵队和军直属队就要开始准备，要知道这是增进红军战斗力的唯一要件。望各部长官负责转达各兵佐一体知照，并督促执行为要。此令。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反对本本主义[1]

（1930年5月）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

[1]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2]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1]，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

[1] 参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　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

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1]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1] 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1]，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2]、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

---

[1]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2] 这里是指中农。

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

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1]，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

[1] 这里所说的山头指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平地指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向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进军，开辟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

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1]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七　调查的技术

（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

[1] 指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1929年初，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经把这些决议案汇集印成单行本，发给红军和地方的党组织。

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

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要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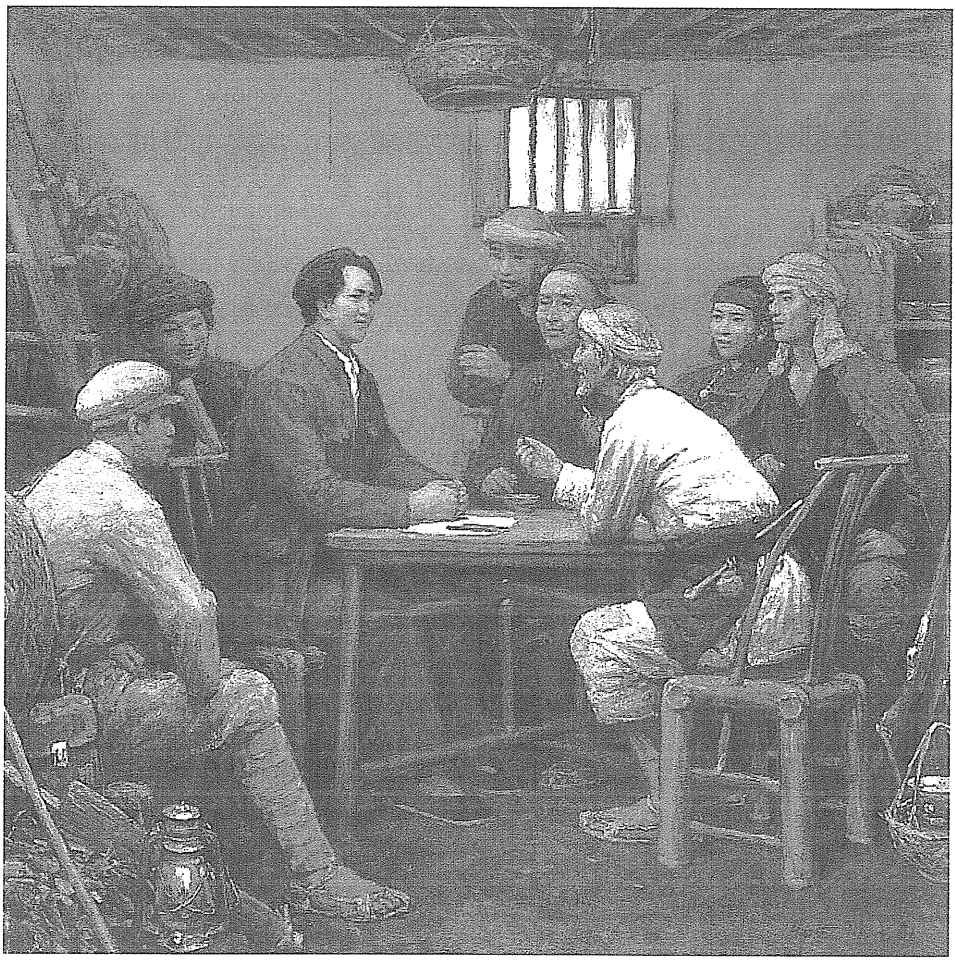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一文。图为《调查工作》的封面、目录和内容（部分）。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油画）

寻乌调查

（1930年5月）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1]。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2]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一九三〇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3]（二月

---

[1] 宁冈调查，是毛泽东在1927年11月做的。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1928年春做的。

[2] 蒋，指蒋介石。桂，指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1929年初，蒋介石派遣其驻江西的第一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派遣其驻湖南的第四集团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

[3] 陂头会议，又称二七会议，指1930年二月上旬，毛泽东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在土地问题上，否定了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主张，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

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1]（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2]职员，城区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3]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

---

[1] 汀州会议，又称南阳会议，指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会址先在福建长汀的南阳（现属上杭县），后移至汀州城。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会议除肯定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

[2] 县苏，县苏维埃政府的简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通称苏维埃政府。本书中的“区苏”“乡苏”“市苏”，分别为区、乡、市镇苏维埃政府的简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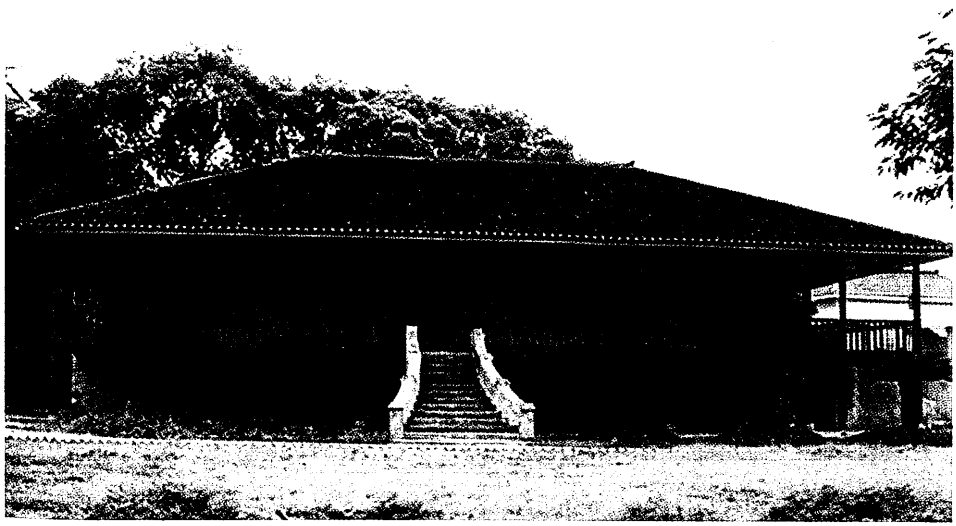
[3] 陈炯明，(1878—1933)，广东海丰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1925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赢（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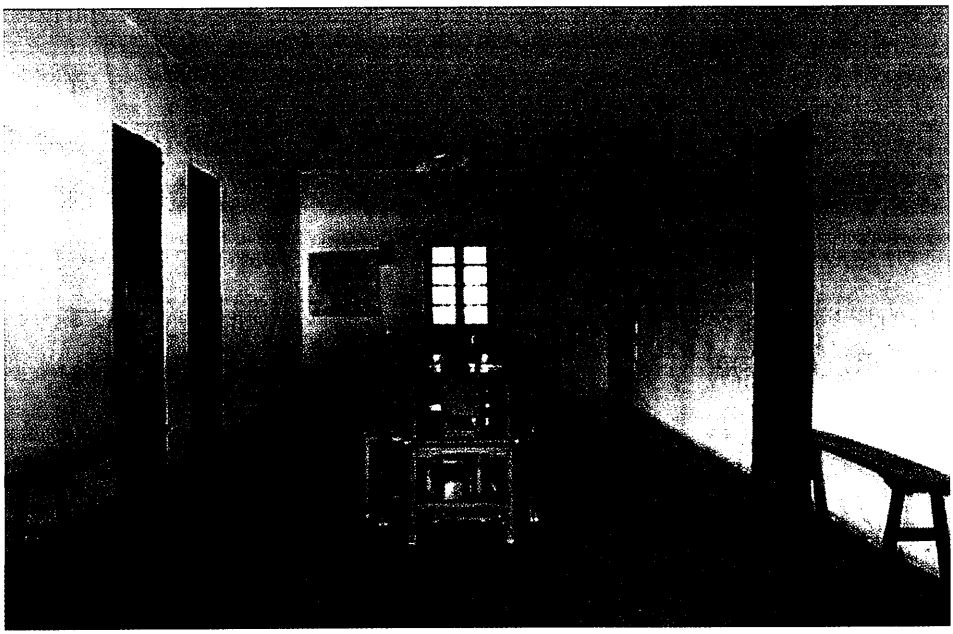
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宁都小布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城马蹄岗进行了寻乌调查。图为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时开调查会的旧址。



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时在寻乌县城马蹄岗开调查会的会场。

第一章　寻乌的政治区划

全县分为七区，七区之中包括四厢十二堡。

七区是：

城区：分东西南北四厢，为全县政治中心。

仁丰区[1]：即篁乡堡。公平圩、菖蒲圩（即篁乡圩）为本区两个政治中心，各设一个局。

双桥区：即双桥堡。内分十三段，以留车为政治中心。

南八区：分南桥、八富两堡，以牛斗光为政治中心。

兼三区：分项山、腰古、滋溪三堡，以吉潭为政治中心。

---

[1] 仁丰区，在1930年5月寻乌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曾改称篁乡区。

澄江区：分寻乌、大墩、桂岭三堡，以澄江圩为政治中心。

三水区：分三标、水源两堡，以三标圩为政治中心。

明万历前寻乌还未设县，万历以后才设县。没有设县的时候，一部分属江西的安远县管辖，设置石溪堡，其地域是现在的澄江、三水、仁丰、县城等区；一部分属广东平远县管辖，其地域是现在的双桥、南八、兼三等区。

第二章　寻乌的交通

一　水路

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源，经澄江、吉潭、石排下、车头、留车，流入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车三个圩场为最大，吉潭在三个圩中更首屈一指。

另由石排下可以通船到城区之河岭（城南十里）。

二　陆路

以石排下为中心，分为四条大路：一条经过吉潭（三十里）、澄江（六十里）、盘古隘，通筠门岭（一百一十里），为兴国、于都、会昌通广东的大路。一条经过县城（三十里）、三标（六十里）、太阳关，通安远城（一百四十里），为信丰、安远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珠村、牛斗光（二十里）到平远之八尺（四十五里），为会昌、安远两方通梅县的大路，即会昌、安远两条路均到石排下集中，共同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车头（二十里）、留车（三十五里）、荒塘肚（六十里）到兴宁之罗浮（九十五里）、罗冈（一百二十五里），往兴宁、五华，为寻乌下惠州的大路。

另有几条小些的路：一条从澄江通安远挖补界之罗塘（三十里），再由罗塘南往下坝，北往门岭。一条从吉潭经小田、船肚、书园往平远（六十里）。一条从县城经大炉下、滋溪、剑溪、礼峯、赖地往武平（一百八十里）。一条从县城经上坪通安远南乡之胡山（六十里），再由胡山北往安远城（六十里），西往太平（三十六里）、鹅公圩（六十里）。一条由县城到新圩（六十里），再由新圩经公平圩（三里）、两广亭（四十五里），往定南之鹅公圩（八十里），再南经鹅公圩，西往定南城，西经鹤子圩往信丰。由新圩经菖蒲（二十里）、隘排口往龙川城（二百四十里）。由菖蒲、隘排口通兴宁城（一百八十里）。以上各路比较小一点。

从寻乌城出发，往门岭九十里，往武平一百八十里，往梅县二百四十里，往兴宁二百四十里，往安远一百一十里，往龙川三百一十里，往定南（经上坪、胡山、太平、鹅公圩）一百六十里。

三　电报

过去电报局设在吉潭，民国十一年移到县城。电线由吉潭通寻乌城，通筠门岭，通平远。

四　邮政

县城是三等邮局。一路走吉潭、澄江通门岭。一路走牛斗光通八尺，再由八尺通梅县；另由八尺分一路通平远。一路走三标通安远。澄江、吉潭、牛斗光三处有“代办所”，三标、石排下二处有“代收所”。旧历二、五、八走门岭，一、三、五、七、九走八尺，二、四、六、八、十走安远。赣州的信走安远，送于都、兴国的信走门岭。县城邮局通常可以汇款二百元以内，五百元以内须先期交

涉，否则不能。前年三二五暴动[1]，抓了邮政局长，罚过五百元。此次新局长怕抓，先期跑了。三二五暴动还杀了一个电报局长。

五　陆路交通器具

和广东一样，不论什么道路一概没有车子。陆路运输工具大多数是活人的肩胛，其次是骡马。县城通梅县大路上骡马很多，县城通门岭、县城通吉潭两条路也有，此外没有。运输的骡马是骡多马少，但普通一概叫做“马子”。用马子驮的货物以盐豆两门为大宗。

第三章　寻乌的商业

本章目录

一　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二　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三　梅县到门岭的生意
四　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五　惠州来货
六　寻乌的出口货
七　寻乌的重要市场
八　寻乌城
（1）寻乌城是什么
（2）盐
（3）杂货

[1]　三二五暴动，指1928年3月25日寻乌党组织领导农民和青年学生举行的全县性革命暴动。

（4）油

（5）豆

（6）屠坊

（7）酒

（8）水货

（9）药材

（10）黄烟

（11）裁缝

（12）伞

（13）木器

（14）火店

（15）豆腐

（16）理发

（17）打铁

（18）爆竹

（19）打首饰

（20）打洋铁

（21）修钟表

（22）圩场生意

（23）娼妓

（24）同善社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调查》（油画）

一　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从石城、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几十万元。从兴国来的，茶油[1]为大宗，米也有（少）。于都、会昌没有什么货来。

澄江圩每圩从门岭来的油约有四船（门岭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装油十二担，每担约值小洋三十元，每年以百圩计算，约值十五万元。

石城、瑞金的米到门岭，大部分经罗塘、下坝（武平属，在三省交界）、新铺（蕉岭属，离梅县三十里）往梅县，每天有约三百担

[1]　茶油，也称木油，指用油茶树的果仁榨的油，可供食用。

过。米走寻乌通过往梅县的，很少。由寻乌通过的是油豆两大宗。豆子担数比油多一倍，每担有五斗的，有三斗的，不等。价值每斗小洋一元五毛。每圩（三天一圩）用船载的有五船，每船十四担，每担（以四斗计）值六元，每圩共值四百二十元，每年一百圩共值四万二千元。另还有肩挑，每圩有二十担，每年有二千八百担，共值一万六千八百元。两项共值五万八千八百元。

二　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鸡

这一条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鸡，次是牛，又次是猪。鸡的大部分是唐江、南康、信丰来的，安远也有一点，甚至有从遂川来的。走王母渡、金鸡圩、新田、版石，不入安远城，由安远城北五里地方通过，入寻乌下梅县。由梅县的鸡行装往松口，向汕头输出。鸡每天走寻乌通过的，安远来的是大宗，也还有小部分走门岭来。每天少也有一百担，多的到百三十担。每担六十斤，以每天百担计，六千斤。鸡贩子由唐江一带一直挑到梅县城或新铺圩（由寻乌走大柘去新铺下船，直往松口，不经梅县）发卖，每斤价五毛（寻乌鸡价每斤四毛）。每天六千斤，共值三千元。每年三百六十天，共值一百零八万元。梅县鸡行卖与松口，每斤价七毛以上，可谓大赚其钱。

牛

每月逢一是“牛岗”。十一月最旺，每岗七八百头牛。正、二月次之，每岗一二百头。三、四、五、六、七月最淡，每岗少的三五头，多的也不过十余头。八月初一这天为牛市“开岗”的日子，从这日起生意逐渐旺盛，每岗从四五十头到六七十头。九、十两月每

岗就有百把头了。

每年共有多少牛呢?

正、二月每月平均一百头，共二百头；

三月六十头；

四、五、六、七月没有市；

八月三岗，二百五十头；

九月同八月；

十月三百头；

十一月三岗，二千一百头；

十二月只有二岗，一百六十头；

全年三千三百二十头。

牛价平均每头值四十元，全年共值一十三万二千八百元。

牛也是如鸡一样，从唐江、信丰来的为大宗，安远也有一点点，寻乌本县没有。和鸡不同的是，鸡于寻乌只是经过，牛则在寻乌出卖。牛市在县城东门外河墈上，卖主是唐江、信丰、安远人，买主是梅县、武平、蕉岭、平远人，经纪（牙人）是寻乌人。不是经松口向汕头输出，大概是牛贩子们买了去转卖给人家耕田，或转卖给城市宰杀。牙人钱每只牛买卖双方各出半毛。牛税有承商包办，每年缴政府一千七百四十元。牛税从前每年“标”（即投标）一次，出钱多的得标，近改为三年一标。税到牛身上，黄牛每头四毛，水牛每头五毛，名之曰“饷”。抽过了税，在那只牛身上拍上个“饷”字的石灰印，买主就起牛跑。饷以外，还有捐，是近来附加的，每牛一毛。承商向政府出的税，连同他自己的赚项，年在二千元以上。以平均每牛抽税四毛半计，每年在寻乌城出卖的牛，当在四千五百头以上。上面说每年三千三百二十头，乃是最少量的估计。

猪

信丰来的最多，安远次之。走两条路来，一条从安远城，经寻乌城，走牛斗光、八尺去梅县，这一路最多；一条由安远南乡，走公平、新圩、留车、平远之中坑圩，往梅县，这一路较少。两条路全年有五千只猪通过。平均每只一百斤，每斤价四毛半（每只四十五元），五千只猪共值二十二万五千元。寻乌政府每只抽税二毛。

三　梅县到门岭的生意

大宗是洋货（牙粉、牙刷、电筒、胶底鞋、肥皂、洋伞、马灯、洋铁均大宗。其中如牙粉、牙刷等，本属中国制的多，但普通也叫洋货），海味（海带、海参、鱼肚、鱿鱼、淡菜、咸鱼等为大宗），盐（十年前惠盐多，三四年前潮盐多，这是因为商人包办路线不同的缘故。现在又是惠盐多，则因八尺、中坑等处反动派对红色区域封锁，阻塞了潮盐的路的缘故。盐到门岭后，一直通往兴国），洋油（亚细亚牌的多），布匹（梅县去的少，兴宁去的多，均买了洋纱自己造的。兴宁织造很发达。兴宁一般生意也比梅县大）洋纱（外国货）这五类。糖与面粉亦有好些。

梅县与门岭不通车，货大部分是肩挑，盐通通用马子驮，只有用船载至澄江起岸。面粉之一部也用马子驮。

门岭去梅县，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货回。

四　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货物种类与往门岭的同，但数量少于门岭，大概比例是门岭六

成，安、信四成，因门岭货物销到瑞金、石城、于都、兴国等广大地方，安远、信丰地域较狭之故。

五　惠州来货

只有盐一门是大宗。咸鱼、黄糖二样略有一点来寻乌卖。此外没有。

六　寻乌的出口货

上面说的都是进口货或通过货，这里要说寻乌县对外出口货。

第一是米。梅县一带很缺乏米，价比寻乌贵一倍，寻乌每年要供给它很多。澄江、三标、吉潭（项山的）、城区四个区域的米，从牛斗光经八尺、大柘，向梅县输出；龙图、腴田、留车、芳田、篁乡上半区一带的米，走中坑向梅县输出；大同、篁乡下半区、大田、蓝田、斗晏及龙川来的一部分，走岑峰经石正向梅县输出。三条路输出数量大略相等，每天共计输出米一百担，全年三万六千担，平均每担价八元，共二十八万八千元。

第二是茶。出于城区西厢之上、下坪，南厢之图合、冈上、鹅子湖一带。三、四、五、七、八月为采茶期。每圩约输出二十担（每担七十斤），每年百圩输出二千担，共一十四万斤，每斤价五毛，共值七万元。十分之八以上向兴宁输出，十分之二以下向梅县输出。采茶时兴宁客子到乡下，收买生叶自己制造。生叶中，“雨前茶”（谷雨以前的，又叫“头春茶”），一块钱八斤，每五斤生叶可以制出一斤茶。这种雨前茶价颇贵，要一块钱一斤。“二春”（三四

月的）和“秋子”（七八月的），每块钱能买生茶叶十五斤，制造出来每斤卖五毛。做茶生意的靠着二春和秋子赚钱，头春茶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十二月还能产出些茶，名叫“雪子”，和雨前茶一样的贵，同属上等人家吃的。出不多，客子们于它也赚不到什么钱。城区之外，双桥区之雁洋坪也出茶，虽很少（每年只值百多元），但很好，因为不是岭头种的，而是菜园子里种的。

第三是纸。出于篁乡，向兴宁（走罗浮、罗冈）、梅县（走中坑，也有走岑峰的）、龙川（走贝岭）三地输出。平均每圩六十担，全年一百圩，六千担，每担价八元，共四万八千元。

第四是木。产地是城区的西厢（上、下坪）、南厢（鹅子湖），南八区的河角圩一带，篁乡区的香山、高头一带，三水区的肖木坑、寨塘坑，兼三区的罗福嶂。除罗福嶂的向潮汕输出外，其余均向东江输出。但罗福嶂木头输出潮汕价钱很贵，输出东江的则价钱很贱，每年约值万余元。二十年前出产较大。

木头出口是龙川客子出本钱，本地木商作辅助。都上山去看完了，把山价（那山里许多木头中，讲定可以“倒”的那些木头的价钱）交与山主，由客子自己雇工倒下来，本地商人则为之照顾，使木头不被别人偷去。四五月是倒树最多的季节，六月以后，倒的渐少，九月以后便不再倒了。木一倒下就剥皮。剥了皮之后至少有两个月摆在地上，使它干起来。两个月后如果市价好，出卖有利，就扎排子下河，往往有搭架搭到三四年的。本地商人对于树贩（外地客子）是处在一种工人的地位，他们称树贩叫“老板”，而树贩称他们叫“排头”，利益的分配是老板九成，排头一成。

第五是香菇。主要产地是三标和安远交界之大湖峒、小湖峒、寨塘坑、上下坝，城区和安远交界之上、下坪一带山地，其次是双

桥区与平远交界之叶子峯。香菇每斤二元，每年约出一万元。安远出香菇比寻乌多，销往南雄，寻乌的销往兴宁。没有客子来收，是寻乌人贩了去卖。

第六是茶油。出在双桥的大同、斗晏、荒塘肚、蓝田、大田一带。年约一万五千斤，每百斤二十五元，共计三千七百五十元。从罗浮、岑峰两条路对兴宁、梅县两地输出。

总计寻乌六种出产（单说出口部分）价值如下：

1.米　二八八，〇〇〇元
2.茶　七〇，〇〇〇
3.纸　四八，〇〇〇
4.木　一〇，〇〇〇
5.香菇　一〇，〇〇〇
6.茶油　三，七五〇

} 四二九，七五〇元

七　寻乌的重要市场

吉潭第一，盐、米、油、豆是大宗。牛斗光第二，盐、米略小于吉潭，油、豆与吉潭等。留车第三，布匹是最大宗，由兴宁进口；油、豆次之。县城第四，牛行要算第一门生意；第二是油、盐、米行；第三算是布匹（从前赣州有布子来，民国十七年起没有了，因为它是土纱织的，“一股大，一股细”，被兴宁、梅县的洋纱布抢了生意去。兴宁、梅县的布很好，“一掌平”）。鸡生意虽大，但它只通过不归“行”，故不算。澄江第五，油、豆、盐在这里过驳，是大宗；米次之；鸦片亦是大宗，从兴宁、于都来。石排下第六，油、盐、米、豆的总口岸，但多属通过，只盐、米有些买卖。

鸡、猪、牛亦是通过。

此外，如岑峰（米）、公平（纸）、篁乡、三标等处，都属普通小圩场。

八　寻乌城

（1）寻乌城是什么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寻乌的许多市场中，由于机会的便利，特为把寻乌城这个市场拿了来观察一番。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城马蹄岗进行了“寻乌调查”。图为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

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是不胜今昔之感。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乌城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的篁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南半县的留车等地也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七八年前还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

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它约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坚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地热闹几小时，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资料吗？

下面是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

（2）盐

本城的一切货物，大都是销向城区的东西南北四厢和三水区的三标、水源两堡这个区域里的，别的地方很少到本城买东西。惟独盐是例外。盐的大部是销往安远、信丰，小部才销在城区、三标。又因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里生意的第一大宗。城内有五家盐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两万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万元生意。

盐分潮盐、惠盐。潮盐好，但贵，每元（小洋）买十斤到十一斤。潮盐色青黑，清洁能防腐。惠盐色白，但质差味淡，因之价也较贱，每元能买十六七斤。要是贪便宜的人才吃惠盐。寻乌的盐，历来是潮盐多，惠盐少。

开潮盐行的，本地籍二家（汇通、新发昌），平远籍一家（韩祥盛），万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与本地合开一家（万丰兴）。汇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去年因做纸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现只存千元左右了。以上两家都开了二十多年了。第三家要算韩祥盛，本约七百元，开了十几年。第四家万丰兴，两百块钱进店，开了四年，现有本四五百元了。第五是新发

昌，开了十多年，拉拉扯扯不上一百元本。

汇通店主钟周瑞是个地主（开盐行的只有他是地主）。店子开在东门城内，家住在南门城外。有二百二十石谷田，每年收获两季，每季出谷二百二十担，一季完全交租，一季农民得着。他家里有个老婆，三个奶子（儿子），三个新妇（媳妇），一个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着她老板娘把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连他自己，共九个人吃饭。没有雇店员。他自己指挥他的奶子、新妇做事。这是城里第一个“资本家”。

韩祥盛，平远八尺人，自己两公婆，一个奶子，三个人吃饭。没有请店工。每年能赚些钱。

新发昌，主人叫邝明奎，车头人，是个前清的文秀才。他开了十多年店，几十块钱做生意，两公婆又一儿子吃饭。因他办事公平，做了两次商会长，前清一届做两年，去年到现在又是他，六十几岁的白头老人家。

（3）杂货

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志成（兴宁人）、纶泰兴（吉安人）、义泰兴（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义成、潘月利、王润祥、潘登记、祥兴、永源金（以上六家均兴宁人）、均益（挑担子出身，本地人）、骆晋丰（本地人，杂货商人中只有他是个地主，收租三百担）、范顺昌（福建人）、黄裕丰（福建人）这十三家，就是大一点的杂货店。其中黄裕丰以黄烟、纸张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布匹为主要生意。次于布匹就是洋货生意。这个小小市场竟什么洋货也有卖，略举之有一百三十一种：

牙粉　牙刷　胶底鞋

皮鞋　套鞋　运动鞋

拖鞋　铅笔　钢笔（自来水笔）

粉笔　天然墨　毛笔

墨盘（砚池）　墨湖（墨盒）　笔套

笔架　浆糊　练习本

印色　原纸　油墨

教科书（没有单独的书店，附在杂货店卖）

字画　小手巾　肥皂

香碱　花露水　花露精

毛面巾　洋袜子　洋瓷面盆

洋瓷碗　洋瓷水角（把碗）　生发油

生发膏　手袜子（手套）　胭脂

围巾　大小梳子　水粉

雪花膏　电筒　电土（电油[1]）

洋火　香烟（有金字、中国、三炮台、哈德门、扇美各种，以金字、中国两种销得较多）

麻姑烟　烟嘴　洋遮（洋伞）

草帽　礼帽　洋瓷茶杯

文明帽　洋毡　棉毯

球被（毛毯子）　绒线帽（小儿用）　夜帽

木棉枕　皮枕　中山扣

白骨扣　乌骨扣　海螺扣

阴阳扣　宽紧带　吊带

---

[1] 当地称电池为电油。

丝裤带　洋裤带　爽身粉

汗衫　扇子（乌纸扇、白纸扇）

钟　表　叫人钟

信纸　信封　日记册

镜子　眼镜　洋刀子

儿童玩具（小洋枪、火车、不倒翁、人公子、小皮球、哨子，此外还有很多）

德国响刀　安全刀　挥剪　毛剪（以上四种均剃头用）　皮夹子（皮箱子）　藤夹子（藤箱子）　洋靛（蓝的）　染布用颜料（洋红、乌粉、灰粉、品洋）

铜锁　铜番锁　铁锁

铁番锁　铜帐勾　骨帐勾

洋油　马灯　禾灯（即草灯）

宝盖灯　洋瓷桌灯　莲花宝盖灯

三练洋灯　四方带灯　六角带灯

圆火带　扁火带（以上两种均点灯用）

骨筷　漆筷　算盘

水烟筒　杆子烟筒　洋钉

铜煲（烧茶用）　轻铁锅子　轻铁盘子

轻铁调羹　明瓦　各种瓷器

骨牌　麻雀牌　枣子

泡圆　各种罐头（牛肉、杂菜、鸭肉、冬笋、批把、沙梨、荔枝、龙眼、菠萝、牛奶）

对联　洋蜡烛　白洋蜡

葡萄干　洋线　铅线

铁线　墨水

以上一百三十一种，商人都叫作“洋货”，在杂货店里出卖。其中打横画的二十三种是销数较多的，没有打横画的各种销数都少。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是从梅县及兴宁来的，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只有洋袜子、围巾等织造品大部分是从兴宁来的。明瓦、对联二种完全从赣州来。皮枕、信纸、信封、铜煲、洋油、扇子、水烟筒、毛笔八种，梅县、赣州两处都有来。皮枕、信纸、信封、瓷器、扇子、水烟筒，赣州货不但占多数，而且比较好。信纸、信封，赣州的是本国纸制的，梅县的是用洋纸制的。洋油、纸烟则广东来多，赣州来少。纸烟是梅县、兴宁、赣州三处来。毛笔亦赣州来多，梅县的只有很少一点。

为杂货店里的次要生意的洋货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说杂货店里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红、绿、柳条各种），竹布（蓝、白、灰、乌、红、光、青、印花各种），竹纱（白、灰、乌、蓝、柳条、靛各种），绸缎（各种华丝葛、各种纺绸、薯莨绸、香云纱），呢绒（厚呢、粗呢、镜面呢），夏布（白、蓝、乌、机白、波心各种）。土布是中国人用洋纱制造，从兴宁来。竹布、竹纱都叫洋布，从香港走梅县来。绸缎中华丝葛、纺绸从杭州走赣州、梅县两路来，寻乌女人买来织头帕，这种头帕每个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约值十万元，销地是城区和三标。

杂货店里除布匹、洋货二个大宗外，还附带出卖黄烟、糕饼和香纸蜡烛，也有搭卖零油零盐的。

城内杂货生意，前清时候每年总计十五万元上下，现今十二万元上下。十二万元的分配是：布匹八万余元（土布七万元，洋布一

万元，呢绒二千元，夏布千余元），洋货二万元（每家多的千一二百元，少的二三百元），此外黄烟一万元上下，糕饼四百元上下（只有两家附带卖糕饼），香纸爆竹五百元上下（附带卖香纸的二家，卖爆竹的十三家）。

还待举出几家杂货店，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情况。

最大的杂货店，店主陈志成，兴宁人，在县城、吉潭、澄江各开一间店。县城这一间本钱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来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钱、伙食等项开销，每年以赚得利息为止。陈本人又嫖又赌。

第二家要算纶泰兴，三个份子合成，本钱二千元。除了开销，每年赚得三四百元。

第三家算义泰兴，三个份子，吊多钱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赚得一二百元。

第四家，罗义成，一人开，千多元本，每年能赚四五百元。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1]敲一块小糖（现在敲一块糖子起码要一块铜片[2]了），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头、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

郭怡和是本钱最小的杂货店，百多块钱本，卖些黄烟、纸媚、蛋、自来火、带子、红索子（红绳子）、丝线、综条（镶鞋口用）、笔墨、毛巾、洋纱巾、骨扣等等东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参加我们

[1] 明钱，即铜钱。

[2] 铜片和本文中的“铜板”“铜壳子”，都指铜元。

这个调查会的）和他一个老婆，每年穿衣吃饭缴费百多元，生意赚项仅敷了它。他是万安人，十二岁到寻乌，现在五十九岁了。他未来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寻乌做了六十年生意，连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历来做的是杂货布匹。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时，有本三千元，从外边缴（商家赊借货物叫做“缴”）到五六千元，自己缴给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时虽只三千元本，却做得二万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寻乌城里第一家大商店。现在是往留车、八尺、牛斗光、车头等处去买货，那时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却都要到寻乌城中他的店里来买货。因为那时货物来源主要是赣州（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吉安亦有来往（紫花布与丝线）。那时向赣州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钱，货就可拿得动。现在不行了。这种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缴不动了。不独赣州，梅县、兴宁也缴不动了。这是一种经济的大变化。就是从前年（一九二八）起，“世界不好”。商家的货缴与农民，农民受了重租重利剥削，本来就是穷的，加以前年蝗虫吃了禾，同时又遭旱灾，农民还不起本城商家的账，因此本城商家也还不起梅县、兴宁商家的账，梅县、兴宁商家都不放心缴给人家了。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许多别的店子。随即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六千九百多元东西）。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现时这个样子。郭做过两任商会长——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

这里还要说到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杂货店的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

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帮工一年将要过去的时候，能干的，老板继续留他做；不能干的，老板便辞歇他，老板对他说："我的店里不需要这么多人做了，明年你要另找生意。"他斟到了一个新的店家，他的地位越发高了一些，衣服也穿得越发好了一些，薪俸（不叫工钱）也逐年加多起来。他的社会名称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他在帮做的那一年中，老板给他的薪俸不是取讲定数目的形式，也没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板要给他做各色冬夏衣服。再则他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做得好，店里长钱，他的薪俸便逐年增加。光绪年间生意好时，先生的薪俸最高有到一百二十元的，但现在因为生意零落，最高薪俸不过八十元了。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自己回到家里去住也是有的；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像郭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万安去住家，把生意交给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靠不住的先生，是不能把生意交给他做的，因为他讲嫖赌、"打斧头""打雷公"（"打斧头""打雷公"，都谓"吃油饼"[1]）。

---

[1] "吃油饼"，这里指明吃暗拿占便宜的行为。

（4）油

油是本城第三门生意，从门岭、安远两方面来，销在城区及篁乡，三标也有点把子（点把子即一点子）。只一家油行，刘福兴，一百大洋领了一张“帖”，就算本钱。代客买卖，经过一担油收行佣两毛子。十一二月是顶大门生意，每个大圩（逢一为大圩）有一百担，两个月六百担；小圩（逢四、七）三几十担，两个月四百担。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过三几担，通共不过三百担。全年约一千三百担，抽行佣约二百六十元。因为他领了帖，由他卖独家，什么人都只能从他那里买油。帖从南昌省政府领来，要县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领帖钱，才有帖子发下来。一百块领帖费之外，还要五块钱手续费。一张帖八年有效，过了八年成为废纸，又要领过新帖。要领帖的不止油行，还有盐行、豆行和牛行。

（5）豆

也只一个行，没有店，城隍庙公地上买卖。何子贞是个公安局长，近来做警察队长，寻乌的反动首领。他在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顶大门，两个月有八百担。全年约共一千担，一担（一担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佣两升，每担豆价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约计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何子贞是本城人，住在东门外，小时很苦，平远中学毕业，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回来当小学教师，当了八九年，古柏、潘丽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六年清党前后，古、潘等领导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贞领导的“新寻派”发生冲突。民国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国十七年，三二五暴动把何子贞赶跑。四月，何子贞恢复势力，大出头，大罚革命派的款子，后来又做公安局长、警察队长，渐渐发了些财，在近郊买了田地。他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即没有与

合作社派冲突以前，是代表商业资本势力的，起始组织“留粤学友会”，开办平民义学，时在民国十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县城开大会，革命派势力长起来，何便与封建豪绅妥协，并且取得了对封建派的领导地位，成为寻乌最恶劣的反动首领。这次红军到寻乌，他才率领警察队（靖卫团[1]）逃往项山。

（6）屠坊

只有三个案，摆在街边，没有屠店。三个案是刘奀二、陈老二、刘世渭。刘奀二从前有百把元本，现在了了（了了即没有了）。陈老二、刘世渭也完全没有本钱，因为买猪不必要现钱，猪杀了后收了钱再付猪价，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拿现时说，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分，全年可赚二千一百六十元，是个不恶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为三家包缴屠宰税，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红军入城后，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销路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肉价，红军未来前每斤三毛二，现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陈贵和、高元利、元利栈、周裕昌、刘双盛、凌文盛、彭同孚这七家是较大的酒店，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人）、刘双盛（本地人）、陈贵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钱都不出百元。凌文盛（本地人）、元利栈（吉安人）、彭

[1] 靖卫团，又称靖卫队，是一种反动的地方武装。

同孚每家不过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卖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为色黄，也叫黄酒。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一般喜欢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坏人，又较便宜的原故。分为“双酒”“单酒”（只城里这样称呼，乡下不说“双”“单”而说“好”“淡”），双酒酒娘多。卖酒以壶算不以斤算。双酒十八个铜板一壶，是黄酒中最好的，普通人家请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们每餐喝一点，他就不吃饭也做得。单酒十个铜板一壶，口渴了，贫民买了当茶吃。双酒生意比单酒大。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三家均本城人，本钱都不过十把块钱，卖的都是白酒。还有周裕昌卖的也有白酒。这种酒用黏米做，味较黄酒烈，出卖不讲壶，零卖两个铜板一杯，趸卖一毛六分一斤。白酒生意比黄酒少，黄酒约九成，白酒约一成。不论黄白，凡属做酒生意，他的目的并不全在酒，拿了酒糟供猪（喂猪），是他更重要的目的。自己的猪吃不完，拿了发卖，两个铜板一小碗。黄酒店最好的时节（三月至八月口渴时节）每店每天能卖五块钱，平常时节（九月至二月）每天能卖两块钱。黄酒店每家每年可做一千零二十元生意，七家共计七千多块钱生意。白酒店热季半年，每天每家收一块钱，凉季半年，每天只得五毛子，每家全年二百七十元，四家共只有一千元上下。

酒税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约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8）水货

水货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呀，“山珍海错”就是它们的标语。水货商人的荣枯得失，亦是颇饶兴味的。下面先举出各样的品类，次观察他们的得失。

咸鱼　第一大门。桂花鱼、青鳞子、海乌头、海鲈、剥皮鱼、

石头鱼、金瓜子、黄鱼、金线鱼、圆鲫子、大眼鲢、拿尾子（身大尾小）、鞋底鱼（即“并背罗食使”，只有一侧有眼睛，要两鱼并走才能觅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谓之“并背罗食使”，就是拿了这种鱼做比喻的）、角鱼子（头上有两个角），都是咸鱼类，一概从潮汕来。

海带　第二大门。有青带、海带两种。青带亦名赣带，最好，赣州来。海带少于青带，货较次，价钱较贱，梅县来。年销千多斤，两毛子一斤。

糖　也是水货店里出卖，第三大门。分为白糖、黄糖、冰糖、橘饼各种。白糖中有雪粉，看是好看，不甜，梅县来；有粗白，很甜，惠州来；有糜白，中庄货，惠州来。三种都是洋糖，一毛七八一斤。黄糖中有芋头糖，一团一团的，梅县来；有片糖，一片一片的，最好，惠州来；有散沙糖，掺有沙子，最差，惠州来。过去是黄糖便宜白糖贵，现在是黄糖贵白糖便宜。黄糖过去不过一毛六子一斤，现在涨到二毛四五了。过去白糖二毛六七子一斤，现在跌到一毛七八了。黄糖都是土糖，白糖都是洋糖。本城白糖每年销千多斤，黄糖销六七千斤（只冬季有来）。因为黄糖更甜，所以比白糖销得多。冰糖从梅县来，年仅销几十斤，两毛多子一斤，属洋糖。橘饼，梅县来，年销二三十斤，三毛子一斤。

以上各种糖中，以片糖销数为最大门，因为做米果要用它，过年时候不论城、乡、贫、富，家家都要做米果。

豆粉　第四大门。筠门岭来的多，他县来的也有。番薯做的，还是粉，没有成条子，做肉丸等用。年销几千斤，一毛五六子一斤。

猪皮　第五大门。普通席面用碗猪皮做假鱼肚。梅县来。年销千把斤，一毛子三两，每斤五毛半。

闽笋　从梅县、安远两条路来，“闽笋”是个名而已。第六大门。不但酒席用它，普通亦作粗菜吃，特别是割禾莳田时候。寻乌自己本有些笋子，三四月间农民挑了卖到梅县去，七八月后寻乌人要用，又零零碎碎从梅县买了来。年销五六百斤，二毛三四一斤。

鱿鱼　办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门。梅县来。年用三五百斤，每斤七八毛。

豆豉　年销三千斤内外，一毛四子一斤。寻乌人也会做，做了熬酱油，没出卖的。差不多家家要吃，放点油到里面蒸一碗吃得几餐，人家省吃省用，往往这样做。

面灰　即面粉，梅县来，洋面粉多。做包子，做饺子，做面条，做糕饼，都要用它。尤其是糕饼用面最多：蛋饼、提糖饼、冇饼（“冇”，当地读胖，意曰里面是空的）、五仁饼、猪油饼都是面做的。两毛子一斤，年用百包上下。

洋蜡　一块一块的白东西。二毛五六一斤，每年销四五百斤。

玉粉　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条子。梅县方面来。普通人都吃它。一毛子半斤左右，年销六七百斤。

以上十一门是比较用得多的，以下各门都用得少。

盖市　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请上客才用它。梅县来。用得不多，每年三两百块钱生意。普通的鱿鱼叫“洋鱿鱼”。

菜莆　就是芜菁，和萝卜相像，腌了的。走信丰来。每年销得三两百斤，端午过了才有卖，八月一过就没有来了。两毛子一斤，比西粉贵一点。

鱼翅　四毛子一两，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参　每年用三两百斤，比鱼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鱼肚　用三两百斤，价和海参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参必定

要用鱼肚，便不用假鱼肚的猪皮了。

墨鱼　只用四五十斤，每斤价七八毛，同鱿鱼差不多。

珧柱　销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贡鱼干　仅销十斤八斤，每斤价二毛。过去可销七八十斤。

大虾　销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虾并不是很大的虾，它的名字又叫“虾米”，不比“潮虾”有四两一个的。

虾壳　极小的虾子压扁起来好像虾皮一样，叫做虾壳。销得百多斤。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把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镶豆腐。虾壳价每斤一毛多。

蜇皮　三毛子一斤，销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　大的叫做“蚝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销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没有卖。

天青鲔　一种海鱼，大的有扇子大一个。本城少卖。

以上盖市到天青鲔各种都是海菜，从潮汕来。

金针菜　即黄花，两毛子一斤，年销四五十斤。

云耳　销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绪年间每斤不过五毛子，涨了一个对倍。梅县来。

香菇　销百把斤。冬菇较好，两块零钱一斤。春菇较坏，一块二三毛一斤。本地出产。

冬菜　白菜制成罐头，过去走天津来，近来梅县也可以造了。销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　豆腐皮卷成条子，两毛多钱一斤，销四五十斤。兴宁来。

豆腐霉　即腐乳，梅县来。豆腐浆、芋子、面粉三样东西做成，与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

胡椒　白胡椒，销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四毛钱一斤，贵了两倍。乌胡椒，销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两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国来的。

榄豉　把生橄榄煮熟，去核发霉，即成榄豉，寻乌叫榄角，梅县叫榄豉。每年只销得十多斤，每斤价二毛多。

酱油　本地做的也有，门岭来的也有。小黄豆子蒸熟，晒得半干，摊开使它上霉，再拿了去煮。煮出来的水加进香料和盐，就成酱油；煮后的豆子就成豆豉，但这种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没有滤去酱油的豆子。豆豉和酱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较大。豆豉每月销得二三百斤，年销三千多斤，每斤价一毛四。酱油每年销三几百斤，每斤价一毛半。

柿花　年销百把块钱，小的三个铜板一个，大的一毛子两个。

红枣黑枣　两样年销百零斤，黑枣四毛子一斤，红枣两毛子一斤。

龙眼　一年只销十把二十斤。有壳的三毛多子一斤。无壳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药店里才有。

荔枝　很少有卖。价和龙眼略同。

杨桃干　销得几十斤，四毛子一斤。

从柿花到杨桃干各种均从梅县来。

瓜仁　就是瓜子，信丰、门岭都有来，三毛零子一斤，销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种都是水货店的生意。此外，水货店还附带卖洋油和茶油。

水货店中的盛衰兴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

均益七家，是水货生意中大一点的。此外，还有卖水货的小摊子若干家。其中，顺昌老店和张均益是杂货店兼做水货。

顺昌兴记是顺昌老店的分支，水货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块本钱，每年向梅县缴得动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饭，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卢权利，算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除水货外，还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各样，运往兴、梅做“行岗生意”，他做的水货生意不如兴记，这一宗却是兴记所没有的。他也能在梅县缴得些些动，因为他是梅县人，生意颇红，缴千把八百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两公婆，请了两个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每年至少赚两三百元，财气好的年头，千把八百也要赚。

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用度呢，生意赚了钱来开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储蓄起来，算水货店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成立，把他的田没收了一部分，不待说心里是呕气的。他小时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

顺昌老店主人范兴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个人，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货生意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来败下来，土地分散，范兴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担谷子的田了。现在苏维埃分田，他家还能分一点进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却能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没有做生意。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苏维埃分田有

点分进去。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同样的。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经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那时候（民国十年以前），寻乌的城东小学（一些地主凑股子办的，五块钱一股）是个有名的“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无出息的，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张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什么叫做骗祖宗呢？第一是刚毕业的时候，祠堂里头照例赏给毕业生一些钱，叫做“抢花红”；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举人有功名的平分学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毕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爷们竟有六七十个进了这个毕业公司。他们毕业后，在他们的大小公堂中，除开抢花红得谷子外，单分胙肉一门，每年得一百斤。

骆接赐，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个人吃饭，没有请先生，蒸烧酒，卖水货，除开销外，能赚一头二百块钱（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从前好嫖，讨了个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块钱讨来的），老实勤快，酒糟又可供猪，所以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担谷田。

张均益，做水货又做杂货，一头二百元本，其余是借来的。没有请先生，指挥他的儿子做生意，每年颇有些赚头。他是本地人，

五六年前是个挑夫，帮寻乌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县，从梅县挑了布子及咸鱼回到寻乌。他自己挑东西，同时又当夫头。这种夫头的职务是能够赚钱的。寻乌商人拿了钱给他去办货，寻乌城的老板和梅县的老板两头都给酒钱与他，因此他就慢慢地发起财来。

摆摊子的水货生意，每家不过几十元本，多的不过一百元，他们的货是从本城大水货店和过往小贩那里买来。这种摆摊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发起财来。本城由摆摊子起家开店的有许多家，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都是。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来。

（9）药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三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

[1] "奴古"，客家话，指男奴仆。

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1]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10）黄烟

城里有两家制造黄烟的店子。一家叫黄裕丰，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卖纸张杂货，赚了万多块钱，拿回上杭买了田，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号，也是自己制黄烟，安远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开张。

---

[1] 赖世璜（1889—1927），江西石城人，曾任粤军第七军第一师师长、赣军第四师师长、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等职。

黄裕丰请了两个工人，一个刨烟，一个打包。涌泉号请了一个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饭，这一点与杂货药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则平日有吃，因此没有特别的打牙祭。吃饭也有些不同，先生经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则人少时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几个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唤工人，唤做“师父”。

杂货店、水货店的黄烟，多是从这种制黄烟的店子里买去的。

（11）裁缝

共有用机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刘芹英、黄嫂子、廖接芳、刘森河、刘师父、谢神保、范癞子、谢其龙、何祥古、谢师父、黄老五、黄上先都是用机器的，每家一架“车子”（即缝纫机）。每家的老板都同时是工人。每人带个徒弟，缝下子边，打下子扣绊。这种裁缝店的资本，就是买一架机器的本钱。机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别人用旧了的）。民国九年以前，寻乌没有缝纫机，一概手工做。民国九年有个兴宁人何师父，第一次弄来一架机器开店。他原先是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因他“剪刀很利”（寻乌人说裁缝偷布，不说他偷布，而说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带着车子回兴宁去了。前年（一九二八）还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内有几架是买了别人的旧车子。其中黄老五手艺顶好，生意顶大，勾结官厅及豪绅，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赚钱买了田地。三二五暴动，他即表现反动，这次革命势力进城，他就跟反动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样，民国九年何师父创用机器，兴“上海装”（破胸、圆角、打边）。民国十二年，上海装不要了，行一种破胸、方角、大边装。去年起行“广州装”（七扣四

袋而身很长），一小部分人喜欢穿这一种，但多数人还是大边装。从来的衣，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从兴新学起，开始有破胸新装，到了民国七八年，新装渐渐多起来。但直到去年，拿全县人口说，还是旧装的多，新装的少。近两年来，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新装日渐加多，特别以青年为普遍。青年学生，不待说老早是新装，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大多数也是新装了，除非是很穷无钱做衣服的才仍然是旧装。在青年群众中，特别是鞋子起了个显著的变化。去年夏季，南半县抗租得了胜利，冬季又分了田，农村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胶底鞋和运动鞋来（这种鞋的底是从广州运到兴宁，兴宁做成鞋子，每双十毛左右）。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们还要佩个电筒，系条围巾，有些还要穿薄毛羽的夹褂子裤。

城里手工缝衣店至今还剩三家。

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手工做一件的时间，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价的比较：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机器做六毛。货色的比较：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

全县重要圩场吉潭、澄江、石排下、车头、牛斗光、留车、篁乡（采用机器比任何一处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处，都有缝纫机，因此全县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废除手工、采用机器做衣了，特别寻乌的南半县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

（12）伞

彭万合、李祥仁两家造纸伞。彭万合是武平人，在寻乌城开伞店，开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来寻乌时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伞逐渐赚了钱，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动前，连田产共有千多两千块钱资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的父亲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寻乌南

门外田背地方买了六十担谷田，起了一栋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内做伞生意。田背的田租给农民耕种，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个兄弟，死了四个，还有三个兄弟，六个儿子、侄子，一个母亲，三个妇人，五个媳妇，共十八个人吃饭。儿子在初等学堂读书。他们三兄弟中，他是做伞的，三十岁了。请了两个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岁，曾在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读过二十几天书，就碰着三二五暴动，反动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没收他田背的家产，烧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东学校毕业，不过老三读的是在“毕业公司”时代的城东学校，老七时城东学校却已经是改造过的，即革命的中山学校派办理的时候了。因此老七于城东学校毕业后，也就进了中山学校，加入“暴徒”队伍里。老三自城东毕业后，就在武平当小学教员，现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现在只有四五十元资本了。他父亲彭盛祥时代（光绪年间）纸伞还很盛行，那时候社会用的伞有了三成洋伞，还有七成是用纸伞。民国到今，恰好斟了一个方向：洋伞占去七成，纸伞只有三成。不论城乡，不论工农商学，凡属“后生家”和“嫩妇女子”，差不多一概打着洋伞了。洋伞是从梅县和兴宁来，因此彭盛祥时代南半县的留车、牛斗光要到县城彭店来买纸伞，现在却通通往梅县、兴宁买洋伞去了。从前彭万合每年要造出三千把纸伞发卖，现在每年不过只造得千二三百把了。从前（光绪年间）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两个人了。伞价从前每把二毛五，于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个南康老表，四十多岁，伞工出身，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四五十元本，每年出伞二千左右，请了两个工，一个削骨子，一个褙纸，他自己上油。

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中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中国人把它绷起来，加上一个伞把子。羽绸伞每把价一块大几（谓一块五毛以上），洋布伞每把一块二三。纸伞、洋布伞、羽绸伞的销行比例是：纸伞、洋布伞各百分之三十，羽绸伞百分之四十。

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学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13）木器

从前只有一家，胡东林，赣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开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种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盘、招牌、匾额（酬神、祝寿、颂德等用）、对联、书箱、衣箱、壁橱，学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礼用的扛盒和撑格，等等。

木器店算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销在城区，而且销往各区各县。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给工农贫民，而是供给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工农贫民要不了，除非为了嫁女才向他买些小衣箱、小柜子之类。他家很苦，在赣州。二十年前他从赣州来寻乌帮人家做木工，积了点子钱开个小木店，慢慢发展，盛时请过四五个工，赚了千把块钱，付了一半去赣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个工人，他自己做，儿子帮一点，仅仅敷口。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县没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响。地主阶级和

其他有钱人也不做寿了，也不做热闹喜事了，酬神和歌颂功德也停止了，学校也大半关门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败下来呢？

他的木器的样式，凡供给封建地主的一概是旧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进步样范的，那就是学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师有来往。南门外福音堂和教会医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亲戚薛某，去年邀了十个人打了一个“月月标”的会，每人五块钱，共五十元起本，开个小小木货店在城隍庙侧边，不请工，两父子做，一年蚀了本，奄奄无生气了。

工农贫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场上供给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脚盆呀，饭甑呀，饭盆呀，饭勺呀，水勺呀，锅盖呀，倾盆呀（覆菜碗、覆锅头的盆子），砧头呀，菜板呀（切菜用，圆的叫砧头，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篮呀（盛了割下来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砻盘呀（推子），楼梯呀，等等东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圆木的”匠人们挑了来卖。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东西，是依了时节和需要而向圩场上供给的。砻盘一种要定做。风车要上杭师父才能造。全县有十来个上杭师父，每年由上杭来一二次。水车一门，本县农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县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着水车这种东西。

南门外还有两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贫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资本家乃至稍微有几个钱的佃农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请木匠做棺材。只有极穷人家，或是“抖紧”时候（急用时候），才会买这种火料子。失了东西或被人损坏了东西的人，常常是这样破口大骂：“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

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爱割”的“割”，消灭的意思。）这就是形容火料子这种棺材是不名誉的人才用它的。有钱人家自己请木匠做棺材，这种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风车的师父们，他们兼着造棺材。

（14）火店

有刘万利、合昌隆、刘鸿兴、温得利、潘发利、潘金利、汤日恒、同来安、曾记涛、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刘奚二（兼卖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担子的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卖牛的，背包袱子的（背着包袱子向着别地找生活去），四乡到城里来打官司的，往赣州读书的，变把戏的，卖膏药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缘的，行医的，看风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莲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担子客人中，大多数是鸡鸭客子，少数是挑烟皮客子（烟皮即烟叶）。

开火店不要多的资本，只须几条旧被窝，几床粗席子，买点米买点柴火，就可开张。店屋租钱要在几个月后才交付。

开火店赚钱，靠赚那些撑伞子的和穿长衫子的。他们来了，把点好东西给他们吃，把点好床铺给他们睡，要走了给他们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担子的及其他穷人来了，火钱（即歇钱）饭钱都要轻些。吃饭照碗数算，比长衫客子照餐数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会吃的一碗又一个零碗就够，不会吃的半碗也够）。吃酒的一壶水酒等于一碗饭价。火钱每夜三个铜壳子（即铜板），因为要点一盏灯火，还要烧水洗身，故要火钱。冷天盖被窝，另拿被窝钱，每人两个铜壳子。火店卖酒饭的利润，每十毛本赚四毛。真的讲起来，开火店的赚钱，还是靠畜猪子，因为火店的糠、饭汤和零饭，是经常有的。

火店的对头是警察和衙门口的差人，因为警察、差人要盘查，常常借了盘查为难客子，弄客子的东西，如像借了查烟土，一转眼把客子的银钱偷去了。若当戒严时候，还要因对答不妥当受那无妄的飞灾。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还没黑，就在黄坳、河岭、长举、新寨等离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来，火店的生意大受影响。

火店中，同来安店是反动的。店主陈登祺，出身却是贫农，家在留车，穷得没饭吃，因为他会两手打，便在留车一带乡下教打。民国七八年他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他因与官厅勾结，又跟留车劣绅陈吐凤要好，三二五暴动时保护县长谢寅出险，为谢所赏识，政权恢复，被提拔为靖卫队长。他率领队兵到双桥一带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谢县长走了，他回到火店里。这回苏维埃没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种。水豆腐销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开豆腐店赚钱，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能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

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猪，每店每年可畜四个，约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猪供米要多，还不如畜猪子划得来。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16）理发

全城理发店八家。民国元年以前器具都是旧式的，装式则一律是辫子。民国元年起，开始用洋剪（挥剪和毛剪），样式一概和尚头，没有别的。民国二年开始兴“东洋装”，器具还没有大镜子，也没有化学梳和轻铁梳子。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装”，还是没有大镜子等。民国十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寻乌学生到赣州读书传来这种新样。民国十二年开始有了宽八九寸、长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了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剃光头。在整个人口中，那种剃平头、陆军头等等新样子的，还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一个小部分又全数属于青年群众。

理发价，剃光头、挥光头都一毛，挥各种新装一毛半，修面只

半毛。

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自己的工钱在内）。这一笔钱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赌。

剃头和裁缝，不论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赚项储蓄起来发财的，原因是这两种人多半聪明伶俐、好嫖好赌、好吃好着。为什么这两种人是这样的呢？大概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前清时候，社会上看剃头工是属于“下九流”的。别的地方，缝工的社会地位也很卑下。缝工虽有老婆，但他们仍是好嫖。剃头工则十个有八个没老婆。这种没老婆的人并不觉得苦楚，他们倒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对“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脚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烟铳），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戏），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1]，五流丹青[2]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铁

三家打铁店，叶师父、杨师父、李师父。杨师父安远人，叶、李均于都人，每家资本五十元内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头，锄

[1] 堪舆，和本文中的“地理先生”“看地的”，均指看住宅基地和坟地的迷信职业者，通常称为“风水先生”“阴阳先生”。

[2] 丹青，通常借指绘画。这里指画工。

头，铁锸（即耙头），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鲢鲤刨，梭镖（寻乌土话“旭子”，梅县叫“挑笔子”，东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锅铲（炒菜用），铲子（刨锅头用），火钳，火铲，钩环（挑水用），铁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种铁器（各种刨铁、各种凿子、斜铲、铁锤、凳头钳、角罗钻、割刀），铁尺（做衫压布用），绵刀子（裁缝用），马刀，关刀，双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铁钉，门锸（上门用），铁箍。除马刀、关刀、双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销向城厢附近。打铁器和打铁方法，一概旧式。

铁是城区南厢的黄沙水，双桥区的铁锸水、石圾坑，南八区的车头、横径、大陂角六处地方所产，每处都有炉，铸铁，又铸锅头、犁头、犁壁（犁铧）。铸出的铁不但销在本县，大部分还是销往惠州、石龙，也有销往门岭的。锅头除销本地外，约有半数销往会昌及赣州，还有一小部销往潮汕。犁头、犁壁销在本县。每个炉子要挑响炭的（响炭即木炭，铸铁、铸锅都用它，挑的约二十人），烧炭的（用木烧响炭，每窑三人，五窑炭供一铁炉，共十五人），运砂的（铁砂从山崩下，农民挑运卖与打炉子的，这种工人不便统计），以及炉厂内的工人（高炉铸生铁十人，炒炉铸熟铁十二人，铸锅头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柜和行走三人），共计一炉铸铁需二百人上下。每个炉子单铸铁要资本千元，单铸锅头也是千元，铸铁兼铸锅头则需二千元，大宗开支是砂子和响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钱。炉厂有独家开的，也有合股开的。工人的工钱，师父（工头）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板的。坐柜每年七十元。师父和工人以日计，做一天算一天，坐柜以年计。还有神福、红包和来往盘缠，都是老板对工人的缴费。师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蚀本。师父会做的每年可得工资五百元。每间炉厂每

年能生产四千元，六个厂二万四千元。民国以前没有洋铁来或来得少，工价又便宜，寻乌的铸铁生意比现在大，会做的炉厂每年能生产二万元以上。前清时虽只有两间炉厂，却共能生产四万余元。现在炉数加了，每间炉厂的产量却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钱贵（工钱贵是因外来工业品贵）和洋铁侵入。

铁价现在比三十年前（光绪二十五六年）贵两倍，那时生铁每担（四十斤左右）最贵不过十一毛，现在却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钱买一斤生铁。三斤生铁打成一斤熟铁，价五毛。

本城三个打铁店，两个于都人，一个安远人。乡下打行炉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铁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炉子出门，高炉每座四个人打，矮炉三个人打，共有铁工一万三千左右。他们打铁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广东，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间爆竹店，钟老板，会昌人，几十块钱本，开了六七年。自己及请的一个师父共两个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习惯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寻乌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两块钱。今年初一反动政府宣布戒严，不准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准放，爆竹生意因此大减。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钟老板的爆竹生意减少了，从前梅县和门岭两方输入寻乌的爆竹，近来也停止了。

（19）打首饰

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封建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

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银也是个名，实际是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有些是铜上面涂一点银。打这种首饰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几十元做本。他们的首饰，一部分是人家来定做的，一部分是用个小匣子装着背往四乡去卖的。七家首饰店中，有四家是一个老板、一个工人、一个徒弟三个人做事，一家是四个人做，一家是两个人做，另一家只一个人做。学徒制度与理发业差不多，不过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烂一些。

（20）打洋铁

一家，刘俊记，兴宁人。前年来本城开店，以前无所谓洋铁。三几十块钱本，一个老婆、一个徒弟和他自己三个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铁灯呀（不[1]灯），盛洋油的壶子呀，盛茶油的壶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烧茶吃的壶呀，洋油透子呀（滤子），酒透子呀，盛茶叶的瓶子呀，各种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这样一个洋铁店乃社会需要的。生意也很赚钱，三个毛子一只洋油瓶，从本城、吉潭、三标、澄江、牛斗光等处杂货店里收了来，做成洋铁器以六个毛子卖出去。此次红军进城，刘俊记不知何故跟着反动派跑了。

（21）修钟表

也是一家，叶公昌，梅县人，除工具外，十把块本钱，专门修理钟表。全县除本城一家外，牛斗光还有一家。两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开的。寻乌全县有十二万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钟表，共有钟或表二千四百个，所以需要一两家修理钟表的店子。

---

[1] 不（dùn），方言，指形状短粗、矮胖。

（22）圩场生意

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着的城子。以寻乌情形说，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圩场生意的要项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铺不做这门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许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农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运到广东去。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叫做“盐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寻乌城一切生意大。寻乌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盐（年十万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货（十万元），第四豆（二万余元）。米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国元年五元，民国十六年旱灾有过十六元，本年红军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蕻墓，从四乡挑来“赴圩”。木炭（响炭）价，光绪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涨到二十二毛，现每百斤十六毛。片柴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国元年二毛二三，民国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国十六年到现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猪肉。前头店铺生意中已讲了的三个案子，其实应该讲在圩场生意里面，因为是圩场上的生意。

第四猪子。细猪子（两个月的）和猪条子（三四个月的）都没有行，都在圩场上买卖，每圩约三十个，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个上下。现细猪子每斤三毛，猪条子二毛，大肉猪二毛五。为什么猪条

最便宜呢？因为猪条子是四五十斤一个，不是很没有钱用的人不肯拿了出卖的，但迫得拿了出卖时，人家就卡他的价钱了，他也只得忍痛丢手。

第五鸡鸭。本地四乡来圩上零卖的，为数不多，平常每圩鸡鸭两门十把二十只，也有时一只都没人要的，这证明了寻乌城之苦。过年过节每圩可销百多只。价钱，鸡每斤四毛半，鸭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场出卖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铺生意中木器项下附带讲过了。现在讲竹器，谷箩、谷笪（笪读达，即晒簟）、畚箕（挑灰粪下田的）、鸡鸭笼、猪笼、篮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东西的）、磨栏（即栏盘）、糠筛、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捞（捞箕）、筷子、扫把、洗锅把、掇耳子（即鸢箕，比畚箕小）、角箩（小孩子装米果吃的小箩子）、篓（即鱼篮，摘茶子[1]也可用）、河子（即“得鱼忘筌”[2]之筌，别处曰籇）、茶篮、笠麻（斗篷）、菜篮、晒篮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场上卖。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苋菜、菖头、脉子、芥蓝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丝瓜）、节瓜、甜瓜、黄瓜、西瓜、番菁（南瓜）、茄子（广东人叫吊菜）、凤菜（又叫空心菜，别地叫蕹菜）、芋子、菁子、萝卜、韭菜、葱子、茼蒿菜、白菜、菜头（芥菜头）、当机（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八月豆）、老虎豆、树豆子、青豆芽、黄豆芽、马齿、黄芽白，以上各种小菜都由附近乡村供给本城居民。

第八鱼。有鲩、鲢、鳙、虾子、鲤、鲫、黄鳝、泥鳅、虾蟆、

---

[1] 茶子和本文中的“木梓”，都指油茶树的果实。

[2] 出自《庄子·外物》。原文是“得鱼而忘荃。”荃亦作筌，捕鱼用的竹器。

虾公、元鱼（脚鱼）、河鱼子、“抢”等等。普通市上卖的只有鲩、鲢、鲤、鲫、黄鳝、泥鳅、虾蟆数种，其余各种不经见。鲩每斤二毛半，黄鳝每毛十两，泥鳅每毛一斤，虾蟆每毛七两。“抢”是少有的大鱼，寻乌城去年曾卖过一个四十斤的，别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带循河上来，个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糍粑、那子（粉皮）、板子（软板子、铁练板、铁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鱼子板、苎叶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种）。圩期到了，他们就来了，特别是“会景”的时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时候）来的更多。一两块钱本钱。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荠次之。此外，枇杷、柚子、杨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呀，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

科举未废、文武两考盛行的时候，也有现时这样多的娼妓。科举既废，逐渐减少，光绪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往后又渐加多，到现在又恢复科举时代的盛况。南半县革命向北发展，同时红军开抵澄江，娼妓们许多跑下乡去了。她们中间传说，“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要过斩”，所以她们吓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24）同善社[1]

约当光绪二十七八年时，赣州一个绸缎店恒孚号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寻乌来开办同善社，他就是所谓天恩先生。那时的善长古鹤甫是个秀才，住在城里，家务也不很好。后来善长改了潘明典，是个拔贡，有千元上下家资，现做九江地方法院书记。郭友梅是光绪二十七八年进的同善社，那时候有社员百把八九十个，以后还进了好多，最盛时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发源在四川，由那个四川的同善社发出公事到各省开办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许后再向各县开同善社。赣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来到寻乌，首先拜会县知事，知事赞成了，出了保护告示，同善社就可以大大地开起来。入社是要经过神明的批准的，一个筒子放些纸坨子，有的写个“准”字，有的就是白纸。同善社的神明叫做达摩祖师，介绍人引导要进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头祈祷

[1] 同善社，从先天道分化出来的一种会道门组织，清朝末年发源于四川省永川县，后在反动政府扶持下逐渐蔓延到许多省。

之后，伸只手到筒子里拈那纸坨，拈个“准”，便进同善社，拈个白，不能进去。有个屠夫三次都是拈个白的，有个土豪四次都拈个白的，“莫说无神也有神哪”。林虎到过寻乌城，好大一个头，二十八九岁，威武得很。许崇智[1]也曾到过这里。林虎部下营连长有七八个进了同善社，在这里扎了一个多月。进同善社要入社费一元，以后随时捐钱，也不勉强。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来要捐钱，公事上说：“捐了钱，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饭哪。”郭友梅捐过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寻乌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个是女子。他们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农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谓农民没有贫农，都是“有碗饭吃的”“不求人的”。民国七八年省政府来公事要停办同善社，停了一两年。随后唐生智[2]有公事来，说“善菩萨，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办起来。民国十二三年政府又来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两天内不能和女人睡觉，睡了就不灵验。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四川有个九层工夫的天恩先生到过赣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两块钱接天恩先生的风。方本仁[3]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两次“龙华会”，社员都到，见人出两毛钱，向祖师磕头，奏鼓乐，吃斋菜。

进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

[1] 许崇智（1887—1965），广东番禺人，曾任粤军第二军军长、粤军总司令等职。

[2] 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1927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3] 方本仁（1880—1953），湖北黄冈人，曾任北洋军阀赣南镇守使、赣粤边防督办和江西军务督办等职。

寻乌县长曾有三个进了同善社，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到同善社磕头。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业比例如下：

职业	人口数	百分比
农民	一，六二〇	六〇
手工业者	二九七	一一
游民	二七〇	一〇
娼妓	一六二	六
商人	一三五	五
政府机关	一〇〇	四
地主	七八	三
宗教徒	二二	一弱
共计	二，六八四	一〇〇

看这个表，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所谓手工业者，包括各业手工工人和手工业主，商店的店员也算在内。所谓手工业，就是缝纫店、黄烟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饰店、洋铁店、修钟表店、屠坊店这一些。所谓宗教徒是耶稣教十人，天主教三人，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纯粹地主十二家，共约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里面。商人是指盐行、杂货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货店、药材店、火店等，共计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余家，三十几个妓女，却养活一百六十二人。

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同等。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计，便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这表示失业群众之多是怎样的可惊。所谓政府机关一百人，是指新的县苏维埃、城区苏维埃两个机关（四十人），加上县苏赤卫队（六十人），不是指的旧政府。但是旧政府机关人数也是与新政府人数差不多的。说到这个群众中的领袖部分，即那旧社会的指导阶级，自然不是那总数占百分之八十七的农民、工人、游民和娼妓，他们是被统治者，统治者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商人的商会虽没有多大权力，商人群众中却有几个人参加那统治全县的县政府。不过那几个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他们是接受地主的领导，帮着做些事。这也是因为寻乌城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

商人而能向政界话事的：第一个算何子贞，豆行老板，用个假名出张帖子拿给别人去开。他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当公安局长，又当警察队长，又当国民党委员。他父亲承包牛岗税，剥削牛商。他初回寻乌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意识，颇有新派之称，后来便与地主妥协了。现逃。第二个是黄光甫，水货店宝华祥的老板，商会的文牍，能到衙门话事。现逃，店没收。第三是火店老板陈登祺，初当法警，升靖卫队长，跑衙门。现逃。第四是杂货店主陈志成，虽没做官，却事事与反动派同谋，有会必与。现逃，店没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举如下：

何德新　从前收租五六百石，现收百石，七八个人，仅够开销。乡人和衙门有交涉时要请他话事。他儿子何挺拔，平远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

何成治　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卖，是城内第一个大地主。何成治死，寡妇当家，买个儿子不能话事。

刘佛荣　收二百多石，人少，有谷出卖，寻乌城第二个大地主。“水浸牛皮——很吝”，不与外事。

刘段轩　只收几石谷。中山派，与何子贞打官司打穷了。他的儿子还在赣州班房里。他的儿子是赣州第四中学毕业，新的城东小学校长。

范老八　百多石，有多余。他哥哥开顺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门。此次派款三百元。农民没收了他。

范家声　百多石，有多，十五六岁，中山学生，被何子贞罚款。此次又被苏维埃派款一千元。

张三玉　百多石，有多，寡妇管家，不出面。

邝四嫂　几十石，有多，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不反动。

吴老四　已死，留个寡妇，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百多石租，有多，不话事。吴老四光绪年间坐县署征收柜，全县钱粮由他过手。死了四年。

范明才　先前开杂货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有多。民国初年当保卫团总，是劣绅，好嫖，好赌，现跑了。

何祥盛　摆摊子出身，做水货生意发财，三二五暴动被罚款，生意关门。他儿子何家常，买来的，梅县东山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领袖之一，共产党员，过番去了（往南洋叫“过番”），现到福建。

何学才　何子贞之父，县衙刑房科写口供，后做堪舆，承包牛岗税，买了几十石谷田，是个大劣绅。

以上十二家是纯粹地主（两家中地主，十家小地主）。其中何德

新、范明才、何学才三人是积极反动分子，刘段轩、范家声两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儿子何家常是共产党员，其余六家是所谓“只顾发财不管闲事”的。

下面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钟汇通　寻城第一家盐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余剩，跑衙门，话事情。

骆晋丰　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实，不话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够。老三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会会长，同善社主任教员）也只几十石，仅糊口。

荣春祥　几十石租，全部储蓄着，做生意吃饭，不话事。

温荣记　八十石，全存着，做生意吃饭。第三个儿子温锡纯与新寻派勾结。

林笔利　水货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闲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钟汇通与温荣记是反动派，余都是所谓“不话事”的。五家中钟汇通、骆晋丰两家是中地主，余三家是小地主。

第四章　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

本章目录

一　农村人口成分
二　旧有田地分配
三　公共地主
A. 祖宗地主

B. 神道地主

C. 政治地主

四　个人地主

A. 大地主

B. 中地主

C. 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D. 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E. 小地主

五　富农

六　贫农

七　山林制度

八　剥削状况

A. 地租剥削

1. 见面分割制

2. 量租制

3. “禾头根下毛饭吃”

4. 批田

5. 批头、田信、田东饭

6. 谷纳、钱纳

7. 铁租、非铁租

8. “要衫裤着去捞”

9. 劳役

10. 土地买卖

B. 高利剥削

1. 钱利

2. 谷利
3. 油利
4. 卖奶子
5. 打会

C. 税捐剥削

1. 钱粮
2. 烟酒印花税
3. 屠宰税
4. 护商捐
5. 牛捐
6. 赌博捐
7. 财政局总收入
8. 派款借款

九　寻乌的文化

一　农村人口成分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零四五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四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百分之三
破落户　百分之一
新发户　百分之二
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　百分之四
中农（够食不欠债的）　百分之一十八点二五五
贫农（不够食欠债的）　百分之七十

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专门脚夫）　百分之三
游民（无业的）　百分之一
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　百分之零点三

二　旧有田地分配

公田　百分之四十
地主　百分之三十
农民　百分之三十

三　公共地主

A. 祖宗地主

寻乌公田多，成了各区普遍现象。各种公会多得很，祠堂里的公会如什么“公”什么“公”，差不多凡属死人，只要是有“后”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钱的，他的所谓后者必定从他们的家产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个公。这种凑份子立公的办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凑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现钱。再则那什么公还在时，他自己就留出田产立起公来，这一种比前一种更多。公田一经成立，就年年收租。租除祭祖用费外，大概总是有多余的，便把它积蓄起来。积蓄的方式不是拿谷积蓄，而是拿钱积蓄，就是每年把多余的谷子粜给贫民，把钱积起来。积得若干年成一笔大款，便购买田地。如此下去，这一公的田地就渐渐地增多起来。但这积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的子孙均分了去。多半是子孙穷苦的多才主张分的，子孙富足的多呢，那便不主张分

了。分是在什么时候呢？又是怎样一种分法呢？就是当那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每人分得几斗谷、几斤肉。这种谷叫“红丁谷”。肉有四个项目：一是“胙肉”，从前是秀才、举人有功名的人分的，后头加上“毕业生”。二是“房股肉”，每房一份。三是“老人肉”，七十以上的人每人一份。四是“丁肉”，每个男子一份。分的次序：先分胙肉，次老人肉，因为这两种人是可贵重的，每人大概分一斤。次房股肉，每股十斤八斤的有，十多二十斤的也有，整的分出去，再零分与房众。为什么要分房股肉呢？这是一种斗争，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对分房股肉，主张分丁肉。但结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数少的房份的意见分了房股肉。为什么少数对多数胜利呢？因为这种公的产业，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权利的。次分丁肉，不是每个公都有分，多数公是没有丁肉分的，这是因为公款不多，或是人太多了的原故。有少数公堂谷肉不是平分而是轮分，名义叫做“轮收”，又叫“管头”，轮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开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头的荷包里，这并不算“吃油饼”，因为这样做正是公堂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呢？当他那个祖宗还没有死，把家产分拆给儿子们的时候，为了怕他的子孙日后把分得的一点田产变卖了弄得没有饭吃，就从田产中挖出一部分不分，作为公田，永不变卖。一面有了他死后的祭费，一面呢，他的穷困的子孙便得了周济了，这叫做“留出后路”。他的子孙也很赞成这种办法，因为这就是为自己留出后路。凡那祖宗生前没有立起会的，祖宗死后，子孙们只要稍为富裕也必定为他立会，出名叫做祀祖，其实是为了自己。所以轮流收租名则是轮流替祖宗收租，实则是轮流替自己收租。在这个意义之下，那些贫苦子

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那些穷苦人闹着要分公田也不是要分了田去耕种，他们是要分了田去变卖，得钱还高利债或买明天的早饭米。在这种情形上面，看得出贫农群众因为他们苦得没有米煮，便把什么“祭扫”呀、“慎终追远”呀等等封建思想逐渐地不要了，他们的生活迫着他们要不了这些宝贝了。

总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

B. 神道地主

神道地主即神、坛、社、庙、寺、观六种。“神”是指的各种各色的神，许多都有会，如赵公会、观音会、关爷会、大神会、真君会、婆太会、赖爷会、公王会、伯公会、文昌会等等，都是没有庙的。还有一种醮会，祈神之用，也属这一类。在上述的各种神内有一部分是立了“坛”的。坛是立起一块石头，有的几块石头垒成一个小屋，那里面藏着好灵验的神呀，因此叫做坛。不论神、坛，凡有会都有公田，出钱弄这种神会的通通是富农地主。神会的产业百分之九十五是田地，百分之五是谷子和钱。这种田、谷、钱，叫做“会底”。目的：一是为神，因为神能保佑他们人畜清泰，财丁兴旺；二是吃东西，神诞那一天吃一顿，过年过节还有肉分，但要斗了份子的才有吃有分。斗过份子后来穷了的，有顶退份子的办法，譬如每份是五块钱会底，人家就出五块钱给他“顶”了去，他就算是“退”出了会。“社”是与“神坛”有别的一种“社坛”，每个村子有一个，即使那个村子只有三家人，也有个社坛。为什么要社坛？保佑禾苗没有虫子食、牛猪六畜不至于遭瘟，保佑人们得到康健。每个社都有会，二月起，十月止，每月都开会，会期普通是初

二，有些地方是十六。开会那天，同社的人每家来一个，不分贫富，一概有份，杀猪买酒，大吃一顿。吃过之后，开堂议事，作陂开圳呀，禁六畜伤害禾苗呀，禁胡乱砍伐山林竹木呀，条规不一，议论纷纷，也没有什么主席，也不要什么记录。虽然乱讲一顿，却有一种自然的秩序。就是当那所谓“老前辈”或所谓“更懂事的”讲得“更公道”的时候，大家都说他的话“讲得好”，就是这样子成了决议。这种社是群众的，虽然也信神，却与地主富农的神坛完全两样。这种社的会议是农民作主，不是豪绅作主，也不完全是富农作主，是大家来而“更公道”的人的话为大家所信仰，这个人就作了无形的主席。社坛有公堂的最少，大多数是每月初二开会（要敬神）时候大家斗钱，每人每次二毛、三毛至四毛，不来吃的不出。再讲到“庙”。庙是有屋子，而屋子里面有菩萨的。庙有个庙祝，土名叫做“庙老”，是个老头子，服侍菩萨，招扶香灯。庙多少有庙田，也有无田的庙。有庙田的，庙老吃庙田的租，无庙田的，庙老伙食从群众中捐钱谷。庙有城隍庙、关帝庙、三官庙、三圣宫、赖老庙、龙王庙、关岳庙、杨公庙、东岳庙、江东庙等等。庙的性质，是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的意思。神坛是地主需要的，社坛是农民需要的，庙是地主、农民共同需要的。庙的田产很少，租入不够香纸费及庙老用，所以不是严重剥削所在。“寺”则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剥削厉害的地方。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为什么施田地给和尚呢？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大地主为了“修子修孙修自己”，所以施田给和尚。五福庵、回龙寺、正觉寺、观音阁、东笔山、大悲阁、鹅湖庵、西竹山、天台山、狮子岩、三角峒、角公岩、法华庵、西华山、南阳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龙山，都是城

区附近的和尚寺。道士斋公的叫做“观”，则有云盖峤、大山里、川塘坑等等。观的田产的来源和剥削的状况，与寺无二样。

总计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二十。

C. 政治地主

又分二类，一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一类属于教育性质的，一是桥会、路会、粮会一类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

县城的考棚田收得六百五十石租，经手的豪绅“吃油饼”吃去一百八十石，交出四百七十石与考棚。考棚田的来历是前清时候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许多谷子，建筑余款，置买田地，作为考棚年修经费。起个“尚义祠”，把那捐款大地主的姓名写在木主上，捐多的主高，捐少的主矮。

宾兴田的来历也是地主捐起的，田散在全县各堡，多数仍由原主管理，年交收获之五成与县城宾兴祠。宾兴祠在各堡设有分局掌管田产。田产的用途是作为乡试、会试的路费及中了举人、进士的奖赏（主要还是作为乡试路费和乡试奖赏），奖赏的别名叫做“花红”。县宾兴祠年可收千五六百石谷租。乡试（省考）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举行。每届寻乌试考的一百多人，每人路费二十四元，中了举的有花红百多元。宾兴祠内有百几十块木主，写的都是出捐的豪绅们的名字。科举废后，凡在赣州第二师范毕业的，每人发参观费三十元，使他们好往江浙一带参观。此外，往外国留学的也曾津贴过一回，一个留学日本的给了三百六十元。县城办简易师范及高等小学，即是用的宾兴祠的经费。

建筑学宫也是地主捐钱，因此也如尚义祠、宾兴祠一样，起了一个“好义祠”，纪念那般捐主。后头祀孔经费又捐了千多元，是款

子不是田地。

学租是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如篁乡古姓有学租一百石，车头邝姓有二百多石，至少的也有几十石。此外城区有“薪水会”，各区也有。各区普遍地有“文会”，性质同是奖励取功名，但系一种地方形式，由几姓或一区集合起来的。还有篁乡古姓某地主（古柏的祖父）捐出一百石租起个“尊育堂”，却是奖励全县读书人的，算是一个特别形式。

总计教育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至于公益性质的桥会、路会、粮会的土地，数亦不少。不但大桥、长桥有会，村落小桥也往往有会。有会就有田，都是地主、商人捐起的，目的是修理桥梁。起始钱少，逐年放债堆积起来成了大数，置买田地。每年十二月算数、敬桥神，名之曰“做桥会”，捐主都来吃一餐，吃了之后还分猪肉，所以桥会实在是个剥削机关。桥会大的有八千元，田产每年收租五百石，那就是留车的浮桥。小的有二三石租的，乃是很小的小桥。

路会不多，会田也少，全县不过十大几个（十五个以上叫十大几个）路会，每个路会不过收七八石谷。为什么桥会发达路会零落呢？因为路烂了修补易，不修补也不至于完全不能走人，桥则不然。

粮会也少，全县不过几个，如篁乡的严姓，大田的梅姓，车头的邝姓，吉潭圳下的刘姓，各有一个，各有些田地。多的如车头邝姓粮会有五百石租的田，原是“军田”，现充粮会。粮会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粮，抵制政府向族内各家迫粮。各方敲榨，各人不利，故斗钱成立粮会，或由各小公出钱斗成。有了粮会，法警只找粮会一处，免得各家受害。没有粮会呢？法警来了，脚钱多过粮钱，逾

限不完要算利息，利又非常之重，因此起个粮会。粮会起始钱也不多，也是逐年放利积起来的。

总计公益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四　个人地主

A. 大地主

以上说了公共地主部分的土地，再说个人地主部分的土地。个人地主土地在全部土地中占百分之三十，比公共地主土地要少。个人地主土地中又以小地主（收租不满二百石的）土地占大多数，中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上但不满五百石的）土地次之，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土地最少。

全县共有八个头等大地主，如城区的刘土垣，篁乡区的罗含章，南八区的谢杰、邝文荣，双桥区的梅洪馨，兼三区的潘明征（绰号“屎缸伯公”），澄江区的林朝官、王菊圆，收租都在千石以上。其中最大的算“屎缸伯公”，他是兼三区的项山堡人，连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及他在吉潭圩上开的药店、杂货店，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他是全县豪绅的领袖。民国初年他的第三个儿子潘梦春（是个文理不通的脚色，没有考过科举，也没有进过学堂）做过县财政课长（国家财政）。民国六七年他的大儿子潘奕仁（是个秀才，粗通文理）做过三年县财政局长（地方财政，管理考棚、宾兴、牛捐、赌捐、护商捐等款）。民国十三四年潘梦春又做全县保卫团总公所长，统辖七区保卫团，全县实权都在他手

里。他在总保卫团任内为了要钱用，同时北洋军阀邓如琢[1]部队到县要军饷，发了许多纸票，使用了几个月，被一个中地主叫赖翱虚的在省城一状告了他，才停止了。民国十五年国民党势力来，他就失势，但他立即和原来带资产阶级色彩的、这时已经和地主妥协了的新寻派结合，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今年三月豪绅们把县长胡泽凡推倒，他就上台做县长，红军到来他才跑往武平。他有七十多支枪，被武平钟少奎收编去了。刘土垣算第二个大土豪，但不活动，是个中学毕业生，在县里没有权。谢杰，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做过赖世璜的师长。现在上海组织什么赣南钨矿会，争钨矿自办，加入改组派[2]，组织“江西自救会”，出版《自救日报》，反对蒋介石。对于“剿共”，呼号甚力。王菊圆，赣州第四中学毕业生，澄江方面很有势力，和流氓很要好。他在澄江圩开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卖生意，店的后楼开个鸦片烟馆，让流氓们去吃不要钱，因此取得一班流氓对他的拥护。他嫖人家的老婆，别人若不识高低也去嫖时，流氓们就要给那个人以厉害的打击，有受这种打击弄得倾家荡产的。

寻乌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有十二个。曹善成（西厢田背），收租五百石，祖父发的财，是个“老税户”[3]。丘树烈（西厢图合），收五百石，无大用。他的儿子是个工程师，南洋大学毕业，

---

[1] 邓如琢，安徽阜阳人，曾任北洋军阀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第一师师长等职。

[2] 改组派，是国民党的一个派别。1928年底，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因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被称为改组派。

[3] “老税户”，指祖辈父辈已经是地主的人家。

到英国打过一转，现在天津什么锅炉公司当工程师。曹愿森（东厢），收五百石，本城高小毕业，四十岁了，在东厢有权。黄甲宾（北厢长举），收七百石租，国民党员。何子贞想利用他，他不出来。现在投机，向农民表示好意，要枪交枪，要钱出钱。他说："国民党没有用，出了钱不能保命，出到苏维埃还可保命。"谢善德（三标鸭子墓），五百石，读老书的，是个"山老鼠"[1]。王佛盛（水源坳背），五百石。儿子王维藩，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国民党员，在外未归。蓝绍宗（澄江），五百石，蓝死了，寡妇当家。曹国栋（吉潭），六百石，从前称万户，造房子用掉一些，高小毕业，"屎缸伯公"之戚，与潘梦春合作。易展良（双桥区桂石下），五百石以上，开头反动，田快被分掉，又罚去千多元，穷了，不反动了。赖鹏池（双桥区丹溪），称万户，五百石以上，前清附生，老实得很，辫子还留着，但不反动。邝明经（南八区鸡子叫），六百石，他的第四个老弟当白军营长，反动，全家走尽。陈万保（廷岭），六百石，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他自己不反动，他的老弟是新寻派，和他共家，很反动。以上头等大地主八个，二等大地主十二个，共二十个，江西人所谓"万户"就是指的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为的这个理由，我们还要把中地主列出来，只是小地主为数太多不便列举。地主阶级中为什么要分出中地主，因为中地主的政治作用不但和小地主大有分别，和大地主亦显然有分别。

B. 中地主

首先举城区。丘伟伍（西厢图合），收四百石，日本帝国大学皮

[1] "山老鼠"，指住在山区，很少外出，不问世事的地主。

革科毕业，在赣州贫民工厂做工程师半年，民国十一年回寻乌做教育局长，进国民党，新寻派领袖之一，为新寻派计划，是个厉害的东西，红军到寻乌，同谢嘉猷一路跑了。黄甲奎（北厢长举），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寻乌国民党指导委员，新寻派分子（新寻学校教员），积极反动。骆松盛（北厢长举），收三百石，城内开骆晋丰杂货店，不积极反动。有个侄子是国民党员，高小毕业，说共产党的坏话。何挺拔（北门城外），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干事，新寻派主要人物，努力于反革命。刘佛荣（小东门外），收三百石，不反动，做医生。

三水区：雷昌响（三标长排），三百石，是个“山老鼠”，无用。胡恩荣（三标圩），三百石，是个斋公，不问世事，专门要两个铜钱，在家里困觉。胡镜如（三标圩），二百石，赣州第四中学毕业，二十多岁，三标有名的土霸，参加县政权。凌鲁石（三标径石），三百多石，老秀才，做过多年财政局长，又做什么课长，又做考棚首士，一连干了十多年，赚了钱，在三标起了新房子，五十多岁。袁德和（水源袁屋，最反动地方），二百石左右，中学毕业，国民党员，反革命。此外，三水区还有中地主多人，记不清楚。

澄江区：蓝子乾，四百石，省立中学毕业，在澄江圩开蓝协泰杂货布匹店，反革命。谢嘉猷，三百石，高小毕业，四十多岁，做过十四军谢杰部下团长，寻乌团防总队长，改组派，把红军五十团第一营消灭的就是他，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凌希贤，三百石，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澄江新圩开个店。

兼三区：陈玉横（吉潭），三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吉潭的土霸，新寻派主要人物，“屎缸伯公”的孙婿，很活动。刘太宗（吉潭圳下），四百石，赌博头子，流氓出身，赌博发财，民国五年还是

“当乌”（做贼挖壁，夜间出门，叫做“当乌”）。潘金棣（项山），二百多石，梅县师范毕业，新寻派，国民党积极分子，吉潭靖卫团总。潘明瑞（项山），四百石，“屎缸伯公”亲属，吉潭圩上开了两间杂货水货店，项山反动首领。潘观澜，虽是个百多石租的小地主，却是反动首领，潘丽死于他手。赣州高小毕业，做小学教员五六年，那时并不反动，三二五暴动前后就腐化反革命了。他的父亲是个赌博头子，以此发财。潘明典（项山坪地），百多石，前清拔贡，民国法政毕业，做过陆丰、会昌两县知事，又做本县教育局长数年，还担任许多别的事，有“身兼九长”之称。本是个中等地主，运动省议员用掉四千多元，还是落选。去年做南昌高等法院管狱所长，今年在九江做高等法院书记官，是个官僚主义者。说话很漂亮，字也写得好，样子也好看，又很规矩，像个孔夫子。潘景文（项山大坜），三百多石，前清秀才，老先生。潘国才（项山村），三百石，也是个老秀才。潘国卿（项山村），只有五六十石租，高小毕业，叶子峯土匪的秘书，反革命。刘翰元（剑溪），二百多石，不中用。

篁乡区：李其琅（篁乡圩），三百石，赌博出身，儿子李含辉高小毕业，反动派重要分子。刘玉接（篁乡圩），二百多石。儿子刘金燕，南昌心远中学读书，又进了沪江大学、上海大学各读过一下，过去接近合作社派。刘玉麟，刘玉接的弟，四百石，是个哑巴，四五个儿子均小学毕业；小儿子读过中学，参加三二五暴动，现反革命。赖寿成（红头岭），四百石，儿子赖世芳梅县东山中学读过书，反革命。赖翱虚（红头岭），四百石，秀才，上海理化专修科毕业，做过县立高小校长一年、教员五六年，运动省议员失败。两个儿子中学读书，其中一个又在北京师范毕业，接近合作社派，三二五暴

动时新寻派向他进攻，现在两个均反革命。汪子渊（山子下），二百石，篁乡的反动首领，是个大劣绅，做过保卫团总，宾兴分局长。刘经曦（司城村），三百多石，梅县中学毕业，父亲在胡谦那里干事，被土匪打死了，不反动。刘荃兰（司城），二百石左右，高利贷起家，现在也不反动，儿子加入农协，因误会被农民乱枪打死。罗成添（溪尾），四百石，买半毫子黄烟都要同人讲价钱，是个守财奴，要钱不要命，他那村子整个的反革命。罗福寿（溪尾），前有三百石，分开了，反革命。罗佩慈（溪尾），二百石，做过于都县长，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三二五暴动前大家还在秘密准备，他看出来了，在农村中散布改良欺骗主张说："家里的谷子要赶快平价，不要钱，发与本姓的贫民，不然不得了。"是个反动首领，豪绅中很厉害的。罗禄寿（溪尾），二百石，儿子是新寻派，喜出风头。古乐三（塘背），两兄弟合计三百石。他哥子是个秀才，做过两任省议员。他自己在胡谦那里做过军需，陈炯明时代做过五华县的一个区长，全县反动首领之一，带三四十支枪，跟谢嘉猷跑了。古光瑞（塘背），二百多石，高小毕业，反动。古化南（塘背），二百石，是个老实人。古光禄（塘背），四百石，守财奴，顶好便宜，买小菜都要讲价。他儿子在梅县东山中学毕业，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以上塘背各古，均古柏同屋人。）古有余（塘背），五百石，开纸行，又卖烟土，又开花会，纵赌。他是个守财奴，不问世事，专门要钱。因他是强房中的弱股，他的亲支大家欺负他，向他要五十就五十，要一百就一百。严锦绣（高头），过去唤万户，做屋做穷了，剩三四百石谷，开了间铺子在公平圩，子孙十几个，不问世事，发财为主，算得个"山老鼠"。严国兴（高头），百多石租的小地主，以做生意为主，公平圩开杂货店，同时贩纸，商家来往扯得通。贝岭、岩下

的商人借钱给他，连同他自己的钱，共用掉六七千元，运动省议员，失败，现负债。篁乡区的反动首领之一。严锡柏（高头），二百多石，开了间杂货店在公平圩，不甚反动。（以上兼说了几个小地主，因为他们是著名脚色。）

双桥区：黄庆云（黄田），二百石，不反动。罗守汉（黄沙），二百石，不反动。赵尚钦（腴田），三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反动。谢友丰（腴田），二百石，不反动。陈德全（留车），二百石，在留车开盐行，反动，二十一纵队把他枪毙了。陈镜日（留车），二百石，不反动。儿子陈继光参加三二五暴动，梅县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失败，跑往南洋。陈山牛（留车），赌博鬼，二百石谷，不反动。陈标记（留车族坑），过去是万户，分开三四家。陈标记死了，他的儿子“不子六”有三百石，在留车开水货店，反动首领。陈国才（留车族坑），二百石，梅县中学毕业，反动派。陈吐凤（留车族坑），二百多石，大劣绅，寻乌五虎将之一。“潘（明典）谢（虚左）陈（吐凤）彭（子经）邝（太澜），寻乌五虎将。”“新寻”“合作”两个新派起来后，老的五虎将就倒台了。陈及潘、彭、邝都是秀才，只谢是毕业生（寻乌简易师范）。廖洪贵（石碣），二百石，开个水货杂货糕饼店在枫山圩，不反动。刘俊福（坜坊），过去称万户，分开了，现有四百石。儿子刘鸿翔，赣南中学毕业，又在北京文化大学读过书，狗屁不通，却十分反动，双桥区反革命首领之一，现还在死守炮楼。刘石福，刘俊福的兄弟，二百多石，过去拿钱办过小学，现亦在炮楼中。刘元瑛（坜坊），二百多石，在炮楼中。刘作瑞（坜坊），四百石，三二十个人的大家庭，参加革命，把田分掉了。原因是早前和刘俊福争田买，又为了一个奸情案起衅，三二五暴动他家有人参加，失败，刘俊福诬告他，并勾结叶子峯土

匪把他家烧掉了。现在他侄子刘国香做区苏维埃委员，刘日升做乡苏维埃委员，他自己在家不问事。他是梅县第五中学毕业生，老实得很，二十三四岁，比他侄子还年小，官司是他侄子的父亲即他的哥子主持着打的。刘宝华（石贝），三百石，儿子在县中山中学毕业，参加革命，做共产党区委书记。刘开香（石贝），二百石，高小毕业，不反动。汤思贤（下磜），三百石，梅县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十分反动。汤立贤（下磜），二百石，黄埔生，做过靖卫队长，新寻派。汤佛淑（下磜），二百石，是个劣绅，人称土霸，小学教员讲习所毕业，新寻派走狗。曾超群（上磜），百多石[1]，梅县中学毕业，不反动。曾锡麟（芳田），三百石，读老书的，放高利贷放得很厉害，他和他的侄子曾光华（小学毕业）反动到十二分，均在坵坊炮楼里被农民围困着。曾菊香（芳田），二百石，侄子曾产丰，高小毕业，是个共产党员，房子被叶子峯土匪烧掉了。曾海澜（伯公坳），过去是万户，最近分拆，他得二百石。参加三二五暴动，被曾锡麟告状用去千余元，叶匪又罚他，老弟被叶匪捉去罚款六百多元。现不反动。易颂周（桂石下），二百石，前清秀才，是个劣绅，与叶匪有勾结，现跑走了。何子文（丹溪），过去是万户，分开了，现在二百多石，反动不厉害。钟寡妇（丹溪），二百多石，反动派，跑了。赖荣俊（岑峰），二百多石，过去是小劣绅，现不反动。梅仁华（岑峰），二百石，不反动。梅调先（大田），秀才，三百石，反动派，逃走。赖文莲（大同），三百石，红军二十一纵队捉着罚了二千元，田分掉，现不反动。邝春龙（雁洋坪），二百石，高利贷起家，没收了，现不反动。邝世仰（雁洋坪），二百石，梅县师范毕

[1] 这里指分家后曾超群所有的田亩数。分家前曾家兄弟二人共有谷田200多石。

业，国民党员，死反动。邝应绍（黄羌坪），二百石，不反动。邝兰春（黄羌坪），二百石，不反动。陈陶香古（族坑），三百石，寡妇管事，赌博起家，反革命。

南八区：刘篁先（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枪决了。刘添运（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杀了他一个儿子，屈服了。刘焕通（龙图），三百石，被红军罚款千余串，现不反动。刘世滴（龙图），二百石，前清秀才，反动派，全家逃走。刘振广（河角圩），二百石，第三个儿子反动，跑了，其他不反动。刘梅荣（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曾月辉（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寡妇管事。曾路福星（河角圩），二百石，有余钱，勾结叶匪，全家反动，跑了。陈二赖禾（鸡子叫），二百石，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侄子被红军枪决，很反动。赵芷香（车头），二百石，老先生，过去有点子“劣”，不反动。赵赞杨二（车头），二百石，全家反动，跑到坜坊炮楼里去了。他是赌博鬼，祖父发的财。赵奕二（车头），二百石，老实，兼做生意，在车头开华兴店，今年第三次四县会攻时店被烧了，他的父亲被杀，不反动。赵应华（车头），二百石，过去是万户，分了一半给他四个儿子，余一半归他两公婆，“坐灶子”（把家分拆，自己留一份，叫“坐灶子”），不反动。他的余积是临时分给他子女比较多的儿子。温赞标（青龙），二百多石，高小毕业，不反动。钟文发（珠村），四百石，兼做盐米生意，祖父遗财，不反动。钟斑三（珠村），三百石，祖父遗业，他过去曾赌博，有时会做和事佬，不反动。钟继善（珠村），二百石，梅县中学读书，参加革命，在红军十一军五纵队工作。钟大面六（珠村圩），三百石，老税户，赌博，反动，全家走尽。钟咏柳（珠村圩），二百石，东洋留学生，做过武穴警察局长，在本县做过一等课员、承审员、实业局长，在谢杰部下

亦干过事，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逃到平远去了。彭子经（古坑岗），三百石，前清秀才，本县五虎将之一，清末做过湖南凤凰厅巡检，民国时代又在本县做过财政局事务员，收过赌款，最近在团防队做军需股，每次清乡都参加。一个儿子彭秉彝，梅县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做过知耻小学校长。全家反动极了。黎祖德（古坑岗），过去是万户，做生意，做蚀了本，剩下三百石，全家反动，走了。彭宏云（下廖），二百石，不大反动，开个杂货店在下廖村。彭宏权，彭宏云老弟，二百石，反动，跑往平远。彭锦汉（下廖），二百石，兼做生意，开药材和杂货铺，死爱钱，不反动。韩佛仙（满坑），二百石，兼做生意，又耕田，老实人，但亦逃到平远去了。钟奕材（林田坝），三百石，高小毕业，祖父手里是万户，两家人分，过去不赞成革命，逃走，现自愿罚款，要求回家。钟丁四（林田坝），二百石，祖父遗业，子弟也有耕田的，不反动，“怕共产”。钟树芬（林田坝），二百石，他自己死了，老婆当家，罚款二百元，不反动。谢瑞琳（牛斗光），三百石，医生，不承认罚款，逃走。谢肇凡（牛斗光），二百石，新寻派，赣南中学毕业，做过保卫团总，最近做过靖卫团总，南八区革命胜利后，在反动县政府当秘书，是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陈春荣（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儿子高小毕业，当白军连长，反动，全家走平远。陈六记（牛斗光），三百石，在留车和牛斗光各开一个油盐米豆行，勾结叶匪，很反动，全家走了。陈忠俊（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他的儿子过去做过保卫团总，不反动。谢佩钦（牛斗光之枫树岗），四百石，是个高利盘剥者，很多赌贩向他借钱，他的儿子在新寻学校读书，反动，逃走了。陈安如（廷岭），三百石，兼做猪牛贩，开火铺，罚了他的款，现在不见得反动。曾人升（莲坪），三百多石，自己会耕

田，赌博发财，不交罚款，逃走。钟星奎（珠村龙虎坑），二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做干事，南昌训政人员养成所毕业，新寻派的中坚分子，反动之极。

以上全县七区，共有中地主一百一十三个。

C. 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

D. 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大中地主的生活，依寻乌状况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他们的生活比较奢华。他们看钱看得松，他们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的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派遣子弟进学校也颇热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学等类学校毕业的。这种人在地主阶级中比较少，而且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澄江的王菊圆就是好例。第二种是半新不旧的。他们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他们也办学校，也做教育局长，但他们办的学校是专制腐败的。做教育局长是为了拿到一种权，可得到一些钱，而不是为了什

么“开通民智，振兴教育”。但历来的教育局长多半是他们做，第一种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们的生活介在节俭与奢华之间。他们人数在大中地主中占着大多数。守旧是地主的本性，这第二种人为什么也要半新不旧地随和时势一下子呢？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城区的丘伟伍，兼三区的潘奕仁，澄江区的谢嘉猷，就是这个阶层的适例。第三种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们的住地是在与河流及市场隔窎的山僻地方。他们始终希望恢复科举。他们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他们的生活很节制。他们至多挥个光头，有些仍是薙去额发一二寸。这种人在大中地主中依寻乌说是占着少数，双桥区（大田）的梅洪馨就是适例。大中地主阶级中新的占百分之十，半新的占百分之七十，全旧的占百分之二十。但所谓新的，是说他们走向资本主义化，不是说他们革命。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还有一种情况要说明的，就是大中地主阶级的新旧，不仅是以地域的原因（河流与山地，近市与远市）而形成，还有以年龄的原因而形成的。一家之中，老年人多半守旧，少年人多半维新，中年人就多半半新不旧。这种年龄的原因即是时代的原因。老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最深，同时他已行将就木，也无能力讲新，所以只得守旧。少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浅，同时不维新没有出路，所以他们比较不顽固些。中年人则介在二者之间。举一个例，大地主“屎缸伯公”是很顽固的。他的儿子便主张办学堂，但办出来的学堂却是半新不旧。他的孙子则往广州，往上

海，往北京，往英国，有六七个出外读书，研究所谓“新学”的。不过无论怎样研究新学，依然是彻底的反革命。“屎缸伯公”的孙子潘作琴在英国医科毕业回来，现在汕头行医，称汕头西医第二个好手，每天收入四五十元，每月能收千多元。他初回国时，寻乌教会医院出千二百元一年请他，不肯就，因为他在汕头的收入更要大。

E. 小地主

小地主（二百石租不满的）数目更多，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1]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但是小地主在地主阶级中是占着绝对大多数，而且显出下面的特点，即：（一）做小生意的多。他们开小杂货店，收买廉价农产物候价贵时卖出去，大概百个小地主中有十个是兼做这种小买卖的。中地主虽也有做生意的，而且他们一做生意就比小地主做得大，但他们做生意的成分比较很少，即中地主多半还在一种封建经济的领域中过生活，不如小地主商业化得厉害。（二）特别表现小地主商业化的，还有他们派遣子弟进学堂一事。小地主子弟进初等小学是全部，进高等小学也几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进中学的亦十家有三家。这个阶级接受新文化的形势是比哪一个阶级要快要普及。他们在全般政治生活中是受中地主阶级统治的，即是说他们是没有权的。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却表现很迫切，革

[1] 蒸尝费用，即祭祀费用。

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寻乌的合作社派（即中山中学派）的运动，就是代表这个阶级的运动，而和他们对抗的新寻派（即青年革命同志会派）的运动，却是代表中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为什么小地主阶级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即民权主义的革命文化如此之迅速普遍，他们的革命要求与活动如此迫切与猛进呢？则完全是因为他们这阶级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破产得非常厉害的原故。由这两个阶层（小地主与大中地主）的斗争，引导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即代表中等地主而多少带了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寻派，日益与大地主妥协结成反革命战线，而代表小地主带着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成近来的土地革命斗争。

上面所说的小地主，不是说小地主的全部，只是说他们的一部分。普通所讲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百分之三十二。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百分之零点九六，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刘鸿翔、赖世芳、刘瑞标就属于这个阶层。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三二五暴动中以及失败后，就陆续表现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寻乌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阶层。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

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璆（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点六四，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以上说所谓老税户破落下来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员来说，有三十个中学生，一百个高小学生或小学教员，都是过去或现在参加革命的，都属于这两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阶层，尤以第二部分为特别多。

普通所讲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这个阶层是在一种“方新之气”的活动中。他们的经济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种（雇长工帮助的很少，雇零工帮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穹远的瘦瘠的土地租与别人种而自己收取租谷。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粮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许多不是把谷子出卖，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远的八尺等处发卖，以期多赚几个铜钱。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放谷子出去，压迫贫民“上档量本，下档量利”（上档下档即夏收冬收）。他们又放“捡谷钱”和“捡油钱”。什么叫做捡谷钱？趁着青黄不接时候，以钱捡与农民，到了收获时候以谷还与债主，大概捡给两块钱，就要在收获时还一担谷，而那时谷价常常值得四块钱一担了，这是一种对倍利。捡油钱也是一样，多属对倍利。所有放高利贷，

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大地主、中地主放债也是放的加三利，加五利非常之少，捡谷钱、捡油钱可说没有。还有更凶的“月月加一”利，即见月还利百分之十，一年便对倍有过。这种借贷都要抵押品，并且要借一种“会”做面子，如“订同会”。还有“印子会”，是月月加一，利上起利，比订同会更厉害。这些都是大中地主所少做的。前清时候放恶利的比较少，民国以来放恶利的渐渐加多。“现在人心更贪了”，就是贫民对于高利贷者含有历史意义的评语。“今个人，人心较贪了咧”这个话，在寻乌贫民群众中到处都听见。这班新发户子看钱既看得大，更不肯花费钱米抛弃劳动送他们子弟去进学堂。所以他们中间很少有中学生，高小学生虽有一些，但比破落户阶层却少很多。至于破落户阶层为什么进学堂的多，就是因为他们看钱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经手赚来的），而且除了靠读书操本事一条路外，更没有别的路子可以振起家业，所以毕业生就多从这个阶层中涌了出来。上面所说那种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的说法却不叫小地主，而叫它作富农，即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五　富农

另有一种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实际仍是一种富农。前边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则不叫作富农而叫他们作小地主。贫农群众便是作这样看法的。这种所谓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由是他们没有半地主性，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

的。其实在贫农眼中，他们仍是一种特殊阶级。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因为他们有钱余剩，他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农产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了出卖。他们还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他们供着猪子、猪条子或大肉猪。以上这些都是与半地主性的富农一致，而与自足的中农不相同的。因此，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

六　贫农

——贫农中的四个阶层——

什么叫做贫农？我们简单回答道：不够食的叫做贫农（不够食的原因是受剥削，那不待说）。但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若从贫农里头再加剖解，便知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第一个是半自耕农。他们是不够食的，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够使用。他们须从地主那里租来一部分土地，完了租去，自己又不够食了。但他们在贫农群众中则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不但有牛，有犁耙，多少有些活动本钱，而且有一个表现他们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自己有一部分土地。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十点五，在贫农全数中则占百分之十五。第二个是佃农

中之较好的。他们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动本钱，但没有一点土地。他们的特点在于有牛，大多数有一条牛，极少数也有两条、三条牛的。他们比半自耕农穷，即比半自耕农更不够食，但比别部分贫农却要好些。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占贫农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村中一个最大的群众。第三个是佃农中之更穷困的。他们同样无土地，他们虽有犁耙，但多窳败，虽也有几个本钱，但是很少。他们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是每家有牛的，他们是几家共一条牛，或有一条牛，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地主为了节省饲养费交给他饲养的，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一下子这条牛的劳力，寻乌所谓“只能定得一爪子”的就是指这种牛。这一个阶层之不够食的程度比上举两个阶层都厉害。他们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十点五，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五，是一个与半自耕农相等数量的群众。第四个是佃农中之最穷的。他们除没有土地之外，还没有一点本钱，借米借盐是常事。他们又没有一点牛力，农忙时节，候别人把田耕过了，然后同别人（那些亲戚家族们）借了牛来，或租了牛来，耕那数亩用重租租来的瘦田。他们虽然有犁，但没有耙，因为打一架铁耙要好些钱，他们力量不足办此。这一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七，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是一个并不很小的群众。他们衫很烂，要讨来着。三餐饭两餐食杂粮（粟板呀，番薯片呀）。做米果卖，砍柴火卖，挑脚，就是他们添补生活的办法。

七　山林制度

寻乌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脚的氏族手里，后到的氏族便没有山或少有山。因为先到的占领，所以也有小姓先占了山，大姓后到仍没有山。田与山的情形不同，田地转移很快，小地主和农民的田

地，用典当的方法一年转移两次的都有，一年转移一次的就更多了。至于卖绝，也是常有的。山地则因其生产力小，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谓“公禁”者，不但禁止买卖，而且绝对地禁止自由采伐。除非死了人，“倒条把子树，搭墓棚”，才得许可。为公共利益使用，如作陂，开圳，修桥梁，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只有定期开山，蕻基三年两开，树木两年一开。由“禁长”召集本村同姓人等到场议定开山日期。到期，每家出一工，到山采伐，所得蕻基或树卡（开树木山又叫落卡，即砍树枝）共同分配。也有按山林生产情况分成若干小块，召集公众到场拈阄，然后按所分地段各自去采的。以上是家族主义的山林“共产”制度。还有地方主义的山林“共产”制度。多半以村为单位，由村内各姓人等公举禁长。严禁私采，定期开山等等，都与家族“共产”的山林一样。禁长三个起码，多的到十多个，依村落大小山林广狭而定，以五六个为最普通。禁长均由选举，任期不定，有一年换两回的，有四五年不换的，全看他尽职不尽职。凡做禁长的都要铁面无私，公公道道。“不管你天皇老爷的奶子，捉到了你偷树子，偷蕻基，均要罚的。”南八区龙图乡有个禁长，捉到了一个偷树子的女子，那个女子对他说：“我倒条子树子搭下子亭子，不要罚我，我同你龙图人都是亲亲戚戚，为什么你就这样没有情呢？”那个禁长回答她道：“不要说你这个卖板子（米果）的昭凤妈，今天就是我的舅婆也要罚，要晓得我刘世烈狂是铁面无私的。”若是禁长不能维持，大家又乱砍乱伐不顾公益的时候，就要“暖禁”（唤起大家注意，恢复从前规矩，叫做“暖禁”。疏忽神明，重新致敬，叫做“暖神”或曰“暖福”）。禁长们每年召开禁山会议一次，一切关于禁山的规矩都是由这种会定出

来的。禁山会临时召集的多，也有“有底子”的。开禁山会的那天，不但禁长们到，而且那个范围内每家都到一人，每人自带酒饭，另外出一毛子或半毛子买菜，并买敬“伯公”（“伯公”就是杨大伯公，什么地方都有，每个树头下，田埂下，山坳上，什么地方都有他）的香纸。以上两种这是说的“共产主义”的公山。还有“资本主义”的私山，乃是香菇山、茶子山、茶叶山、竹山、杉山等，生产品能变卖，出息较大的。这些山原来也都是公山，渐次落在有钱人手里，大概是大地主占一半，小地主（新发户子）及富农占一半。因为开这种山不是有资本的不能开，特别是开香菇山、茶叶山，要大地主，其余则多是资本主义化的小地主及富农。寻乌的山地约作如下的分配：一姓公山占百分之十五，一乡公山占百分之五，私山占百分之十，离人家远开发不到任其荒废的所谓“荒山”，则占了百分之七十。成为荒山的原因，有些是人少山多用不着它，有些则是姓界限制，虽有他姓欲利用的，亦被山主拒绝，只好让其荒废。这种被姓界限制欲开发而无从的情形，到处都有。土地革命之后，这种姓界便消灭了。

八　剥削状况

A. 地租剥削

1. 见面分割制

见面分割与量租，两种同是寻乌县的收租制度。见面分割是禾熟时地主与农民同往禾田，农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对分，双方各半，地主部分要农民送到他家里。有些地方分割之先，由地主先取一担，这一担不在对分数内，这种多半是肥田。地主的理由是：此

田我买来时多费了田价，你佃户耕了省了粪草，若不先取一担，你占便宜太多。但这种办法是很少的，百家之中不过一家。另有一种，是农民先取出些谷子，叫做“撮谷种”，数量是在全数租谷中撮出一撮箕。理由是：秧子打在别人田内，不在你这个地主的田内，打了秧子的那块田，早子[1]没有收，别家地主要受损失，为了补偿佃户亦即补偿别家地主的损失，所以要先撮出一撮箕。当地主自己或派人到场监视分割时，要吃有猪肉有鱼（有些还有鸭子）的午餐。午餐过了，禾分割好了，农民挑了租谷伴同地主或其雇工送去地主家中时，还要加上两个鸡蛋，放在谷子上面一同挑了去，每天都是如此。农民和地主感情好的，送上七八个蛋的也有。

2. 量租制

量租制是“早六番四”。平远是对分。为什么要“早六番四”呢？因为早子价较贵，收获量也更多，交租六成才不便宜了佃农；番子[2]价较贱，收获也较少，故交四成。表面上看，早六番四两档扯平，还是五成，实则不然。地主常得五成六，农民只得四成四。因为早子收获量虽多，每十担中地主现已得去六担，农民只剩了四担了。番子则收获量每十担中往往要比早子少二担，只有八担，交去四担租，自己只得四担，合起早子的四担共得八担。地主却共得十担。成为四点四成与五点六成之比。

大暑（旧历六月）割禾，立秋（旧历七月）量租，地主通知农民把租送来。不见送来时，地主自己打个洋遮子，亲自跑到农民家里去催。再不送来，就派工去取。取又取不着，就调了他的田。有些恶地主呢，就告农民的状，捉了农民去坐班房，不过这种恶地主

[1] 早子，指一年两季稻的早稻。

[2] 番子，指一年两季稻的晚稻。

不多就是。原来见面分割占全县百分之四十，量租占百分之六十。近来见面分割的加多，量租的减少，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为什么见面分割的加多起来呢？因为佃户穷的日多，常常一割下禾就没有谷子，地主怕农民收后不量，所以见面分割加多起来。同时农民为怕调田与吃官司，也宁愿见面分割。

3. “禾头根下毛饭吃”

“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说的是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情形寻乌简直占百分之四十。为什么禾头根下毛饭吃呢？譬如耕了二十担谷田的，量去了十一担多租，剩下八担多。去年过年和今年青黄不接毛饭吃时借过地主谷子两三担，加上加五利，又要还去三担多至四担多。打禾了，要买好东西招扶地主。禾打过了，买上一点油盐，舂上一点米子，立秋刚到，一切都完。这就叫做“禾头根下毛饭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阿嗬”。南半县土地斗争中，农民、小孩子普遍地唱了一只歌，那歌唱道：

月光光，
光灼灼。
埃跌苦，
你快乐。
食也毛好食，
着也毛好着。
年年项起做，
总住烂屋壳。
暗婧女子毛钱讨，
害埃穷人样得老。
暗好学堂埃毛份，

有眼当个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越想越可怜。
事业毛钱做，
年年总耕田。
六月割也就，
田东做贼头。
袋子一大捆，
擎把过街溜。
吗个都唔问，
问谷曾晒就？
穷人一话毛，
放出下马头。
句句讲恶话，
俨然税户头。
唔奈何，
量了一箩又一箩，
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阿嗬！
又阿嗬，
会伤心，
穷兄穷弟爱同心，
穷姊穷妹爱团结，
团结起来当红军，
当到红军杀敌人！

注[1]："埃"，我。"毛"，没有。"项起做"，继续做。"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样得老"，怎样得老。"暗好学堂"，再好学堂。"割也就"，刚割完。"做贼头"，很恶之意，如贼头一样恶。"袋子一大捆"，用去收租的。"过街溜"，洋伞。"吗个都唔问"，什么都不问。"放出下马头"，打官腔。"税户头"，大地主。"阿嗬"，没有了之意。"爱同心"，要同心。

4. 批田

寻乌地主把田批与农民通通要写"赁字"，没有不写的。五年一小批，七年一大批，是全县普通的赁期。这是东佃间的"规矩"，也就是不成文的法律。只有那种恶地主才敢借故破坏这种法律，三四年或七八年调换佃户。赁字上面写明的是：（一）田眼，写明田的所在及界址。（二）租额，写明见面分割制还是量租制。（三）租的质量，写明要"过风精燥"，不得少欠升斗，如违转批别人。（四）田信，写明每年或每两年交一只鸡公。这种赁字，哪怕少到三担谷田都要写一张。因为若不写赁字，一则怕农民不照额交租，打起官司来无凭据，二则怕年深日久农民吞没地主的田地。赁字只农民写交地主，地主不写交农民。

下面是赁字的一个例：

"立赁耕字人邝世明，今来赁到凌贱贵兄手内禾田一处，土名铁寮坝，禾田一大丘，计租六桶。当日三面言定，每年合纳租谷六桶，限至秋冬二次，早六番四，送至家中，过风精燥，交量明白，不得缺少。如有缺少，任田主另批别佃，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赁字为照。

---

[1] 这个注是毛泽东加的。

每年信鸡一只。

见人　罗长盛

代笔　谢雨霖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立赁耕字人　邝世明”

5. 批头、田信、田东饭

批头分“批头钱”“批头鸡公”二者。批头钱，每石租普通单批（五年一批叫单批）一毛，双批（十年一批叫双批）二毛，也有三毛的如篁乡等处，均批田时交清。批头鸡公不论批田多少总是一只，也是批田时交。单批转到双批，即五年转到十年，批头钱、批头鸡公一样照交。南半县双批多，如篁乡、双桥两区完全没有单批，就是一份田耕几十年的现在也还有，只很少。地主将田批出去后不久卖了与别人时，退还批头钱一部分与农民。北半县单批多，地主卖田时不退批头钱。

田信鸡每年一只，赁字上写明是“鸡公”，因为鸡公（阉鸡）比鸡婆较大，但农民还是送鸡婆的多。赁字上虽说了每年一只，但农民往往两年才送一只。送的时候在冬收后或过年时节。不见送来时，地主常常自己去催。“田信鸡公送了来啊！”“唔曾畜到。先生！等我后圩买到来。”或者说：“毛啊，先生！今年子总要免下子。”

双桥区有田东饭，每年请地主吃一次。别区很少。

6. 谷纳、钱纳

送租，全县说来百分之八十送谷子，百分之二十折钱。公堂、神会、庙宇、桥会的租，约有一半是交钱的，因为公堂、神会等佃农亦多半有份，因此佃农常常要照当时市价折钱送去，而把谷子留下备自己食用。这种人多半是兼做小生意的或有猪鸡出卖的，才能得到钱。那些豪绅把持的公堂、神会，为了有利他们的侵蚀（候谷

价高时钱卖得多），便强迫农民交谷上仓，农民亦无可奈何。同一理由，地主田租总是交谷而不准农民交钱，只有离田庄很远的地主才有准许折钱的。

7. 铁租、非铁租

非铁租占全县百分之八十，水旱天灾，面议减少，但每石租只减少一斗到二斗。遇大灾害收成大减时，请了地主来看过了，冇谷（“冇”，当地音胖，冇谷，无米之谷）也要分一点去。铁租是在赁字上载明“半荒无减”，在全县占百分之二十。但实际上农民实行得少，仍然是请了地主看过，精冇照分（精谷就是好谷）。

8. “要衫裤着去捞”

许多的农民把租交过，把债还清，就没有饭吃了。地主们收了那些租不肯出卖。过年了，农民急于得点谷子，地主把谷放出一部分，但不是卖而是借。因为借谷的利息是半年加五（早前的利率是“钱加三谷加四”，近来谷息加四的少了，大多数都是加五），比卖的味道更多。地主卖谷是要到四五月间青黄不接时候，那时价钱抬得更高，但他还要三歪四摆。

农民走到地主家里向地主道：“先生，食了朝?”

地主：“唔，系哟!”

农民然后慢慢地话到籴谷：“您的谷，埃来籴两斗子。”

地主：“毛……啊！自己都唔够食。”

农民：“好哩哪！您都毛谷，河坝里水都毛流！搭帮下子，让斗子给埃，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1]!”

地主：“好，你十分话紧了，埃的口食谷都让点子把你，你肯不

[1] “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意思是等米下锅。

肯出这多价钱呢?”

农民：“先生，莫这样贵，算减点子给埃!”

价钱如了地主的意了，然后把谷子粜与农民。

有个传遍全县的故事：篁乡地主刘福郎，是个著名刻薄的人，青黄不接时候，他把冇谷掺进精谷里发粜。有一天，有个农民到他家里籴谷子，他叫他的媳妇和女儿道：“要衫裤子着就要去捞!”农民们把他这句话传了出去，就成了全县闻名的大笑话。为什么这句话会成笑话呢？因为寻乌习惯，女子偷人叫“捞”，把冇谷掺进精谷去也叫做“捞”。他当着农民不好明说把冇谷掺进精谷，一个不留心，对他的媳妇和女儿说出那句好笑的话来，就成了流传至今的典故。

9. 劳役

劳役制度全县都没有了。地主有紧急事如婚丧等类，也常常求佃户替他做事。地主带耕一点田地，农忙时候，也常常求佃户替他做工。但通通是出工钱的。

10. 土地买卖

据知事公署粮柜上当雇员的刘亮凡说，民国十四年全县把田出卖的有六百家（买田的不足六百家，因为有一家买几契田的），以全县三万家计（十二万人，每四人为一家），每五十家中有一家破产。至于典当，更多于卖绝，每百家有五家把田典出（典进的每百家有二家，因一家有典进几契田的）。即是寻乌近年每年有百分之二的人家破产，有百分之五的人家半破产。

田价：坑田每石租十七元到二十元，埂田每石租三十元到四十元。普通坑田二十元，埂田三十元。典当坑田每石租典价普通十五元，埂田普通二十元到二十五元。

典当分为“过手”“不过手”。过手，是田主收了典主的典价之后，把田交了给典主，典主收了田或自己耕或佃给别人耕，都由他作主，田主不能过问。过手之后，典主也没有租送给田主了，田主除了保留收回权之外，简直和卖绝一样，因为主权的大半已在典主手里了。不过手，由典主将典价交与田主，而田仍由田主耕种，每年量租给典主，租率是照普通田租一样，每一石谷田交一石谷租（两档共）。譬如坭田典价每石租二十元，田主得了二十元，交出一石租，每石谷价普通四元，利率是年二分。为什么典田利率低于社会借钱利率呢（普通借钱年利三分起码）？因为一般富农（新发户子们）的心理，高利放债不如低利典田靠得住，“把钱放到泥里头”是很稳当的。富农们为什么不买田而去典田呢？因为农民和地主的破产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先典后买”，成了普遍现象。但“田就姓大，一典就卖”，也是普遍现象，故买田与典田仅仅相差一间。过手不过手二者，过手的占百分之九十，不过手的占百分之十。不过手的多半是包租（铁租），但也有法律上过手，而由原主向典主书立赁字成为东佃关系仍耕着这份田地的。这是于债主（典主）债户（田主）关系之外，再加一层东佃关系。

不过手典当的田，有些是偷典的。就是那些“嫖赌食着”的少爷们，当他们赌输了或者没有嫖钱了，欠了暗帐，不得开交的时候，便瞒了他的父亲把田秘密典给那些强房大姓的富农或地主之手，等到他的父亲死了，然后把田过手。为什么要典给强房大姓呢？因为只有强房大姓才不怕事，秘密发觉了，他就公开起来，也不怕他的父亲不依。

典田不过手，也是典主对田主的一种重利盘剥的机会。因为田主每年交租交不清时，典主就对那未清部分行起息来，年年加多，

最后非把这份田完全卖给典主不可。这种欠租利息是三分以上的高利贷，而不是二分的典价利息。

B. 高利剥削

1. 钱利

钱利三分起码，也是普通利，占百分之七十，加四利占百分之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二十。通通要抵押，有田地的拿田地抵押，无田地的拿房屋、拿牛猪、拿木梓抵押，都要在“借字”上写明。大地主、中地主、公堂、新发户子（发财的小地主及富农）都有钱借。其中以借额论，中地主占百分之五十，新发户子占百分之三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二十。以起数论，新发户子最多，占百分之七十五，中地主占百分之二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五。以借债人论，加五利（年利五分，每百元利五十元）、加一利（月利一分，每百元年利百二十元）差不多通通是贫农借的。加三利（月利三厘，每百元年利三十六元）也有，但极少。以贫农借额作一百，加三利占百分之二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七十，加一利占百分之十。贫农的借主多半是新发户子，三元五元，十元八元，零零碎碎，利上起利。抵押品贫农无田可指，多半指房子，指牛猪。借主时时想吞并贫农的房屋牛猪，或他很小的一块田，或一个园子，察到贫农要钱用，就借给他，还不起，就没收抵押品。也有中等地主借这种吞蚀贫农的小份子债的，古柏的祖父古有尧就是一个例。他曾经用这种借贷法吞并贫农三个菜园子、两个房子。今天借一元，明天借两元，逐渐成一大注，便有资格吞并一个菜园子了。他常常处心积虑，用这种乘人之危、零碎借债的方法去谋人的财产。他于地方的事、公堂的事一切不管，因为这些事颇妨碍于他个人的发财。他算得个典型的重利盘剥者。

加三利，多半是富农向富农借的，借债的用途是做米贩、做猪贩或者往市上开家小商店。为什么富农向富农借得到加三利，贫农只借得到加五、加一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趸”。普通总是二百元、三百元一借，还了来，作得用，不像贫农之三元五元一借，零碎得很，还了来，也不能作个什么用。二是靠得住。富农有田契作抵押，他的经营又是生利的、有希望的，不像贫农之财产很少，借钱多半是为消费或转还别人债务，很不可靠。

中等地主的钱多半是借给那些小地主中之破落户及正在走向破产路上的农民，他的目的也是在于吞并土地。

大地主及公堂的钱很少借给人家的，因为大地主的目的在享乐而不在增殖资本，做八十酒呀，起大房子呀，留了钱做这些用，送子弟读书也要用钱（这不是他的重要目的）。一小部分商业化的大地主，拿了钱去做生意。因此，也就无钱借与别人。那些有多钱余剩的，没有工商业可以大注地投资，零零碎碎借给小地主及农民，既借不得几多，又不甚可靠，他就宁可挖窖埋藏，不贪这点利息。加以军阀捐派频繁，看见多钱出借之家，就这也要捐，那也要派，闹得不得下地。陈炯明部下林虎、刘志陆[1]，在篁乡向大中地主、公堂、神会派了万多元，派过两三次，因此更发使他们把钱藏起来。

2. 谷利

谷利比钱利重得多，乃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十二月、三月两个期间借的最多。贫农为了过年，故十二月要借谷；为了莳田，故三月要借谷。不论十二月借，三月借，均六月早子收割时候要还他，利息均是加五，即借一石还一石

[1] 刘志陆（1890—1941），广东人，曾任广东潮梅镇守使、粤军第二军军长等职。

半（三箩）。这种六个月乃至三个月算去百分之五十的利息的制度，乃是高利贷中很厉害的。

贫农六月收下早子，还去租谷和借谷，吃到八月就没有谷子了，又要跟地主富农借谷。八月借谷一石，十月打番子时候还他，加二利，要还一石二斗。若贫农十月还不起，只得同债主说："埃今年毛有还了，明年早子收了再还。"债主就说："也可以的，本利加算起来才行。借给你的那一石本，算加五利是五斗，那利息二斗利上起利也要加五，就是一斗，你明年六月总共还我一石八斗。"（本一石，加利二斗，又加利五斗，又加利一斗，共一石八斗。）那末从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一个对年，共是加八利。假若他明年六月又还不起，那末从一石八斗再行加五起算。假如那个农民到了那年番子时又还不起，转到次年六月，再转到次年八月，如此转下去，一年转两回，转到十年就成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

3. 油利

油利是所有借贷关系中的最恶劣者。所谓"对加油"，寻乌南半县有茶子山的地方都有的，北半县没有茶子山，所以没有对加油。什么叫做对加油呢？借一斤，还两斤，借两斤，还四斤，借四斤，还八斤，这样叫做对加油。什么期限呢？九月打油时候为标准，九月以前一年之内不论什么时候借的，一概对加利。

油山[1]是地主或富农的，租给贫农耕种，地主富农收油租，二十斤油收十斤，六十斤油收三十斤，计收百分之五十。地主富农收了这些油租，大概百分之九十是挑赴市场发卖，百分之十是用对加利借给贫农。但他借时，往往说这油是他儿子或他媳妇的私家油。有些呢，也确是他儿子、媳妇的私家油，富农家里的媳妇们和他还

[1] 油山，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没有当家的儿子们常常有私油。它的来历是，当摘茶子的时候将过了，茶子树下的零茶子遗落没有拾的，他们就拾起，打出油来作为他们的私财，他们就有资格放高利贷。

“先生，借点钱给埃！”

“毛！”

“借点谷给埃！”

“毛！”

“毛有吃了，总要借点子！”

“油就有，埃奶子的。”

贫农目的不是借油，因为油利太贵了，但因为地主富农钱谷都不肯借，迫着只得借油，借了油去变卖成钱，再籴谷子吃饭。

也有借油吃的。贫农们打禾子，没有油吃，提个壶子跑到地主富农家里借一壶油，六月借油九月还，一壶还了两壶去。贫农家里没有秤，有些贫农的老婆、媳妇也不识秤，借一壶还两壶，她们是容易记得的。

4. 卖奶子

上面第二节里所说十年拖欠的话是假设的，事实上债主很少准许农民一笔账拖到十年之久。他总是压迫农民很快还清，还清一次，再借二次，因为他怕农民欠久了靠不住。通常情形是准许农民还本欠息，息上加息，推算下去，也只三年五年打止，不准太欠久了。债主怎样强迫农民还债呢？打禾了，债主挑了箩子走到农民的稻田里去，对农民说：“你的谷子还了我来！”农民无法，望着债主挑了谷去。既交了租，又还了债，“禾头根下毛饭吃”，就是指的这种情形。许多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之下扯着袖子揩眼泪呢！

“嫁姑娘卖奶子，都要还埃。”这是寻乌的习惯话。债主们对那

种“可恶的顽皮农民”逼债，逼到九曲三河气愤不过的时候，往往是这样说的。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刘亮凡是城区富福山人，富福山离城十八里，那村子里共有三十七家人，分为刘、曹、陈、林、黄五姓，共有五家卖奶子（客籍叫儿子曰奶子）的，内三家都姓刘，是刘亮凡（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的亲房，名字叫做刘昌育、刘昌伦、刘昌纯，其他两家，一家叫林芳廷，一家叫陈良有。刘昌育（刘亮凡的胞叔）是小木工人，余四个都是佃农。刘昌育有四个奶子卖去三个，刘昌伦三个奶子卖去一个，刘昌纯两个奶子卖去一个，林芳廷三个奶子卖去两个，陈良有一个奶子卖去一半。五家都是因为破产到完全没有了，没法子，把奶子变卖得些钱，一面还清债主的账，一面自己吃饭。买主都是附近村庄里的本姓绅士和富农，绅士更多，富农次之。卖价每个百元（起码）到两百元（最多）。卖时两家在名义上不说“卖”而说“过继”，但社会上一般都说“卖奶子”。要写张“过继帖”，普通也叫作“身契”。过继帖上面写道：

“立过继帖人某某，今因家贫无奈，告借无门，人口嗷嗷，无力养育，情愿商请房族戚友将所生第几男过继于某宗兄为男，当得身价洋若干元。自过继之后，任凭养父教读婚配，倘有打骂等情，生父不得干涉。两方甘愿，并无勒迫，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此过继帖一纸为据。

媒人某押
某押
某押
房族某押
某押
某押
戚友某押
某押
某押
父某押
母某押
兄某押
弟某押
某某代笔
某年某月某日立”

这种卖身契只有卖主写给买主，买主不写文件给卖主。所谓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个，都要“水扣钱”，抽卖价的百分之五。房族戚友临场有多到十几个的，都要“画押钱”，归买主出。亲房及强梁的（多半是绅士）画押钱要多，有十多元到二十元的，普通房族戚友画押钱每人一元以内。奶子的年龄有三四岁的，有七八岁的，有十三四岁的。买卖奶子，由媒人背了送到买主家。这时候奶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甚至两夫妻打起架来，妻骂夫没有用，寻不到饭吃要卖奶子，旁人也多有替他们流泪的。刘昌育卖奶子，他的侄儿刘亮凡就是一个看不过意流了泪的。现在讲到调查会的第二个农友李大顺，看他供给的材料又是怎样？他是双桥区的黄沙村

人，他那个村是个有人家四百户左右的大村，内中卖奶子而被他亲眼看见的有五家，每家卖出一个奶子。有一家是卖往广东平远县的八尺地方，李大顺在路上撞到这个背着小奶子的父亲往平远方向一路哭了去，这人撞到熟人脸上不好意思到十分。他为什么要把奶子卖往广东八尺呢？因为卖的价钱更高，一个奶子卖得二百多到三百元。不论卖到什么地方，四五岁的幼年奶子卖的价钱更高，因为容易“养得疼”（带得亲）。年龄大了，像八九岁的、十多岁的，反倒卖不起价钱，因为不容易带得亲，并且容易跑掉。至于到调查会的第三个农友梅治平，他是双桥区蓝田村的农民，他村里也有卖奶子的事。他的叔父梅宏波穷得不得了，三个奶子一个过番（往南洋）去了，一个在家，一个卖往平远。附近暗径村，贫农梅传华七个奶子，卖出五个。那天调查会到的就是刘、李、梅三位，他们自己村子里出卖儿子的事，就有上述那么多起。三人中一个是北半县人（刘），两个是南半县人，那末全县的情形也不难推知了。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刘亮凡说，他曾见过和听过卖儿子的事，在他家乡的附近共有上百的数目。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

听见人家卖了儿子了，债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讨账。“卖了奶子还不还埃（我）吗！”债主很恶声地叫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5. 打会

打会的目的是互相扶助，不是剥削。如为了娶媳妇，做生意，

死了人要埋葬，还账等等，就邀集亲戚朋友打个会。但月子会、隔年会、四季会，因为标利很重，结果变成剥削农民。

打会的人（会头）不是全无资产的人，多半是中农阶级及小商人中间打会的多。富农不消打会，极贫的贫农想邀个会也邀不到，只有半自耕农，佃农中之有牛力、农具者，自耕农，市镇上较活动没有破产危险的小商人，他们邀会才有人来。

会有长年会、半年会、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五种。

长年会是六个人，六年完满。除头会外，每人出洋十元，共五十元，交与头会。头会“没本盖利”，三年加三（每年盖利十五元，共四十五元），两年加二半（每年盖利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计六年头会要盖利八十元，本则“没收”去了。二会以后没本盖利制度与头会同，惟利息逐年减轻。如二会是二年加三（每年十五元，共三十元），二年加二半（每年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盖利息六十五元。三会以后盖利更少。“头会卖脸皮，二会捡便宜”，说的是头会虽得经济利益，但须低头求人才打成会，二会既不求人又得利益。

半年会采取标息制度，每半年标一次，人数八个起码，九个、十个、十一个以至二十多个都有。半年会不是没本盖利，而是每半年一了。（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缺。）

C. 税捐剥削

1. 钱粮

（1）地丁　全县一千四百二十四两，每两还正税大洋三元，附税二角四分。它原本不是钱而是米，每石谷田完地丁米八勺（每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每升地丁米折成忙银六分四厘二，再照每两忙银折成大洋三元二角四分，约计每石谷田完大洋二分。相传从

前安远典史杨霄远跑到北京皇帝老子那里，头上顶个盘子，盘子里面覆着许多酒杯子，表示安远、寻乌两县山多田少，手里拿着一篇奏文，上面写着“万顷山冈一线田”等等话头，请求减轻田赋，弄得那个皇帝大发脾气，说你那么个小官敢到我的面前上奏，我可不依，喝声推出斩首。然后拿了奏文一看，看到“万顷山冈一线田”的地方，却说“话还说得有理”，就批准他的奏文。因此安、寻两县田赋较之他处为轻。至今两县地主富农当每年完粮时候，还要拿些香烛到杨霄远庙里祭他一番。两个县城都有杨公庙。

（2）官租　篁乡全区，三标区一部分，城区也有一点，名曰“官田”。政府收官租不收地丁，共计九百四十多两，较之地丁贵得八九倍，大概每石谷田要完小洋二毛。为什么有这种官田呢？明朝篁乡出了个“霸王”，名叫叶楷，盘据篁乡多年，与明朝皇帝作对，皇帝用计把他剿平，把所有篁乡全区叶楷管辖地方的田地充公，名曰官田，禁止买卖，只能用佃户与佃户之间转移田地的名义，叫做“顶退”。三标官田的来历与篁乡相同，那里曾为叶楷部属占据过。城区的一点小的官田，则因那里的人曾经犯了皇帝老子的法，因此没收了他的田来。

（3）合计　地丁、官租二项，合计银二千三百六十余两，每两折三元二角四分大洋，也不过七千六百四十余元。由于沙冲水破，逃亡孤绝，贫苦拖欠几种原因，每年有两成收不到手，实际只能收六千一百十二元左右。

（4）苦甚　上述田赋数量，每年不过六千一百余元，而县署用款如行政经费、司法经费、监所经费、人犯囚粮、慈善经费各项，每年须用一万余元，以之抵充，不足远甚。故到寻乌做官的人，莫不觉得苦甚，便一意勾结豪绅，借种种事故压榨贫民。至于烟、

酒、屠宰等税，直接归省政府，不与县署相干，县署能指挥的只有田赋一项。

（5）陋规　县署钱粮经征柜上有几种陋规：第一是银水，每块钱至少吃去半毛至多一毛。譬如市价每小洋十二毛折大洋一元，粮柜上却要收十二毛半，全年六千一百余元，每年可吃银水三百多元，这是粮柜上的第一个大剥削。经征主任没有薪水，专靠银水及其他陋规养他。第二是过割礼，又名割粮礼，民间买卖田地要交割粮礼，粮柜上每户要收过割礼二毛，全年约有六百户割粮，可得一百二十元。第三是填写礼，田地买卖不但要交割粮礼，而且要税契，就是要拿土契到粮柜上斟张官契（财政厅发下来的），将土契文字填写到官契之上，每张收填写礼二毛，全年所得总数与过割礼同。第四是券票礼，即粮票钱，每张小洋三分，全年约二千张，共六十元。以上四种陋规，除银水外，都是公共的。每个知事新到任，粮柜主任要孝敬二十元至三十元与他，名曰“点规”，即是希望新任知事再点他做粮柜主任的意思。此外，还有过节礼（端午）、过年礼，不但要送知事，而且要送财政科长，知事送物，科长送钱（十元到二十元）。这些耗费都是出之于陋规。

（6）管钱粮的　寻乌县有三个管钱粮的，刘士辉、刘梅芳、黄少堂。民国以来就是他们管钱粮，他们挟着几本粮册做宝贝，勾结历任县知事把这个职务当做世袭。由三人中互推一人为主任，其余两人为户书。红军到城，三个都挟着粮册跑掉了。

2. 烟酒印花税

寻乌的烟酒印花税，每月小洋各六十元，共百二十元，一个商人承包，在北门内设个税局。除县城外，每月往澄江、吉潭、三标、石排下、留车、车头、牛斗光、珠村圩、荒塘肚、公平圩、篁

乡圩、中和圩、岑峰圩、茅坪圩、龙岗圩、上坪圩等十六个圩场收税一次。每个小酒摊子卖酒，每个小杂货店卖黄烟，都要抽税。老实的，多敲他一点，调皮的，照章程收。每月一百二十元包税，实收可得二百元，赚八十元。税局要用局丁二名、火夫一名。包商多半是赣州人。

3. 屠宰税

也是包，每月八十元税额，实收百五十余元，赚七十余元。也设一个局，局丁一名，火夫一名。局丁不但招扶局长，还要帮他出外收税。百五十余元，城中即占四十八元八毛（三个肉案）。包商也是赣州人。只能收到圩场有定案的屠户，章程虽然说的乡下人家杀一个猪也要完税，实际收不到。

4. 护商捐

是一种地方捐，普通叫做“百货捐”。国民党经费、靖卫团经费都从此出，公安局没钱用也要拨一份给它。县百货捐总局归地方财政局管辖，县城北门外、吉潭圩、盘古隘，各设分局。油、盐、米、豆、鸡、鸭、牛、猪、羊、狗、水货、杂货、布匹，凡属路途过往货物，无论什么都要抽税，每件半毛起码，五毛为止。米果、水果、柴火、竹木器等附近乡下挑到圩场零碎发卖而非远途过往的东西，不收税。反过来说，一切远途过往的东西都要收税。南半县留车、牛斗光等处群众斗争发展，便无法设局收税。三个分局每月数额二千元以上，吉潭过去有一个月收过二千多元，北门外过去有一个月收过八百多元，盘古隘过去无局，谢嘉猷最近才设立。名字叫做“护商捐”，实则商民恨得要死。

5. 牛捐

县城一处，每年一千七百多元，无局，由三四个股东承包，一

人出面办理。四年来都是新寻派何子贞的老子何学才出面包办。一千七百多元捐额，实际则收二千三四百元，也是一笔地方捐，归财政局管理支配。

6. 赌博捐

名字叫做“公益捐”，包括赌摊与花会，亦属地方经费，由财政局派征收员（何子韶做过两年）管理征收。县城一处每月收一千一百元，盛时每月收过一千八百余元。全县各圩同样要抽。前年每月全县收过三千多元，那时有刘士毅[1]派了一排人来县经办，名曰“防务捐”，每月提去二千元。赣南各县都是如此。后赣南旅省同乡会向省政府告了刘士毅，他不得不撤销，但地方豪绅继续征收如故。这是地方豪绅与刘士毅斗争的一幕小史，许多县都有这种斗争。

7. 财政局总收入

财政局的收入是牛捐（年一千七百多元）、护商捐（年二万四千元）、考棚租（二千元左右）、宾兴租（以谷折钱计三千元左右）、孔庙租（三百元左右）等，共计年收三万元左右。其用途是，国民党县党部、靖卫队、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清乡局、公安局、新寻学校（何子贞、何挺拔办的）、普化学校（在澄江，谢嘉献、蓝玉卿办的）的开销，总而言之是豪绅及其走狗嫖赌、食着、鸦片烟的用费所从出。

8. 派款借款

省政府的赣省公债派过三千元，二五库券派过二千元，中央公债派过一千元左右，金融善后借款派过四千元，军阀过往，如林

---

[1] 刘士毅（1886—1982），江西南昌人，曾任国民党军江西独立第七师师长、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

虎、刘志陆、李易标、黄任寰[1]、许崇智、赖世璜过了多回，前后派过四万多元。以上这些派借款项，由县署分摊到各区、各村、各圩，凡有一石谷田以上的，小商一百元资本以上的，均要派到。凡操到政权的豪绅地主大商，从县到乡各级机关的办事人，均不出钱，对他们的亲戚朋友也为之设法酌减。于是款子都派在那些老实的弱小的地主、富农、商人身上。还要加派手续费、夫马费、茶水费，如上头要派一千元，财政局就要派一千二百元，接下去区乡两级又各要加派，借此渔利。上面借了款去如公债等，间有还下来的，军队借款亦间有还来的，县城及各区保卫团豪绅们一把吞了下去，从不发还与借户。汪子渊当保卫团总时，吞没军队还来借款一千余元，惹起篁乡一带借户和他打官司，始终没有打得出一个铜板。

九　寻乌的文化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

不识字	百分之六十
识字	百分之四十
识字二百	百分之二十
能记账	百分之十五
能看三国	百分之五

[1] 李易标，曾任北洋军阀广惠护军使、粤军第四军军长等职。黄任寰，曾任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能写信	百分之三点五
能做文章	百分之一
初小学生	百分之五（五千人）
高小学生	百分之八（八千人）
中学生	五百人
大学生	三十人
出洋学生	六人
秀才	四百人
举人	一人

（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

高小学生多于初小，是因为进高小的多由读蒙馆后直接进去的。全县初小每区不出十个，七区共七十个，每个以五十人计共三千五百人。此外半新不旧的初小，有其名无其实或者连招牌也没有挂的有八十个，学生约一千五百人。两项共五千人上下。

高小每区至少一个。双桥区经常有两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四个。南八区有二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三个。城区有二个（城内之城东学校及田背之曹仓学校）。篁乡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三个。县城有三个（除城东）。全县经常有高小十三个，最盛时期（三二五暴动前中国大革命前后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有十八个。普通每校有一百学生。前清光绪末年办起到最近，最老的有二十多年历史，共有学生一万左右，一万人中已经死掉了二千左右。高小学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与富农子弟各占小部分。

本县有四个中学，但都短命。项山大地主“屎缸伯公”办的知耻中学（项山小杭）办了一年，双桥地主们联合办的尚志中学（在

坜坊）办了半年，澄江公立的普化中学（在澄江圩）办了两年，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在县城）办了两个月，总共出了一百多个没有毕业的学生。中学生的大多数是在梅县、平远、赣州三处中学读书的（每处各一百名左右）。全部都是地主子弟，其中亦是小地主占大多数。

大学生中大多数出于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只占着五个。刘维炉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了一学期，刘维锷在北大读了二年，邝才诚在北京师大读了一年多，三个都是共产党员。二刘三二五暴动时被杀，邝任红军五十团参谋长，在澄江被谢嘉猷捉着割死。邝世芳在北京朝阳大学读四年，病死，思想是革命的。凌得路在北京文化大学读一年，到俄国留学，以不能供给饭费，在芬兰使馆教大使家塾，思想是革命的。五人都是由祠堂供给学费才进大学的。大地主出身的二十五个大学生（及专门学校学生）全部反动，主要如何子贞（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寻乌靖卫队长）、赖世源（北京师大预科二年，在篁乡参加反革命）、刘鸿翔（北京文化大学读两年，在南八区领导反革命），三人均在寻乌，其余多在外头，属于蒋介石派。共大学生三十人，十分之八是读法科。

出洋学生六人中，潘作琴（英国医科毕业，在汕头行医）、丘凌云（到英国走过一回，其实不算留学，天津锅炉公司工程师）、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新寻派中坚，随何子贞跑了）、古子平（从日本买了一张文凭回来，大嫖大赌，篁乡人，做过教育会长，此次在篁乡炮楼中被红军攻走）四人均大中地主出身。曾有澜（最先出外留学的，光绪年间去日本，法科毕业，在奉天、北京、湖北做法官，中山中学派曾捧他为假首领，三二五暴动失败房子被烧，现加入改组派）、邝摩汉（日本留学，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北京文化大学教务

主任，与寻乌大地主谢杰在南京办汽车公司）二人出身不属大中地主。曾是小地主，官费留学日本。邝是贫农，高小毕业，进南昌宪兵学校，有个什么人赏识他，供给他钱去日本。

秀才生存者全县还有四百个，其中篁乡区塘背古姓一村六百人中占去十一个，是秀才最集中的地方。古柏的高祖七十岁，死时起个“圣旨”牌坊，中间写着“亲见七代”，两边写着“眼见五廪贡”“膝绕十二衿”，说的就是那时候他的孙子同时有十二个秀才。塘背古姓的旧文化在全县是最盛的，他们在政治上也历来占着支配的地位。南八区车头乡二千人中有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区龙图乡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个，则算是少的。近数年来，秀才们大多数无所事事，在乡村中当“老太”（本姓农民呼尊长叫“老太”，地方上人称他则曰“先生”）。这班人多半是收租的小地主，一小部分教书（旧书，也有新书），又一小部分行医以为生。秀才都是地主阶级的产物，但也有极少数是从贫农阶级出身，受地主的栽培而读书进学的。寻乌唯一的现存举人古鹿苹，他的父亲是个雇农，苦得没有饭吃。他小时提个小篮子卖小口（糖子、荸荠、咸萝卜等等），后来读书，先生见他聪明，不收他的学费，以此读出头来。他做过两任县知事、两任省议员。他在乡间是个极顽滑的，什么人都同他好，他亦表面上赞成新派，同时又禁止他的女儿剪头发，限制她的婚姻自由。南半县土地斗争起来，他采取反对态度，这次红军进攻古姓炮楼，他又主张投降。

南半县土地斗争胜利，每个乡苏维埃至少办了一个列宁小学校，普通是每乡两个，特别地方（龙图、牛斗光）办了四个，每校学生四五十人。学校及学生数比旧时国民学校增多一倍。小孩子们说：“若不是土地革命我们没有书读。”高小因无经费也没有教员

（革命知识分子忙于参加斗争去了），还没有办起来。

第五章　寻乌的土地斗争

本章目录

一　分配土地的方法
二　山林分配问题
三　池塘分配问题
四　房屋分配问题
五　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六　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七　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八　留公田问题
九　分配快慢
十　一个“平”字
十一　抵抗平田的人
十二　原耕总合分配
十三　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十四　非农民是否分田
十五　废债问题
十六　土地税
十七　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一　分配土地的方法

有几种分配土地的方法。主要的是照人口平分。全县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方没有分配土地。就已经分配了的说，照男女老少平分法去分配的占百分之八十。当土地斗争初起时没有成法可援，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提出了四个办法，要区乡苏维埃召集群众代表开会讨论，任凭选择一种。那四个办法是：一、照人口平分；二、照劳动力状况分配，劳动力多的多分，劳动力少的少分，即四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为一劳动单位分全田，四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分半田；三、照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他职业的多分；四、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施行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个办法。后头斗争发展，寻乌党就采取第一种办法作为主要办法，推行各区，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现在照这个办法来分配的土地，占全分配区域百分之八十。这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通通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去分配。

有些地方是四岁以下的不分；四岁以上直到老年，不会劳动的分五成或七成，其余分十成。行这种办法的有留车、枫山、上磜、大同四个乡，约有一万人口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照人口平分之后，不会劳动的因为无力耕种退回田之一部分（退的数目多少不等，由本人自定）于苏维埃，由苏维埃补给有劳动力的人耕种。结果成为有劳动力的多分，无劳动力的少分，与县政府提出的第二种办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由农民自动地在分田之后退回一部分田地，而不是一开始就按劳动力标准分配。这

样做的有龙图一个乡。还有黄沙乡也是退田，不过不是农民自动退田，而是政府于平分之后见着一些人得了田无力耕种，就命令他们退回一部分。要农民退田，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若硬要退肥田，而不准他们退瘦田，他们就不喜欢。龙图、黄沙两乡共有二千五百人。

此外，还有大田乡的自由耕种，愿耕多少就耕多少。这是因为大田乡经过白色大屠杀，杀死壮丁近百、老小数十，有几家全家被杀，又有二三十人当赤卫队，或往外县做革命工作去了，全乡原有八百人，现只六百人，有许多田无人耕种，同时全乡的牛一条不剩地都被反动派牵去了，所以只得任人取耕，全不限制，牛则从别乡土豪家牵来使用。

二　山林分配问题

全县对于山林，除牛斗光一个乡外，均没有分配，仍由原耕作人经营，名义上全归苏维埃公有，耕种人向苏维埃纳地税。为什么牛斗光的山林分了呢？因为那乡人多田少，农民要求分山迫切。此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仍然迫切要求分山，如附城南门外、北门外一带的农民，因为山权在各大姓公堂手里，小姓农民没山种，他们就迫切要求分山。

三　池塘分配问题

所有权归苏维埃，使用权归农民，由池塘的邻近人家轮流管

理，每年更换一家。全县都是这个办法。

四　房屋分配问题

没有分，但准许屋少的或被反动派烧了屋的，搬进屋多的人家去住。双桥、南八两区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人在他家里生儿子。寻乌习惯，若别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儿子，就认为他那一家的“精灵”会被那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了。从前双桥区的芳田乡有个进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人们就说是夺了他外祖家的风水。这件事全县闻名。三二五暴动失败，留车暴动总指挥钟锡璆的老婆避难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会生育，就赶快要她走。后头跑到龙川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山上搭了个寮子才把儿子生下来。现在一般被工农占住的人家，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别人在他家里生儿子，但心里是不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现在这种“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

五　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为了这个，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并且连乡为单位都不赞成。他

们衷心愿意的还是以村为单位分田，使他们本村的田完全为本村所得。所以寻乌现在土地分配状况虽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乡为单位分的，但多数农民对于这一办法并不热烈拥护，而只是不积极反对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积极反对呢？则因一乡之中，村与村的土地数量虽有参差，并不怎样悬殊，照乡为单位分了，他们在经济上所受的损失为数甚为微小。至于那些村与村的土地数量相差很厉害的地方，或者是村的区域很大差不多等于别处一个乡的地方，他们就坚决反对以乡为单位，如城区的城郊乡（分为四村）、新寨乡（分为二村），南八区的珠村乡（分为六村）等处地方，均以村为单位分配。但这种地区不多，只占全县百分之十五。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这区移到那区农民自己不赞成，就是这乡移到那乡也不赞成。“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还有迷信风水，以为祖宗坟墓所在，抛去不利。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车头地方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那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小龙去（同一个区，相隔十多里），也同样是经济理由。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六　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城内农民分田最少，每人一石八斗，为全县分田最少的地区。原因是过去耕田的少，过去不耕田而现在要求分田的游民和娼妓很多，因此把田分得少了。娼妓有爱人的跟爱人跑了。没有爱人的无

论如何要求分田，她们说："没有生意了，不分田会饿死。"人们说她们不会耕，她们说："我来学呀！"实在她们业已在耕田了。游民同娼妓大多数都是分了田的。那些分了田的游民都是比较有耕种能力的，如有儿子，有少数本钱的；娼妓则是有丈夫或儿子的，她们每家有三五口人，迫切要求分田，若不分给，她们就闹。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也就分了田给她们。但也有一部分不分的，就是纯粹的流氓或娼妓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的。以城郊说，游民分了田的占百分之六十，毫无耕种能力不分田的占百分之四十。

七　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城郊最少，每人每档（一年收两季，每季为一档）一石八斗。城区四厢又多一点，每人每档三石多。双桥区最多，每人每档七石以上。龙图、河角圩每人每档七石。但大多数地方都是每人每档分五石。每人每天要食米一斤，一年三百六十斤，一百八十斤合一石，共米二石，即谷四石。分田石数都是水谷（即毛谷），每档分五石的，一年两档共十石。十石水谷能晒八石燥谷，食去四石，尚余四石。这四石谷年节做米果呀，蒸酒呀，去了二三石，剩下一二石，不敷衣服、油盐、社会交际（婚丧年节）的日常用度。那末他怎样补足呢？便靠畜猪子、养鸡鸭、种小菜（指城市附近）、种甘蔗、栽竹木、种杂粮（番薯、芋子、包粟、豆子）以及兼做手工（做各种圆木和各种竹器，如锅盖、桶子、饭甑、脚盆、尿桶、水勺、竹椅子、斗篷、簸箕、米筛、畚箕、火笼、竹篮子等等东西。以上那些竹木器，农民兼做的多，专门竹木工做的少，农民甚至有兼做台、凳、椅、桌的），兼挑脚（挑米脚、挑盐脚、挑豆脚、挑油脚、

挑杂货脚，都是帮助人家挑，挑米盐两脚的最多，余较少），兼做小买卖（贩油、盐、米、豆、猪、鸡以至米果等等），兼为资本家做工（采香菇、做纸工、采茶等）。上举各项，每人兼做一门或两门，用这种方法补足生活。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杂收占三分之一。

八　留公田问题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　分配快慢

后起的北半县分配得很快，如城区从暴动占领县城到田地分配完毕，只有二十天时间。还有南八区的车头、龙图及三水区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调查完结，两天算清，又一天宣布，此外的时间是照每人应得的数目实行抽多补少，确定每家田地的区划。这样，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为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南半县的大部分（除车头、龙图）却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双桥一带就有了武装斗争，但到十一月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才开始发表册下去，做土地调查。调查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方法不对，调查表内容很复杂（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龄、土地所有权属谁、土地界址、面积数目、每年收成等等），不必调查的项目也列了进去，

调查手续又很麻烦（县革委将调查表发往各乡，调查好了再送县革委审查），以致延长时日不能分田。今年一月才变更方法，调查表只列简单几项（家长姓名、一家人口总数、能耕种的若干、不能耕种的若干、专做工商业的若干、耕田若干、应分田若干）。调查手续，由乡政府召集“分田大会”，每家出一代表，讨论分田办法之后，当场调查（会场上摆设许多桌子，每个小村的代表们围绕一张桌子，众人口报，一人手录），送交乡政府核清，将人口总数除田的总数，得出每人应分数目，在通衢公布。从调查到公布，只需四天（调查一天，算清两天，公布一天）。剩下就是实际分配，即从第五天起每个乡政府同时派出指导员十多人，分往各村，踏看田地肥瘦，并验第一天调查场中是否实报无误。踏验明白，执行分配，抽多补少，确定界域。这种踏验、抽补工作较为麻烦，斗争亦多在其中，所以须费一星期内外的工夫。用这种方法从调查到分配完毕，至迟不过两星期即可办完。北半县后起地方，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十　一个“平”字

各乡分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是，乡为单位还是村为单位呢？人口标准分配还是劳动力标准分配呢？鱼塘、园、坝怎样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寻乌没有提出讨论）呢？不准虚报，虚报的怎样处罚呢？至于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因为红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没收土地的宣告，用不着再有什么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十一　抵抗平田的人

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南八区牛斗光也有富农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乡政府怕他们，不敢作主，县政府的人去召集群众大会，才强迫富农小地主照办。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共产党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还有双桥区荒塘肚乡政府负责人林某及徐溪乡政府负责人林某（他也是共产党员），分田时独得好田。群众说"办事人得好田，我们补来的是坏田"，大为不满，斗争情绪因此低落。县政府把两人的好田撤回补给群众，群众才高兴了。以上几个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对没收他的田地外，其余都不是没收问题，而是肥瘦分配问题。所以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

十二　原耕总合分配

"以乡为单位"，说的是人口单位，不是土地单位。土地是不能

以区域限制的。甲乡的人在乙乡耕了田，乙乡的人也在甲乡耕了田，一乡的人在他的邻近各乡都有土地耕种关系。区与区的交界，县与县的交界，省与省的交界，农民都是互相交错地耕种土地。所以一乡的人拿了他们原在本乡及邻乡耕种着的土地，总合起来，平均分配，被认为是毫无疑义的。寻乌的土地分配也是这样。

十三　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有三种处理法。第一种是寻乌北半县现在行的（南半县分田在莳田之先，无此问题），上档（又叫“早子”）归原耕，下档（又叫“番子”）归新户。这种办法，富农不吃亏，但一切耕田少的贫农及不耕田的地主与流氓都不满意。特别是地主与流氓觉得没有办法。不能收租了，地主无法得谷。赌博废止，又没有钱借了，流氓失了吃饭的财源。第二种是新户帮钱给原耕，上档亦归新户得谷。这种办法又分帮多与帮少。帮钱多，原耕自然满意；帮钱少，原耕当然不满意。但贫农及流氓群众就纷纷议论，甚至有的说：“几多子家门都了了，你这几根子狗骨气力都唔掼?”意思是说几多大财东都破产了，你这一点点多余东西也舍不得吗？寻乌法律上没有承认这种办法，农民却有自由行之者。像城区有那食不够的贫农帮一点钱给富农，要求富农让了上档的分出部分给他收割，颇有些人家是这样做。第三种是不论上下档谁分了谁就去收获，广东平远县有行之者。

十四　非农民是否分田

流氓在县城方面，略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

不分；在县城以外各区，因流氓人数少，一概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大市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补足一部分。红军士兵和革命职业者，不但分田，而且苏维埃动员农民替他们耕种。地主在乡居住的准许分田。僧尼、道士、传教士要改变职业，即不做僧尼、道士、传教士了，方许分田，否则不分。算命及地理先生无规定，因为很少，大概都是分田的。南半县完全没有僧尼、道士、传教士、算命及地理先生等人了，他们一概改了职业。黄沙乡政府主席的父亲死了，请和尚做佛事，农民反对。寻乌本县很少“看地的”，看地的多属于兴国人。和尚很少，全县不过百把人。耶稣、天主两教，县城一个耶稣堂二百多人，一个天主堂一百多人，篁乡一个耶稣堂一百多人，牛斗光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吉潭一个耶稣堂一百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计耶稣堂五个七百人左右，天主堂一个百多人，共八百多人。耶稣堂属美国，过去县城有一个美国牧师，其余四处均中国人传教。天主堂属德国，有一个中国神甫。教徒成分，寡妇（内有贫农）及老年妇人（地主婆）占百分之三十，刁钻古怪的绅士及其家属占百分之三十，弱房小姓的农民占百分之二十（强房大姓的农民不入教），地主出身没有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大概进教的不外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很坏的，一部分是很弱的。很坏的也不是流氓，而是那乡村中奸滑阴险想当霸王的，他们进教为了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是受人压迫贪图保护的贫弱的人，他们的目的在于避祸。

十五　废债问题

分为债与账两项。债是废除二分利以上的高利贷。该欠商人的

叫作账，民国十七年元旦以前的不还，以后的要还。因为寻乌所有的债，没有在二分以下的，所以二分以上的不还，实际上即是整个的不还。亲戚朋友之间讲人情借来不要利息的债务，群众仍归还，但这是非常之少的。欠商人的账多属富农阶级，中农稍有一点。贫农雇农是没有商人赊帐的。

十六　土地税

去年收了抗租所得税，每抗租一石，收税二斗，在双桥、南八两区实行了。今年二月县革委扩大会规定不分等第普遍收土地税百分之十，税率与抗租所得税相等。这是一种不分等第（不是累进的）的税法。五月县苏维埃大会采用赣西苏维埃颁布的累进税法。

十七　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耙田、挑粪草、挑谷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属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莳田、耘田、捡草、铲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舂谷、踏碓、淋园、莳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荡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加以养育儿女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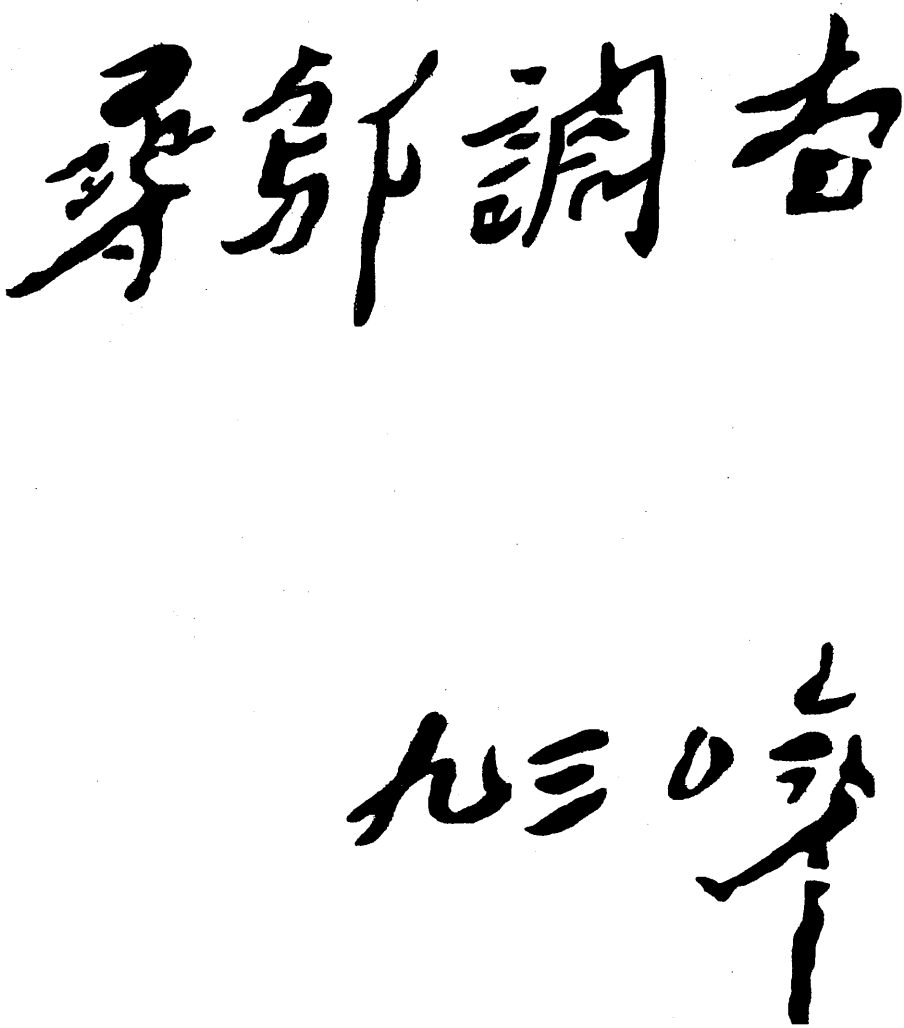
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土地斗争发展，许多地方女子勇敢地参加斗争，这回四军二纵队打篁乡反动炮楼，篁乡的女子成群地挑柴去烧炮楼，又从反动地主家里抢了谷子出来。斗争胜利的地方她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各处乡政府设立之初，所接离婚案子日必数起，多是女子提出来的。男子虽也有提出来的，却是很少。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一个。男子在这个问题上却采取完全反对的态度，其中一小部分男子就消极起来了。“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这就是他们无力禁阻离婚表示叹息的话。这一部分多是属于贫农。一大部分男子是非常强硬的。芳田赤卫队队长曾家勋原有一个老婆，后来又勾到人家一个女子。原有老婆要求离婚，他不肯，对她说：“我家是有进没出的，你要离婚就一驳壳打死你！”龙图的富农刘学盛，反对他的老婆离婚，对革委的主席说：“她要离婚，我就捂了渠。捂掉了渠，我死都愿！”（“捂”，当地读无，消灭的意思；“渠”，当地读已，他的意思。）这一部分男子多半属于富农。政权机关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有过四次变更。第一次是去年十一月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明显地反对一夫多妻，承认原有老婆后有爱人而老婆不反对者无罪；主张有条件的离婚，而其条件并不甚苛，承认一方有疾病的，女子受压迫的，夫妻反目半年不同居的，男子出外一年无消息的，均准离婚；地主阶级毫无条件可离婚。同时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这个申明传播后，南半县各地发生很多的男女间纷扰，最显著的是龙图与河角圩两乡（属南八区）的青年男女群众，几乎发生械斗。原因是两乡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时常调戏对乡成群的青年妇女。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

了一些（她们成群上山去砍柴火，比平素归家时间要晏）。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他们两乡是同姓别房。到今年一月，因为发生捉奸的事，反对捉奸的群众就去干涉，结果几乎弄成械斗。上述事情之外，有老婆又新找一爱人的差不多每个乡村都有，老婆们就群起反对。政府在这种情形之下，来了一条相反的法律。今年二月县革委会扩大会，对“贞操问题”决议：“已结婚之男女，不准与另一男女发生性交，私奸者严办。”同时对所谓“爱人”问题亦定了一条法律：“反对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度，原有夫或妇未经离婚，不得另找爱人，过去有些错误的应即马上离去，只同一个结为夫妇。”对离婚问题没有变更。这个决议发表后，纠纷停止了，一致对付当时严重的时局，打破了敌人的“进剿”。五月二日占领县城，同时红军第四军占领了反动的北半县，发动会昌、安远、平远的群众。在这种形势之下，五月六日全县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取消了二月会议的贞操决议，虽然没有明白地规定禁止捉奸，但再不说什么“私奸者严办”了。此次对“爱人”问题采取了二月会议的意见，对离婚问题与前二次会议无异。但大会闭幕不到一个月，第三区苏维埃大会却大大变更了对“爱人”问题、离婚问题的决议，他们的口号是“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当然的结果，不但禁止捉奸，而且什么爱人也可以带了。这个案子通过的地区是寻乌全县斗争最久（一九二八年到今），又是资本主义最先侵入的地区，时候则又在四军到来，会、安、寻、平四县斗争大大发展的时候。当这个案子提出的时候，提案人的演说是：“四军的人说了，有条件的离婚包含了封建思想。”这篇演说过后，案子就马上通过了。城区是新起来的，建设政权不上一月，男女问题已经闹得不亦乐乎。有一乡拒绝县政府派

去的宣传员，他们说："同志！你唔要来讲了，再讲埃村子里的女人会跑光了！"其实宣传员宣传的是"推翻封建势力""打土豪分田地"，离婚结婚问题也是照着法律讲的，但一经发动，就如水之就下不可制止。城郊一乡跑了十几个妇人，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乡苏维埃在老公们的迫切要求之下出了一张告示，上面说道："一般青年男女，误解自由，黑夜逃跑，纷纷找爱。原配未弃，新爱复来。似此养成，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偷偷摸摸，不伦不类……。"这篇告示，明显地描画了成年老公们的呼声。不过这种"不伦不类"的潮流——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

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贫农阶级已结婚的成年男子，一般说来是反对离婚自由的，但他们反对的态度不是那种反革命性的顽强态度，他们只觉得老婆跑了不得下地。他们的叹声是："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他们跑到乡政府请求设个法子，他们也不敢打他们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呕气的事。富农小地主阶级的成年男子们就完全不同，那种"捂了渠""一驳壳打死你"，都是他们反革命性的横蛮无理的表示。至于成年农民男子们为什么要反对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没有问题）呢？非常明显，他们是为了劳动力。

那末，农民男子是反对女子解放到底的吗？不是的，特别是贫农雇农阶级他们很快就会给予女子以完全的解放，在他们整个阶级解放完成了之后。他们之所以惧怕跑掉老婆，乃是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充分看见推翻封建剥削以后的成果的时候所发生出来的一种思想。只要土地斗争一深入，他们对于婚姻问题的态度就要大大改变了。



1930年5月，红四军在江西寻乌停留一个多月。图为毛泽东撰写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封面。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58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SB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